



马克思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马克思

刘文涛 著

现在有理由这样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它要比所有流亡者、鼓动家和中央委员会文明得多，因为它确实掌握着很多知识和精神力量。马克思本人是知名人物，众所周知，他脚趾尖里的精神财富要比其它一切社团和人们脑袋里的精神财富还要多。

——摘自柏林警察总监的秘密报告

前 言

卡尔·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人,是人类智慧的集大成者。

科学共产主义的产生首先应归功于卡尔·马克思。他是有史以来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巨匠,他同古希腊传说中天堂盗火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巨神普罗米修斯一样,忍受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在崎岖山路上奋力攀行,集毕生所学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这一宏大的理论体系包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他的最重要贡献是两大发现:第一,他把唯物主义引入社会和人类的历史研究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从而为人类提供了科学地认识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方法,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无产阶级是能够使全人类获得解放

的社会中坚力量。第二，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示出追逐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充分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过是历史发展中一定阶段的产物和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

另外，马克思在他所涉及的每一个研究领域（包括历史、语言学、军事学、文学、诗歌以及自然科学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并做出了贡献，他的科学研究事业为全人类创造出了极其宝贵的巨大精神财富。

站在他和他所创建的瑰丽辉煌的思想宝库面前，后人往往会惊讶地发出这样的慨叹：世界上难道真的出现过如此伟大的思想巨人吗？

马克思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且首先是一个杰出的革命家。在那物欲横流，散发着腐朽铜臭气味的西方花花世界中，他自愿放弃优裕舒适的物质生活，与传统的习惯势力彻底决裂，与各国反动统治者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亲身参加和经历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民主运动和伟大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他还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并领导第

一国际的活动。他还给予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巨大无私的支援。他的生命已经完全汇入了世界人民争取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中。

马克思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在对黑暗旧势力的斗争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和勇敢无畏的英雄本色,但他同时还是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普普通通的人。

他是一位充满男子汉激情而又十分忠诚的丈夫,一向把高尚浪漫的爱情视为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他不仅为燕妮美丽姣好的容颜感到无比骄傲,更重要的是夫妻两人有着同样美好的理想和追求,他们在命运的激流中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马克思无论是年轻时写给燕妮的情诗,还是晚年在短暂的离别中寄给夫人的信件,都充满了火一样的炽热和绵绵不尽的温柔,那是爱情与生活的深刻诠释和最高礼赞,今天读来仍让人感叹唏嘘,激动不已。

马克思还是一位充满爱心的慈祥的父亲和外祖父。他一生酷爱孩子,虽然为生活所累,但从把孩子看作一种负担,而认为孩子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最宝贵的礼物和财富,他甚至认为孩子们的喧闹嬉戏是天伦之乐中重要的一部分。他始终无微不至

地关怀着孩子们的生长发育和饮食起居,悉心指导他们的学业、娱乐和各方面的锻炼修养,希望他们将来都能在社会中立足,做一个具有高尚情操和真才实学的人。马克思与孩子们一起玩耍时非常认真投入,觉得这是人世间最天真无邪的时刻之一,也是最有效率的一种休息方式。虽然马克思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大学者和革命领袖,但在孩子们的眼中,他始终是他们最忠实的大朋友。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奥古斯特·倍倍尔有幸目睹了马克思晚年含饴弄孙时的动人情景,他激动地写道:“在这里,我非常惊喜地见到了马克思,这个当时被人诽谤为人类最凶恶敌人的人,多么亲热温和地同他的两个外孙玩耍,而孩子们又是怀着何等的爱依恋他们的外祖父。”

马克思还十分理解和珍视人与人之间纯洁真挚的友谊,他认为友谊是这个冷漠的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他向来以坦诚真挚的态度对待革命事业中的每一个同志和朋友,许许多多受过他帮助、关照和教诲的人都为有这样一位忠诚无私的友人而感到自豪。马克思与恩格斯并肩战斗了40年,在同整个官方世界的斗争中辗转于欧洲各国,过着漂泊不定的流亡生活。在异常艰苦险恶的环境中,他们始终风雨同舟,团结奋斗,休戚与共,结下了亲密无间的

友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一段传世的佳话。正如列宁所说:“古老的传说中有许多非常动人的友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兼战士创造的,这两个人的关系超过了一切古老的传说中最动人的友谊的故事。”

总之,马克思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和奠基人,其战斗的一生显得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同时,他又具有人世间真挚美好的情感和丰富高雅的生活情趣,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他都不愧为人类的楷模。1998年是这位历史伟人诞辰180周年(1818—1998)和马克思主义诞生150周年(1848—1998),在这一时期来临之际,撰写一部马克思的传记,以中国传统的人物传记形式和流畅的文笔,把马克思的人生经历、革命伟业和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介绍给国人,确是一件十分有益而又艰巨的工作。

本书是作者在利用大量中外文资料的基础上写出的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该书覆盖了1818—1883年马克思的全部人生轨迹,其重点放在他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斗岁月,对其成长历程和生活方面的情况亦作全面深入的探讨。作者力求坚持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坚持科学性与思想性的统一,从历史、社会和人结合的角度,对

马克思这位时代伟人进行深入细致的全方位的研究。既要阐述马克思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和各国民族民主运动立下的丰功伟业,也要深入研究他所创立的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既要全面追寻马克思的重要人生轨迹和革命、科研生涯,又要闯入他的私人生活和内心世界,细致生动地展示他的成长道路、家庭、婚恋、个人情感和爱好、道德情操等等;既要研究马克思本人的巨大历史贡献,又要深入探讨推动他做出这些贡献的历史的和时代的因素以及朋友、亲人和进步力量给予他的巨大鼓舞和支持;既要尝试用富有文采的笔触把马克思的一生写得生动感人,又要尊重事实,潜心研究探讨,写出一部学术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传记著作。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山东省教委和山东师大科研部门的大力支持,并深得许多学者惠助,老友王庆生先生还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建议并品评文字,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刘文涛

1997年8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金色年华	(1)
第二章 山道攀援	(22)
第三章 博士论文	(45)
第四章 初出茅庐	(63)
第五章 《莱因报》	(80)
第六章 世界公民	(106)
第七章 伟大的转变	(127)
第八章 潜心研究	(143)
第九章 伟大的友谊	(167)
第十章 首次合作	(189)
第十一章 留给老鼠牙齿去批判的书	(211)
第十二章 创建组织	(231)
第十三章 共产主义者同盟	(252)

第十四章	革命宣传	(273)
第十五章	《共产党宣言》	(292)
第十六章	革命风暴	(313)
第十七章	《新莱因报》	(337)
第十八章	反革命的进攻	(360)
第十九章	红色终刊号	(387)
第二十章	初在伦敦	(408)
第二十一章	总结经验	(429)
第二十二章	痛苦与欢乐	(453)
第二十三章	挚爱与友谊	(474)
第二十四章	经济学研究	(497)
第二十五章	新的高潮	(517)
第二十六章	第一国际	(541)
第二十七章	《资本论》	(565)
第二十八章	公社革命	(591)
第二十九章	《法兰西内战》	(614)
第三十章	反对机会主义	(631)
第三十一章	伦敦老人	(659)
第三十二章	巨星陨落	(687)
附录	马克思年表	(705)

第一章

金色年华

那是特利尔凶猛的儿子，
他性情暴躁。
他既不是走也不是跑，
而是风驰电掣般地飞奔。
鹰隼般的目光无畏地闪烁着。
他愤怒地伸出双手，
仿佛要把苍穹扯下凡尘。
这位不知疲倦的力士握紧拳头，

不停地冲击,宛如幽灵缠身!

——恩格斯

在众多伟大的历史人物中,卡尔·马克思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他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事业制定了理论和策略,他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天才导师和为人类最壮丽的革命事业奋斗的杰出战士,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组织者和精神领袖而载入史册的。他就像一个红色的幽灵,在欧洲和世界徘徊,在暴风骤雨中搏击前进,向着人世间的黑暗腐朽势力和旧秩序发起最庄严、最猛烈的战斗和冲击。

特利尔是位于德国南部莱因省的一座小城,它四面被群山环绕,山坡上是莽莽苍苍的黑森林,终年云雾缭绕,幽深静谧。莱因河的支流摩塞尔河从城西侧流过,碧波荡漾的河面上白帆点点,鸥燕翔集,两岸是茂密葱翠的草木和一望无际的绿色农田。特利尔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尤利·凯撒统治的那个时代,这一地区的作用就已相当重要,摩塞尔河就是由罗马人命名的。进入中世纪后,这里又成了教会大公国的首府,特利大主教的驻地,因此遗留下来的文物古迹甚多,有古罗马时代的城堡和王宫的遗址,有

大竞技场的残垣断壁，有众多巍峨壮观的大教堂，还有一座保存完整的宏伟的涅格拉门，它是 2000 多年前古罗马奴隶们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另外，特利尔还有一些历史非常久远的图书馆，收藏着丰富的历史典籍，文物珍品和图书资料。这是一座充满了浓郁民族文化气息的美丽如画的城市。

1818 年 5 月初，摩塞尔河谷呈现出一派春末夏初的美景：櫻桃花刚刚凋谢，翠绿的柳芽和粉红色的桃花已长满枝头，醉人的暖风轻柔地吹拂着山梁水面，抚摸着充满生命绿意的原野，优美粗犷的渔歌声在寂寥了一个冬天的江面上缓缓地随风飘荡，余音袅袅，不绝于耳。就在这充满盎然生机的时节里，一个小生命在特利尔诞生了。他的出生证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上面写道：“1818 年 5 月 7 日下午 4 时，特利尔高等上诉法院律师亨利希·马克思先生（37 岁）向本人（特利尔民政事务官员）出示了一名男婴并申报，该婴儿于 5 月 5 日凌晨二时降生于特利尔律师亨利希·马克思先生及其妻子罕丽达·普勒斯堡家中。他们拟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卡尔。”

特利尔是德国少数几个既保存了辉煌的历史，又公开展示其自由派观点的城市之一。在卡尔·马克思出生的那个年代，莱因省是德国经济和政治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这里曾于

1795 年至 1815 年并入法国。在长达 20 年的法国管辖期间,这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贵族和教会的产业被剥夺了,农奴制度和封建捐税被废止,城市和乡村获得了广泛的自治权利、开始实行陪审员制和公开诉讼制度,宪法还规定了人民理应享有的种种人身自由和权利。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已经深深地渗入到了这块古老肥沃的土壤之中。

自从 1815 年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后,封建王朝纷纷在欧洲各国复辟,莱因河以南的这一地区又被归还给了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的容克贵族们视莱因地区的市民阶层如洪水猛兽,生怕他们中间盛行的自由民主思潮会启迪人民的心智,从而诱发资产阶级革命,危及他们的政治统治。于是,他们在全面恢复旧秩序的同时,对莱因区采取了极其严格的专制统治和书刊检查制度。

但是,坚冰既已打破,碧绿便会从冻层中破土而出。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和丰富的煤铁资源已使这里变成了德意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心区域。莱因河上缭绕不断的蒸汽轮船的汽笛和岸边工厂传出的机器轰鸣声告诉人们: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迈着坚实的步伐势不可挡地向前挺进。

卡尔·马克思出生在一个充满市民阶层启蒙精

神的富裕文明的家里。马克思家族具有纯粹的犹太血统,这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马克思(Marx)这个名字是摩德凯(Mordechai)的简写,而摩德凯又一度写成马库斯(Markus)。据历史学家考证,这一家族是从波西米亚迁来的,其中许多人都是犹太教的教士和学者,还有人担任过重要的教职。例如,生活在16世纪的一些远祖(迈尔·卡岑耐伦博根等人)曾担任过巴杜亚的犹太法典高等学校的校长和当地犹太教的拉比,卡尔的祖父迈耶·哈勒维·马克思和大伯父萨缪尔·马克思也先后担任过特利尔犹太教的拉比,等等。但是到了卡尔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这一代时,家境变得十分清贫艰难。为了摆脱犹太教正统思想的沉重压抑,亨利希年轻时忍痛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并接受了基督教,从而获得了一张“进入欧洲文明的入场券”,在这件事上,他表现出了极为强烈的个性。经过数年寒窗之苦和不懈的努力,亨利希进入了法律界,后来成了特利尔的首席律师。

亨利希·马克思一生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他喜欢阅读古典文学名著,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尤其喜爱德国著名作家席勒、歌德和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作品。他更喜欢研究探讨哲学和政治学方面的问题,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等人推崇备至,并精通其学说,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他们著作中的精彩

篇章。他的这些爱好和思想倾向对青少年时代的马克思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亨利希·马克思为人谦和安分,在政治上持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不希望发生革命,只要求由普鲁士国王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制定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建立代议民主制度。但即使是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也受到了统治当局的猜疑和忌恨,据说是由于他在一次聚会上曾当众向法国国旗致敬并唱了《马赛曲》。由于亨利希·马克思为人忠诚正直,才华出众,曾被推举为当地律师公会会长,还出任过政府的法律顾问,在社会上颇有名望。

卡尔·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普勒斯堡是荷兰犹太人。她一生辛勤操持家务,含辛茹苦地养育了九个子女,并始终对他们的生活和身体状况操心劳神,这一点从保存下来的她与马克思的通信中便可以看出。但由于文化素养等方面的限制,她的精神世界是狭窄的,因此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所从事的工作的重大意义,总是希望儿子能从事一种比较稳定并有可靠经济收入的职业。她是一位慈祥善良的普通家庭妇女。

卡尔有三个兄弟和五个姐妹,他本人排行第三,上面有哥哥莫里茨·达维德和姐姐索菲亚。但由于达维德在4岁那年就夭折了,因此卡尔便成了家中

的长子。从童年时代起，卡尔在兄弟姐妹中就显得不同凡响：他的身体最为健壮，宽厚的肩膀，粗壮有力的四肢，躯干匀称结实，只是腿略显得短；他的性格十分活跃，精力充沛旺盛；他还具有极高的天赋和颖悟力。

大概还是由于这些缘故，卡尔一直是家庭中的宠儿。母亲说他天生命好福大，必将事事顺遂。而父亲则对儿子过人的才智和忘我的探索求知精神感到欣喜不已，他希望卡尔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发愤攻读，锲而不舍，成为一个富有理性和博爱精神的杰出学者和律师。因此，父亲非常关心卡尔的学业和思想成长，但他并不像当时一般的家长那样对儿子横加干涉，严厉管束，而是常常以一个好朋友的身份同卡尔进行交往。由于白天公务繁忙，他常常在晚间穿着睡衣轻轻走进卡尔的房间，与卡尔亲切地促膝长谈，向他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理想情操，介绍各类有益的知识 and 经验。在卡尔的身上，父亲寄托了无限美好的希望，倾注了绵绵不尽的舐犊深情。

1828年5月5日是卡尔的10周岁生日。他快乐极了，因为每年的这一天父亲总会满足他的要求，送给他一件有意义的生日礼物，这一次的礼物会是什么呢？父亲给他讲了一个善良的婆罗门教徒的故事。小卡尔聚精会神地听着，故事的情节深深地打动了

他，他不禁请求道：“再读一遍，爸爸！”

亨利希绘声绘色地朗读道：“我自己考验自己，必须承认，如果我也愚蠢的话，就不会有幸福。”

父亲的反复吟诵引起了卡尔的沉思，他把这句话深深地记在了心底。最后，父亲亲切地勉励他：“卡尔，你应该边读书边思考，这样就会得到许多启示。”

卡尔对父母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尤其是对父亲。他非常佩服父亲渊博的学识，但他更敬重的是父亲高尚端庄的人品和道德情操，因此，他喜欢就一些有意义的社会和人生问题与父亲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从父亲身上，卡尔学到了丰富的文学知识和哲学知识，继承了进行科学研究的严谨学风，也形成了济世救民的理想抱负和高度的民主主义精神。

但是，卡尔从未被父亲思想中的旧观念所束缚，他那强烈的求知欲望总是推动着他去不断地探寻真理，剔除谬误。卡尔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偷食禁果”的倾向常常使父亲感到忧心忡忡。但即使父子之间出现再深刻的分歧，马克思对父亲的尊敬也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减弱。他一生始终保持着对父亲的高度敬意和怀念，他把父亲的一张旧照片一直保存在身边，当他去世时，这张照片也随他装进了棺内。

据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说：“这个面孔对我来说似乎异常地美。他的眼睛和前额与他儿子的一样，

可脸的下半部，嘴和下颌部分显得更俊俏。整个看来显然是犹太人的面貌，是英俊的犹太人。”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马克思一家的邻居威斯特华伦对卡尔的青少年时代也发生过重要的影响。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是特利尔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菲利浦·冯·威斯特华伦在军政界都担任过要职，在整个七年战争期间是弗里德里希大帝最优秀的将领，著名史学家伯恩哈德把他誉为“总参谋部的天才鼓舞者”。他的母亲珍妮·威沙特出身于阿盖尔伯爵家族，这个家族在苏格兰历史上的地位十分显赫，并与英国王室有亲缘关系。

冯·威斯特华伦男爵本人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曾担任过特利尔的枢密顾问。与那些顽固守旧的普鲁士封建贵族不同，威斯特华伦男爵是一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开明知识分子，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与同样开明的亨利希·马克思结成了莫逆之交，两家的孩子当然也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威斯特华伦的知识和见闻都十分广博，能流利地讲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熟读过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但威斯特华伦最钟爱的还是文学，他喜欢荷马和莎士比亚等世界文学大家的作品，并能够整篇地背诵《伊利亚特》、《奥德赛》以及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诗篇和剧中人的独白。

在休假日里，威斯特华伦常常为两家的孩子们朗读，他那时而优雅动人时而高亢激越的朗颂声把孩子们引入了一个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世界，使他们深刻领略到了文学名著所产生出的巨大震撼力量和美妙神韵。每当此时，威斯特华伦的两位最忠实的听众就是卡尔·马克思和他的爱女燕妮。这时他们的年龄虽小，还不能真正领会到这些精典作品的全部含义，但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主义形象和莎翁笔下的生动人物造型都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无疑，威斯特华伦很快就注意到了聚精会神听他讲话的小卡尔，十分欣赏他的好学不倦和聪明伶俐，并注意在常识和德才等方面给他以有益的启迪。而卡尔则把威斯特华伦当作了崇拜的对象，并把他看成第二个父亲。这对忘年之交常常在一起阅读哲学经典作品，有时还外出散步，在美丽如画的林间小路上交谈学问。马克思始终对威斯特华伦怀有非同寻常的感情，1841年他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献给了这位男爵，上面写道：

“我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请您原谅我把我所爱慕的您的名字放在一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开头。我已完全没有耐心再等待另一次机会来向您略表我的一点敬爱之意了。

我希望一切怀疑理念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颂扬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老人。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个进步;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唯有这种理想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他从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前面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迷雾所吓倒,相反的,他永远以神一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目光,透过一切风云变幻,看到那在世人心中心中燃烧着的九重天。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对于我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

卡尔·马克思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度过他的童年时代的。家中的人口虽然很多,但生活却并不困难,亨利希·马克思的薪水足以保证妻子和孩子们过上富裕的中产阶级生活。卡尔出生时,他们一家住在布吕肯巷 664 号的公寓中(现为布吕肯大街 10 号)。1820 年,他们举家迁入西梅昂街 1070 号(现为西梅昂大街 8 号)居住,卡尔和兄弟姐妹们在这里度过了他们最快乐幸福的时光。

卡尔没有进过小学,他的小学课程全部是在父母的指导下完成的。父亲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丰富的知识为子女们的学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未经历普鲁士刻板严酷的小学教育方式也使得卡尔的个性

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他精力过剩，活泼好动，因此户外活动是他童年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由于他生来就强壮有力，而且知识广博，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组织才能，使他深受孩子们的喜欢和拥戴，自然而然地成了孩子中的首领。

在卡尔的带领下，弟妹及其他小伙伴们经常到附近的广场和花园中纵情奔跑玩耍，有时还到不远的马尔库山上做军事游戏，玩捉迷藏。卡尔还能极富创造力地编造出一个又一个离奇动听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述给孩子们听。尽管卡尔十分顽皮，常常用恶作剧来作弄他的弟弟和姐妹们，但由于他心地善良，待人真诚宽厚，又知道用什么办法尽快地赢回他们的好意，因此他始终是小伙伴们心目中的偶像。马克思的大姐索菲亚后来回忆道：“卡尔是一个身体结实、活泼好动的男孩，头脑灵活，很擅长组织各种游戏；为了这种天赋，姐妹们常原谅他的某些称王称霸的做法。孩子们成群地在紧挨着特利尔城门的小山丘上来回奔跑；卡尔有时自己制作一些并不可口的点心，硬要姐妹们去品尝，她们也很乐意，因为在这之后，卡尔就给她们讲有趣的故事。”

1830年，亨利希·马克思把12岁的卡尔送到了特利尔中学就读。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但过去的教育质量却很一般。当卡尔在这里就读时，恰逢一

位名叫维登巴赫的学者出任该校校长。维登巴赫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精通历史、文学和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学说颇有研究,是特利尔市康德研究会会长和文学俱乐部的负责人。这位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校长不仅思想开明,而且学风严谨,治校有方。他先后聘请了许多有真才实学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教师(其中有些还是小有名气的科学家),重建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对学生也提出了相当严格的要求,从而使学校的教学水平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维登巴赫还拒不屈从于普鲁士文化部的压力,大胆地向学生灌述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使这所学校成了培养进步人士的摇篮。卡尔和他的同班同学埃德加尔(燕妮的弟弟)最喜欢听维登巴赫翻天覆地的哲学和历史课,他们觉得听他的课能得到丰富有益的知识,同时也是一种高雅的精神享受。特别是当他们听说维登巴赫年轻时是一名英勇的雅各宾党人时,他们对他更敬佩了。有一次上课时,埃德加尔代表同学们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校长先生,请您为我们讲讲您年轻时那些不平凡的经历吧!”

听到这番话,维登巴赫显得很激动,沉思了片刻后,他用他那激越动人,略微颤抖的嗓音朗诵了一段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中的诗句,作为答复:

啊,请把我那少年时代还来,
在那时有诗的涌泉喷诵新醅,
在那时有雾霭一层为我遮笼世界,
未放的蓓蕾依然含着奇胎,
在那时我摘遍群花,
群花开满山谷。

.....

我是一无所有而又万事俱足,
我向现实猛进,
又向梦境追寻。
请整个地还我那冲动的本能,
那深湛多恨的喜幸,
那憎的力量,爱的权衡,
还我那可贵的,可贵的青春。

这是卡尔第一次走进学校的大门,他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学习生活。他虽然是班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学生,但无论在学习的勤奋程度还是在颖悟力方面,他都是全班的佼佼者。虽然他的学习成绩并不是最突出的,但凡是在需要创造性地发挥智力和思考能力的地方,他总能远远地胜过其他人。卡尔的班上共有 30 多个学生,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富商和官宦家

庭,年龄大都在 20 岁以上,但他们却对这位小同学始终抱有一种又喜又惧的感觉。据卡尔的女儿爱琳娜后来回忆:喜欢他,是由于只要他在场,同学间的交往嬉戏就显得充实而富有情趣;害怕他,则是因为他能写出辛辣的讽刺诗对他的对手进行嘲弄。

中学时代是卡尔·马克思的世界观发展形成的早期阶段——他开始思考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这一严肃的问题了。

就在他进入中学那年,法国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波旁复辟王朝。受法国革命的影响,德意志境内也形成了一股反对封建统治的人民起义浪潮。1832 年,各地群众数万人在普法尔茨的汉巴哈宫举行了全民大会,许多志士仁人在集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实现民主改革和国家的统一。

这次革命风潮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对年轻的马克思和他的同学们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认真阅读讨论全德人民大会制订的文件,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认识和厌恶。

为了压制学校里出现的自由民主思潮和学生们的反抗情绪,普鲁士文化部门对各校实行了一套非常严厉的管制措施:不允许学生看有进步思想的书籍,更不准他们集会和结社。但是在时代大潮的冲击

下,这些措施并不能把学生同外界火热的革命斗争完全分离开来。

在一个时期中,特利尔中学里不断出现一些宣传革命思想的进步书籍,还有人散发一些反对政府的战斗诗篇,引起了当局者的恐慌。一天,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学校,没收了学生手中被禁的书籍和诗刊,一个从事革命宣传活动的学生被他们粗暴地抓走了,从此杳无音讯。卡尔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的发生,心中激起了巨大的义愤。从这时起,他开始憎恨一切反动的东西。

在中学时代,卡尔在上学途中每天都要经过挤满逃难农民的中心广场和城中的贫民区,广大工农群众的悲惨境遇与富人们奢侈豪华、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常常使年轻的马克思感慨万千。当他把自己的见闻讲给威斯特华伦先生听时,这位见多识广的忘年朋友语重心长地告诉他:社会上还有许许多多不平等和丑恶黑暗的现象。就是在这一时期,卡尔从威斯特华伦先生那里第一次听说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思想,这件事无疑对马克思的一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在特利尔中学,卡尔度过了五年艰苦而充实的学习时光。由于他品学兼优,为人又很善良正直,因此很得教师们的钟爱,纷纷主动给他以各种帮助。特

别是维登巴赫先生,他从卡尔身上表现出的得天独厚的秉赋,高尚纯真的品格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看出,卡尔必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所以他尽自己所能给予了卡尔非同一般的关照,不仅亲自指导卡尔的学业,还常常与卡尔的父亲面谈,要求他对卡尔进行精心的培养。

卡尔没有辜负师长们的殷切期望,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和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之中。他十分重视文化课程的学习,不仅上课认真听讲,课后孜孜不倦地进行钻研,而且还充分利用各种机会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广泛浏览各类世界名著。家中的藏书他早已读遍了,学校图书馆是他经常光顾的场所,每天放学回家路过主要商业区西梅昂大街时,他还常常钻进那里的书店,去翻阅各种各样的书籍和小册子,直到店员来把它们收走为止。同时,他还积极大胆地向老师、父亲和威斯特华伦男爵求教。

卡尔不仅勤奋好学,而且还有广泛的业余爱好。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锻炼身体,因为他知道身体对于人的事业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他很欣赏一句名言:有了健全的身体,才会有健全的精神。他经常与小伙伴们作各种有趣的游戏,有时候,还结伴外出爬山。他还喜欢参加击剑运动,他击剑时动作十分灵活,气势异常勇猛,许多对手常常在他逼人的气势下

未经交手就败下阵来。在夏季,卡尔常常去摩塞尔河游泳,在湍急汹涌的河水中追波逐浪,随心所欲地畅游,累了就在岸边的草地上晒太阳,把身体晒得又黑又亮,父亲常常亲昵地戏称他为“黑毛狮子”。卡尔还特别喜欢散步和外出旅行,这两大爱好一直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常常利用节假日或课余时间,与同学们外出旅行游览。他们最常去的地方是该市重要的名胜古迹和风景区,有时也去郊外漫游野炊,在充满果蔬芳香的农田和果园里嬉戏玩耍。

由于卡尔热爱学习并善于学习,因此他在中学轻松地完成了每一门课程,并获得了优异成绩。1835年秋天,年仅17岁的卡尔中学毕业了。考试委员会在他的毕业证书上写下了这样的鉴定:“该生天赋极高,在古代语言,德语和历史课中表现出了极令人满意的勤勉,数学课是令人满意的勤勉,法语课是颇为勤勉……本委员会衷心祝愿该生因天资过人而获得美好的前程。”

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在中学读书的最后一年中,卡尔时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何在?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十分严肃的现实问题,每一个年轻人在选择自己前程的时候往往都不回避它。

当时卡尔和同学们就要毕业了,是继续升学深

造还是就业谋职,大家都在考虑自己的前途。一些人想当科学家或艺术家,在各自的领域里独领风骚;一些人希望当官,在官场中谋取功名利禄;一些人想去从军,在战场上创造出比拿破仑、征服王威廉和马其顿王亚历大在更为辉煌的业绩。另一些人则想去经商发财,过上豪华舒适的生活,个别人还打算去教会充当神职人员,用现世的虔诚清苦换取来世的幸福。总之,他们大都是从狭隘的个人私欲出发,以谋求个人的幸福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和选择职业的标准。

卡尔与同学们的看法截然不同。他当时还没有考虑好到底要选择哪一种职业,但依据自己的理想抱负和价值观念,他已经为自己将来的职业确定了一个崇高的目标:为全人类服务。他把这一观点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进行了充分的阐释。

在这篇论文中,卡尔首先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只能在自然提供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完全依赖于生存环境,而人则能通过自己的活动驾驭并改变环境,有选择和创造自己命运的自由,在这方面,人要比动物优越得多,这特别表现在人们选择职业方面。但他又指出: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职业,他写道:“我们并不总能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种种关系,还在我们

能对它们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就多少已经确定了。”这一见解是十分深刻的,它说明马克思此时已意识到人的活动与一定社会关系的有机联系。

但是,卡尔反对在选择职业时像奴隶一样地服从客观环境,他认为如果那样的话,其结果将会使青年人自暴自弃,随波逐流。他也反对仅仅从利己的私欲出发,在选择职业时只考虑怎样满足个人的愿望。他指出:“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自己而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名学者,伟大的贤哲,优秀的诗人,但是,他永远不能成为真正完美的伟人。”

经过深思熟虑,卡尔在论文中表达了自己在选择职业时与众不同的崇高志向,他写道: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的天性本应如此: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和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压不倒我们,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存在下去,永恒地发挥着作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

从这篇论文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卡尔·马克思

虽然在政治上尚未成熟,其世界观也远远没有定型,但在他的思想深处已经明确地产生了一种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全人类谋福利已经成了他的人生坐标和美好理想。

审阅这篇文章的教师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震撼,觉得文章的构思过于大胆夸张了,简直不能想象作者是一个只有 17 岁的青年。但他仍被卡尔的精神思想和伟大抱负所深深打动,评语写道:相当好,想象丰富,理解深刻。

第二章

山道攀援

因此我要勇往直前，
永不停止，永不偷闲，
切莫抑郁苦闷，沉默不语，
无所希求，无所事事！

——马克思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遵从父亲的意愿考取了波恩大学法律系。父亲非常关心儿子的前途，他做出这个选择是花费了一番苦心的。他认为学习法律容易

在政府部门谋得职位,而且,莱因省正在创建新法院,因此律师和司法工作人员的前程是有保障的。再说,子承父业还会有种种的便利。

1835年10月,马克思乘船沿摩塞尔河转莱因河航行,前往波恩求学。

这是一个金色的秋季,天高气爽,风光旖旎,空中飘浮着麦菽和瓜果的芳香,宽阔的莱因河欢快舒缓地流淌着,像是吟唱着一首古老优美的抒情诗。两岸是肥沃的黑土地,广袤无垠,色彩斑斓,草原、碧水、森林、田野、山脉……在秋风的吹拂下显得绚丽多姿,妖娆动人。瑰丽壮美的大好河山常常引得青年马克思引颈长望,赞叹不已!他决心要刻苦学习,向科学的高峰努力登攀,为了他脚下的这片热土和全人类的幸福,奉献出自己的全部人生。

波恩距特利尔有100多公里的路程,是莱因省的文化中心。虽然它比特利尔大不了多少,但这里的生活却显得更为丰富多彩,高雅浪漫。

马克思刚入学不久,就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的篇幅虽不算长,但字里行间都渗透了这位慈父在爱子身上寄托的全部期望和深情。他写道:“我希望你能成为我若是出生在你这么好的条件下可能成为的人。你可能会实现我的最美好的愿望,你也可能会摧毁它。”

在父亲的激励下,马克思的学习热情相当高,也非常勤奋,他一下子就选修了9门课程,其中除了法学专业的课程之外,还有文学艺术史、文化史和神学等课程。入学后不久他还加入了文学团体,对文学和诗歌创作如痴如迷。这时他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刻苦奋斗的精神,渴望能通晓一切,了解一切,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还有一定的盲目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看出来,他在信中说:“……对于那些强烈地震撼我心灵的一切,我从来都不能平静地去研究,也不能保持从容悠然,我总是满怀激情,不知休止地向前猛冲。我渴望获得一切,获得上帝美好的赐予,奋不顾身地投入知识的海洋,并且还想掌握唱歌和艺术。”

父亲担心儿子的身体承受不了,但又不愿意为他高涨的学习热情泼冷水。思虑再三,老马克思在给儿子的信中字斟句酌地写道:“在我看来,9门大学课程有点过多了,我不希望你选修的课程超过你身体和精神的承受力。当然,如果你并未感到有什么困难,倒也未偿不可。须知道,光阴似箭,学海无涯。”他在附言中还写道:“我读过你的诗,我亲爱的卡尔,坦率地向你承认,我既弄不懂得它的真正意思,也弄不懂得它的思想倾向。”

在第一个学期里,马克思学习确实十分专注刻

苦,除了认真听课外,他还买了大量各类书籍进行课外自学。由于他制定的自学计划过于庞大,正常的学习时间已经远远不够用,只得大量地占用休息和其它课外时间,往往一天要学习十七八个小时。勤奋的学习使他获益匪浅,但也损害了他的健康,一度得了比较严重的失眠症。

这次父亲不得不进行干预了,一再写信严厉告诫他:学习要有长远打算,切不可不讲科学地蛮干,否则只能适得其反。他语重心长地写道:“一个病夫学者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此,切望你用功不要超过身体许可的程度。另外,每天要进行运动,生活要有规律,我希望,每次拥抱你的时候都会看到你是一个身心日益健康的人。”

根据父亲的建议,圣诞节到来之前,马克思来到荷兰姨父尼姆韦根家作短期休养。由于马克思的体质不错,姨父的家乡又景色秀美,空气清爽宜人,经过半个多月的调养和游览,他又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面色红润的健壮的男子汉,于是他返回了校园。此时他已经减少了听课的次数,但这并不是出于身体方面的考虑,原因是他感到多数课程讲得都很平庸,不能使他满意。打这以后,马克思开始按照自己制定的计划进行自学,这种学习方式一直贯穿于他的大学生涯,并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

大学生活是严肃高雅的,同时也是浪漫而丰富多彩的,这对每一个年轻人都是一个极大的诱惑,青年马克思当然也不例外。

第二学期开始后,马克思已经熟悉并适应了大学里的生活,在同学们的再三鼓动和推举下,他出任了特利尔同学同乡会的主席。这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学生社团。由于法国七月革命在德国引起的革命风潮刚刚过去,对进步人士的政治迫害仍在严酷地进行之中,过去革命时期产生的一些进步组织或者消亡,或者转入了地下,代之而起的便是这种缺乏政治色彩的同乡学生联谊团体。

在同乡会中,年轻的学生们经常组织一些活泼热烈的活动,以释放体内过剩的精力和能量。这些活动浪漫而富有刺激性,有时也失之于轻浮荒唐,大学生们凑在一起狂欢、宴饮、嬉戏、搞恶作剧,痛快淋漓地渲泄自己的情感。有一次宴饮,马克思被同学们灌得酩酊大醉,结果被校方禁闭了一天,当同学们前去探视他时,大家竟然又在禁闭室里喝了起来。这种颓丧无聊的生活方式其实深刻反映了青年学子们对现实生活和当权者的强烈不满,也反映了市民子弟对贵族阶层的厌恶痛恨,他们常常借这种场合发泄这些情绪,甚至还出现过刀光剑影的决斗。1836年8月,青年马克思与人进行了一场决斗,其对手就是一

个贵族出身的纨绔子弟。

关于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形象,我们只能找到一幅保存在古老的石版画上的画像。画面上是一群正在寻欢作乐的特利尔同乡会的学生,马克思孤独地坐在一个角落里,面部表情凝重庄严,似乎在用深邃犀利的目光审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从这张画像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虽仍未完全脱去稚气并带有不少浪漫颓丧的情绪,但他已经是一个个性强烈,毅力坚韧,具有强大的自信心和战斗精神的人了,他左眼上方那块伤疤就是他与那个贵族子弟决斗留下的纪念。

在第二个学期中,马克思把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生活 and 娱乐上了。对于一个刚刚摆脱了父母的管束,并为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所陶醉的青年学子来说,他们心中并不全是欢乐,也充满了苦闷、惆怅和困惑以及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因此,在波恩大学生们狂欢宴饮的喧嚣声中,人们还能时常听到豪迈有力的歌声:

莫再幻想,生活不能等待,
难道我们还要驯顺地等待吗?
时候到了,要正告统治者:
人们渴望自由。

前进吧，青年们，前进！
光荣的教授们，
你们就陶醉于纸上谈兵吧！
轮船已升火待发，我们就要出航了，
打碎锁链，自由在等待着我们。
前进吧，青年们，前进！

马克思在波恩大学的第二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对此父亲深感忧虑，认为儿子快要把学业荒废了，于是决定让马克思转到柏林大学去求学。

青年马克思在去柏林之前回家乡度过了 1836 年的暑假。在这里，他与儿时的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再度相逢。

前面已经提到，燕妮是马克思的忘年之交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儿，生于 1814 年 2 月 12 日，年长马克思 4 岁。还在卡尔刚蹒跚学步的时候，燕妮就非常喜欢这个天真活泼的爱笑的小男孩，常常把他抱到自己家里玩。小卡尔也很喜欢燕妮的家，因为这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布娃娃、积木和木偶等等，还有许多生动有趣的小人书。稍大一点时，燕妮便经常与卡尔一起聆听男爵先生的教诲，一块儿外出游戏玩耍。那时她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天真烂漫，招人疼爱，一双黑亮的大眼睛和满头金发令人难忘，

不仅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也是年长兄弟姐妹们的宠儿。

光阴荏苒，十年左右的时间转瞬间就过去了，此时的燕妮已经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肌肤丰满的年轻姑娘，不仅长得恬静妩媚，气质高雅，而且聪慧异常，谈吐不凡，是当地公认的“舞会皇后”和“特利尔最美丽的女子”。更为可贵的是她具有一种罕见的才智和坚毅的性格，为了追求美好的人生理想勇于作出重大的牺牲。作为一个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名门闺秀，燕妮的身边自然有大批的爱慕者，其中不乏拥有大笔财富和官阶地位的人。但是，燕妮从未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表示过好感，她那颗高傲的心似乎已有了归属。就在这时，马克思回到了家乡。

自从只身来到波恩后，马克思的思乡之情日益强烈，这其中也包含着他对童年女友燕妮的思念，而且时间愈久他愈发现，自己对燕妮的日思夜想实际上是一种炽热浓烈而又十分严肃的感情——爱情。一年的大学生活已使马克思长成了一位相貌堂堂的男子汉，返乡与燕妮相见时，他对燕妮投去的目光也与以前大不相同了，他希望两人不仅仅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而应是朝夕相守、白头偕老的生活伴侣。这一愿望能够实现吗？在许多人眼中，马克思此时还是一个前程未卜的青年学生，既没有贵族头衔也没有殷实的家产，甚至连一份固定的职业也没有。但在

燕妮眼中，情形却完全不同，马克思那非凡的天赋、博大的胸襟和超人的智慧早已使燕妮为之倾倒，她以一种女性特有的微妙感觉意识到，这位年轻的学生迟早会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他就是燕妮苦苦等待的意中人。

这是一个令人惬意而难忘的夏天，马克思和燕妮经常避开家人和亲友秘密地约会。他们或者在寂静的田间小径上悠悠漫步，或是在农田果园的空地上促膝而坐，或者躺在摩塞尔河边金色的沙滩上，一面做日光浴，一面遥望那碧绿的河水和湛蓝的天空，脑海中产生出无限遐思。他们讨论的话题十分广泛：有趣的大学生活，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以及人生的意义，等等。随着思想火花的碰撞升华，两颗年轻的心更紧密地贴在一起了。

一天晚上，马克思紧紧地握住燕妮的手，柔声问道：

“你愿意与我相爱吗，秘密地相爱？”

燕妮用她那柔软炽热的嘴唇吻了马克思的手，轻轻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在这个柔和浪漫的仲夏之夜，他们在皎洁的月光下海誓山盟。

一个贵族家的千金小姐和一个前途未卜的市民子弟终于冲破了根深蒂固的世俗偏见私订了终身，

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勇敢举动。马克思把这件事视为他一生中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有了真正的心上人相伴人生,他将会义无反顾、毫无畏惧地去征服人世间一切丑恶、暴虐和黑暗的东西。而燕妮则知道,卡尔并不是一个钱袋鼓鼓的阔家显贵,自己将来的生活道路也绝不会一帆风顺。但她对于这一点十分明了:她所钟情的人绝不是一个凡夫俗子,而是一个顶天立地、超群绝伦的真正的伟男人。况且,这个人倾慕的不仅仅是她娇美娴雅的外貌,更重要的是她超人的聪慧、颖悟力和那颗坚贞执著而又充满柔情的心。

事过之后,这对情侣只向卡尔的父亲吐露了这一秘密,没有把真情告诉燕妮的父母。因为他们知道,威斯特华伦男爵夫妇虽然没有贵族式的偏见,但他们确实想通过缔结良缘使自己的爱女有一个可靠的归宿。

1836年10月,18岁的马克思,乘坐邮车只身赶赴柏林。这次他不像一年前去波恩时那样的快乐,那时他是怀着征服世界的雄心壮志离开特利尔的,情绪极为高涨。而此时他的心情却非常矛盾:既渴望学习,取得骄人的成绩;又舍不得与心上的恋人分开。在长途旅行中,这种矛盾的心态绞得他情绪烦乱,坐卧不宁,心里总是在想:燕妮现在怎么样了,我什么

时候才能再见到她呢？

10月22日，马克思来到了柏林，进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

当时柏林有30多万人口，是普鲁士王国的首府，城内除了林立的王宫、政府机构和众多的名胜古迹外，还有一家博物馆，一所科学院，一所大学，一所艺术学院，六所文科中学，三家大公共剧院，三家私人剧院和近600所各类学校，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柏林还是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到处是雄伟壮观的高楼大厦，装点得豪华气派的大商场里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式商品，街头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相比之下，特利尔和波恩简直就象是土里土气的偏僻乡镇。

柏林虽然是一座灯红酒绿的大城市，但柏林大学却完全没有波恩大学里那种奢华颓废的浮荡气息。这是一所校风极严谨的世界名牌大学，拥有一流的教学设施，数百位著名的专家学者和2000多个大学生，是一座哺育各类专门人材的摇篮。正如路德维希·弗尔巴哈所描述的：“无论在哪个大学都看不到这种对工作的热爱，这种对大学生的琐碎事情以外的事情的兴趣，这种对科学的吸引力，这种安静和肃穆。同这个劳动之宫比起来，其他大学就是不折不扣的酒馆。”

由于有许多马克思非常崇拜的著名学者在这里任教,所以在初进柏林大学时马克思听课十分认真,不仅选修了许多法律专业的课程,而且还旁听了哲学、历史等其它专业的课程。一个学期过后,他发现一些教授其实徒有虚名,除了照本宣科地讲述一些老掉了牙的旧理论外,毫无建树和创新。失望之余,他又像在波恩时那样,躲进租借的公寓里,埋头钻研自己喜爱的各门知识,在科学的海洋中自由自在地遨游,只有少数几位有真才实学的教授讲课时才能在教室里看到他的身影。

同许许多多热血青年一样,马克思年轻时也富有激情和幻想,具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调,并试图以诗歌这种主要属于青年人的形式把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表达出来。而对燕妮的爱慕和思念之情更使他觉得有股汹涌的情感在胸中流淌澎湃,大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于是,在柏林求学的头两年中,在认真研究社会科学之余,马克思还花费了很大精力潜入诗歌王国中徜徉,写下了大量动人的诗篇。仅在第一年里,他就寄给燕妮三本诗集——《爱情集》(一)、《爱情集》(二)和《诗歌集》。封面上的题辞是:“献给我亲爱的和永远热爱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据马克思的姐姐来信说,燕妮是“含着爱和痛苦的泪水”读完这些诗篇的。

从保留下来的一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诗感情真挚,清新隽永,字里行间充满了高尚的情操和火一般的青春气息。其中有几段这样写道:

在掷骰子的时候,
我会朗诵你的名字——燕妮,
天上的和风把它吹送给我,
像送来一股幸福的信息,
我将永远反复吟唱这名字,
让世人知道,
燕妮本身就是爱情。

.....

燕妮,如果我控制了巨雷之声,
如果我掌握了宇宙的辞令,
那么我就以明亮的闪电般的文字
向着整个空间传达对你的爱慕之情,
让世界将你牢记!

.....

燕妮,发笑吧! 你定会惊奇:

为什么我的诗篇只有一个标题，
全都叫作“致燕妮”？
只有你才是我灵感的源泉，
希望的光辉，慰藉的神灵，
疲惫地照耀着我的心。

.....

燕妮，即使大地旋转回翔，
你比太阳和苍穹更为光亮，
任凭世人对我百般刁难，
只要你爱我，我一切甘当。

.....

我的思念在心中徜徉，
但思念一词已无法表达我的热肠；
它像烈火在熊熊燃烧，
我的心则在火中激荡。

面对复杂险恶的社会现实，马克思感到他与燕妮的相爱之路不会是平坦的，狂风和暴雨将会随时迎面袭来。但是，马克思决不会向任何阻挡他前进的

势力屈服，他要勇敢地战胜生活的挑战，摘取那甘甜的爱情之果。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

如果有那么一股
汹涌澎湃的波涛，
向前奔，不绝滔滔，
奔向那险滩隘道。
向着我和我的渴望猛扑过来，
想把我摧垮压倒，
后退——这事儿我才不干，
这字眼——我连看都不看。
为了达到目的，
我愿和风浪搏斗，
甚至烈火的威风，
也会被我制服。
即使和我一起战斗的人，
一个个全都牺牲，
即使他们全都意志消沉，
对付任何力量我还是能够胜任！

阅读了这些烫手的诗篇，燕妮的心情激动得难以平静。同马克思一样，她也对自己的恋人满怀痴情和思念，大概由于爱得太深了，与此同时也产生出几

分嫉妒和担心。这并不奇怪,马克思这一年才18岁,只身住在充满诱惑和陷阱的现代化大都市中,燕妮认为这是对他们爱情的一个威胁。另外,她此时还面临着来自两个家庭中一些人的阻挠,特别是她的异母哥哥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一个思想反动守旧的人,此时担任特利尔政府枢密顾问),竭力反对她与马克思的婚姻。所以,燕妮此时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在忍受着十分痛苦的煎熬。燕妮给马克思写了许多回信,其中一封信中写道:

“我多么爱你!我所有的心事、想法和念头,一切的一切,过去、现在和将来,只能归结为一个声音、一个象征和一个语调,如果它响起来,它只能是:我爱你!这是难以用语言形容和不受时空限制的。”

她在另一封信中则写道:

“我越是沉湎于幸福,那么,一旦你火热的爱情消失,变得冷漠矜持,我的命运就会越可怕。卡尔,你应看到,由于害怕保持不住你的爱情,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欢乐。”

从同一个时期马克思的姐姐索菲亚给他的信中,也可以看出燕妮当时那种忠贞而又十分脆弱的心理状态。她写道:

“燕妮爱你,如果不是年龄的差距使她感到忧虑的话,那就是由于她父母的缘故。现在她将尝试使他

们逐渐有所准备；然后你本人再写信给他们；你在他们那里是很受重视的。燕妮时常来看我们。昨天她还在这里，她接到你的诗‘悲喜交集之泪’，她哭了。爸爸妈妈和我们姐妹们都很爱她，尤其是后者，爱她胜过所有的人，10点钟以前从不让她离开我们，你满意吗？再见吧，好卡尔，我衷心希望你能完美地完成你的心愿。”

燕妮非常珍爱马克思为她写的那些诗篇，并把它们精心地保存了下来，从未给任何人看过，直至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对有情人经受住了磨难的考验。1837年3月，马克思正式向燕妮的家人提出求婚。这件事在威斯特华伦家里引起一场巨大的风波，燕妮也为此病倒在床上。父母看出女儿为了纯真的爱情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于是同意了她的请求，但要求他们在马克思毕业后才能举行婚礼。这是这对青年男女对现存社会 and 传统观念进行的第一次抗争。虽然他们还要等上漫长的7年，但他们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1836年至1837年期间是马克思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诗集外，他专门为父亲的生日写过一本诗集，并创作了小说《蝎子与弗里克斯》和剧本《奥兰尼姆》。

正如马克思自己晚年认识到的那样，他的作品

的文学价值并不算太高,自己也很难在这方面有大的突破,而且他的兴趣和主要研究领域仍然在社会科学方面,搞文学创作只不过是為了发泄一下“某种情感的热力和对大胆飞驰的渴望”,并不是为了拿去发表。但是,诗歌和戏剧等历来是革命者进行战斗的重要武器。马克思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除了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和火热的情感之外,也抒发了自己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一切反动势力的痛恨以及对那些麻木不仁、碌碌无为的社会庸人们的厌恶,同时,他还热情地歌颂了那些为摧毁旧世界而英勇斗争的大无畏的革命勇士。他的几段诗这样写道:

我宁愿被碾死在火焰车下,
为的是在永恒之中欢舞!
如果还有别的障碍,
我也要跳向那里,
哪怕把阻挡在我与永恒之间的世界摧毁!
必须诅咒这个世界,
扼住这个顽固的东西。

.....

.....我轻蔑地把手套,

掷向世界宽大的面庞，
这小巨人呻吟着轰然倒下，
但我的火焰不会被它的残骸熄灭。
我像神一样胜利地巡视这废墟，
我的句句话都是火焰和行动，
我的胸怀如造物主一样博大。

.....

我再不能安静地生活，
心灵已被紧紧扼住，
我再不能悠闲度日，
要狂飚似地向前突奔。
因此我要勇往直前，
永不停止，永不偷闲，
切莫抑郁苦闷，沉默不语，
无所希求，无所事事！
切莫顾虑重重，
徘徊不前忧心忡忡，
因为我们还有：
渴望、希望和作为。

在文学艺术的殿堂里自由地翱翔了一段时间以

后，马克思又回到了社会科学领域，以更大的激情和坚韧的毅力进行刻苦的攻读。大概从1837年下半年起，马克思把主攻方向转向了自己所钟爱的哲学，以他特有的顽强精神投入到了一场剧烈的“精神搏斗”之中。

在柏林大学里，马克思要比在波恩时还要勤奋刻苦得多，学习成了他生活的唯一内容和动力，也是他最大的人生需要和享受。他的精力和工作能力是非凡的，往往能够同时干几件事情，例如，他能同时阅读研究几本著作，作笔记，并随时记下自己的心得和灵感，还不耽误给燕妮写诗。但他仍觉得时间不够用，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用于读书，他甚至闭门谢客，几乎与外界断绝了来往，既不去游玩，也不交友应酬。有人提出要陪他去结识当地官僚界的同乡，被他拒绝了，连父亲托他去探望老朋友他也不愿意去，为此他受到了父亲的指责，说他过于孤僻了，不利于将来在社会上的发展。其实，马克思只是觉得跟人闲聊会耽误了学习时间。

这个时期是青年马克思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一个充满兴奋、狂热和苦心探索的阶段。虽然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但他对这个世界已经有了自己的新见解，从而使他的成熟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我们从马克思1837年11月

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他写道：

“在这种继往开来的时刻，我们感到不得不用思想的锐眼来观察过去和现在，以求达到认识我们现实的境况。世界历史本身也确实喜爱作这样的回顾，把目光投向过去，这常常赋予它一种倒退和停滞的假象，而实际上它只不过坐在靠椅上，为了理解自己，从精神上洞察自己的精神的活动。

但在这样的时刻，个别的人往往柔情满怀，因为任何一种转变部分地是优美的绝唱，部分地是伟大新篇章的序曲，这种新篇章力求赋予正在消失的丰富多彩的色调以牢靠的形式。然而我们倒想给已经一度经历过的东西树立一座纪念碑，以使它在我们的感情中重新赢得它在我的行动中已经失去的地位……

所以，当我在这里度过的一年行将结束，回顾一下其间所经历的各种情况，以便回答你，我亲爱的父亲，从埃姆斯寄来的那封极其亲切的信的时候，请允许我像考察整个生活那样来观察我的情况，也就是把它作为在科学、艺术、个人生活方面全面地展示出来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来观察。

当我离开你们的时候，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新

的世界，一个爱情的世界。甚至到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异常高兴，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烧起我对生活的渴望。这次旅行甚至使我非常难受，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经得起消化，最后，艺术也不如燕妮那样的美。”

马克思这一时期阅读的书籍非常丰富，大大超过了教授们布置的参考书的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他对哲学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系统深入了，先后精心研读了康德、费希特、伏尔泰和卢梭等人的哲学思想。由于他用功过度，常常达到通宵不眠、废寝忘食的程度，因此身体再次受到了严重损害。1838年春天，他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嘱咐，到柏林附近的施特拉劳去疗养。

施特拉劳是一个美丽宁静的小渔村，是休息和沉思的理想之地。被大诗人海涅誉为能“涤荡灵魂，冲淡茶水”的施普雷河环绕着她匆匆地流过，像一条玉带伸向远方，船只在河面上穿梭往来，空气清新爽朗。河边有金色的沙滩，再往远处则是大片灌木丛和绿油油的草地，开放着各种不知名的野花，还有野葡

萄等浆果点缀其间，姹紫嫣红，争芳斗艳。马克思在这里住了三四十天，天天在河边漫步，有时也去河中划船，还同村民打过一次猎。几天过去后，他觉得自己的精神已有了较大的恢复。

由于医生禁止读书，所以马克思来疗养时基本没带来什么书籍。但对于马克思来说，不读书是一种比生病更大的痛苦，而随着身体的恢复，这种痛苦便愈加强烈，于是他又开始读书了。阅读什么书呢？正巧手头有一部黑格尔的著作，这样，马克思在疗养期间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第三章

博士论文

要知道,我宁肯忍受痛苦,
也不愿受人奴役。
我宁肯被锁在山岩上,
也不愿作宙斯的忠实奴仆。
——埃斯库罗斯

初入柏林大学时,马克思也曾涉猎过黑格尔的著作。但由于黑格尔哲学是为普鲁士专制统治服务的官方哲学,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其文字又晦涩难

解,所以马克思对它缺乏兴趣,没有进行深入研究,而是遵守对父亲许下的诺言,偏重于钻研法律。

但是,马克思并不甘于只掌握支离破碎的知识和具体的法律条文,他希望把这些知识全部弄懂吃透,并抓住其精髓。但他很快就发现,没有哲学作为武器,这一点是不可能达到的。于是他又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并打算写篇有关法哲学方面的论文,这便是马克思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最初的动因。当然,他所以研究哲学也与他希望深刻认识当时充满矛盾斗争的现实生活有关。马克思在 1837 年底给父亲的一封信中指出:“我又一次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这样我就必须怀着良知再次投入她的怀抱。”

如果马克思此时遵循父亲的安排,循规蹈矩地学习法律的话,那么,他将会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位著名的律师或法官,过上安安稳稳、富足殷实的物质生活。但他却走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这意味着他选择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险径,沿途到处是悬崖峭壁、荒草荆棘,充满了危险和不测,只有那最勇敢的登攀者在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价之后,才能到达胜利的顶点。

艰苦的研究工作开始了。马克思广泛地研读哲学书籍,先后研究了康德、费希特、卢梭和伏尔泰等人的思想,并企图把这些思想引入法学领域,以便能发现并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法哲学体系。但他的一次

次努力都失败了,最终他得出一个结论: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过于抽象空洞,严重脱离实际,它的狭隘性和反科学性不能引导他有效地解决学术研究和现实社会中的问题。

这样,马克思于1837年春天在斯特拉劳疗养地再次把目光转向了黑格尔。他利用这一空闲时间认真拜读了黑格尔的一些代表作,并写了大量的批注和摘要。在黑格尔的书中,马克思发现了一个令人振奋、朝气蓬勃的新世界,特别是黑格尔关于自然、社会和精神世界总是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的观点给了马克思以巨大的启迪,使他感到振奋不已。他在一首诗中激动地写道:

我发现了最崇高的东西,
并领略了其中的奥秘,
因此我将和神一样巨大,
并像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
在波滔翻滚的思想海洋上,
我曾长期漂流寻觅,
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语言,
我把它紧紧地抓在手里。

1831)是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出生于斯图加特的一个官宦之家,曾先后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任哲学教授。黑格尔早年曾受到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主张对德国进行政治改革,但晚年走上了与普鲁士专制政权妥协的道路,在他身上集中反映出了当时德意志资产阶级的两重性——革命性和软弱性。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他把整个世界看作是“绝对观念”的体现和发展,而这个“绝对观念”其实就是上帝的代名词。从这一点出发,黑格尔把普鲁士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束缚人们思想的基督教说成是合理的、必然的,因此他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赞扬,他的哲学也被推崇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他去世的前一年(1830年)被当局任命为柏林大学校长。

但是,这些短视的当局者没有看到黑格尔哲学中的另外一面——埋藏在其保守的体系中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黑格尔认为,宇宙和人世间的一切都不是永恒存在的,没有一世不变的东西,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人类社会也是从低级到高级无休止地向前发展的。根据这个原理,普鲁士的封建专制体当然也不是永恒的。可见,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是保守的,其方法论却是革命的,这一严重的内在矛盾决定了黑格尔学派并不是铁板一块,迟

早会发生剧烈的分化。

果然,黑格尔逝世后,由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发展和矛盾的激化,黑格尔学派迅速地解体了。那些顽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保守势力死抱住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不放,竭力为专制制度辩护,形成了黑格尔右派,即老年黑格尔派。而那些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则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批判封建制度、宗教和社会现实,形成了黑格尔左派,也称青年黑格尔派,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的年龄大都在30岁以下。这两大学派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出于他们对黑格尔哲学的不同理解,实质上体现了资产阶级与封建保守势力之间的尖锐对立。

马克思在斯特拉劳疗养期间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成员,并参与了他们的活动。当然,马克思转入青年黑格尔派也与他的大学老师爱德华·甘斯教授有一定关系。甘斯是黑格尔的得意门生,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理解很深,正是他生动的哲学课使得马克思对黑格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深刻的认识。后来,马克思参加了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中坚组织“博士俱乐部”,这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

博士俱乐部是由一些持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大中学教师和博士组成的学术团体,其成员依靠共同

的信念和追求结成真挚牢固的友谊，参加这一组织的人必须具有相当高的才能和天赋。该俱乐部的精神领袖是柏林大学神学系讲师布鲁诺·鲍威尔，他是一个学识渊博、思想激进的战斗的无神论者，写过《约翰·福音批判》和《新约福音批判》等著述。他主张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把人类从宗教的压抑下解放出来，而只有自我意识才能完成这一任务。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有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和阿道夫·鲁腾堡等人，都是当时哲学论坛上的风云人物。他们经常在施特黑利咖啡店中聚会。

施特黑利咖啡店位于耶戈尔大街和夏洛丹大街的交叉口上，它在德意志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这里距柏林大学只有几分钟的路程，热情的店主人又为顾客们准备了不少开明的报纸和政治性刊物，因此许多大学生、教师和知识界人士都喜欢来这里聚会。作家弗里德里希·查斯于1846年在一本书里写道：

“在施特黑利咖啡店里，柏林人为了议论种种新闻而汇聚在一起。在这里，诗人海涅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夹馅蛋糕，一面创作他辛辣讽刺柏林上层社会的短嘲诗；在这里，20年代的戏剧评论家们写文章评论使整个旧欧洲为之倾向的仲塔格的才华；在这里，

‘青年德意志’运动受到七月革命的影响而壮大起来；在这里，进行过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热烈争论；也正是在这里，‘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思想成为过时的现象，而《哈雷年鉴》和《莱因报》为它们的枪炮备足了弹药；在这里，柏林的新闻记者们给全德国的报刊撰写文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年轻的德国人民和新时代是在这里取得胜利的。”

在施特黑利咖啡店的“红厅”（其墙壁全部为红色，故称）中，博士俱乐部的成员们一边喝着咖啡和葡萄酒，一边热烈讨论一些都感兴趣的热点问题。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共同研究黑格尔哲学，批判神学蒙昧主义，捍卫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并且试图辩证地探讨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是博士俱乐部中最年轻的一位成员，其他人的年龄都比他大许多，而且在哲学研究领域已有所成就，确实值得马克思向他们学习请教。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位新来的年轻人的思维不仅极其敏锐深邃，而且具有一种无畏的献身精神和无与伦比的感染力，所以他们很快就对他刮目相看了。他们在一起进行研究讨论，交流心得体会，马克思从中获得了不少知识和灵感，与此同时，他的言论和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这里的每一个人，特别是他对黑格尔哲

学体系的精辟见解和以辩证的方法考察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的新思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推动了该俱乐部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马克思对博士俱乐部及其成员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巨大深远的,俱乐部的一些成员多年后对此仍记忆犹新。科本用充满激情的语言赞叹道:“你是一座思想的仓库,一所大学,或者用柏林的土话说,你那聪明的头脑如同牛头一般大。”他还很坦率地承认,当时他是在马克思的指导下思考问题和写作的。

另一名博士俱乐部的成员莫泽斯·赫斯则写道:“我所崇拜的马克思博士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他将会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击。在他身上既有最深奥的哲学的严肃性,也有最机敏的智慧。请你想象一下,要把卢梭、伏尔泰、费尔巴哈、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成一个人,……这才会使你得到一个关于马克思的概念。”

就连博士俱乐部的头面人物鲍威尔也对马克思非常钦佩,不久,两人就结成了至交。在每个周末的晚上他们几乎都要见面,或者在街头漫步交谈,或者坐在房间里面对面地研究探讨。当讨论进入高潮时,便常常能听到他们高亢激昂的话音和爽朗的笑声。鲍威尔对他与马克思的这段交往记忆尤深,他后来在柏林时写信给马克思说道:

“我经常去这里的娱乐场所和特利尔旅馆的教授俱乐部。但无论哪方面都比不过咱们的俱乐部，咱们的俱乐部以前总是充满精神生活的乐趣，这种岁月已一去不返了。”

从保存下来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博士俱乐部的时间虽然不算长（到他毕业时为止），但他已经以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深刻的批判精神成为俱乐部的精神支柱之一，博得了人们的尊重和赏识。人们已初步认识到马克思是哲学界冉冉升起的一轮旭日，终有一天，他将成为一位思想的巨人。同时，一些细心的人也发现，马克思的思想中已经有了许多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的东西，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青年黑格尔派只是把辩证思想用于对宗教的批判，并不去接触现实，而马克思虽然并不否认批判宗教的巨大意义，但他已经越来越企图用哲学武器去触及现实社会了。正如几年后他在评价博士俱乐部时所说的：“……对宗教的批判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自从马克思潜心钻研哲学以后，他就决心献身于科学研究事业，毕业后到大学里任教。马克思的好友鲍威尔此时已到波恩大学任教了，并颇有影响，他

希望马克思也到这里来，共同发展哲学研究事业。因此，马克思希望毕业后到波恩大学谋得一个副教授的职位。这样一来，马克思就违背了父亲当初为他制定的求学目的——到法律界服务。

为此，父子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双方各持己见。由于马克思陈述的理由非常充分，况且父亲也不是一个固执守旧的人，争论的结果，父亲十分不情愿地作出了让步，同意了马克思的选择。但是，父亲对马克思总是放心不下，觉得儿子到现在还不知道将来如何维持生计，他希望儿子至少能过上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

1838年初，操劳了一生的父亲病倒了。5月间，马克思接到母亲的急信后迅速赶回家乡。不久父亲就病故了，享年61岁。马克思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把父亲安葬在山下的一块墓地里。

父亲的去世给马克思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马克思一向视父亲为自己的启蒙老师和人生知己，自己有什么苦衷和心事都可以毫无保留地向他倾吐，而父亲总是以一位谦谦长者的身份向他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忠告，虽然有时言词比较严厉，但殷殷爱子之心和舐犊深情却溢于言表。而且，父亲从来不蛮横地干涉马克思的私事，其中包括他的个人抱负和婚恋问题。在马克思心目中，这是一位天使般的慈

父,是自己最亲密的长辈。父亲的去世还使马克思及其家人的物质生活出现了危机,母亲一人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用微薄的收入含辛茹苦地抚养七个儿女。艰辛的生活使母亲迅速地衰老了,情绪也变得很低落,她不能理解儿子为什么要致力于对生计毫无帮助的哲学研究。而马克思此时虽然也想尽快完成学业,但他那力求完美的性格和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却极大地阻碍了他这样做。

1839年初,马克思开始准备他的博士论文。他这一个时期的学习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学习任务大大加重了,而生活费用则有所下降,因此马克思尽量减少了不必要的社会活动和应酬,躲进在路易森大街45号A租借的寓所(这是马克思在柏林求学期间住过的多处住所中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处)里闭门不出,日夜埋头于书刊和稿纸堆中。

这一时期,马克思把主攻方向放在了哲学史上。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全面研究了黑格尔的哲学,而后再系统研究了古希腊哲学,例如,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斯多葛学派和怀疑主义,等等。

马克思为什么要研究古希腊哲学呢?

一些史学家认为:这是由于古希腊哲学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很大,马克思当然也不例外。但这只是一个次要原因,其主要原因是:马克思认为应该吸

收古希腊哲学家的战斗精神,把理论研究与现实斗争紧紧地结合起来,发挥哲学在改造社会中的巨大作用。他还认为,为了对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基督教进行批判,有必要深入了解基督教产生的历史。总之,马克思认为要理解未来,首先必须知道过去,这是他研究哲学史的最根本的动因。就是在研究古希腊哲学的时候,马克思爱上了伊壁鸠鲁,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把人从对神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从而赋予人类自由的精神。

为了把问题搞深搞透,得出科学的结论,马克思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他阅读了大量古代和现代学者的有关论著,这些学者有:塞克斯都、第欧根尼、拉尔修、亚里士多德、欧瑟比、辛普利修、伽桑狄、斯宾诺莎、霍尔巴赫、莱布尼茨、谢林和黑格尔等等。经过认真分析研究,他于当年就写出了七大本笔记(即“柏林笔记”),初步确定了他的博士论文的命题和基本观点。马克思决定在论文中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进行比较研究,并做出深刻的评判。他把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确定为《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70),古希腊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的创始人之

一。他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最小的,不可分的物质微粒,虚空则是原子运动的场所。无数的原子在无限的虚空中不间断地作急剧的直线运动,并相互结合,从而使宇宙千姿百态。根据这一观点,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其特定的原因,都是必然的。

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公元前 270),古希腊晚期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并有所发展。他认为不可分的、绝对充实的原子在大小、形状和重量上是不同的;由于内部的原因,原子在虚空中不仅有直线的运动,也有倾斜的运动。伊壁鸠鲁克服了德谟克利特排斥偶然性的观点,并在认识论上强调了感性认识的作用。

这两位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都在哲学和自然科学史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对伊壁鸠鲁的认识上却存在一些谬误,特别是他的关于原子脱离直线进行偏斜运动的学说,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否定,认为他歪曲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

通过认真考察,马克思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伊壁鸠鲁不仅没有歪曲原子论,而是继承并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这一学说,使之进一步完善。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总结了这两位哲学家对人类精神发展起的作用,同时,详尽指出了二者在自然哲学方面

的差别：

第一，德谟克利特论证了原子的物质存在，而伊壁鸠鲁则对原子的概念和本质做了深入研究。

第二，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始终在虚空中作急剧的直线运动，因而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必然的，而伊壁鸠鲁则认为原子不仅有直线运动，也有倾斜运动。

在研究中，马克思更欣赏伊壁鸠鲁的观点，因为从物理学上看，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说或许没有什么依据，但在哲学上，这一观点却具有重大意义。它实际上提出了自我运动的辩证原则，强调人的精神自由和反抗命运的能力，并可以推动反对专制暴政和思想束缚的正义斗争。因此，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热情地讴歌了伊壁鸠鲁的哲学，赞扬它是日落时天边的彩霞，如同英雄之死那样悲壮，其目的就是颂扬自由精神和批判宗教蒙昧。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伊壁鸠鲁哲学中的某些错误。例如，伊壁鸠鲁过分强调了感性认识的作用，认为只有感性知觉才是认识真正的准绳，这显然是不对的。伊壁鸠鲁还过分强调了个性的自由，认为人脱离了社会和集体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对此马克思持批判态度，他主张：人是社会的人，人们只有在一定社会中，通过相互作用，发生一定关系，才有

可能得到一定自由,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孤立地存在。

马克思在论文中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无神论的思想,大力倡导思想自由和精神解放。他在论文的序言中写道:“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的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肝脏中跳动着,它将永远像伊壁鸠鲁那样向着它的反对者叫道:‘那拼弃群氓的神灵的人,才是诚实的,反之,那同意群氓关于神灵的意见的人才是不诚实的。’……‘我痛恨一切神圣’,要‘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下的神灵。’”在论文的末尾,他还用伊壁鸠鲁的话猛烈抨击了那些信仰神的人是“无知和迷信”。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希望人们向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学习,坚决反对宗教迷信和暴政,向一切不公正的丑恶现象进行坚决斗争。他极其热烈地赞颂了伊壁鸠鲁反对宗教和黑暗腐朽势力的大无畏战斗精神,为此他在论文中援引了卢克莱修的一段著名诗句:

当人类受到宗教的重压,
在大地上悲惨地呻吟,
而她从天际昂然探首,
用狰狞的面孔怒视人们之时——
一个希腊人首先抬起了凡人的眼睛,

勇敢地抗拒那个恐怖。
没有什么能使他退缩，
无论是神灵的威名、
 雷电轰击或骇人的雷霆……
由于这样，宗教被打倒了，
他的胜利把我们凌霄举起。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大学时代寒窗苦读的心血结晶，全面体现了他当时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并带有青年黑格尔学派思想影响的鲜明印记。论文表明，马克思对古希腊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已达到了相当高深的程度。同时也表明，马克思已经成了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战斗的无神论者，他把哲学研究与对宗教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紧密结合为一体，决心要象古希腊神话中造福于人类的普罗米修斯那样，冲破一切束缚和禁忌，冒着生命危险，探求真理，改造社会，实现自己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崇高理想。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他用震撼人心的语言尽情讴歌了这位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悲剧式的英雄：

普罗米修斯承认：

说实话，我痛恨所有的神明。

这是哲学的自白，是他自己的格言，用以表示他

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上的神明……

对于那些认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已经恶化而欢欣鼓舞的懦夫们，哲学再次以普罗米修斯对众神的侍者海尔梅斯的话回敬了他们：

要知道，我宁肯忍受痛苦，
也不愿受人奴役，
我宁愿被锁在山岩上，
也不愿作宙斯的忠实奴仆。

1841年春天，马克思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到哪里去申请博士学位呢？马克思颇费了一番琢磨。

当时在柏林大学进行论文答辩不仅程序相当复杂，而且需要花费不少钱，另外由于形势的变化，反动保守势力此时已控制了柏林大学的讲坛，马克思不愿让自己的论文和学术观点受到他们的嘲弄和玷污。

考虑再三，马克思把论文送到了政治空气比较自由的耶拿大学。主持鉴定工作的哲学教授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先生对这篇论文的观点和风格非常赞赏，认为马克思“才智高超，见解深刻，学识渊博”，于是未经进一步考试，马克思就被授予了哲学博士学位。1841年4月15日，马克思终于拿到了博

士学位证书,此时他年仅 23 周岁。

博士俱乐部的朋友们都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希望他在科研和社会领域继续奋斗,取得更辉煌的成就。进步的政论家莫泽斯·赫斯在给友人的信中兴奋地写道:“你应准备结识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或许他是现在活着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他将在报刊和讲坛上崭露头角,并将很快就把德国的目光吸引到自己的身上。”

第四章

初出茅庐

最初他看中了实际的职业（法学），后来又倾向于理论的职业（哲学），当获得博士证书后，选择职业的难题就更尖锐地摆在他面前了。当时，马克思决定从事理论工作（在大学任教），但政府不让他给学生讲课。于是他开始对政府“讲课”，并很快就完全专心从事这项工作了。

——尼·拉宾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在人们冷静地、聪明地、理智地向我分析之前我就深深感到，我不能得到你现今令人陶醉的青春之爱。啊，卡尔！这中间恰恰有我的苦情。凡是以无以名状的快乐使任何别的女性得以满足的东西，你那美好动人的热烈的爱，你那无法形容的身形，你那令人鼓舞的理想，总之，所有这一切只有使我不安，甚至常常给我带来失望。我越是沉湎于幸福，那么，一旦你火热的爱情消失，变得冷漠矜持，我的命运就会越可怕。”

这是马克思在柏林求学期间燕妮写给他的许多信件中的一封，如实地反映了她当时的感情世界。正是由于她对马克思的爱过于炽热浓烈，而他们所面临的世界又是那么光怪陆离，冷酷无情，她的思念中才带有那么多的忧愁、伤感、疑虑，甚至妒忌，对恋人的日思夜想以及社会和家庭给她施加的巨大压力，使她的身心长期处在痛苦的煎熬之中。

这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1841年4月间，马克思拿着博士证书从柏林返回家乡，当天他就急切地赶到了罗马人街威斯特华伦家中，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此时此刻，他们都幸福地感觉到：两人可以成家立业永不分离了。

但事与愿违，现实生活又给他们美好的憧憬浇

了一盆冷水。

自从父亲去世以后，马克思家中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了。母亲罕丽达·马克思艰难地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她与马克思原本就不太牢固的思想联系也因此而变得更为脆弱。

沉重的家庭负担使罕丽达对儿子只有一个要求：尽快取得学位和高官厚禄。她在1838年10月给儿子寄钱时就告诉他：此钱只能用于这一目的。但儿子的行为却使她很不满意：他在大学又读了两年半，得到的不是法学学位而是哲学学位，而且他并不想谋求官职，一心要去学校教书。母亲认为儿子彻底违背了她的意愿，使她改善家庭生活的希望破灭了，因此大为光火，一怒之下竟拒绝分给他一份遗产。母亲的这一举动不仅严重影响了马克思的生计，而且也使他娶妻成家的打算落空了。

此时马克思又处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严酷的现实迫使他面临着一次命运的抉择：是谋求一份待遇优厚的官职呢，还是去从事具有巨大风险而又十分清苦的科学研究事业？

马克思的选择是坚定不移的，他认为：高官厚禄固然很诱人，对家庭生活也有利，但这决不是自己的志向。他立誓要毕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献身于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科学事业。因此，他打算尽快到波恩

大学去执教。

对于马克思的这一选择,博士俱乐部的朋友们给予了巨大支持,他们纷纷写信,鼓励他在理论研究领域里建功立业。燕妮对马克思也很理解,因此他们没有急于办理婚事。对此,两个家庭中的某些成员认为这对青年人的关系到此就算结束了。但他们完全想错了。马克思和燕妮的命运早已牢牢地连接在了一起,任何灾难和风浪也无法使他们分开。眼下他们只是决定把婚期推迟一下,等马克思获得大学副教授职位后再成家。

但是,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良好愿望能够实现吗?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1840年,费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上了普鲁士的王位。新国王与他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父亲相反,他对革命年代留下来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东西十分反感,希望建立起一种专制主义的家长制的社会,所有的德意志人都是他的家庭成员。为了收买人心,他上台伊始曾装出了一副开明公正的面孔,接受了反对派集团提出的自由主义的执政方针。但随着德国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日渐高涨,这位虚伪的君主感到十分恐慌,很快就撕下了伪装,公开表示绝不实行立宪改革,甚至连任何批评当局的言论也

不许发表。统治当局的倒行逆施引发了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一个新高潮。在这动荡不安的时期里，普鲁士政府加强了政治上的反动，不仅在政治领域疯狂镇压自由民主运动，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打击压制他们认为不利于专制统治的各种思想言论，迫害持有进步思想的政治家和学者，而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则首当其冲。

在这股反动逆流中，教育界的形势尤为恶劣，教育自由已不复存在，许许多多进步的学者被逐出了学校的大门。在新任文化大臣艾希霍恩的指使下，波恩大学的某些御用文人开始攻击陷害布鲁诺·鲍威尔。由于鲍威尔在其新作《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中批判了宗教愚昧，因此成了反动派打击他的依据。威廉四世以此为借口禁止鲍威尔在大学讲课，1842年3月，又宣布解除他的波恩大学副教授的职务。这样，马克思通往大学讲坛的道路被彻底堵死了，他的博士证书竟成了一张废纸。

此时，马克思和燕妮的婚事又变得遥遥无期，这对痴情的恋人只得在愤怒和期盼之中苦苦地相互等待。

人生在世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有时一个偶然的事件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轨迹，

甚至造成某种大喜大悲的戏剧性的结局。试想,如果马克思实现了他的副教授之梦,登上德意志某所大学的讲坛,他的人生际遇会是一番什么情景呢?他将汇入那冗杂庞大的教授队伍,当然,他会成为其中最出色的一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能够成为一位与整个官方世界对抗,并必将摧毁整个旧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伟大的导师吗?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历史的玄妙之处也正在于此:一个机会失去了,另一些机会往往会不期而至。正如著名学者尼·拉宾所说的:

“最初他看中了实际的职业(法学),后来又倾向于理论的职业(哲学),当获得博士证书后,选择职业的难题就更尖锐地摆在他面前了。当时,马克思决定从事理论工作(在大学任教),但政府不让他给学生讲课。于是他开始对政府‘讲课’,并很快就完全专心从事这项工作了。”

马克思在波恩谋职的日子里,一边为求职而奔忙,一边仍在埋头苦读,他觉得自己虽然获得了博士学位,但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没搞清楚,需要认真研究。他研读了许多学者的著述,如:日·巴尔贝拉克、伊·格隆德·克·鲁莫尔、赫·梅涅尔、斯·德·布罗斯等。就在这一时期,费尔巴哈的名著《基督教本质》一书出版了,马克思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一口气

读完了这部著作。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早年曾在爱尔兰根大学执教,1830年发表了《关于死和不死的思想》一书,结果触犯了教会而被解职。费尔巴哈不向命运和恶势力屈服,继续进行哲学研究,探寻真理。1837年,他与一位理解他的善良姑娘贝尔特·列夫结为生活伴侣,从此他在乡下长期居住下来,依靠妻子微薄的家产和自己的稿费维持生计,艰苦地从事研究工作。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在于:他在德国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他认为自然离开人的意识而存在,思维是存在的反应,人是自然的产物,空间、时间和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人能够认识客观规律等等,从而正确解决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但是,费尔巴哈对待黑格尔主义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他虽然成功地摧毁了黑格尔保守的哲学体系,但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哲学中的精华部分——辩证法,因此他是一个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

费尔巴哈的著作打破了德国哲学界一潭死水般的沉寂状态,唯心主义对哲学界的一统天下被撕开了一个缺口,起了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青年黑格尔派中的许多人都深受其影响,思想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马克思更是如此。恩格斯后来在回忆当时

情景时写道：“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出这部书的解放作用。那时候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了费尔巴哈派。”这一时期马克思潜心研究了费尔巴哈和其他哲学家们的著作，共写下了五本研究笔记，后来称作“波恩笔记”。他的思想进一步充实成熟起来了。

在波恩居住期间也是马克思自由政论家生涯的起步阶段，他为自己安排了许多写作计划，并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尝试。

起初，马克思打算与鲍威尔共同编辑出版一种新的哲学杂志——《无神论文库》。他们的这种想法是与当时特定的环境分不开的。普鲁士的封建反动势力对进步运动进行严厉的镇压迫害，而教育界受到的压力最大，所以在讲台上已经很难宣传激进的革命理论了，进步学者们只好转而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理论和政治见解。恰好当局此时对科学报刊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允许篇幅不超过 20 印章的书籍可以不经预审出版，因此为政论家们留下了一个充足的活动空间，于是他们便纷纷转移到了这一阵地。马克思步入哲学领域已有几年时光了，其学识也受到公认，但到这时为止尚未公开发表过文章，因此他也想在这一领域一显身手。

为此，马克思做了充分的准备，阅读摘录了许多

著名哲学著述,如《论灵魂》(亚里士多德)、《神学政治论文》(斯宾诺莎)、《罗辑研究》(特伦德伦堡)、《人性论》(休谟)、《康德哲学史》(罗生克兰茨)等等。马克思和鲍威尔原想以这个新杂志为一面旗帜,团结动员起一大批进步的学者,向宗教和黑暗的社会势力发起猛烈的进攻,但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影响了他们的计划。

为了躲避普鲁士政府的迫害,阿尔诺德·卢格把他主办的《哈雷年鉴》转到普鲁士境外去出版,改名为《德国年鉴》,并转向激进的人道主义立场,举起“为争取自由,反对敌对政权而斗争”的旗帜。卢格的立场观点与马克思和鲍威尔比较接近,因此,如果再创办新的刊物势必会引起力量的分散,这是不必要也是不策略的,所以马克思和鲍威尔的计划就此搁浅了。

创办刊物一事未成,马克思决定要用辛辣的政论文章来抨击批判宗教和专制暴政。1841年8、9月间,他参与了鲍威尔的《对黑格尔的末日的宣告》一书的写作。由于早就有所准备,马克思对该书所要阐释的理论问题驾轻就熟,所以写作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当年晚些时候该书就问世了。

这部作品表达了当时大部分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和立场,号召进步的哲学家们联合起来,建立现实

的政治反对派来反对现存国家。书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论题：进步的思想家们应该将理论变成实践。文中写道：“理论原则应直接转向实践和活动……哲学也应在政治领域中成为一股积极的力量，坚决地冲击和动摇现存制度，如果它同哲学的自我意识发生矛盾的话。”

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战斗檄文，其矛头直接指向宗教蒙昧主义和旧的封建秩序，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但由于作者们使用的语言和笔法比较隐晦，一般读者不能完全抓住其要领，于是鲍威尔和马克思决定继续写它的续篇，题目定为《黑格尔对宗教艺术和基督教艺术的憎恨和他对国家所有实在法的取消》。根据他们的构思，这本书应直接对宗教和国家等中心问题展开议论，但从两人的写作分工来看，鲍威尔的那部分工作只是重申过去提出的一些原则，只有马克思负责的那些篇章才能给这些问题以充分的论证。1842年初，鲍威尔完成了自己那部分的写作任务，他把稿件寄给了出版商，并催促马克思赶快交稿，但马克思却以身体不佳为由把这一工作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后来鲍威尔只好把自己写的几章单独出版了，更名为《从信仰的观点斥黑格尔关于宗教和艺术的学说》。由于没有马克思的合作，这本书在理论和观点上都没有什么突破。

是什么原因使得马克思没有与鲍威尔再度合作呢？

一些史家认为，主观原因是由于马克思在深入研究有关宗教和国家等问题时发现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订正，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使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客观原因是这个时期燕妮的父亲突然病重，为了照顾这位慈父般的朋友，马克思从1842年1月就回到了特利尔。3月3日，威斯特华伦男爵去世了，为了安慰悲痛欲绝的燕妮，他又在家乡住了一段时间。

但上述分析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关键。马克思与鲍威尔中断合作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正在发生着一个飞跃，他开始把哲学与政治问题直接联系起来，而鲍威尔则迟迟迈不出这一步。在前一时期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已日益清楚地觉察到了自己与鲍威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看法是不一致的，但他又不愿损害两人真诚的友谊，因此便以别的原因作为借口，没有继续与鲍威尔进行合作。

从马克思与鲍威尔的这种关系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已经逐渐与青年黑格尔派分离了，他认为仅仅在哲学上批判普鲁士国家是远远不够的，哲学家应该直接参加社会中火热的政治斗争。

尽管马克思此时还很年轻，并且没有独立发表

过任何东西,但是他已经在进步知识界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巨人和勇敢的斗士。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期间经常到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程,他听到了人们对马克思的种种议论,给他以极大的触动。于是他根据自己的想象写了我们在本书篇首引用的那首长诗,对马克思的形象作了生动的描述。

就在这时,国内发生的一件事情引起了马克思的高度关注。

19 世纪初叶,普鲁士政府曾颁布过一项极其严厉的书报检查令,给文化教育事业带来了一场严重的灾难,也引起了人民大众的强烈愤慨和激烈的反对。为了造成民主自由的假象,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同时更有效地控制舆论,维护封建专制王权,普鲁士国王于 1842 年初颁布了一项新的书报检查令。这个法令诡称要放宽对新闻出版的限制,允许对国家机构及其个别部门进行评价,对法律进行讨论,等等。但该法令同时又指出:这些批评言论只有在“叙述礼貌、倾向善良”时才可发表,日报应由完美无缺的人操办,而且这些人要有“他们的意图严正和思想忠诚”作担保。

新书报检查令的出台在知识界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一些目光短浅的人错误地认为这一法令标志着

普鲁士向出版自由迈进了一大步,是值得可喜可贺的好事情。一些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文章,对这个法令进行宣传 and 赞扬,为“皇恩浩荡”而感激涕零。

在这场由普鲁士官方导演的政治闹剧中,马克思始终保持了清醒冷静的头脑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看出了这个法令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也预见到它将给国内政治斗争带来巨大消极后果——模糊人们的斗争视线,麻痹人们的革命精神。于是,他立即着手对书刊检查令进行严肃的批判。

1842年初,马克思在特利尔为《德国年鉴》写了一篇语言犀利、内容深刻的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对统治当局的虚伪面目和险恶用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首先指出:“歪曲和抽象地理解真理”是新书报检查令的出发点,真理被看作不依赖于事物的性质。该法令要求人们在探讨真理时必须“严肃谦逊”,马克思认为当权者提出这一点是企图扼杀学术研究自由,阻碍人们去探寻真理。

关于所谓“严肃”,马克思认为就是不许学术界出现不同的风格和流派,限制学术讨论的自由发展,用行政命令强制规定某一种写作风格,其结果只能使学术界出现死气沉沉的局面。他写道:“你们赞美

大自然令人赞叹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都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烁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有一种色彩——官方的色彩。”

关于所谓“谦逊”，马克思认为就是不允许批评和发现真理，这是对学术研究的最大限制，是违背学术自由原则的。他对此写道：“如果谦逊是探讨的特征，那么这与其说是害怕虚伪的标志，不如说是害怕真理的标志。谦逊是使我们寸步难行的绊脚石。……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防腐剂。”

马克思还把新检查令与旧检查令做了比较，通过研究发现，新书报检查令并没有放宽对写作和出版业的限制，反而增加了新的限制。他指出，该法令以追究作品的倾向为标准，要求检查官们禁止那些“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倾向”的作品发表，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举措。它表明新闻检查官可以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对于一切带有进步倾向的作品进行肆意摧残，因此这是一种恐怖主义的法令，而广大进步作家和理论工作者则是最大的受害者。

针对法令中关于日报应由“完美无缺”、“意图严

正和思想忠诚”的人去办的说法,马克思认为这是企图剥夺报刊出版人挑选编辑的权利。政府根据这一条,就可以通过检查官挑选一些他们中意的人(即拥有财产和特权的容克阶级及其代表)充任编辑,而报刊在受到官方检查之前首先要经过这些编辑的检查,因此最高决定权仍牢牢操在政府手中,而政府则可以扮演一种十分超脱的角色。

通过分析研究,马克思认为书报检查制度中有一个无法医治的痼疾,这个痼疾是什么呢?这个痼疾就是它与社会和人民的尖锐的对立,它要扼杀一切带有进步色彩的出版物。马克思认为,这一痼疾隐藏在现存的制度当中,他指出:“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政府的理智是国家的唯一理性。”“公众的智慧和善良的意愿被看作甚至对最简单的事情也无能为力的东西,但对于官员们来说,却连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也被认为是可能的。这一痼疾隐藏在我们的一切制度之中。”

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新书报检查令是一个反动的举措,它不仅没有放宽对写作和出版事业的限制,反而进一步加强了限制,是公开与进步势力相对抗。因此,“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最后,马克思以一句非常富有哲理的话结束了这篇文章:“当你能够感觉你愿

意感觉的东西,能够说出你所感觉到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一篇战斗的檄文,它表明马克思已经公开地站在反对专制统治的立场上,直接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他希望以哲学为锐利的武器,向一切反动的东西发起猛烈的进攻,从根本上变革普鲁士的整个国家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而不是局部的改良。虽然他此时还不能完全了解进行这一改造的动力和伟大历史意义,但他已经与青年黑格尔派分离了,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这篇文章还显示出了马克思非凡的写作才华、独特的写作风格和不妥协的战斗精神,这些宝贵的东西将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不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为了避免遭到打击迫害,马克思没有在文章上署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冠之以“莱因一居民”的署名。这一署名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莱因地区是当时德意志境内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在这里有深厚的土壤和广泛的群众基础,马克思是作为莱因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向整个普鲁士的封建专制主义发起挑战的。

文章写成后,马克思把它寄给了激进的政论家阿尔诺德·卢格主编的《德国年鉴》,希望能尽快发表,以发挥其战斗作用。由于《德国年鉴》的检查官禁

止发表这篇文章,卢格只好把它载入一部《轶文集》,于1843年在瑞士出版了。但当这部文集进入普鲁士境内时仍遭到了当局的查禁。这一事实彻底撕去了罩在普鲁士当权者脸上的虚伪面纱,进一步有力证明了马克思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评论是何等正确。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政论家,一生著书立说,笔耕不辍,留下的文字著述汗牛充栋,浩若烟海。但直到他晚年,每当回想自己的写作经历时,他仍然对自己的这篇政治处女作感到由衷的骄傲。

第五章

《莱因报》

这家报纸的畅销，证明了它是如何深刻地理解人民的意愿。为了上述目的这些人付出了自己的资本，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面对任何牺牲都没有裹足不前。现在请阁下自己来判断：我作为这些人的代表能不能、有没有权利声明《莱因报》将改变方针？查封《莱因报》难道只是对个别人的暴力行为，而不是对莱因省以及整个德国精神的暴

力行为？

——马克思

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写于1842年1月至2月间。但由于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十分严厉，这篇文章未能在《德国年鉴》杂志上发表，直至1843年2月才发表在了瑞士出版的一本《轶文集》上，事情整整耽搁了一年。

这一出版周期实在太长了，怎么能满足火热的政治斗争和急剧发展的形势的需要呢？

因此，马克思把目光转向了日报，因为他看到当局对日报的检查要比对杂志的检查马虎（这大概是由于日报种类较多，出版周期太短等缘故），在日报发表稿件既方便又快捷。这时，一家设在科伦的报纸——《莱因报》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莱因报》创刊于1842年1月1日，是由莱因省大资产阶级的著名代表人物康普豪森、汉泽曼以及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袖们共同出资筹办的。他们企图用这家报纸来维护莱因地区工商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普鲁士当局虽然对它存有深深的戒心，但为了对抗《科伦日报》（该报是一家非常极端的天主教派报纸，只听命于罗马教廷的指令，蔑视普鲁士当局），还是从策略出发容忍了它的存在。为了争取更

多社会势力的支持,也为了使大批优秀的政论家和学者为该报撰稿,《莱因报》的创办者们与激进派(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结成了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秘密联盟。

但是,报纸的股东们最初只是想把它办成一个带有温和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报纸,主张只发表有关经济研究的论文,于是,他们任命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弟子古斯塔夫·霍夫金为该报的主编。霍夫金是个温和的自由派分子,在政治上对当局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结果大大束缚了报纸的发展。报纸的两位出版负责人是青年黑格尔分子格奥尔格·荣格和哥伯特·奥本海姆,他们与霍夫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所以霍夫金不久就辞去了主编职务。

马克思十分关注《莱因报》的出版编辑工作,认为可以把它办成一份反对专制统治、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报纸。因此从1841年秋天起,他开始积极参与报纸的创办工作。这时他已是青年黑格尔派中一位举足轻重的权威人物了,他向报纸推荐了他的朋友青年黑格尔分子阿道夫·鲁滕堡出任主编,这一提名得到了接受。

这样一来,《莱因报》实际上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报纸,主要撰稿人几乎都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

成员,如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尔·鲍威尔兄弟、科本、梅因、赫斯和施蒂纳等。同时,报纸内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讨论德国统一和政治改革等重大问题,莱因大资产阶级所要求的纯经济理论的文章则越来越少了。

股东们对于《莱因报》的这种倾向感到有些不安。但由于报纸的知名度大大提高,发行量增加,股东们的经济收入也十分可观,所以他们未对报纸发生的这种方向性变化提出更多的异议。

但在办报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鲁滕堡是个毫无批判能力和创见性的人,远远不能胜任主编一职。特别是当普鲁士当局加强了对《莱因报》的检查和压制之后,鲁滕堡的这些弱点就更暴露无遗了,结果使报纸失去了明确的方向和风格,刊载的文章往往相互矛盾,缺乏计划性,使许多毫无价值、大同小异的文章充斥了版面。不久,报纸的声誉开始下降,订户也有所减少。

于是从1842年4月起,马克思开始亲自为《莱因报》撰文。4月至5月间,他在报上连续发表了题名为《第六届莱因省议会的辩论》的一组文章,在市民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此后又陆续发表了《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等一批颇具影响力转论文。同时,他还积极为报纸的出版负责人出谋划策,就如何提高

办报水平发表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提出了“不要让撰稿人领导报纸,而要让报纸领导撰稿人”的指导思想,对《莱因报》的健康发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从1842年8月起,马克思已经成了《莱因报》的实际领导者。

10月上旬,马克思迁居到了科伦。在这里,他与一群激进而才华出众的知识界朋友相逢了。此时,他们大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血性方刚,胸怀大志,决心要大干一场,投身于与旧世界进行的真正战斗中去。在一次欢乐的聚会上,他们进行了一场无拘无束而又十分热烈的争论。

鲍威尔告诉马克思:“我们将掀起一个反对上帝的暴动,让所有的天神屈服,纷纷走下云端,向我们祈求宽恕。”

“取得自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冷静地说道,“但我建议猛冲。”

“猛冲?对,猛冲!”赫斯豪情万丈地表示赞赏。

“向上天猛冲!”鲍威尔激动地大声呐喊。

“不,”马克思严肃地纠正道,“向大地猛冲。”

鉴于马克思显示出的卓越才华和高超的组织能力,1842年10月,该报的股东们正式委任马克思为主编。马克思此时意识到:对于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遇,应该牢牢地抓住它,走出恬静孤寂

的书斋，在火热的斗争实践中迎接风浪的考验，实现自己在中学时代就确立的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理想抱负。于是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办报工作中。

什么是机遇？为什么有的人能够牢牢地把握住机遇，并加以充分利用，而另一些人则只能大声抱怨自己命运弗如？对此，马基雅维利的解释是：命运之神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她左右着我们命运的一半，而把另一半放在我们自己手中。温斯顿则认为：机遇只属于那些有心的人和做好了充分准备的人，他们从早年便注意刻苦磨练自己，当机遇来临之际，他们已经胸有成竹，从而牢牢地把握住了机遇。马克思就是这样的有心之人，为了自己施展才华的那一天，他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

当时的科伦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是莱因省的经济中心，在文化方面也有一定影响。马克思迁居科伦后，就以烈火般的激情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开展工作，用自己过人的才华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这份报纸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从而开创了《莱因报》发展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在他个人的生活史上也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就任主编几天以后，马克思把报社的编辑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当与会者们陆续来到会议室时，

马克思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他一边吸着雪茄烟，一边考虑着办报方针等重大问题。他告诉大家，《莱茵报》原来的内容太软弱无力了，他坚决反对在报上刊载那些严重脱离现实的所谓纯学术的论文，更反对那些哗众取宠，甚至对当权者暗送秋波的言论。他主张报纸应该体现时代的趋势和人民的革命要求，用批判的精神来讨论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大事。因此，他对大家提出了要求：

“我们应该少发些不着边际的议论，少唱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

马克思一边说着，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他那铿锵有力的话语使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激励和振奋。很显然，他们都很赞同他的观点。

在会议结束时，马克思告诉大家：“要勇敢起来，因为我们手中有真理，就是被关进监狱，也要坚信自己的理想和权利！”

在马克思的主持下，《莱茵报》的面貌很快就焕然一新，变成了一份与封建专制制度坚决斗争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因此受到广大民众和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发行量持续增加。1842年8月，该报只有订户885个，到11月份就增加到1820个，1843年

初则猛增到 3400 个,这一数字在世时是相当大的。可见,《莱因报》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鲁士的范围,并且还在继续扩大。

马克思虽然担任了《莱因报》的主编,工作也十分出色,但他并没有忘乎所以,自命不凡,而是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一边紧张地工作,一边继续刻苦攻读,钻研理论问题,从来不轻率地乱发议论。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地反应了他的这一特点。

有一次,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奥格斯堡的《总汇报》指责《莱因报》是“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指责给予答复,但他认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浅薄,不足以深刻论述这一问题。于是他立即进行了认真的钻研,购买了许多法文、英文和德文的有关著作,特别是一些著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著作、反复阅读,深入研究,并同一些朋友认真交换了意见。在掌握了问题的实质之后,他才动笔写了一篇辛辣的文章,对《总汇报》的观点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剖析。这虽是马克思就任主编后不久处理的一件小事,但却真实地显示了他对待写作和理论研究工作的严肃性和科学态度。

在主编《莱因报》期间,马克思仍然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家,而国家的基本职责之一就是合理地组织社会。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马克思的观点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认识到:国家并不具有合理的性格,也不象黑格尔说的那样,在历史发展形成的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观点的形成与这一时期他同普鲁士国家及其官僚政治进行了亲身接触有关,也是他对社会和经济问题深入研究的一个结果。

这一时期,马克思一方面邀请了许多进步学者和撰稿人为《莱因报》写稿,另一方面自己也勤奋地进行理论研究,发表了不少论述当时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文章,深刻阐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马克思在《莱因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如果把这篇文章同他先前发表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相比较,人们可以看出,后者只是一般地论述出版自由问题,而前者则是把这个问题同各个社会等级和阶层对待出版自由的态度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详细考察,从而得出了更为深刻的结论。

马克思在文中指出,在出版自由问题上,各个等级和阶层出于不同的利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此在省议会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中,每个人都在为各自所代表的利益而进行斗争。例如,诸侯等级和贵族等级都坚决地反对出版自由,虽然他们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理由,但根本的一点是都担心出版自由会导

致社会革命的爆发。在文章中,马克思对这些特权等级提出的极其荒谬的理由逐一进行了分析驳斥,特别批驳了他们把革命说成是某种阴谋诡计的结果,严肃地指出:革命的爆发是合乎规律和逻辑的,革命是客观过程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决不是由于出版自由所引起的。

马克思还对城市等级即资产阶级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反对出版自由,他们认为出版自由是好的东西,可惜被坏人玷污了,因此只好把它扼杀掉。马克思对这些人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鞭笞,说他们是对变化和未来充满恐惧的“德国庸人”。

资产阶级中的另一些人赞成出版自由,但他们是从维护行业自由出发赞同出版自由的。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批判。他认为这种观点虽然比反对出版自由要高明一些,但却是“在未保护之前先扼杀的一种对出版自由的保护”。所谓行业自由实际上是买卖的自由和剥削的自由,如果简单地把出版自由归结为行业自由,为了挣钱而出版,这样,即使没有书报检查的束缚,出版也是不自由的,因为它已被物质的东西束缚住了。马克思严正指出:“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和写作,但是他决不应为了挣

钱而生活和写作。”

相反，马克思对省议会中农民代表的意见持非常赞赏的态度。这些代表认为：人类精神应该根据它固有的规律自由地发展，德国人民比任何别国的人民都更迫切地希望获得出版自由。马克思认为这真正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是一种极其勇敢可贵的行为。

《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一文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某些重要思想。他已经把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扩大到了对这个制度的社会基础——贵族统治和等级特权的批判，并揭露了普鲁士代议制度的实质：它并不是人民的代表机关，它是虚伪的，反人民的，是维护特权等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的。马克思在告诉人们一切剥削阶级都是出版自由的敌人的这一事实的同时，还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的真面目——只不过是物质的束缚代替了精神的束缚。

这是马克思在《莱因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它把革命的热情与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使《莱因报》真正转向了革命民主主义，从而成为该报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发表的评论莱因省议会活动的论文中还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关于林木盗

窃法的辩论》，它发表在 1842 年 10 月至 11 月 3 日的《莱因报》上。

在当时，正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德国地主阶级对传统的公共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其中包括许多林地。这样就使得普通农民对森林的利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种情况给贫苦农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因为使用公共林地和拾捡枯枝一向是他们谋生的一个重要来源。许多农民为了反抗这种掠夺，也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继续砍伐林木，拾捡枯枝，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与所谓“林木盗窃”有关的刑事案件。

在莱因省第六届议会上，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支持对砍伐林木者加重处罚和对捡枯枝者给予严厉惩处。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挺身而出，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为穷苦农民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反对国家准备制定的相关法律。

为了证明捡枯枝不是盗窃林木，马克思首先从法的角度对事情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枯枝与作为所有权对象的林木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即枯枝不是林木，它不是林木占有者的财产，所以捡枯枝不应算盗窃。另外，他还提出了穷人自发的权利意识，即捡枯枝用以维生是穷人专有的权利，“正如富人不应要求在大街上的施舍物一样”。马克思指出：把捡枯枝

说成是盗窃是立法者把所有者的狂妄的欲求变成了合法的要求,受到损害的是贫民,而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反而受到了进一步的迫害。

在文章中,马克思对那些反对政客们的谬论逐一进行了批驳,其言词是有力而巧妙的。例如,有的议员认为,应把到森林中砍木材都视为盗窃,由于过去不算作盗窃,所以这种情况才时有发生。马克思驳斥道:如果这种推理被认可的话,那么就应该得出如下结论:因为打嘴巴不算杀人,所以才常有这种现象发生,因此必须做出规定,打嘴巴就是杀人。还有一个议员狡辩说:常常有人先把幼树砍伤,待它死后再当作枯枝弄走,因此,拾枯树和枯枝都是盗窃行为。对此马克思愤怒地指出:如果把拾枯枝和盗窃林木混为一谈并给予惩罚的话,那么法律就是荒谬的,而农民则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把所有者的欲求变成了法律的社会经济根源,他认为这是私人利益的作用——这不仅仅是等级的私利,而且是私有制的利益。马克思指出,等级国家的法律是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不仅承认他们的合理权利,甚至经常承认他们的不合理的欲求”。而等级议会则是保护大私有者的有力工具,他们衡量一切事物的态度都是以剥削阶级的私利为转移的。在这篇论文中,马

克思不仅从政治和法律方面揭露剥削阶级的本质，而且指出等级国家及其法律代表了大私有者的私利，并公开站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一方，竭力维护他们的权利，这表明他已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方向转变了。

在马克思的主持下，《莱因报》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反对政府的恐慌，他们对《莱因报》的检查越来越严厉了。马克思及其战友们每天都要与检查官进行周旋，对此，他们采取了一些十分巧妙的办法。例如，他们先把一些无关紧要的文章送给检查官看，任凭他肆意删改等。等检查官看累了或时间所剩无几的时候，再送去一些长篇文章，使他无法认真地进行审阅，只得敷衍了事。还有一次，检查官晚上要携妻子女儿去参加省督举办的舞会，但赴会前必须把当天的报纸清样审完，可是马克思等人故意没按时送清样来。眼看舞会时间就要到了，检查官只好亲自赶往印刷厂，草草审查了一下就了结了。就这样，许多带有革命思想的文章仍然经常出现在《莱因报》上。

但是，反动统治阶级是决不会让革命思想在普鲁士的国土上自由地发展传播的。由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和政治思想越来越激进，《莱因报》对现实问题的剖析和批判也越来越深刻犀利，所以很快就触

怒了当局，双方发生了第一次正面交锋。

1842年，《莱茵报》上发表了记者科布伦茨的一篇通讯，对摩塞尔河沿岸葡萄种植者的困难处境作了报导，批评政府对此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谁知这一实事求是的文章竟然得罪了当局，普鲁士省督冯·沙培尔十分恼火，他亲自出马，以澄清事实为名指责《莱茵报》诽谤了政府。

这是官方发出的一个挑战信号。对此马克思没有畏缩，作为《莱茵报》的主编，他立即对官方的无理指责给予了有力回击。

为了写好这些文章，有力地揭露抨击政府与人民利益的尖锐对立和对群众疾苦的漠不关心，马克思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到摩塞尔河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并收集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

对于摩塞尔河地区，马克思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因为他的家乡特利尔就位于摩塞尔河畔，那里的农民世代都靠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为生。在马克思的印象中，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好地方，美丽的葡萄园、绿茵茵的草地和舒缓清澈的摩塞尔河水构成了那里独特的景物风貌。一到收获季节，这里到处可以看到如同玛瑙般晶莹剔透的紫红色的葡萄，连空气中都充满了沁人心脾的醉人的芳香。

但如今这里情形已经每况愈下了。在封建贵族

的残酷奴役下，在资产阶级和商人的疯狂掠夺下，葡萄的价格低得惊人，葡萄酒的销路也被人为地阻塞了，但政府却向果农征收极为沉重的税款，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了极为悲惨的境地。马克思看到这里的居民有如一座座人间地狱：破败不堪的小屋、肮脏的泥泞的道路和面黄饥瘦、无精打彩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公共设施和卫生设备，人与鸡、狗、猪等家禽畜同住在一起，悲惨的境况简直令人目不忍睹。摩塞尔河在日夜不停地奔涌着，弯弯曲曲的流水发出低沉凄婉的呜咽，那是摩塞尔果农发出的悲惨的呻吟和愤怒的呼号。这里广为传唱的一首民歌引起了马克思深深的哀痛，歌中唱道：

红黄相间的葡萄闪闪发光，
长在阿尔河和摩塞尔河边，
憨厚的农民日夜企盼，
这下子可摆脱了一切苦难。

这时涌来了一批奸商，
他们来自国家的四方，
“我们拿走收成的三分之一，
欠债还钱理所应当！”

从科布伦茨和科伦，
又来了一批老爷官：
“第二个三分之一算是交税，
国家一定要拿走这一份！”

悲愁的农民孤苦无助，
只好向上苍苦苦哀求。
上帝降下了暴雨冰雹，
大声吼道：“剩下的归我所有！”

面对眼前的悲惨情景，马克思的心在痛苦和愤怒之中颤慄了。回到科伦后，他立即写了一组文章，题名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于1843年1月15日至20日陆续刊载在《莱茵报》上。在这组文章中，马克思详细地列举了许多确凿的数字和材料，以活生生的具体事实说明了摩塞尔河两岸农民的极端贫困状况。他指出：“谁要是明白葡萄酒酿造者的目前的悲惨处境已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在他们的业务活动中、甚至在他们的精神状态中引起了怎样的（越来越厉害的）变化，那么，当他想到这种贫困状况将继续保持下去，甚至还会变本加厉时，他一定会大吃一惊。”

在文章中，马克思用自己的亲身见闻和掌握的

详细资料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局确实未曾采取认真的措施为摩塞尔农民提供帮助，普鲁士的官僚们眼看着农民陷入灾难而无动于衷，他们不仅不帮助农民消除穷困，反而企图把主持正义者提出的有关申诉和报导粗暴地压制下去。马克思认为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应该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神及其体系”中去寻找。

针对某些人试图把摩塞尔农民的苦难说成是自然条件恶劣和个别官员渎职所造成的，马克思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当时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普鲁士的专制体制，他深刻地分析道：

“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误入歧途，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 and 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象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

在这里，马克思向人们揭示了一个铁的事实：在现存体制下，人民不可能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

马克思的这组文章用最尖厉的语言和入木三分的剖析对普鲁士的官僚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勇

敢地捍卫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当局者的专横麻木和贫苦群众的悲惨遭遇使得他感慨万千,他用一种无比愤怒的笔调写道:“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达思想的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用迫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来公开地说几句话,因为故乡的生活条件是不允许他忘记这种语言的。”

由于这组文章立场鲜明,辞锋锐利,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欢迎,而当权者们则恨得咬牙切齿。马克思原计划共发表五篇文章,结果只发表了两篇,其余的都被查禁了。

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家,而不是只研究抽象的理论和高喊漂亮的革命口号的空谈家。人民群众是深厚肥沃的土壤,而无产阶级革命家则是从这土壤中生根、发芽并逐步成长起来的。马克思在迈出革命的第一步的时候,就十分注意与广大民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和接触,不仅关心他的疾苦,时常深入民间搞社会调查,而且能够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敢于为维护他们的利益而进行公开的战斗。正由于他深深地扎根于民众的土壤之中,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和巨大的力量,所以日后才长成了一棵参天的大树,成为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的伟大领袖。

为了捍卫真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和《莱因报》的同仁们与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马克思并不是单纯地满足于同政府论战取得的某些胜利，他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莱因报》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号召广大进步人士为彻底变革社会现状而进行战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为了使报纸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长期生存下去，作为主编，马克思不仅要把握报纸的政治方向，把编辑工作搞得井井有序，发动各界进步人士为报纸投稿，同时还要讲究斗争策略，不让书报检查官们找到查封报纸的借口。

在这方面，马克思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排除了不少阻力和干扰。与“自由人”的斗争就是一个例子。

所谓“自由人”是以梅因、施米特为代表的一些柏林的极端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他们没有什么积极的理论纲领，而是以激进的面目出现，鼓吹抽象地批判一切，否定一切，在毫不相干的场合空洞地高喊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等激进的口号，是一伙玩弄革命词句的空谈家。他们企图把马克思置于他们的空谈之下，把《莱因报》变成宣传他们观点的传声筒。“自由人”的行为对社会并不能发生任何积极的影响，只能四面树敌，败坏革命民主主义的声誉。

在普鲁士这个“没有警察局发放的牌号连狗也

无法生存”的地方,《莱因报》要想继续办下去,就必须彻底摆脱“自由人”的纠缠。马克思坚定地贯彻了他本人提出的“不要让撰稿人领导报纸,而要让报纸领导撰稿人”的指导思想,毫不犹豫地淘汰了“自由人”寄来的不符合出版方针的大量稿件,即使是熟人的稿件也决不妥协。同时,他向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们发出了忠告。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坦率地谈了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和处理方式:“我自己淘汰的文章并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所有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先生对共产主义从未研究过)。”为了保障《莱因报》的生存和健康发展,马克思不久就与这些“自由人”决裂了。

但是,普鲁士这样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是不可能允许一份具有革命倾向的进步报纸长期存在下去的。随着《莱因报》的影响日益扩大,统治当局的不满和恐惧也与日俱增。马克思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深刻揭露了专制王权下人民的悲惨生活和统治阶级的腐朽反动,极大地触怒了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的内务大臣冯·罗蒙惊呼道:“毫无疑问,《莱因报》带有反对派机关报的性质。它的任务就是在德意志宣传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主张立宪的国家是

唯一适合于时代的国家。他们想用科学论证的办法和不断攻击现存制度的办法来散布这一观点。”特别是《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的发表,使得《莱因报》与政府的矛盾冲突表面化了,这表明《莱因报》遭查禁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842年12月底(即书报检查放宽一周年之际),海尔维格在《莱比锡总汇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政府查禁一家报纸提出公开批评,普鲁士当局的反应是:立即把海尔维格驱逐出境,并查封了《莱比锡总汇报》。1843年1月3日,萨克森政府在普鲁士的压力下查禁了《德国年鉴》。1月21日,普鲁士内阁召开会议,指责《莱因报》散布对国家、教会和现存秩序的不满,诽谤行政当局,并侮辱友邦,决定对该报实施查禁。

这一无理粗暴的举动深深触怒了广大订户,也严重影响了股东们的利益,在整个普鲁士引起了一股强大的反对浪潮。进步舆论对当局的举措给予了激烈的谴责,几千人联名向当局提出抗议,摩塞尔河地区的农民也纷纷上书请愿,要求当局撤销这一无理的决定。

为了照顾股东们的利益,普鲁士政府允许《莱因报》再发行三个月,条件是必须接受双重检查,即书报检查官过目后,还要警察局进行检查,认为合格才

能出版。这时,德国资产阶级特有的软弱性又一次暴露出来。股东们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抱怨马克思办报具有革命倾向,要求降低报纸的政治调子,以维持其生存。

通过这件事,马克思对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坚决反对妥协退让,决不放弃原则,于是决定退出《莱因报》。

不久,马克思在《莱因报》上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声 明

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本人自即日起,退出《莱因报》编辑部。特此声明。

马克思博士

1843年3月17日于科伦

从马克思开始为《莱因报》撰稿到最终退出《莱因报》只有一年的时间,其中担任主编的时间仅仅五个月,这在马克思的一生中是十分短暂的,但在他的政治生活和世界观的发展过程中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同那些为了挣钱不惜出卖灵魂的庸俗作家不同,马克思把写作的目的看得极为高尚,他是出于宣传革命理论、改变旧世界、为全人类谋幸福的良好

动机而从事写作工作的，所以他的文章一向实事求是，爱憎分明，既不隐恶也不溢美，更不哗众取宠或卑躬献媚。他以锐利的文笔、深邃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思辩能力深刻地揭露了普鲁士专制统治的反动性和欺骗性，揭示了普鲁士代议制度的阶级实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为广大的贫苦劳动者进行强有力的辩护。通过勤奋的研究，特别是深入社会进行实地调查，使他深刻认识到物质利益在人类社会中的重大作用，而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理论都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

为了正确地解决好这一问题，马克思遂开始了对经济学进行认真研究。马克思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当时，“我作为《莱因报》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因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因省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因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通过亲身参加斗争实践还使马克思认识到了一些重要问题：只要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存在，民主和自由在这里就没有容身之地；而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其经济上的弱点，本身存在着严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能与专制制度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更不可能承担起解放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这也推动他在

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去寻找真正改变现存制度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总之,在《莱因报》工作时期是马克思理论上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时期,而其重要推动力则来自于他的社会实践。在艰苦的科学研究和革命实践中,他的世界观逐步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普鲁士的反对派们为马克思离开《莱因报》而欣喜若狂。书报检查官圣保罗在3月18日写道:“今天风向变了。昨天报社的精神领袖、灵魂终于辞职了,……我真是高兴极了,而且今天我用于检查的时间仅仅是平时的四分之一。”但圣保罗对马克思的为人十分了解,他知道马克思是决不会屈服的,他接着写道:“马克思会为他的观点去死的,因为他坚信他的观点是真理。”

马克思离开后,《莱因报》仿佛失去了灵魂,其生命之舟也走到了尽头。1843年3月31日发行的最后一期上刊载了编辑部致读者的告别词,这是一首充满豪迈和悲壮的诗篇:

告 别

高举自由的旗帜我们远航出海,

把祸患连同锁链鞭子一起掩埋！
水手们毋需被监视，
他们都恪守自己的职责。
人们说我们拿命运赌博，
让他们嘲笑和议论灾难吧！
哥伦布当初虽遭到耻笑，
但毫不畏惧地打开了通向新世界之路。

新的战斗正在彼岸召唤，
一定有人与我们在战火中同行，
征途上注定会有艰险，
我们将忠于自己勇往直前。

第六章

世界公民

如果说,她(指燕妮——作者注)与青年朋友私订终身只是她的个人私事,那么,她做出第二个决定(指决定与马克思结婚一事——作者注),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之外,成为政治事件了。她公然同她的阶级决裂,从今以后,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她站在了她丈夫的一边。

——路易丝·多尔纳曼

离开《莱因报》后，马克思又从社会的大舞台回到了恬静的书斋，投入到潜心钻研，冥思苦想之中。他要对他办报中遇到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进一步发展完善自己的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但他把自己下一步的落脚点定在了克罗茨纳赫，而不是科伦，因为那里住着他刻骨铭心的恋人——他的未婚妻燕妮，他打算立即结婚成家。

马克思之所以希望立即与燕妮结婚，除了两人感情方面的因素外，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早在1843年1月份，他就决定要离开德国，到国外去创办杂志，因为这样可以躲开普鲁士当局的检查和迫害，充分地运用并发展自己的才华，潜心研究探讨革命理论。但马克思在做出这一决定时，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燕妮怎么办呢？”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马克思认为他决不能只身一人出国，而必须与燕妮一起走，所以他决定尽快办理两人的婚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不能、不应当也不想同未婚妻分手离开德国。”他在另一封信中则写道：“我可以丝毫不带浪漫主义地对您说，我正在热烈而严肃地恋爱。”

马克思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了燕妮，燕妮也十分赞同，于是她立即开始进行紧张的结婚准备。而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之余也参加了这一“繁重的”劳动。但马克思虽然在经济理论上颇有造诣，而在选购物

品方面却显得一窍不通，是一个十足的外行，所以，燕妮只能一人把这项工作承担了起来。这种情形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看出来，她写道：“今早出门，我在商人沃尔夫那里看到许多新式花边。你买不到物美价廉的就让人去挑吧，我请求你，亲爱的，这东西让我也去买吧，现在我的确宁愿你什么都不买，把你的钱留在路上用。瞧，亲爱的，我就在你身旁，我们一块儿去买吧，不然人家会使我们上当，这在公司里是会发生的，去吧，亲爱的，现在就去买。还有小花环。真怕你多花钱，咱们一块去挑该有多好。”

1843年5月中旬，马克思经特利尔来到克罗茨纳赫，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燕妮。6月19日，这对有情人终于结束了长时期的苦恋，举行了婚礼。

从他们私订终身到现在，整整七年过去了，在这期间，他们的爱情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的考验，但无论是岁月的流逝、社会上的流言蜚语，还是来自亲人的反对阻挠，都未能熄灭他们心中的爱情之火，反而使他们之间的感情纽带变得愈加牢不可破。现在他们终于幸福地结合了，两颗火热的心更加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他们将在时代的大潮中并肩搏击，永不分离。他们的爱情故事也终将在千千万万革命者中间传为佳话，为一代代后人所传诵。

马克思和燕妮的婚礼是十分简朴的，毫无贵族婚礼上的奢华浮躁气息，除了燕妮的母亲和弟弟外，亲属中没有其他人参加。他们选择在克罗茨纳赫举办婚礼，就是为了追求一种清新圣洁的气氛，摆脱那些来自社会的世俗偏见。

对于马克思来说，与他的心上人结合是大自然赋予他的最美好的赠礼。从此，他有了一个温馨美满的家庭，他那漂泊不定的生活中有了一个宁静的港湾，无论是在多么困难多么艰险的时刻和场合，他时刻都能感觉到有一颗温柔坚强的心在替他分忧解难。而对于燕妮来说，这一婚姻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她从此与过去的贵族生活截然分开了，置身于一种前程莫测，凶吉难料的命运激流之中。但她却如释重负，因为她终于摆脱了贵族家庭的束缚，可以与自己的心上人朝夕相守，与他一起从事为全人类谋福利的伟大事业了。正如路易丝·多尔纳曼所说：“如果说，她与青年朋友私订终身只是她的个人私事，那么，她做出第二个决定，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之外，成为政治事件了。她公然同她的阶级决裂，从今以后，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她站在了她丈夫的一边。”

新婚后的几周大概是马克思和燕妮一生中最为幸福的一段时光了。

六月的艳阳把小城克罗茨纳赫装点得多姿多

彩,如梦如幻,时断时续的小雨滋润着山川大地,使天地万物显得更加清新娇嫩,甚至有几分诡谲妩媚。轻风温柔地吹拂着路旁和郊外原野上沾满了水滴的花枝嫩叶,使空气中充满了一种大城市里少有的浓郁的复离子的气息。这对新婚夫妇身着婚礼盛装手牵着手,在这旖旎多情的风光中徜徉漫步,雄浑巍峨的尼柯斯克大教堂下,纳厄桥的画栏边和施罗斯贝格的乡村遗址中,到处都留下了他们款款徐行的足迹和相依相随的身影。几天后,马克思和燕妮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先后游览了爱贝尔堡、普法尔茨、巴登—巴登等地区,在祖国的青山绿水和众多的名胜古迹中度过了永生难忘的蜜月。

回家后,他们在克罗茨纳赫又居住了大约半年。这期间,马克思一边就新杂志的创办工作与卢格进行磋商,一边继续从事紧张的理论研究工作。而燕妮在操持家务之余也积极地读书学习,她不想在未来的生活中仅仅扮演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而希望能够尽力跟上丈夫那疾速前进的巨人般的步伐,并在战斗中尽力给他以必要的帮助。

在克罗茨纳赫居住的半年是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工作极度紧张的一个时期。

通过对前一阶段工作的思考,马克思认识到:应该联系实际,对理论问题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研究

整理,特别是有关哲学、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这一时期,马克思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研究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对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马克思在《莱因报》工作时期,就深深感觉到在黑格尔庞杂的哲学理论中隐藏着唯心主义的体系和革命的辩证法之间的尖锐矛盾,必须加以批判地研究。实际斗争经验还告诉他,黑格尔把君主立宪制说成是“最完美的”国家形式,这是极其荒谬的。因此马克思开始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等观念。

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写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由于种种原因,这部著作直到1927年才公开发表)。同时,马克思还对欧美各国的历史和国家理论做了深入的探讨,阅读了许多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以来重要思想家的著作,共写出了五本笔记(即著名的《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些知识在他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黑格尔认为是国家决定着市民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颠倒现实关系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必须把它再颠倒过来。他指出:“如果理念变为独立的主体,那么现实的主体(市民社会、家庭、‘情势、任性’等等)在这里就会变成和

它们自身不同的、非现实的、理念的客观要素。”他还说：“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

这样一来，马克思就得出了以社会生产关系作为国家现实基础的基本观点，从而得到了一个结论：要找到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正确认识，不应到黑格尔所描绘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到他所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到现实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去寻找。

马克思还对黑格尔把君主立宪制看作最完美的国家制度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人民的主权根本不同于君主的主权，二者是完全对立的，凡是在君主拥有主权的国家，人民的主权就不存在。所以君主立宪制只是国家形式的一种，“并且是不好的一种”。只有人民拥有主权的国家（即民主制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

马克思还对黑格尔美化官僚国家体制的言论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官僚制度的基础是财产私有制和社会上存在着各种相互对立的利益，在这种制度下，国家政权成了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的工具。普鲁士的官僚和统治者们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把个人利益充作国家利益，并侵犯了真正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从而使国家目的变成了某些人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们升官发财的手段。

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时候,马克思始终贯彻了唯物主义的原则,并阐发了一系列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因此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也正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形成的过程。

新婚燕尔,按理说正是夫妻间的浪漫多情之季。在这一美妙的时光里,绝大多数青年人都在卿卿我我,耳鬓厮磨地尽情品尝爱情生活的美酒,然而,马克思却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理论研究工作之中了。对此,燕妮从未有过任何委屈和怨言。相反,她认为丈夫所从事的是一项伟大而又十分光荣的事业,因此她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丈夫的一举一动;或伏案攻读,或奋笔疾书,有时还津津有味地倾听他的宣讲和解说,阅读他刚刚写完的哲学手稿。当然,她也时常怀着焦急的心情期盼着她的心上人早一点停下手中的笔,两人外出散散步,聊聊天,体验一下热烈而又温馨的新婚生活。但她从未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

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这话对于马克思夫妇是完全不适用的。在他们长达40年的婚姻生活中,爱情之火似乎从来没有停息过。正是这种浓郁如窖酒,清甜似甘泉的永不衰竭的爱情,使得他们的夫妻关系非常和谐并充满了浓浓的诗情。也正是这种爱情的美和力量,帮助马克思夫妇战胜数不清的困

难,在科学研究和革命事业中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正如他们的小女儿爱琳娜所说的:“没有燕妮·冯·威斯特华伦,那么卡尔·马克思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这决不是夸大。两个生命(两个卓越的生命)能结合得如此紧密,互相取长补短,的确是见所未见的。”

在克罗茨纳赫居住期间,马克思一直与卢格就创办新杂志的问题进行讨论,双方保持着十分频繁的书信往来。

阿诺德·卢格(1802—188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青年时代即投身于进步学生运动,被政府关押过六年之久。后曾在大学任教,因与一位富家女子结婚而过上了富裕的生活。1838年,卢格创办《哈雷年鉴》,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政治论坛。该刊物被政府查封后,他又于1840年起担任《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的编辑工作,是当时享有盛誉的进步报人,与马克思过往甚密,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就是由他设法发表的。

自从退出《莱因报》后,马克思已看透了普鲁士政府的反动面目,深感在德国已不可能有效地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了。于是他决定离开祖国,到国外去从事理论研究和政治宣传,并就这一问题与卢格进行

了全面讨论。1843年9月,他在给卢格的一封信中指出:“……这里的空气会把人变为奴隶,我在德国根本看不到一点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在德国一切都受到了强力的压制,真正的思想混乱的时代来到了,极端愚蠢笼罩了一切,……所以事情日益明显:必须为真正独立思考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合地点。”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马克思与卢格的讨论终于有了明确的结果。卢格来信告诉马克思,在巴黎创办杂志的事情已经确定下来了,根据马克思的意见,该刊物定名为《德法年鉴》,卢格保证每年付给马克思六千塔勒薪俸,而马克思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地准备好需要刊载的文章。

按照卢格的说法,给予马克思的年俸能够保障他过上较稳定的生活。此话有些过分了,这点钱其实仅能维持马克思夫妇最简单的生活,况且燕妮此时已经怀孕了。但马克思夫妇仍然十分愉快地接受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去巴黎的目的是为了他们的事业,并不是为了赚钱,从下面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在同一时期,马克思还接到了普鲁士政府的聘请。普鲁士当局为了摆脱马克思这个可怕的敌人,打算收买他为政府服务,所以派了马克思父亲的一个

老朋友——枢密参事埃塞尔先生前来看望他，试图说服他担任普鲁士国家的官职，并保证他在官场上能飞黄腾达。但马克思夫妇轻蔑地拒绝了这一聘请，在他们的眼中，人生中最宝贵的事情莫过于探寻真理，为全人类服务，而不是金钱和官位。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无论马克思和燕妮的处境多么艰难，生活多么贫困，面对统治当局一次次高官厚禄的诱惑，他们从来没有动过心。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携夫人燕妮离开了克罗茨纳赫，迁居到巴黎。从此，这对革命情侣便一直在异国他乡漂泊，并不断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和驱逐。他们成了不受各国反动政府欢迎的世界公民。

在相当漫长的一段岁月里，马克思没有国籍，直到去世，他的身份都是政治流亡者，被迫辗转于欧洲各国，过着充满贫困、危险和不幸的生活。但是，燕妮始终坚定地追随着马克思和他的事业，两人如影相随，并肩前进，矢志不移地为了自己的伟大理想而勇敢战斗。

初到巴黎，马克思和燕妮立即被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的风貌深深地吸引住了。到处是宏伟华丽的现代化建筑设施：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宽阔繁茂的林荫大道，热闹非凡的商场、咖啡馆和歌舞厅，还有五光十色的橱窗，琳琅满目的商品，形形色色的

新潮时装和妩媚迷人的巴黎女郎，简直令人目不暇接。但给他们印象最深的还是这里众多的名胜古迹和灿烂的文化遗产：收藏着无数世界艺术瑰宝的壮丽辉煌的卢佛尔宫，充满英雄史诗气息的雄浑壮观的凯旋门，金碧辉煌、令人叹为观止的凡尔塞宫，庄严肃穆又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巴黎圣母院和先贤祠及塞纳河畔旖旎多姿、变化万千的秀美风光……所有这些都使得他们流连忘返，赞叹不已。

但当他们深入到巴黎各个街区内部时，却发现在这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表象之后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番情景：肮脏拥挤的贫民区中挤满了低矮破旧的平房，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蜷缩在令人窒息、狭窄潮湿的小屋里，在饥饿和寒冷中发出痛苦无助的呻吟。到处是没有街灯、下水道的陋巷和堆满了垃圾杂物的弄堂，工人们在没有安全设施的机器旁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着，却过着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生活，监狱里常常人满为患……广大劳动群众贫困不堪的生活状况已经达到了令人惨不忍睹的程度。

但是，巴黎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的城市，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这里一直是资产阶级革命和人民运动发生最频繁的地区之一。1830年7月，这里又爆发了震撼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巨头推翻

了波旁复辟王朝的统治，夺取了政权。这场政治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法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巩固。据统计，法国的工商业总投资从 1830 年的 300 亿法郎增加到 1843 年 410 亿法郎，蒸汽机的数量从 1830 年的 625 台猛增到 1842 年的 3000 多台，而这一时期的钢铁产量和煤产量则分别增长了 1 倍和 1.5 倍，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随之不断发展壮大。但工业革命在促进了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劳动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工人的工作时间延长了，实际工资下降了，劳动条件也日益恶化，资本家利用机器生产的条件大量雇佣童工和女工，结果造成大批工人失业，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于是，法国人民再次掀起了反抗斗争的高潮，1831—1834 年，里昂和巴黎等地也先后发生了工人起义。虽然这些起义最终都被政府镇压下去了，但它们表明：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形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巴黎不仅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而且与普鲁士相比较，这里的文化和学术气息也更为浓烈，科学研究领域里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活力。

这里没有普鲁士那么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学术研究和各种文化活动不仅十分丰富，而且具有一定的自由色彩，人们可以公开地讨论有关思想、艺术

和宗教等方面的问题,甚至一些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如共和制和君主制问题),也允许发表不同的见解,甚至进行激烈的争论。而且巴黎素来是欧洲文化事业的一个重心,许许多多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曾经旅居于此,并在这里施展才华,大放异彩。如同著名学者路易丝·多尔纳曼所说:“当时的巴黎是欧洲最坚强、最进步的精神中心。昂诺莱·德·巴尔扎克在这儿写下了他的《人间喜剧》,小说中他把金钱至上的市民阶级描写得栩栩如生。漫画家昂诺莱·多米尔在这里工作过;欧仁·德拉克罗伊和让·法朗索斯·米勒在这里作过画;妇女解放的先驱乔治·桑在这里写出了她的社会小说;这里的剧院上演维克多·雨果的剧本和杰柯莫·迈耶见的歌剧。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崇拜者和其他人在巴黎庄严地宣布他们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制度;多米尔的朋友茹尔·米涅在这里写出了他的《法国革命史》。”如今,当代一些进步的学者、艺术家和革命家们也纷纷来到这里,如德国革命诗人和政治家亨利希·海涅、波兰作曲家和钢琴家弗雷德里克·肖邦、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和波兰自由诗人亚当·密茨凯维支,等等。他们在这里体验社会,了解民情,考察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状况,进行理论研究、艺术

创作和革命宣传。于是，巴黎再一次成为各国进步人士的汇集之地，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正在这里渐渐地积聚、汇涌。

马克思和燕妮于1843年10月中旬来到了巴黎，在田鳧路一所简朴的楼房里安下了他们小小的家。这里位于塞纳河左岸的市区，是一个小市民居住的区域，居住着不少来自外国的革命者，特别是德国的流亡者。与马克思同住一楼的还有卢格一家和一位名叫格尔曼·莫伊勒的德国进步作家。

马克思夫妇来到巴黎后受到了侨居这里的各国流亡者们亲切友好的接待，因为他们都熟悉马克思主编的《莱因报》，敬佩他的革命精神和卓越才华，也知道他与燕妮的那段曲折感人的爱情经历。

最先接待他们的是海尔维格夫妇，是他们热情地帮助马克思和燕妮把家安置下来。马克思与海尔维格是老相识了，他和燕妮都非常喜欢这位诗人的那些充满激情和战斗精神的诗篇，特别是他于1842年发表的《党之歌》，反对诗歌脱离政治和党派，体现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受到马克思的高度赞赏。在巴黎，他们又成了密切的友人和邻居，有一段时间就住在一起，共同讨论研究政治理论和德国的命运等问题。他们的夫人也成了最要好的朋友。爱玛·海尔维格比燕妮还要年轻几岁，受过高等教育，其父是富有

的银行家,但她却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甘愿跟随丈夫流亡国外,从事革命活动和艺术创作。她与燕妮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共同支持协助丈夫们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由于她们的存在,清苦孤寂的侨居生活增添了不少欢笑和乐趣。

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与海尔维格的友好关系没有永久持续下去: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海尔维格力主执行冒险主义政策,企图组织志愿军回国作战,马克思不同意这种只能葬送革命力量的做法,两人从此便分道扬镳了。

在巴黎,马克思还结识了不少真挚亲密的朋友,海涅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伴随了他们一生,虽然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之间有并不算太远的亲缘关系——确凿的资料表明:海涅两代以前的祖辈与马克思三代以前的祖辈是同一个人。

亨利希·海涅(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他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富商家庭,青年时代在大学攻读法律专业,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海涅从20年代起开始以诗歌为武器,对德国的政治现实进行揭露,因此受到政府的迫害,于1831年流亡法国,毕生在这里从事诗歌、散文和政论著作的写作。海涅早年主要写抒情诗,深受浪漫主义影响,作品具有隽永、明净和朴素等特征。从40年代开始,他写了大量

优秀的政治讽刺诗,抨击反动腐朽的政治现实,体现出一种朦胧的社会主义思想,艺术造诣也达到了颠峰状态。

马克思和燕妮早年在威斯特华伦男爵那里拜读过海涅的作品,如《歌集》、《哈尔茨山游记》等等,是海涅诗歌的爱好者和崇拜者,因此他们很快就与海涅建立起了真挚的友谊。马克思夫妇在文学创作和欣赏方面具有很高的修养,常常与海涅就诗歌创作等问题展开认真的讨论,有时还就海涅新作的修改问题开诚布公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海涅也非常敬佩马克思渊博的学识和犀利深邃的思想,经常主动上门征询马克思的意见,有时还把自己的新作朗诵给他听,一起逐字逐字地推敲。

对于燕妮,海涅则怀有一种诗一般深沉纯洁的爱慕之情。他欣赏燕妮那种高贵娴雅的神态和温柔敦厚、毫无雕琢的天然之美,更欣赏她那冰清玉洁、一尘不染的品格和情怀。他虽然比燕妮大许多岁,但却把她当作自己精神上的慰藉和创作灵感的源泉。他常常感到与她在一起,他那疲惫不堪的头脑能享受到一种令人愉悦的轻松和净化,他那被苦难和岁月严重侵蚀的心也豁然开朗,重又聚满青春活力。

在一个不短的时期里,海涅是马克思夫妇家中最受欢迎的一位常客,简直就是他们的“宠儿”。只要

海涅一走入家门，正伏案工作的马克思便立即停下手中的笔（对于素有“工作狂”之称的马克思来说，这是许多人享受不到的一种殊荣），燕妮也放下手中的书或针线，亲切地迎接这位尊贵的客人。他们总是先递给他一杯热气腾腾的浓咖啡或清凉爽口的冰啤酒，然后，就开始了热烈而不拘一格的漫谈。他们的话题十分广泛，谈到了遥远的祖国，谈到了动乱不堪的欧洲和世界，也谈到了新近上市的书籍和思想界的动态。马克思常常向海涅详细地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讲得认真投入，海涅也听得入迷动情，可见，政治家与诗人在许多方面是息息相通的，尽管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

有一次，马克思郑重地告诉海涅：

“我相信革命，正等候它的到来。它总归是会到来的，这是科学得出的结论。但是我们应该在思想上武装起来，在革命中实现我们的理想，以免在革命到来时措手不及。这将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世界上最后一次革命。”

听了马克思这番话，海涅特有的诗人的激情被鼓动起来了，他兴奋地说道：

“巴黎街头衣衫褴褛的饥民们已经在期盼革命了，虽然他们所渴望的行动过于暴烈，充满了血腥气味。但无论如何，共产党是值得重视的，……虽然我

不喜欢流血,但我更厌恶专制暴政和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我准备热爱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真诚地宣布要实现世界大国,这是一种伟大的情感,我赞同并拥护他们。”

马克思微笑着听着海涅讲话,他明白:诗人目前正处在矛盾之中,还有些茫然和犹疑,但他迟早是会战到正确的方向的。

接着,他们开始讨论海涅的一部作品《觉醒》。海涅用他那充满激情的嗓音朗诵了这首诗篇,马克思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细心地推敲揣摩。马克思是一个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人,总是力求探寻最完美的形式,因此,他对诗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说实在的,他和燕妮都很欣赏这首诗,其中的一段他们很快就背熟了:

不再是柔和的箫笛,
不再是田园的牧歌式的情调,
你是祖国的喇叭,
是大炮,是重炮,
劲吹,轰动,震撼,厮杀!

马克思夫妇对海涅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使他的思想境界更高了,对社会问题的

理解更深刻了，诗歌创作也进入了 he 一生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如《时代的诗》、《织工歌》和《等着吧》等）中，他猛烈地抨击了德国封建制度的罪恶，揭露了神学蒙昧主义的虚伪，也讽刺嘲弄了那些对权势者奴颜卑膝的政治庸人们。1844 年是海涅与马克思交往最密切的一年，他写出了他的传世之作——政治讽刺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无情地批判了封建专制统治，歌颂了人类美好灿烂的明天。诗中写道：

新的歌，更美好的歌，
啊，朋友，让我替你们制作——
我们要在地上
建筑起天国。

我们要得到人间的幸福，
再不愿总是饥肠辘辘，
再不愿把勤劳的手得到的东西，
去填饱那吃闲饭的肚腹。

为着所有的人，
这地上有足够的面包产生。

玫瑰花呀，常春树呀，美呀，乐呀，
甜豌豆呀，也能同样滋生。

这首不朽的诗篇即将出版时，海涅正在汉堡探视母亲，他迫不及待地把诗歌的校样和一封信寄给马克思，信中以最亲切的语言表达了他对马克思和燕妮的感激之情：“我把本书的开头部分带到巴黎给您，它不过是由浪漫曲和歌谣所组成，您夫人将会中意（我恳切地请您代我向她致以衷心的问候；我高兴将很快与她再见……）。”

第七章

伟大的转变

马克思在这个杂志（指《德法年鉴》——作者注）上……已经作为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来到巴黎后，马克思一方面筹办新杂志，一方面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他全面研究了欧洲各国

的历史,对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做了深刻系统的探讨,并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对这些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为了能够批判性地继承这些文化遗产,创立一个能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提供正确指导的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亲身参加了当时火热的工人运动,考察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革命斗争。

一天清晨,马克思换上一身洗得已发白了的旧衣服,匆匆走出了家门。他步行来到了市郊的一个贫民区,走过了一条条拥挤肮脏的小胡同和一排排彼此十分相似的破旧的房屋,最后,在一个低矮狭窄的宅院门前停了下来。敲过暗号后,院门打开了:

“您找谁?”

一个工人模样的人用警惕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马克思从容地回答了暗号,于是他被领进了一座房子。房间里阴冷潮湿,浑浊的空气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劣质香烟的烟气,在昏暗摇曳的烛光中隐隐可以看清拥挤着十几个人。巴黎的一个工人秘密组织正在这里开会,经朋友介绍,马克思前来参加旁听——这是马克思初来巴黎时深入考察工人运动的一个场景。

在巴黎居住期间,马克思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

中去,或者到他们家中进行访问,或者到工人们常去的小酒馆,找他们谈心交朋友。由于马克思毫无大知识分子的架子,待人谦和亲切,关心工人的疾苦,而且谈的大都是他们非常关心的问题,所以很快就赢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信任和尊敬,成了他们的知心朋友。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同革命工人发生接触。在他们那里,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给工人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们进行的一次次英勇斗争及其经验教训以及工人群众对未来社会的向往和憧憬。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深深体验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战斗精神,也清楚地看到要想彻底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革命,而工人阶级则是这场革命的主要力量。同时,他也认识到历次工人运动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人阶级还没有一个科学的、革命的理论作指导,他们的斗争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在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马克思还与一些工人组织和外国流亡者的秘密团体取得了联系,德国流亡者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中有马克思十分熟悉的格尔曼·莫勒伊博士,而该组织的精神领袖则是杰出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和思想家、裁缝出身的威廉·魏特林。魏特林从巴贝夫的学说中吸取了平均共

产主义的理论,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主张推翻这一罪恶的制度,并认为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在通过什么道路达到奋斗目标的问题上,他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马克思虽然对魏特林的某些观点并不赞同,也不愿意参加当时任何一个工人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大都受到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或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影响,并带有浓厚的宗派和密谋色彩),但马克思主张与他们保持较密切的联系,他认为这些工人团体虽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还不成熟,但他们的革命斗争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而且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在科学理论的影响下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

任何英雄人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马克思之所以日后能成为伟大的革命导师,除了他本人的天才条件之外,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亲身参加阶级斗争和科学研究的实践,并深入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与他们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获得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很显然,在他从书本上学习理论知识的过程中,任何先知贤哲都没有教给他关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解放全人类的真理,只是当他深入到社会底层,并亲身参加工人运动之后才得出了这一结论。从这一层意义上讲,马克思之所以能转变成共产主义者,其真正的老

师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他本人对此也深有同感,他曾经写道:“如果一个有学问的人不愿意自己堕落,就决不应该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应该整年整月地把自己关在书斋或实验室里,象一条藏在乳酪里的蛆虫一样,逃避生活,逃避同时代人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

马克思到巴黎来的主要目的是与卢格共同创办一份新杂志。但由于卢格病倒了,所以创办杂志的繁重工作就压到了他一个人的肩上。马克思不同意恢复原来卢格编辑的《德国年鉴》(即《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他主张新杂志应具有国际性,带有更鲜明的革命色彩,它必须“用法国人的方式讲话”(即要采取革命行动),应该“向德国的制度开火”!因此根据他的建议,新杂志被定名为《德法年鉴》,马克思希望用这一杂志把德国和法国最进步的政治理论家们联合起来,向封建专制制度发起猛烈的进攻。

为了使《德法年鉴》的创刊号既富有战斗气息又具有学术价值,马克思花费了不少心血。他除了日夜奋笔疾书,撰写自己的文稿以外,还广泛地向一些著名学者和政论家约稿。他曾经给费尔巴哈写信,请他撰文对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进行批判,还要求海涅等新老朋友为杂志写稿。马克思的努力没有白费,海涅、费尔巴哈、赫斯、海尔维格等人先后给他寄来了

稿件,其中许多文稿写得相当精彩。

马克思原先估计能从法国战友那里征得不少稿件,但这一希望完全落空了。不久他还发现,许多寄来的邮件被警察当局偷偷地拆阅了。这使他感到气愤,也使他认识到法国政府对他的工作怀有高度的戒心。但是,困难和挫折从来也吓不倒马克思,只能促使他更加努力地工作,况且,巴黎的空气毕竟要比德国自由得多,身边还有亲爱的燕妮日夜陪伴着他,这在精神上给了他以极大的鼓励和安慰。要知道,在结识恩格斯以前,燕妮是唯一真正理解和全心全意支持他的事业的人。

《德法年鉴》于1844年2月正式出版了。这是第一、二期的合刊号,其中刊载了马克思在筹办杂志期间给卢格的几封信和两篇论文:《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也发表了两篇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同期刊载的还有卢格、巴枯宁、赫斯和费尔巴哈等人的书信和文章以及海涅和海尔维格的诗歌,等等。

《德法年鉴》以马克思、卢格、巴枯宁和费尔巴哈等人写的八封信件作为其开篇,讨论并阐述了创办该杂志的背景和目的。针对卢格认为德国人民是甘愿忍受暴政的“庸众”,德国不会发生革命等悲观论

调,马克思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观点。他认为,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极其反动严酷,它的唯一原则是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而且德国确实存在一批政治庸人,但没有必要因此而德国的前途心灰意冷。他正确地分析了德国发生革命的前景:由于存在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阶级之间的剧烈对抗便在所难免,因此德国必将发生深刻的政治革命。他写道:德国正在“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这命运就是即将来临的革命。”

为了实现并完成这一革命,马克思直截了当地宣布了《德法年鉴》和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对现存的封建制度和普鲁士专制国家进行无情的批判。为了避免受社会上流行的各种错误思潮的误导,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新的杂志决不是竖立起一面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要研究社会的发展规律和革命斗争的经验,把理论批判与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成为正确指导和鼓舞人民革命斗争的强大理论武器。

在《德法年鉴》上大唱主角的人物不是卢格和青年黑格尔分子,而是马克思,正是他的论文决定了《年鉴》的基本方向。

青年黑格尔派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中最激进的一翼。起初,他们对宗教蒙昧和封建专制是持

坚决批判立场的,马克思刚进入社会时正好遇上了这股新思潮,并被卷入其中。但当他潜入这股思潮的深层时发现,表面上的波澜掩盖下的仍是一潭死水,只有继续破浪前进,把这个派别远远地抛开,才能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并服务于人类,从而跟上时代疾速前进的步伐。在巴黎创办《德法年鉴》正是马克思的世界观发生这一质的变化的关键时期。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在德国犹太人的解放问题上采取的唯心主义立场。

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的解放简单地归结为宗教问题,在他看来,似乎犹太人只要放弃了犹太教就能获得解放。而马克思则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必须把宗教的批判转向对反动的政治制度的批判。他指出,德国犹太人首先应该实现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此后才是人类解放(即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废除私有制等一系列办法,解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制度下彻底解放出来,只有到这时,人类才算获得了真正的解放。

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概念,并把它们加以区别。还强调指出:只有经过“不

停顿的”革命,才能从政治解放发展到人类解放。这样,马克思在这里涉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有着根本的区别,后者必将随着前者而出现。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还对国家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阐释。

马克思在《年鉴》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上篇文章在内容上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实际上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哪一种社会力量能够克服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并实现人类解放。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参加了工人运动的实践之后写成的,这一点从该文最终得出的结论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首先就宗教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宗教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因此仅仅批判它是不够的,应当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那么,哪种社会力量才能承担起进行这一批判(实际上指的是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任务呢?政治解放是由资产阶级承担的,但政治革命的结果只能使人们得到部分的解放。人类解放要比政治解放

深刻得多，它要彻底消除那些使人受奴役压迫的一切关系，消灭私有制度。这一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承担，因为只有它才要求消灭私有制，它的阶级利益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阐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同时，马克思还论证了另一个重要原理：先进的革命理论具有巨大作用，它是改造社会的锐利精神武器。马克思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他还写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在自己思想发展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青年黑格尔分子、经过费尔巴哈，走向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终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他从无产阶级的原则立场出发，认识到无产阶级是未来社会的创造者和建设者，阐述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思想。他还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强调了必须通过革命暴力摧毁旧制度等重要理论原则。从此，马克思以崭新的姿态投身于推翻剥削制度的伟大革命洪流之中，他的生命

已经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和美好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融为一体了。

《德法年鉴》的出版吓坏了普鲁士政府，他们如临大敌，动用一切手段试图阻止这份危险的杂志进入普鲁士境内，并警告书商们不得出售该杂志。同时还下令，如果马克思等《年鉴》的撰稿人进入国境就立即予以逮捕。由于当权者的极力阻挠，所以只有三分之一的杂志陆续到达读者的手中，这样一来，资金的周转便遇到了麻烦，《年鉴》下一步的出版工作陷入了困境。

面对危险和挫折，卢格怯懦地退缩了。作为一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卢格不能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把共产主义看作是穷人的利己主义和贪欲的表现，他主张对社会进行改良而不是革命性的改造。因此，卢格反对在《年鉴》上发表具有革命锋芒的文章，也十分害怕普鲁士当局的恐怖政策。所以到1844年3月，卢格就与马克思分道扬镳了，他还以《年鉴》的发行工作受阻为由，用若干份《年鉴》杂志代替了应该支付给马克思的薪金。这样，不仅《德法年鉴》停刊了，而且马克思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难以为继的窘境。此时，燕妮的临产期快要到了。

燕妮是5月1日这一天生产的。当接生婆正在忙碌的时候，马克思在外屋焦急地等待着。燕妮的呻吟

声使他感到心脏在一阵阵地疼痛，烦躁极了，只好不停地抽烟，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踱步，不一会儿，烟雾就把他笼罩了起来。

几个小时过去后，小家伙终于呱呱堕地了。这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长得眉清目秀，皮肤红润鲜嫩。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是生活给他带来的最大快乐和安慰。他高兴得手舞足蹈，把新生儿紧紧地抱在怀里，仔细地、长久地端祥着，赞叹着，似乎总也看不够，爱不够。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感激之情和对女儿绵绵不尽的爱，他当众庄严地宣布：

“我女儿的名字就叫燕妮，这是我最喜欢的名字，人类再也创造不出来了。”

马克思是一位勇敢无畏的革命家和战士，但他绝非像某些反动家伙宣传的那样是个铁石心肠的怪物。他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热爱亲人朋友，此外，人们还从他身上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性格特征——父爱。他把孩子看作大自然赐予他的最好礼物，简直就是下凡的天使！即使身处极度贫困和危险之中，马克思也坚定地认为：孩子不是生活的负担，他们是真正的财富，能给人们带来无穷的快乐和幸福。

大概是对女儿爱得太深了，望着这个身体瘦弱的小东西，马克思内心深处隐隐地产生了几分忧虑：千万不要发生什么意外啊！于是，他像研究哲学、经

济学那样，时常认真细致地观察女儿的一举一动：什么事物会使她高兴，什么又会惹她烦恼伤心，例如，对各种音响、光线和物体的反应等等，每当发现孩子有什么不舒服的征兆，他就会变得忧心忡忡。

为了使女儿在较好的生活环境中调养，也为了得到燕妮家的老家庭医生的帮助，孩子生下刚满月，燕妮就带她返回了老家特利尔。

在老家，小燕妮受到了全家人的关怀和精心照料。家庭医生告诉燕妮：只有喝人奶才能使孩子的身体健壮起来。于是，她为女儿请了一位奶妈。果然，小燕妮的体质很快就增强了，不仅体重明显增加，精神也变得越来越好，十分活泼好动。很快，她就成了全家人宠爱的心肝宝贝。在给马克思的信中，燕妮怀着欣喜的心情写道：“我敢保证，你已认不出这个孩子了，只有她那凝神的眼睛和天生像小帽子一般乌黑的头发可以使你认出来。其他的一切确实全变了，不过越来越明显地像你。近几天，我给她在汤里加了蔬菜，她吃起来可真香。洗澡时她用手拍水玩，弄得满屋满地是水，于是她用小手蘸水放在嘴里吮吸……她哭起来，我们马上指着台布上的小花给她看，她就一声不响，聚精会神地看，直到眼里充满泪水，……她本身就是快乐，每个表情都惹人发笑。你将会看到，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多么可爱的小人儿……”

燕妮曾经号称“特利尔第一美人”，因此，她此次只身返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些庸俗的小市侩和专爱搬弄是非的长舌妇们私下里议论纷纷，认为马克思一定是穷途潦倒到连老婆孩子都养活不起的程度了。

听到有人说丈夫的坏话，燕妮感到非常气恼，甚至怒不可遏。但是，她知道与这些社会庸人进行争辩是不值得的，也毫无益处。于是，她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对他们进行回击：尽管她此时的经济状况十分拮据，但她每次出门前总要精心打扮一番——略施粉黛，穿戴上从巴黎带回来的漂亮合体的时装和首饰，再加上她那天生娇美艳丽的容貌，显得额外优雅高贵，妩媚迷人，不知内情的人往往把她看作一位家境殷实的大知识分子家的少妇。对此，燕妮颇感到有些得意。在一封给马克思的信中，她用一种调侃和兴奋的语气谈了自己的感受：“我在每个人面前都显得阔绰，我的外表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有一次我比所有的人都漂亮，我一生中从未像现在这样更好、更光彩。这是给他们最好、最深刻的打击……”

马克思非常喜欢孩子，虽然身处逆境，但他仍希望自己的女儿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而应该有许多活泼可爱的弟弟和妹妹。燕妮也抱有同感，她希望自己将来能拥有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儿女成群，其乐融

融，孩子们长大后都能像他们的父亲那样英俊正直，成就一番大事业。她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用幽默含蓄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想法：“一个穷人，虽然生活十分贫困，但在家中每年都要过一次‘本教堂的节日’，也就是说生一个孩子。这个穷人准备欢度第十一个这样的节日。”

在特利尔居住期间，燕妮对丈夫的生活非常关心，她频频写信，告诫他要调节好饮食起居，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切不可因操劳过度而放弃了休息。但燕妮更关心的还是丈夫所从事的工作。她希望丈夫的事业能尽快出现转机，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就，她相信马克思是具备这种实力的。

此时，燕妮已经把马克思的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她的生命已经完全与丈夫的命运连为一体了。有时候，她期盼丈夫获得成功的心情竟然比马克思本人还要迫切、强烈。在一封信中，她像一位斯巴达母亲嘱咐将要出征的儿子那样对丈夫说道：“啊！卡尔，你要做的就赶快做吧！……你知道，你的其它论文起了多大的作用。要写得客观细致，或者幽默轻松。请吧，亲爱的，让笔跃然纸上，即使会绊倒，会摔跤，也要一跃而起——你的思想要像老近卫军的掷弹手那样巍然屹立，那么庄严，那么勇敢，也要像他

那样说：我宁死不屈。制服要穿得松松的，不要绷得那么紧，有什么要紧。法国军人的外形就是这么轻松，多漂亮。想想那些穿着整齐严肃的普鲁士兵，你能不寒而慄吗？——松松皮带，解开衣领，脱去军帽——把字用得像它们自己所想的那样，把一些分词去掉。这样的战斗兵一定不会是那么整整齐齐地进军的。你们的军队上阵了吗？平安出发，元帅，我的黑元帅。”

第八章

潜心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里绝对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

续。

——列宁

马克思在巴黎一共居住了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期间,他与巴黎工人阶级和各国革命流亡者建立起了十分密切的联系。工作之余,他常常走出寂静的书斋,深入到社会中去,到火热的工人运动中去。他参加过许多次工人集会,在会上发表过演讲,与很多工人谈过心,也结识了不少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例如,他与俄国的米·巴枯宁、法国的比·勒鲁和路易·勃朗等人会过面,就许多理论问题交换了看法;他还曾与蒲鲁东有过多次接触,经常与他就理论问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并启发他用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问题,等等。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更深刻地了解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受压迫的地位,掌握了法国工人运动的不少有益的政治斗争经验,也更坚定了他的无产阶级具有伟大历史使命的信念。另外,他还清楚地看到工人运动的发展还处在很不成熟的阶段,工人阶级还受到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糊涂观念的严重影响,这种情况表明:工人运动极需要得到正确理论的指导。

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呢?

马克思认为：一方面，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该积极地深入到工人群众和革命斗争中去，力求用正确的革命理论去影响他们。另一方面，理论工作者应该花更大的气力去从事科学理论的研究工作。

因此在巴黎期间，马克思无论社会工作有多么繁忙，有多少恼人的事情纠缠着他，他始终没有停止过科学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德法年鉴》停刊以后，他把全部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去了。他研究历史，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状况和结构，企图弄懂资本主义及其矛盾发展的内部过程和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他异常勤奋地工作着，简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每天的工作时间大都在十六、七个小时以上，常常忘记了休息和吃饭。在他看来，只有发现真理才是人世间最大的幸福，而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则是人类最高尚的品行。

然而，科学思想体系的创立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才能逐步取得成功。这如同攀越一座险峻的山峰，近处藏草迷离、藤蔓缠绕，远处险峰陡峙、重峦叠嶂，稍有不慎就会误入歧途或堕入谷底，或者因心衰力竭而中途止步。因此，在通往科学顶峰的道路上，不畏艰险和不屈不挠的坚毅品格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精神可以使人在困境中不灰心动摇、扎扎实实地向前攀行。

马克思正是这样一种人,他从踏入社会那天起,就有一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和广容百川的博大胸怀,孜孜不倦地追逐着真理和正义,虽历尽千难万险而乐此不疲。

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具有古老灿烂的历史文化的伟大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和革命激情的勇敢坚毅的民族。特别是在近代史上,法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一向以激进、彻底而闻名于世: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用武力一举摧毁了封建专制主义的象征——巴士底狱,从而掀起了震撼世界的大革命的序幕;1792年,革命狂飙再起,巴黎人民毅然铲除了封建王权,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国;1793年巴黎又爆发了六月二日起义,企图阻止革命前进的吉伦特派的统治被推翻,雅各宾革命民主专政建立,从而把法国大革命推向了最高峰。这些激动人心、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引起了马克思浓厚的兴趣,而法兰西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又使得他感慨万千,钦佩不已。

因此在巴黎期间,马克思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法国革命史,试图从中找到对德国革命有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并用法国人民的战斗激情来启迪德国人民的心智。

马克思专门研究了法国 1789 年革命史、1792—

1793年革命和第三等级的历史,阅读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著作以及法国大革命领导人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等人的论著,写下了大量心得笔记,并计划写一部法国国民公会史。这一宏大的计划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马克思在这一研究中得出的许多带有结论性的东西对他以后的研究工作是大有裨益的,对他的唯物史观的形成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复辟时期的法国史学家梯也尔、基佐等人虽然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但他们力图从财产关系的变化解释社会政治关系的变化,承认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些观点中,马克思吸取并发展了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与这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为了深刻理解导致当前阶级斗争的深层次的原因,着眼于研究作为阶级结构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因此,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了。

早在主编《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对经济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心要深入地研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经济关系。在巴黎期间,他认真研究了許多经济学家的著作,如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以及詹·穆勒,等等。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经济思想使马克思深受启发,当然,他也从中发现了许多谬误和值得进一步

研究思考的问题。

亚当·斯密(1723—1790)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建者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其主要贡献是最先提出了一般社会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值的原理。

虽然某些学者在以前也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但在创造价值的劳动问题上却始终没有走出误区(例如,配第认为只有生产金银的劳动才创造价值)。斯密纠正了他们的观点,他指出: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价值的源泉。这样一来,他就撇开了劳动的具体形式,从而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归结为一般的社会劳动,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他又错误地认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为价值,主张自由竞争原则。他是代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

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其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斯密的理论,例如,他指出,斯密说有些商品没有使用价值也有交换价值,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商品没有效用就没有交换价值;他还主张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价值量是与商品包含的劳动量成正比的,等等。但是李嘉图的学说仍没有解决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平

均利润论等所存在的矛盾。

在阅读这些经济学著作时,马克思进行了极为严肃认真的思考,做了大量摘录工作,并写下了详细的笔记,保存下来的一共有九本(即《巴黎笔记》)。从这些笔记可以看出,虽然马克思这时期刚刚开始与古典经济学划清界线,他的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尚在形成过程中,但他对古典经济学派的批判态度已经十分鲜明了。马克思已经看到:古典经济学家们把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为从来就有的、与“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关系,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看成永恒的规律,这是它的根本缺陷所在。

在笔记中,马克思还揭露了古典经济学的虚伪性:以抽象的规律掩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他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存在着生产过剩和劳动力过度贫困的矛盾,存在着资本及其使用方式的扩大与“缺少生产机会”的矛盾,古典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它所关心的仅仅是资本家的利益,工人只被看成“劳动的机器”。

在巴黎期间,马克思还对法、英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昂利·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出生于贵族家庭,曾热情地参加过美国独立战

争和法国大革命,后专门从事研究和写作,出版过《一个日内瓦公民给当代人的信》、《论实业制度》和《新基督教》等著作。

圣西门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其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资本主义是一种充满矛盾、畸形发展的社会,富人的享乐是建立在穷人的苦难的基础上的,最终将被合理的实业制度所取代。在实业制度中,由国家组织生产,实行有计划的协作制、体力和脑力劳动义务制和才能等级制,用对物、对生产过程的管理取代对人的统治,为人民大众谋取最大的福利,但并不消灭私有制,也不完全排除社会不平等现象。他还反对用群众暴力实现社会改造,主张和平地实现新制度。

夏尔·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出生于商人家庭,长期从事商业活动,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深刻认识。后脱离商界,潜心研究理论,写过《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论家务农业协作社》和《经济和协作的新世界》等著作。

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充斥着混乱、贫困和淫荡,是万恶之源,国家是特权者反对穷人的卫士,整个社会贫富不均,剧烈动荡。他希望建立起所谓和谐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基层单位法郎吉是一种以农业为主,工业为辅的生产消费协作组织,人们可以按

兴趣爱好从事不同的工作,其产品按劳动、资本和才能分配,人人皆可成为股东从而消灭阶级对立,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妇女解放,消除城乡差别。傅立叶认为,可以通过和平宣传和示范等方式在数年内建立这种制度。傅立叶的信徒们曾在世界各地进行过多次法郎吉试验,但都以失败告终。

罗伯特·欧文(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出生于手工业者家庭,后成为企业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带有更多的实践色彩。他曾在苏格兰创办工厂,为劳动者提供良好的住房,设立合作商店,开办托儿所和小学,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培育“未来教育的幼芽”,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才。

1824年欧文赴美建立“新和谐村”,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集体劳动制,失败后回英国继续从事社会主义试验。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是造成贫富悬殊和道德沦丧的根本原因,主张建立劳动公社,实行公有制以及共同劳动和分配的原则,消除阶级和剥削,成员按其能力和需要分配工作,还主张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以及城乡差别。主要著述有:《新社会观》、《新道德世界书》等。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

众对资本主义不满情绪的一种反映,因此这一学说中必然包含着许多积极因素。例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和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批判,指出私有制度是一切灾难的根源,资本主义并不是永恒的制度。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虽然其中有不少空想、荒诞的东西,但也具有许多天才的和有一定科学性的设想,这对于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具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的,他们不懂得社会的发展规律,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否认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把实现其理想社会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身上,企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建立新的社会。因此他们的目的是无法实现的。

例如,为了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欧文曾经在美国办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企图用宣传和“示范”的办法来感化统治阶级,使他们自动地放弃剥削压迫,以建立一个所谓“和谐”的社会。欧文的这一共产主义实验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则想了一个好办法:他把自己设计的社会改造方案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并表示希望与那些愿意资助这个计划的人合作。然后,他每天中午坐在家中等待,结果他苦苦等了许多年,始终没有一个富

翁来登他的门。

在巴黎期间,马克思系统地研究了这些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从中汲取了某些合理、科学的成分,批判了那些消极的、空想的因素,为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建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844年4月至8月,马克思在巴黎写了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把自己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做了比较全面的叙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这本书才在苏联正式出版,定名为《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全面论述了关于异化劳动的学说。“异化”这一术语以前曾在哲学界广泛应用,指的是主体在发展过程中转化为与自己相对立并反对自己的异己力量。但是,费尔巴哈研究的是宗教以及人的本质的异化,黑格尔研究的是绝对观念的异化。马克思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批判了他们关于异化的思想,并加以继承和发展。

在《手稿》中,马克思全面研究了劳动在人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指出:正是劳动使人类可以从事多方面的创造从而不断进步。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而属于“不劳动者”(即资本家)所有,被他们用来继续支配劳动者;工人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这种劳动是非自愿的,劳动已不

属于劳动者自己,而属于他人;劳动仅仅成为劳动者生存的手段,他们失去了劳动的兴趣;异化劳动必然产生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尖锐对立。

马克思在探讨了异化劳动的种种表现之后,还深刻挖掘了产生异化劳动的原因。马克思指出,社会中的种种异化形式都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而劳动异化则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产品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劳动者相对立,并导致了人们之间关系的疏远,以致一部分人可以对另一部分人进行剥削和统治。而异化劳动又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使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日益剧烈,最终必将导致私有财产制度的崩溃。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样,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研究进一步揭露了私有制度的本质和罪恶,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产生的必然性。当然,马克思也预见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还要经历一个漫长艰难的历史过程。

自从《德法年鉴》被迫停刊后,马克思一直试图找到一份能够发表自己政治见解的刊物。他的这一愿望不久就实现了,一份名为《前进报》的报纸为他提供了这一可能。《前进报》是由德国商人亨利希·伯恩施太因于1844年初在巴黎创办的,每周出版两

期。创刊之初，它的政治倾向比较保守，曾发表过恶毒诽谤《德法年鉴》的文章。

自从1844年5月，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出任该报主编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该报具有了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这样一来，马克思和他的《德法年鉴》的战友们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们决定给这份尚未受到当局“关注”的报纸撰稿，对德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发起了锐利的攻击。

《前进报》的主办人伯恩施太因并不是激进的革命者，对政治问题也不太关心。但他是一位精明的商人，办报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因此他最关心的是报纸的发行量和由此而带来的利润。由于《前进报》刊载了一系列内容激进的文章后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订户猛增，经济效益明显好转，所以伯恩施太因没有对报纸内容发生的变化进行干预，而是采取了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这对于该报向革命的方向转变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前进报》很快就吸引了更多的革命者和政论家的注意，其作者队伍越来越壮大。除马克思外，海尔维格、艾韦贝克、海涅、卢格、巴枯宁、毕尔格尔等人也先后加入了进来。

为《前进报》撰稿也是海涅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在马克思等人的影响下，他连续在《前进报》

上发表了《中国皇帝》、《安心》和《新亚历山大》等著名诗作，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了无情的嘲讽和严厉的政治批判，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例如在《中国皇帝》这首不朽的诗篇中，他借助对中国满清王权的讽刺鞭笞，对普鲁士王朝和封建专制体制的腐朽反动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抨击。诗中写道：

我父亲是个不饮酒的怪人，
他不喜欢喝得酩酊大醉；
但我却很爱喝烧酒，
我是个强大的统治者。

饮酒具有神奇的作用！
我心里对这一点认得清：
只要我把烧酒喝得痛快——
中国在世界上就能特别繁荣。

中华帝国蒸蒸日上；
到处是春天的芳香。
我自己几乎已长大成人，
我的妻也有了身孕。
得病的人都获得健康；

所有的人既富足又幸福。
我的第一位大圣人孔夫子，
提出了最出色的思想。

士兵们吃的干粮，
比糖果味道还香；
而我的国家里的乞丐，
都穿着绸缎和丝绒衣裳。

那些满大人，
我的那一队老弱残废的人们，
又恢复了令人羡慕的活力，
重返生气泼辣的青春。

信仰的象征和屏障，
那座宝塔已经建成，
犹太人在里面领洗，
这会使他们戴上龙的勋章。

叛逆的精神烟消云散，
满洲的老爷高声呼唤：
“我们不要什么宪法，
我们要的是抽打皮肉的竹竿！”

为了把我的酒瘾全部戒掉，
医生给我开了戒酒的良药；
可是我喝酒是为了国家的幸福，
因此不听他们的劝告。

一杯又一杯！
像甘露一样味美！
我的人民虽然也喝醉，
却还在热情地高呼“万岁！”

这一时期，《前进报》经常向读者介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现状，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马克思等人希望通过这种宣传对德国的革命斗争施加有力的影响。但由于撰稿人的成分和思想状况极为复杂，许多人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因此矛盾和争论便在所难免，时常发生激烈的思想交锋。

以马克思为首的共产主义者与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由此而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其思想理论也日趋完善。正如苏联著名史学家彼·费多谢耶夫所描述的：“每周举行的编辑会议上争论都很激烈，如同报纸的一个编辑所回忆的，连窗户也不能打开，否则街上就会挤满人

群,打听激烈叫喊的原因。主要争论发生在马克思与卢格之间,胜利属于马克思,他从1844年夏季开始对报纸的方针影响越来越大。像后来恩格斯所写的那样,在马克思的影响下,‘该报辛辣地嘲讽了当时德国专制制度和冒牌立宪制度的空虚拙劣’。”

《前进报》内部的这场争论很快就变成了一场公开的论战,其起因是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

这次起义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在19世纪40年代,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德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所遭受的剥削也越来越严重,劳资矛盾异常尖锐。西里西亚是德国工业的重心之一,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工人阶级受到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双重剥削压迫。

西里西亚的织工们为了得到外出做工的权利,要向地主缴纳特别的捐税。为了赢得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任意压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劳动条件也日益恶化,工人及其家属不得温饱,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历史资料证明:在起义爆发以前,该地区的3万多织工中竟然饿死了6000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统治当局的矛盾已经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当地纺织工人中流传着一首他们自编的歌曲——《血腥的屠杀》,歌中悲愤地唱道:

村子里有个法庭，
它比弗迈还要狠毒，
它的法官不用审判，
很快就夺走人的生命。

.....

你们这些无赖和恶魔，
简直是地狱中的厉鬼，
夺去穷人的财产，
应该狠狠地诅咒你们！

1844年6月4日，纺织工人唱着这首歌经过了他们最痛恨的大工厂主茨文兹格尔门前，抗议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结果惨遭毒打和逮捕。工人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动了起义，捣毁了茨文兹格尔的住宅，销毁了帐本和财产契据。各地工人纷纷响应，罢工和示威的浪潮此起彼伏。

面对工人阶级的战斗，统治阶级暴露出了凶残的真面目，他们立即调集重兵进行严厉镇压。工人阶级则奋起反抗，他们纷纷拿起木棍、石块、铁棒抗击，与反动军队进行英勇的战斗。最后，工人起义因寡不敌众被残酷镇压下去了，数百名起义者被判处徒刑或强制劳动。

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爆发以后,社会上的各个阶级对它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如前所述,德国政府实行高压政策,用武力把工人起义淹没在血泊当中。与此同时,他们还采取了“软”的一手,利用虚伪的慈善活动和教会的宗教宣传,以掩饰其凶残的真面目,软化和麻痹劳动群众的反抗精神。而资产阶级则完全站到了政府一边,顽固地维护其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

在围绕织工起义展开的政治讨论中,激进派发生了分裂,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认为西里西亚织工进行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战斗,而认为这是对社会的“威胁”,因而对工人持敌视态度。卢格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起义爆发后,他用“普鲁士人”的笔名在《前进报》上发表了题名为《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的文章,竭力贬低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巨大意义,说普鲁士是个非政治的国家,在这里发生的起义只有局部意义,缺乏“政治精神”,否认工人起义是由于被剥削造成的。他还诬蔑德国工人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独立地进行政治斗争,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只能破坏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卢格的这些言论明显地反映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对工人阶级的本能的敌视。

激进派中的另一部分人则与卢格完全不同,他

们从工人阶级的奋起反抗中受到巨大鼓舞,不仅热情地歌颂工人起义,而且公开为之辩护。例如,革命诗人奥格尔格·维尔特和政论家威廉·沃尔弗等人在起义发生后都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工人阶级的英勇行为,表明了支持德国工人的鲜明立场。而伟大的革命诗人海涅更是为工人阶级的壮举感到热血沸腾,他认为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不是单纯的饥民骚乱,而是德国工人走上反对自己的阶级敌人的革命的第一步。

1844年7月的一天,海涅与马克思在家里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这些软弱可耻的民主派把起义说成是饥民的骚动,真是鼠目寸光!”马克思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简直气愤极了。“不!海涅,这决不是骚动,你可曾听过织工们唱的那首歌?”

“是那首《血腥的屠杀》吗?”

“对!这是悲壮的呐喊,是战斗的呐喊。你知道,歌词中根本没有提到个人和家庭,他们所反对的是整个私有制社会和富人,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伟大胸怀和力量。”

马克思越说越兴奋,海涅也越听越动情,蓦地,一股汹涌激越的旋律闯入了他的脑际,很快他就完全沉浸在一首新诗的构思和创作之中了。不久,一首

充满悲壮和战斗激情的诗篇《贫苦的织工》在《前进报》上发表了，诗中写道：

悲愤的眼睛里没有泪水，
他们坐在织机前咬牙切齿，
古老的德国，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要织进去三重诅咒。
织啊织！

一咒那又聋又瞎的上帝，
我们孩子般虔诚地向他祈祷，
我们的企盼和期待全落了空，
他竟然把我们欺骗愚弄，
织啊织！

二咒那富人的国王，
我们的哭号打不动他的心，
他榨干了我们的最后一文钱，
还要让我们像牲口一样死在刀下。
织啊织！

三咒那虚伪的祖国，
只有骗子和恶棍才在这里过得幸福，

这里有腐朽和尸臭；——
古老的德国，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织啊织！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
我们纺织着，日夜匆忙——
古老的德国，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要织进去三重诅咒。
织啊织！

马克思是怀着高度赞赏和深切同情的心情观察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他极为痛恨卢格等人对起义所抱的轻蔑态度。为了批判卢格的错误观点，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颂扬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了《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揭示了这次起义发生的原因和起义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工人阶级的贫困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因此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是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发生的原因所在。他认为这次起义显示了德国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成熟。他们不仅捣毁机器，而且销毁了帐簿和财产契据，把剥削阶级和私有财产制度作为打击对象，起义还显示出一定

的计划性,工人群众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这些事实说明:德国工人阶级已经认识到自己与私有财产制度的对立。马克思在文章中还指出:起义证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改造者所具有的巨大力量;社会主义必须通过“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的革命才能实现。

由于马克思等人的参与,《前进报》的政治倾向越来越激进,其社会主义色彩也日益浓厚,因此在进步人士和广大民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爆发和卢格等人对工人群众的污蔑,促使马克思越来越深入地研究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途径等重大理论问题。他彻底否定了认为可以依靠现存国家来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和消除贫困等错误思想,得出了贫困的根源是私有制,要想根除贫困就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的思想。

这一事实意味着,马克思已经向得出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的重大结论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前进报》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的影响却在极为迅速地扩大,它的周围团结着一批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在报上讨论有关无产阶级的状况和历史使命等重要的问题,积极宣传正在形成之中的共产主义观点,对于推动国际工人运动的

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它受到了反动势力和统治当局的粗暴攻击和迫害，许多反动刊物污蔑它是“最坏”、“最危险”的报纸，甚至叫嚣不能让它生存下去。

1844年夏天，普鲁士国王派遣专使亚历山大·冯·洪堡向法国政府提出交涉。洪堡携带着威廉四世的亲笔信和一个迈森产的名贵花瓶来到巴黎，要求法国以“鼓动刺杀国王（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由封闭该报馆。起初，法国政府觉得这一指控过于牵强，弄得不好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没有接受。但事隔不久，它就以该报没有交纳保证金把主编贝尔奈斯先生逮捕。1844年12月，法国政府终于撕去了虚伪的面纱，公开宣布封闭《前进报》。

第九章

伟大的友谊

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列宁

早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就立下了“一个人只有为全人类劳动，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的伟大誓言，如

今时间已经过去整整 9 年了。在这段不算短的岁月里,他严格地实践了自己所说的话,为了使全人类得到真正的解放,他甘愿放弃本可以轻易得到的舒适安逸的生活,投身于知识的浩瀚海洋和革命斗争的汹涌激流之中,搏击驰骋,与专制制度、各种反动的社会势力和错误思潮进行激烈的战斗。

长年的工作和斗争使马克思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不断完善了他的科学理论体系,同时,他也受到各国政府和各种恶势力的恶毒诽谤和迫害。在这种极度艰险恶劣的环境中,他要与统治阶级和反动势力斗争,要与伪装成朋友的阴险敌人斗争,同时还要忍受贫困动荡生活的煎熬,为维持自己的生计和柴米油盐等家庭琐事而劳心费神。

这种不断探寻真理和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生活,使马克思在激动振奋之余也感到十分疲倦,并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孤独感。这是一种只有那些攀登上人生最高境界的人才能体验到的孤独——漫漫长路,吾谁与归? 马克思也是一个人,在他那钢铁般坚强的外壳之下隐藏着一颗普通人的心,他也需要休息和抚慰,也需要朋友和友谊。他时常感到,如果有一位志同道合、坚强勇敢的战友与他并肩战斗的话,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事情啊!

为了得到这种真正的友谊,马克思曾经苦苦地

寻觅过。

他曾与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阿陀里·鲁滕堡博士一见如故,结为至好,时常就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鲁滕堡还引荐他参加了博士俱乐部。但他很快就发现,两人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而且鲁滕堡不仅学识粗陋,还十分傲慢固执,拒不接受别人的合理意见。在主编《莱因报》期间,马克思曾就鲁滕堡稿件中存在的严重技术问题向他提出忠告,这位学兄竟勃然大怒,并一直耿耿于怀。

他曾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领袖布鲁诺·鲍威尔的真诚的友谊,他对此很看重,并希望能与鲍威尔在哲学研究领域中长期合作。但这一愿望很快就落空了。鲍威尔的政治观点始终没有进步,他只满足于能与牧师们争辩中表现自己观点上的正确性。对于只关心自己温饱“没有批判思想的”芸芸众生,如果狭路相逢,他还能给予同情和施舍,但却从不愿与他们发生任何联系。马克思曾试图纠正他的这种严重偏见,但未见成效。

后来马克思又结识了激进的民主主义政论家、杰出报人阿尔诺德·卢格。他们曾经是真正的战友,一起为报刊写文章,抨击专制统治,宣传革命思想。卢格创办的《德法年鉴》为马克思提供了向专制制度

开火的阵地，使马克思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曾几何时，当他们的事业遭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卢格怯懦地退缩了，其革命战斗精神大大减弱。特别是当西里西亚织工们为了生存的权利而奋起战斗时，卢格竟然站到了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对起义者横加污蔑指责，表现出了严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从而导致他与马克思私人关系的彻底破裂。

交一个朋友其实并不难，但要交上一个既能为共同的崇高理想努力奋斗，又能经受住长时期风浪和磨难考验的真正朋友，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面对一次次友谊的淡漠和私交的破裂，一次次背信弃义，反目成仇，马克思没有心灰意冷，他坚信：茫茫大千世界上一定存在着像自己这样立志攀登科学高峰的仁人志士，他们迟早会在战斗的旅途中相遇的。马克思在期望和幻想之中苦苦地等待着。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844年8月23日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巴黎法兰西剧院广场上暖风习习，游人如织，在广场一侧的雷让斯咖啡厅里，马克思独自一人坐在桌旁。他的眼睛注视着窗外熙来攘往的人群，目不转睛地搜寻着，脸上流露出一丝焦急的神态，似乎在等待着一个重大时刻的到来。此时马克思正在等候一个人，一位将

与他在时代的大风大浪中毕生并肩战斗的忠诚战友——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该城座落于乌培河谷地,四周有山峦环绕,林木繁茂,所以气候温和湿润。在春夏秋三个季节中,这里到处花团锦簇,郁郁葱葱,远方群峰陡峙,壮丽巍峨,是一个风景秀丽、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巴门也是一座著名的工业城市,以纺织业为主,大约有一百多家中小型企业,产品质优价廉,在国内十分畅销。但这里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为了压低成年男工的工资,资本家们雇佣了大批童工和女工,驱使他们干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工作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得到的报酬却极为微薄。因此工人们的生活非常贫困,许多人拥挤在低矮破旧的草棚里栖身,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

恩格斯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工厂主家庭,共有兄弟三人,与父母同住在一幢阔绰舒适的豪华住宅里,地址是:巴门市布鲁歇尔·罗特尔800号。

恩格斯的先人是于16世纪定居于此地的,历来属于当地的名门望族。其祖父曾经担任过市政府的顾问官,也是巴门教区的创始人。

恩格斯的父亲也叫弗里德里希,起初在祖父的工厂里工作,后改为独立经营,在许多城市办过工厂,是一个殷实富有的工厂主。弗里德里希办事干练,头脑机敏,到过欧洲的许多国家,见闻和学识都很广博,在学术上也颇有造诣。他特别喜欢音乐和戏剧,经常在家里拉大提琴,吹低音笛,有时还举办室内音乐会。但他继承了家族中根深蒂固的普鲁士传统,在政治上很保守,笃信宗教,而且性格暴躁,对子女的管教十分严格。恩格斯是家中的长子,从小就受到极其严厉的管束,父亲要求他虔诚地信奉上帝,规规矩矩地做人做事。但恩格斯从小就精力旺盛,聪颖活泼,喜欢探究人类和大自然的各种奥秘,因此常常受到父亲的训斥和打骂。

由于在父亲那里得不到温暖,年幼的恩格斯便把依恋的目光转向了母亲。恩格斯的母亲名叫爱利莎·弗兰契斯卡·莫莉蒂娅·恩格斯,出身于一个学者家庭。她的父亲是荷兰人后裔,曾担任过哈姆理科学学校的校长,是当地很有名气的语言学家。爱利莎本人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极富教养,在诗歌和音乐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尤其喜欢歌德的作品,这对于恩格斯的影响颇大。母亲为人十分善良,温存柔和,富有幽默感。虽然她的性格比较软弱,但还是尽力保护孩子们免遭丈夫的粗暴对待,所以深受孩子们的

爱戴。恩格斯一生都非常热爱母亲,并与她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恩格斯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这里壮丽多姿的山山水水和丰富的人文景观深深地滋润了他的心田,母亲底蕴丰富的文学修养和她那温柔慈爱的呵护轻轻地打开了他心灵的窗口,启迪了他幼稚的思维。同时,他也耳闻目睹了广大劳动人民苦难的生活和资本家的凶残苛刻,贪得无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所有这些都在他身上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他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同情劳苦大众,痛恨人世间的暴虐黑暗,崇尚真理和追求真善美。

恩格斯 13 岁那年进入了巴门市立中学读书,一年后,父亲又送他到爱北斐特中学就读。这是一所创建于中世纪(1592 年)的老学校,当时在普鲁士颇有名气。该校学风严谨,教学设施齐备,图书资料极为丰富,而且还有一批才学横溢、思想进步的教师。因此,学校生活在少年恩格斯面前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爱北斐特中学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外语、宗教、历史、物理、数学、地理、博物、艺术和哲学导论,等等。恩格斯学习热情很高,也十分刻苦,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这时期他很喜欢自然科学,在物理、化学等科目上下了不少功夫,表现出了极强的颖悟力。但

就是从这时起，他在语言上的天赋开始显露出来了。在中学时期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拉丁语、法语和希腊语等多种外语，对历史和文学的兴趣也日渐浓厚，喜欢浏览各种有益的书籍。

这时期，恩格斯对维吉尔、西赛罗和李维等人的作品很感兴趣，尤其喜欢阅读欧里庇德斯的悲剧和柏拉图的《克里顿对话篇》。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德意志的历史和民族文学。像许许多多青年人一样，青少年时代的恩格斯具有浓厚的英雄崇拜意识，他特别敬佩那些反抗强权、暴政和邪恶，为人类争取自由和幸福的英雄人物。希腊神话中盗天火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巨神普罗米修斯和荷马史诗中英勇无畏的斗士阿基里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使他常常为之感叹唏嘘。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德国文学中的三位英雄形象：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战无不胜的勇士齐格弗利德，民间传说中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神箭手威廉·退尔和歌德笔下的悲剧英雄浮士德。

在恩格斯心目中，这些人物都是叱咤风云、威武不屈的英雄豪杰，他们具有坚韧的个性、百折不挠的毅力和甘愿为人类正义事业献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在反抗黑暗压迫，为人类谋利益的伟大斗争中创立了可歌可泣的丰功伟业。感慨之余，恩格斯常常会萌生这样一种念头：如果自己生活在英雄们的那个

时代,也一定会为了高尚的理想和追求而英勇战斗,经受住种种痛苦和磨难的考验。

恩格斯虽然学习很用功,但并不是一个死啃书本的书呆子,他十分注意观察现实的社会生活。当时学校里的宗教色彩仍很浓重,在某些教师眼中,不信教是一种罪恶。有一个学生曾经问老师:“歌德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位老师竟用蔑视的口吻回答说:“他是不信教者。”受母亲的影响,歌德一直是恩格斯心目中最伟大、圣洁的诗人和作家,所以他对这种状况感到很厌恶。通过进一步观察他还认识到,信教的人并不都是心地善良的绅士,因为,他发现很多工厂主每个星期都虔诚地去教堂做礼拜,可是他们却非常残酷地压榨工人,对他们的死活漠不关心。这种现象更引起了恩格斯的深思。

出于对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某种厌倦心理,恩格斯开始严肃地思考社会问题了。他开始更多地阅读课外书籍——其中包括许多被当局查禁的书,对学校安排的课程则有所放松,这引起了父亲的极大关注。有一次,恩格斯阅读了一本关于13世纪骑士故事的书,书中描写的游侠骑士们匡扶正义、除暴安良的英雄壮举和追求真正爱情的浪漫经历,引起了他的某种共鸣。但这本书不慎被父亲发现了,认为他看了“一本肮脏的书”,是“意志薄弱和思想浮泛”的表

现。为了对他严加管教,父亲干脆把他送到爱北斐特中学校长家住读。在这里,恩格斯受到校长大人极其严厉的监督,度过了一段痛苦难熬的时光。逐渐地,恩格斯对这种学习生活感到厌恶了,他把这种学校称作“监狱”。

恩格斯原准备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深造,专门从事经济学和法学研究,但父亲却执意要让智商极高的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在商界飞黄腾达。1837年,父亲在巴门开设了一家新的公司,同年,又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与企业家彼得·欧门创建了欧门——恩格斯棉纱公司。父亲照应不过来,于是就让恩格斯放弃学业,下海经商。就这样,恩格斯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巴门的事务所当了一名练习生。

恩格斯一向很厌恶这种充满铜臭气的行业,但父命难违,只得听从了父亲的安排。这是命运对他的第一次严重打击。此时他才17岁,距中学毕业只有9个月的时间。第二年,父亲又把他送到不来梅的贸易公司里当办事员,做一些检验和收收发发之类的枯燥无聊的工作。

不来梅是德国的四大自由城市之一,同世界各国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在政治和学术方面都比恩格斯家乡自由得多。这样,恩格斯就从家乡狭小封闭的天地中走了出来,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

有机会受到各种进步思想的影响。

工作之余，恩格斯一边刻苦学习外国语言，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外国书籍和报纸杂志，其中许多书在普鲁士都是被查禁的进步书籍，他不仅自己看，还悄悄把它们寄送给过去的朋友们分享。起初，恩格斯对文学很感兴趣，歌德、海涅和白尔尼是他当时最敬佩的诗人和作家。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写了不少文学作品，曾经在《文艺批评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随笔和书评。后来，恩格斯发现自己在文学上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于是他又转向了社会科学领域，广泛进行社会调查，从事理论研究。恩格斯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能发现使全人类获得解放的真理，并立志要象汹涌澎湃的洪流那样，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通向理想王国的光明大道。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一股汹涌的洪流，
呼啸着独自奔出山谷，
松树在它面前轰然倒下，
它就这样给自己冲开一条大道；
我也将和这股山洪一样，
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

青年时代的恩格斯是以一种狂热的拼搏精神从

事学习和研究工作的。每天下班后,他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伏案工作,认真阅读历史、哲学、语言、神学以及文学方面的书籍,一直工作到后半夜。星期天和节假日更是他的全天学习日,从不懈怠。读书的同时,他还勇敢地拿起笔,开始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向专制制度和宗教宣战。1839年,他在汉堡的《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匿名文章《乌培河谷来信》,以犀利的笔触描绘了乌培河地区残酷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宗教的虚伪和工厂主的贪婪,表达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

通过科学研究和深入社会,恩格斯的政治观点变得越来越激进了,充满了对封建专制统治、神学蒙昧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仇恨。他希望彻底变革这种社会状况,解放德意志人民,同时自己也获得自由和解放。恩格斯在一首诗中充满激情地写道:

西方彩霞闪耀,
自由的曙光倾刻间来到;
旭日初升,放射出不熄的光芒,
黑夜在消逝,带走它的苦难。
那时候,不仅在我们播种的花圃里,
鲜嫩的花蕾含苞待放,
而且整个大地都是万紫千红的花园;

葱茏的草木把山河点缀，
和平棕榈装饰着北国之乡，
爱情玫瑰插在穷苦人身上。
茁壮的橡树移植到了南方的海疆，
举起棍棒打倒暴君；
谁使他的国家重获和平，
橡叶桂冠就会戴在谁的头上。

1841年3月，恩格斯回到了巴门。不久，他就对家乡那种落后闭塞的沉寂局面感到厌烦了，但他又不愿再去经商，于是决定去服兵役。当时普鲁士政府规定青年人必须服一年兵役，但地点可以自由选择。经过一番权衡，恩格斯最终选择了柏林，因为那里有著名的柏林大学，他可以在服役之余去那里学习深造。于是1841年9月，他作为一名志愿兵来到了柏林炮兵旅。

在服兵役期间，恩格斯一方面认真钻研军事，一方面利用空余时间去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柏林大学的哲学研究在全国是很有名气的，也是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舞台。恩格斯在这里很快就结识了一批青年黑格尔派分子，经常与他们一起进行学术讨论，写文章批判宗教愚昧和反动的哲学思想。统治当局担心自由民主思想在柏林大学泛滥起来，于是

赶走了一批具有激进思想的教师,并请来了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来传授所谓“天启哲学”,公开为正统思想和宗教做辩护。

政府的倒行逆施和谢林的反动说教深深激怒了恩格斯,他立即发表了一篇论文《谢林论黑格尔》和一本名为《谢林的启示》的小册子,抨击谢林把哲学贬低为“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了“基督教哲学家”,其目的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从而彻底揭穿了谢林的反动面目。在那本小册子中,恩格斯向广大读者发出了战斗的召唤:“我们将战斗和流血,我们将无畏地直视敌人的愤怒的眼睛并战斗到最后一息。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我们的旗帜在山顶飘扬?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同志们的刀剑在闪烁,钢盔在发光?……伟大的决定性的日子,各民族战斗的日子已日益临近。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在柏林期间,恩格斯认真阅读了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深有同感,对马克思的学识和才华十分敬佩。经过勤奋的研究和写作,他也先后发表了20多篇文章,对专制统治及其思想观念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后,对恩格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他抛弃了唯心主义,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变。

1842年10月恩格斯服兵役期满,在回巴门的途

中他曾在科伦停留,想拜会时任《莱因报》主编的马克思,但未能如愿。同年11月底,恩格斯奉父命赴英国的曼彻斯特经商,途中再次来到科伦,这一次他见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十分赞赏马克思的理论观点,所以对马克思很热情,但马克思的反应却比较冷淡,因为他已经与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断绝了关系,把恩格斯也当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但马克思对这位年轻人幽默诚恳的态度颇有好感,真诚地邀请他为《莱因报》写稿。

1842年底一个雾霭茫茫的日子里,恩格斯乘坐轮船到了伦敦,又转乘火车来到曼彻斯特,进入欧门—恩格斯棉纱厂工作。此时的英国刚刚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号称“世界工厂”的头号经济强国,其工业产品几乎占据了全世界工业产品的一半。曼彻斯特当时是一个拥有40万人口的重要工业城市,轻纺工业极为发达,到处是林立的工厂、高耸入云的烟囱和充斥着各种商品的商业店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是,这里的贫富差别也表现得异常明显,资本家过着挥金似土、穷奢极欲的庸朽生活。广大工人群众则拥挤在低矮阴暗的贫民窟中,在饥寒交迫之中发出痛苦的呻吟。因此,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表现得异常激烈。

同全国一样,从19世纪初叶开始,这里就出现

了一系列工会罢工斗争。到了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终于酝酿成了席卷全国的宪章运动,人民大众为争取选举权和一系列民主自由权利而展开英勇斗争。这种情况表明:这里的工人阶级已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来到曼彻斯特后,恩格斯亲身领略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巨大威力,感到极为振奋,于是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去参加宪章派的集会,同工人阶级进行密切的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思想活动和政治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他结识了不少宪章运动的领导人。与此同时,恩格斯抓紧一切时间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法、英两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他严厉地批判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入研究了商品、价值、价格、地租、资本和劳动等经济范畴,揭示了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经济矛盾,表现出了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从恩格斯这一时期的思想言论可以看出,他已经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父亲原想把恩格斯送到英国,在这个资本主义的乐园中学习锻炼,以便将来能继承自己的事业,但恩格斯却在工人运动和科学研究中

彻底背离了父亲和他所属的那个阶级，成长为一名对工人阶级充满同情敬佩和对资产阶级无比憎恨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曼彻斯特期间，恩格斯不仅与无产阶级建立了牢固的友谊，而且还结识了一位普通的纺织女工，并最终把真挚的爱情献给了她。

这位姑娘名叫玛丽·白恩士，比恩格斯小一岁，出生于一个染色工人家庭，祖籍爱尔兰。玛丽虽然因家贫没上过几年学，但她天生聪颖活泼，纯朴大方，性格开朗乐观。更可贵的是玛丽还是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她痛恨对爱尔兰实行民族压迫的英国当局，更痛恨残酷压榨广大劳苦大众的剥削阶级，很年轻时就投入到争取爱尔兰民族解放和反对阶级压迫的正义斗争中。自从认识了玛丽，恩格斯就被她那“野玫瑰”般美丽的外貌和坚韧纯洁的品格深深地吸引住了，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经常一块深入工人居住区，访问社会最底层的劳动群众，参加工人社交集会和各种政治活动。在玛丽身上，恩格斯更深刻地了解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他们的思想感情，而玛丽则在恩格斯的帮助下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在逐步发展升华。1843年，共同的革命理想和阶级情感使他们幸福地结成了夫妻，他们在一起恩爱生活了20多年。

对于恩格斯和玛丽的婚姻,许多人是不理解的,这其中也包括恩格斯的家人和许多亲密的朋友。他们认为无论从经济地位还是从文化素养来说,恩格斯都完全可以娶一个更为端庄娴雅、富有教养的富家小姐。但恩格斯却不以为然。在他眼中,玛丽不仅美貌大方,心地善良,她的身上还具有工人阶级的许多美好品格。并且她出身于工人家庭,对这个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和深刻的理解,这对于恩格斯所从事的事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事情的发展确实如此。与玛丽的结合使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感情更深了,从而更坚定地站在了他们一边,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壮丽的共产主义运动之中。正如德国著名学者 H·格姆科夫所说:“恩格斯对玛丽的爱,大大有助于恩格斯最终站到无产阶级方面,对他们的状况进行科学研究,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当然,对于恩格斯的爱,玛丽也给予了充分的回报。她把自己美好的青春和火热的爱情全部奉献给了恩格斯,并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在艰难动荡的革命岁月里,玛丽的爱是恩格斯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精神慰藉。

1844年8月23日,恩格斯在从曼彻斯特返回家乡的途中又来到巴黎,在友人的安排下来到法兰西

剧院广场,在雷让斯咖啡馆见到了正在焦急地等待他的马克思。

他们重新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

此时,他们相互间已经非常了解了。他们都认真地拜读过对方的文章,发现他们虽然居住在不同的国度,彼此之间的交往也很有限,但是,他们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共同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经济学中去寻求;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结束“人类的极度堕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且他们都决心把革命理论同工人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奉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

马克思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位客人。这是一位肩膀宽阔、高高瘦瘦的青年,一头黑黑的卷发象波涛一样覆盖着漂亮的前额,留着淡褐色的络腮胡子。他的皮肤纯净而白皙,高高的鼻梁和大大的嘴巴则显露出几分沉稳和敦厚。

寒暄了几句之后,马克思首先揭开了话题。

“我已经认真地读过了你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得好极了!你认为经济的一切矛盾都源于私有制度,这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发现,比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更具有社会意义!”

听了这番夸赞,恩格斯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他谦虚地说:

“博士先生,您过奖了。我也看了您写的文章,令我钦佩不已。您已经得出这一结论了。”

“这就是说,我们早已经并肩战斗了!”马克思爽朗地笑了起来。他已经打心底喜欢上了恩格斯,并从他那浅蓝色的明亮目光中看出:这是一位诚挚可信并具有超人智慧的热血青年。

“对!”马克思接着说道,“我们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无产阶级肩负着改造世界和解放人类的伟大使命,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亲爱的弗里德里希,今后你就叫我卡尔好了。”

听了马克思的一席话,恩格斯感到有一股热流从心底涌起,很快就暖遍了全身。他为能得到马克思的赞扬而由衷地骄傲,更为结识了这样一位坦率真诚的朋友而兴奋不已。

友谊啊,友谊,古往今来,人们常常提到这个美妙的词汇,古希腊人甚至还编出了愿意为友谊而献身的奥列斯特和皮拉德的神话^①。但当人们认真地回

^① 奥列斯特和皮拉德是古希腊神话中亲密无间的两位英雄人物,他们已经成了忠实友谊的象征。

首往事,寻觅友谊的足迹时,却往往黯然神伤。其实,友谊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她是绝对排斥任何利己的私念、贪婪的欲望、虚假的造作和肤浅张狂的。只有那些具有高尚情操、博大胸襟和宏伟的理想抱负并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才有可能获得这种稀世珍宝。而今,命运使马克思恩格斯走到了一起,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重任已经历史性地落到了他们的肩上,这一伟大的人类进步事业必将把这两位时代巨人紧密地、牢不可破地凝聚在一起。

这次咖啡馆会晤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脑海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并且谁也不愿意让对方离开自己。于是,恩格斯便在马克思家里住了下来。在这段难忘的日子里,他们朝夕相处,亲如形影,不分白天、黑夜地在一起促膝交谈,往往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们谈话的内容人们已经不能详细知晓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谈的大都是一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令他们感到高兴的,是在这些问题上他们的观点竟然完全一致!

谈话中他们还就一些新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探索,当通过认真的切磋,在思想火花的反复碰撞中取得了一定进展时,他们都兴奋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不仅具有共同的理想抱负和政治观点,而且思维方式也极其相近,他们都是睿智博学、具有极强个性和思辩批判能力的时代骄子,但他们都没有把对方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他们此时所想到的仅仅是:在未来的战斗——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治斗争中,自己终于有了志同道合、比翼齐飞的坚强战友!

在这段日子里,马克思还陪着恩格斯访问了共产主义俱乐部,参加了群众集会,与巴黎的工人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结识了一些法国工人运动领导人和外国革命者,使恩格斯对法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有了大致的了解。同时,他们还还对下一步理论研究的方向和要做的实际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恩格斯此次在巴黎逗留了十天,与马克思结下了终生的友谊,开始了他们长达 40 年的合作和战斗。从此以后,不管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路途中遇到多大的困难,不管各国政府、政治反动派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派别对他们进行何等残酷的迫害和打击,他们始终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向旧制度、向传统观念和宗教愚昧、向一切社会黑暗势力发起一次又一次猛烈的冲击,共同承担起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历史重任。

第十章

首次合作

我们先写下这篇论战性的绪论，再各自分头在自己的著作里叙述自己的肯定的观点以及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 1844 年的巴黎之夏，马克思只有 26 岁，恩格斯才 23 岁，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人生的旅程刚刚开始。同所有的人一样，他们也愿意体验世间的种

种乐趣,享受幸福的生活。但他们所理解的幸福是一种高尚的人生追求和完美的精神境界,它是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物质享受。在中学时代,马克思曾经用一句非常朴素的语言对自己的幸福观做了高度概括——“为全人类劳动”。而今,他和恩格斯又进而把它理解为——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但是,共产主义理想不是空中楼阁,要实现这一宏大的事业必须付诸于脚踏实地的工作和艰苦卓绝的战斗,迎着狂风恶浪的击打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因此在巴黎的十天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科学理论的同时,还对下一步要做的具体工作进行了安排。他们打算先写一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书,与他们在思想上划清界线。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要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刚刚踏入社会时都积极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这是因为当时这一派别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采取了坚决批判的态度,坚持民主自由原则,代表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进步思潮。但是,青年黑格尔派代表的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他们身上也有明显表现,特别是当马克思、恩格斯等更激

进的革命者在理论研究领域和革命实践中大踏步前进的时候,这个派别势必会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其局限性也表现得愈加明显。

该派的主要首脑鲍威尔等人背离了他们过去一再宣传的激进的民主思想,逐渐向右转,放弃了反对宗教和普鲁士国家的斗争,顽固坚持唯心史观,夸大个人的历史作用,鼓吹英雄创造历史,蔑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他们甚至与封建统治阶级妥协,美化普鲁士国家。鲍威尔等人还发表文章,公开表示要与“1842年的激进主义”彻底决裂,影射和攻击马克思等人的共产主义观点,宣布自己的批判已不再是“政治性”的了。鲍威尔等人的这种变化使他原来的政治盟友们(包括共产主义者和广大的民主势力)感到痛心疾首,却顺应了反动当局的政治需要。一位负责报刊检查工作的官员的话表达了他们的这种心态,他写道:“鲍威尔兄弟使我真正高兴,他们的所为完全符合书报检查令。”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不断地对异己的思想流派进行批判并划清界限的过程中,才能制定并不断完善科学的革命理论。同时,他们还看到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已经日益堕落,他们向共产主义者发起了进攻,并在理论界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就青年黑格尔派的问题

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讨论。

巴黎是个声色的世界。特别是入夜之后，这里的各个公共场所里到处人头攒动，灯红酒绿：大大小小的商店里挤满了购物的人群，一派喧嚣恣肆的滚滚红尘；在各个交易所中，一笔笔充满欺诈和阴谋的买卖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红男绿女们放荡形骸的身影和刺耳的歌声充斥着座座酒馆和歌舞厅；华丽恢宏的凡尔赛镜厅和土伊勒里宫里更是丝弦悠扬，歌舞升平，花天酒地；就连路旁菩提树的暗影下，一个个道貌岸然的绅士和装扮得妖艳迷人的摩登女郎也在进行着金钱与皮肉的交易。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一个充满了肉艳和铜臭的夜巴黎。然而，就在1844年夏季一个这样的夜晚，在巴黎田鳧路旁的那幢简朴的小楼中，两位年轻的思想家正在进行着一场严肃而热烈的讨论。

“黑格尔的思想有时就像游离于自然和人之外的精灵，他的《逻辑学》就是专门收集这些精灵的潘多拉的盒子，你说是不是、弗雷德？”马克思一边抽着雪茄烟，一边侃侃而谈，每句话都似乎有千钧重力。

“你的结论是正确的！”恩格斯十分赞许地点了点头，接着说道，“而鲍威尔一伙总是在攻击我们，他们使用的就是黑格尔哲学中的这些糟粕，他们企图扼杀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

“他们还十分蔑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恩格斯的话音刚落，马克思又发话了，“他们荒唐地认为创造历史的不是人民，只有杰出人物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恩格斯气愤地说：“简直是胡说八道！”

“我们应该接受鲍威尔一伙的挑战，把他的思想批驳得体无完肤，我们要写一篇论战性的文章，不要写一部著作。”

恩格斯立即接受了马克思的建议。于是，他们在当天夜里就动手写了起来。

恩格斯的思维一向清晰敏捷，一旦有了灵感，写文章往往一气呵成。在巴黎期间他就写完了分给他的那一部分（共七节）。恩格斯离去后，马克思继续写作。他查阅并引用了大量资料，用了约三个月时间完成了他负责的主要部分。由于他扩大了写作计划，内容超出了原来的设想，结果写成了一本大部头的著作。起初，他们把书名定为《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但付印时，马克思用它作了副标题，另加了一个标题——《神圣家族》。这原来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幅名画的名称，画中人物是圣母玛利亚怀抱圣婴耶稣，旁边围绕着玛利亚的丈夫圣约瑟，以及圣伊丽莎白、圣约翰等《圣经》人物。马克思用这一名称来讥讽鲍威尔等人凌驾

于芸芸众生之上的那种不可一世的狂妄形象。

在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值得一提。书稿完成后，马克思曾把它寄给恩格斯审阅。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观点十分赞赏，也对他写出了这么大部头的书而惊叹不已。他认为自己写的部分太少，最好不要署自己的名字，并把这一意见郑重地告诉了马克思。但后来马克思不仅署上了恩格斯的姓名，而且把他排在第一作者的位置上。这件事表现了马克思不务虚名的高贵品质和他对恩格斯的深情厚谊。但恩格斯为此却产生了深深的内疚和不安。

《神圣家族》首先是一部哲学著作，它对哲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体系进行了解剖批判，为辩证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时深刻揭示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源，指出：把一般与特殊、个别绝对割裂开来是错误的。应正确理解从可感知的具体事物的世界向一般概念的转化，只有在揭示了这些事物固有的内在本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青年黑格尔派则把个别与一般完全割裂开来，从而坠入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死胡同。

对于辩证法的正确理解也是《神圣家族》的重要内容。该书作者用辩证的眼光对社会现象进行了观

察,发现它们固有的内在矛盾是社会现免辩证运动的源泉,而这些矛盾斗争则是社会发生变化和革命的内部条件。

《神圣家族》还批判了唯心主义历史观,提出了正在形成的唯物主义的歷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鲍威尔等人认为历史是由少数有教养的“英雄”和“社会中坚力量”创造的,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对人民群众持蔑视态度。鲍威尔在一篇文章中极为露骨地指出:“迄今为止,历史上一切大的活动之所以从一开始就不成功和没有实效,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注和热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观点予以坚决的驳斥。他们指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群众,正是他们的劳动和斗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群众中孕含着巨大的力量,历史上的一切大的活动之所以有实际成效是由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当然,这并不抹煞个人(特别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论述了精神力量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认为思想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进步的思想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代表了进步的阶级利益,从而通过指导人的活动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但是,“思想从来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

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另外,《神圣家族》一书中还包含着一些重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例如,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问题。

马克思在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是由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观点。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是始终存在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使这种对抗不断产生,剥削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要求保存这种关系,而无产阶级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则力图消灭这种关系,因此,无产阶级的这种客观状况就决定了它肩负着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使命。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为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而联合起来进行英勇的战斗。

《神圣家族》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进步的报纸纷纷发表文章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迄今写的最有深度和力度的一部著作。而那些反动保守的报刊则对该书表现出强烈的愤怒和深深的敌意,但他们在攻击谩骂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该书作者具有渊博的学识,并善于运用辩证法的武器。

总的来看,《神圣家族》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成

熟时期的作品,但确实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是他们在建立共产主义理论和与自己的思想敌人划清界限的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在革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书中得出的某些重要结论,在他们以后的科学研究中日益完善,并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被一再证明是正确的。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标志着他们伟大而漫长的共同战斗历程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相聚的日子里,他们相互间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都给予对方以高度评价,并开始共同向旧世界发起猛烈的冲击,在战斗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从此以后,这两个伟大的名字和他们的事业永远地联在一起了。

写完了《神圣家族》以后,马克思又继续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并积极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时常为《前进报》撰稿,对普鲁士国王和专制政府进行严厉的批判。这时期经常为《前进报》撰稿的还有海涅、毕尔格尔斯等许多进步人士,使该报成了当时欧洲最具革命倾向的一份报纸。因此,普鲁士和法国政府把它视为洪水猛兽,想方设法要把它消除掉。

早在 1844 年夏天,普鲁士就以“鼓吹谋杀国王”为由,要求法国政府关闭《前进报》报社。由于这一指控过于荒唐,法国政府没有贸然接受。在普鲁士政府

的一再施压之下，法国政府后来终于采取了行动。1845年1月的一天，巴黎警察闯入马克思家中，代表政府宣布了对马克思、海涅、毕尔格尔斯等人的驱逐令，限令马克思在24小时之内离开巴黎（马克思夫人燕妮可以晚些时候离开）。这一举措在巴黎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社会主义者和广大民主人士纷纷提出强烈的抗议和指责，要求政府顶住普鲁士的压力，收回成命。面对这种局面，政府做出了让步，撤销了对海涅的驱逐令，并表示：只要马克思等人不再宣传反对普鲁士政府，就可以留在巴黎。对此，马克思表现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风亮节，断然拒绝与政府妥协，决定立即离开巴黎。

但是到哪里去呢？普鲁士早已下达了对马克思的通缉令，只要他一进入边境就会被投入监狱。思忖再三，马克思决定到当时还有一点民主气息的比利时去。1845年2月1日，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一同来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不久，燕妮把全部家当廉价卖掉后，带着女儿小燕妮也来到了这里。

马克思在巴黎居住了15个月，与这座城市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他十分喜欢这里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旖旎多姿的秀美风光，常常为人类博大精深邃的才智和自然界鬼斧神工的神奇造化所倾倒。

但是,他更喜欢在这里结识的人。在这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世界性大都市里,马克思深入到了千千万万普通工人群众中去,认真考察了他们的生活和斗争状况,并结合实践进行了艰巨的理论研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而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在巴黎,马克思还有幸结交了许多才华出众、品格高尚的亲密友人,例如海涅、海尔维格等等,他与燕妮的爱情生活也结出了幸福的果实——他们的宝贝女儿小燕妮。但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里再度相逢,并结为终身挚友,开始为创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批判旧世界而共同战斗。马克思一生旅居过许多国家和城市,巴黎只是他漫长异国漂泊生涯中短暂的第一站,但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永远难忘的。

来到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发现这里的政治气氛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么宽松。比利时当局也很害怕马克思的革命思想,在他到达后不久就命令警察部门对马克思进行严密的监视,并要求马克思不得在比利时境内发表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文章。由于马克思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从事他在巴黎未完成的理论研究工作,再加上形势极为恶劣,他并不打算马上就公开发表评论时局的文章,所以他答应了当局的这一要求。但普鲁士政府仍嫌不足,对比比利时政府施加

了强大的压力,要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这样,马克思不得不于1845年底公开宣布放弃普鲁士国籍。从此以后,马克思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

听到这一消息后,马克思的一些朋友纷纷前来看望他。一位朋友非常关心地问道:

“卡尔,听说你放弃了普鲁士国籍,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马克思镇定自若地回答说,“而且今后我可能再也得不到它了。”

“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有句名言:‘哪里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那么,你的祖国在哪里呢?”这位朋友对马克思的处境感到十分忧虑。

稍加思索后,马克思用一种斩钉截铁的口吻告诉这位友人:“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他看到这位朋友有些迷惑不解,于是又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这是《常识》一书的作者、英国民主主义思想家托马斯·潘恩说过的话。当年美国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潘恩在美国为美利坚民族而战。美国革命胜利后,他又回到欧洲,参加了欧洲的反封建斗争。”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马克思虽然放弃了普鲁士国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热爱这个国家。因为普鲁

士毕竟是他的祖国,他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母亲和许许多多亲朋好友还生活在这里。他所痛恨的只是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和黑暗的社会现状,正是由于反动政府的残酷迫害,才使他忍痛放弃了国籍。但马克思始终把可爱的故土牢牢地记在心里,一生中从未谋求过其它国家的国籍。他曾多次试图恢复普鲁士国籍,但没有获得过成功,直至他去世。

比利时虽然国家很小,但经济却相当发达,大机器工业已经取代了手工工场,机器制造、纺织和采煤等工业部门的生产水平在整个欧洲名列前茅。

同其它工业化国家一样,资本主义带给工人的灾难在比利时也十分严重,工人劳动时间长,生产环境恶劣,工资收入也少得可怜,失业在时时威胁着他们。贫富悬殊引起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为革命流亡者们研究科学理论和传播革命思想都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来到这里,马克思就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理论研究工作之中。

在恩格斯的建议下,马克思起初准备编纂出版一套《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为了使德国读者了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优秀作品,唤起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关注和对

资本主义制度的憎恶。

1845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多次讨论过这个计划。丛书中要收录的主要是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摩莱里、马布里、欧文等著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同时他们还打算把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些激进的平民思想家的作品也收进来。由于英国作家葛德文的作品阐述了与社会主义近似的思想,因此也在其列。

出版这套丛书的计划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发展工作十分重视。他们认为这与制定宣传科学理论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不矛盾,反而有助于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在讨论这一计划时恩格斯就开始动笔了,他把傅立叶的《论三种外在的统一》中的几章翻译出来。但这是这项计划中唯一完成的成果,由于出版工作遇到了巨大困难,原定的合编者莫泽斯·赫斯又持有不同意见,丛书的出版工作最终搁浅了。

从巴黎返回巴门后,恩格斯一边潜心从事理论研究,同时积极参加了家乡火热的革命斗争。他与当地的一些共产主义组织和个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常出席一些政治集会,在会上发表演讲,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科学的革命理论。有时,他还走出巴门的狭小天地,到科隆、杜塞尔多夫、波恩等许多城

市去,从事革命活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由于有了恩格斯这样一位杰出思想家的介入,这一地区的理论研究活动和革命斗争显得空前的活跃,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家乡的这段日子里,恩格斯本人的研究工作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在这一时期里完成的。但是,恩格斯的这些革命活动不仅深深地触怒了地方当局,使他遭到了警察部门的严密监视,同时也与思想保守僵化的父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政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之下,恩格斯觉得在家乡再也呆不下去了,便于1845年3月离开巴门,来到了布鲁塞尔,在离马克思家不远的地方住了下来。

从此,这两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开始肩并肩地进行战斗了。

这一时期,马克思一家的生活是非常贫困的。美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搬家三次,如遭火灾。”从巴黎迁居布鲁塞尔,不仅花去了马克思仅有的一点积蓄,刚刚置办起来的家当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为只有变卖掉家具(包括燕妮的部分衣物)才能筹集到足够的旅费,此外别无他法。再加上比利时当局不允许马克思发表评论时局的文章,这等于断绝了他的主要生活来源——稿酬,更使他的生活陷入了无以为继的窘境。所以在他

刚刚来到布鲁塞尔时，竟连一个合适的住处都找不到。我们可以从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笔记本中找到燕妮的一段有关寻找住宅的嘱咐，从中我们可以体味到他们生活的艰难拮据和燕妮对马克思充满挚爱的柔情。燕妮说：

“……这间（指孩子的房间）和你的陈设简单的工作间……如果只有一间也好啊。

厨房不用装饰了。炊具由我来料理。被褥和洗换也不用你操心，家具除外。家具一般是什么价？因为即使把我们的带去也得置点新的……

其余的我听从我高尚的良人明智的判断，不过要请你特别注意，是否能有壁橱，它在主妇的生活中有重要作用，是最值得注意而不可忘记的。书怎样安置才好，啊，阿门！”

马克思夫妇为了寻找住房花费了不少时间，曾一度在布瓦·德·萨维奇旅馆里安身。最后，他才在东城的同盟路5号租到了房子（恩格斯来后住在7号）。这是一处适合于他们经济条件的住房，座落在工人住宅区内，正如燕妮所说：“就像在贫苦的殖民地一样。”

在马克思生活最困难的那段时间里，是恩格斯最先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他立即在社会主义者和朋友中间广为宣传，发起募捐活动，为马克思筹到了

一笔款，他本人则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所得的第一笔稿酬送给了马克思夫妇，以解燃眉之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至少不能让这些坏蛋们，由于他们的破坏行为使你造成经济上困难而得意……我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使你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不言而喻，我是非常愿意把我第一本关于英国的书的稿酬供您使用。”

另外，马克思夫妇还从燕妮母亲那里得到了一种特殊的帮助——她把自己最可靠的管家助手琳蘅送到了女儿的身旁。

琳蘅名叫海伦·琳蘅(1823—1890)，出生于萨尔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八九岁时就来到威斯特华伦男爵家当仆人。她对两位老人的照顾非常周到得体，同时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亲如父母般的关怀和教育。燕妮与马克思结婚后，母亲看到女儿的生活十分艰难，于是便把琳蘅作为“最好的礼物”送给了女儿。琳蘅是在燕妮身边长大成人的，一直是燕妮的知己和贴身女伴，所以当老夫人要求她到布鲁塞尔来时，她感到十分高兴。

作为一个农家出身又受到精心调教的女仆，琳蘅在操持家务上具有很高的能力，在这方面连燕妮也远远赶不上她。她聪明果断，开朗热情，擅长缝纫、烹调、购物和管家理财，并能够灵活地处理好各种琐

细的日常小事。自从琳蘅来后，马克思的家变得舒适多了，家里随时都是整整洁洁的，来了客人有热水或冷饮招待，一日三餐虽谈不上丰盛，但饭菜总是那么香甜可口。在长达数十年的共同生活中，琳蘅对马克思一家忠心耿耿，工作勤勤恳恳，精打细算，在管理家务方面显示出了高度的责任心和管理能力，并能与马克思一家共同承担生活的重担，共享欢乐的时光。在谈到琳蘅在家庭中的作用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说过：“琳蘅是执政者，马克思夫人是发号施令者，而马克思则像驯羊一样服从这种执政。”在对待孩子方面，琳蘅更是尽职尽责，她用女性特有的母爱精心地抚养了马克思的子女，孩子们都把她当作“第二个母亲”。

琳蘅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她从威斯特华伦夫妇和燕妮那里学会了读书写字，而且她天资聪颖，有很强的理解能力，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所以她非常敬重马克思的人品和学识。她知道马克思从事的是对全人类有益的大事业，为了马克思的事业和家庭，她甘愿做出最大的牺牲。琳蘅算不上是美人，但她身材修长，面容清秀姣好，有一种动人的魅力，因此她也曾遇到过倾慕她的男子，有过缔结良缘的机遇。但是，她毅然放弃了追求个人的美满生活，永远留在了马克思家中，成了这个家庭的重要一员。

琳蘅对马克思一家付出了超乎寻常的情与爱，但这绝不仅仅是某些人所说的那种传统的女仆对主人的愚忠，这里面既有共度青春风华而产生的依恋情结，也有在患难与共的艰难年代里结下的深厚情谊，但更多的则是体现在一个纯朴善良女性身上的那种人类最美好的品格：人性、慈悲和忠诚。这位心地宽阔纯洁的普通妇女在马克思这个高尚祥和的家庭中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位置和人生归宿。她理应永远属于这个家庭。威廉·李卜克内西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虽然她不曾立过任何誓约，但她那颗忠诚的心自然而然地使她非同卡尔和马克思夫人以及孩子们留在一起不可。于是她留下来了，而她的青春岁月消逝了。她留下来，和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当她将自己的命运与之连在一起的人们都死去时，她才得到休息。”

这是对琳蘅一生最恰如其分的写照。

在布鲁塞尔居住时期，虽然贫困的阴影始终笼罩着马克思一家，但是他们并不缺乏朋友和友谊。

马克思继续与过去的朋友们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就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工人运动等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同时，他在布鲁塞尔的家成了各国革命者和流亡者的一个活动中心，马克思渊博的学识和科学的革命思想使他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吸

引着许许多多进步人士前来与他会晤切磋,聆听他的教诲。而燕妮则是一个称职的女主人,虽然家里没有山珍海味,甚至连一件象样的家具也没有,但燕妮以她热情大方的举止和雍容华贵的外貌迎来送往,接待四方宾朋,深受客人们的尊敬爱戴。这时期与他们经常来往的朋友有: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政治家亨利希·毕尔格尔斯、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律师卡尔·梅因茨、革命家威廉·沃尔弗、革命家和思想家约瑟夫·魏德迈、社会活动家若特兰·日果,还有普通工人约瑟夫·莫尔,等等。燕妮的胞弟埃德加尔这时期也在布鲁塞尔,并且是当地共产主义团体的重要成员,这使身处异国他乡的燕妮感到非常高兴。

在这些新老朋友中,有几个人物需要介绍一下。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在30年代就是著名的诗人了,但由于他的诗有一种脱离现实的格调,所以曾受到过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的批评。后来,弗莱里格拉特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写过许多充满革命激情和宣传工人阶级斗争的诗篇,为此受到了当局的政治迫害。来到布鲁塞尔以后,他与马克思一家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马克思的思想对弗莱里格拉特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他的诗篇更具有战斗的力量。例如,在《革命风暴的使者》一诗中,他对工人

阶级的伟大力量给予了热情赞颂。诗中御船的火夫对国王说了这样一段话：

这个时刻，我的一冲一撞，
这全在于我，
看，大厦倾倒，而你正坐
在那顶端！

格奥尔格·维尔特，被恩格斯誉为第一个无产阶级的诗人。他出身于官宦家庭，同恩格斯一样，从事过令他厌恶的商业，并从中看到了资产阶级的凶残奸诈和无产阶级深重的灾难。他是1845年来到布鲁塞尔投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就在这一时期，他发表了脍炙人口的战斗诗篇——《兰开夏之歌》，用最美好的语言歌颂了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诗中写道：

他们坐在赤杨树下——
这美丽的夏日装束。
粗犷愤怒的好汉，
来自约克和兰开夏。

他们一直坐到深夜，
用沙哑的喉咙歌唱。

他们相互述说：
“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在战斗。”

当他们全搞清楚的时候，
个人热泪盈眶。
强壮有力的伙伴，
他们慷慨激昂。

他们握紧双拳，
疯狂地挥舞着帽子。
森林草原也齐声呐喊：
“平安升起，西里西亚。”

在布鲁塞尔期间，马克思的家庭——这个特殊的家庭完成了它的最后组合。先是恩格斯和琳蘅大约在同一时期来到这里，接着，1845年秋天，马克思和燕妮的第二个女儿劳拉降生了。1847年初，燕妮又生下了一个婴儿——一个全家人日夜企盼的男孩，马克思夫妇用燕妮亲爱的弟弟的名字叫他埃德加尔。这个孩子长得并不算漂亮，但全家人却欣喜若狂，对他倍加宠爱。

第十一章

留给老鼠牙齿 去批判的书

我们那时都是大胆的小伙子，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天真的儿戏而已。

——恩格斯

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楚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马克思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居住了三年。这是他闭门苦读,潜心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时期。

马克思从青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方法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他不仅天天手不释卷,认真研读,而且对理论研究工作具有一种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和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从不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在马克思读过的书上,人们可能看到许许多多记号——曲线、直线、叹号、问号和重点号,在书页的边缘处和扉面上还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注。

马克思进行科研时,常常会产生出极为强烈的执著感和巨大的冲动,有时甚至能达到废寝忘食、如痴如迷的程度。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常常要搞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休息,天刚亮又起床继续写作了。但他最喜欢的工作时间还是夜晚。每当星斗阑干,明月当头,孩子们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屋子里静寂无声,这时马克思的头脑开始进入了最亢奋的状态。他用帐幔把灯光紧紧地遮住,聚精会神地投入到了他所钟爱的研究工作之中。此时,他的整个身心都完全沉浸在创作的激情和灵感里了,只有热血在周身沸腾,大脑中不断地闪烁着思辩的火花,笔

尖在纸页上唰唰地疾走，有如一叶轻舟在波涛汹涌的思想激流中纵横驰骋。

马克思在工作间隙的休息方式也十分特别。在工作告一段落和感觉疲乏时，他常常拿出事先找好的诗集或小说，躺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阅读，他往往同时看几部小说，读到得意之处还常常不自觉地念出声来。当这种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他便以更加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重新投入到紧张的思索和写作之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布鲁塞尔的三年中，马克思的辛勤耕耘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当马克思与他的好友恩格斯合写的第一本书《神圣家族》出版后不久，他又于 1845 年春天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份只有五页的手稿记录在 1844 年至 1847 年马克思使用的笔记本里，一共有 11 条提纲，显然是匆匆写就以供进一步研究使用的。但它的内容却十分丰富深刻，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缺陷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阐述了一些最基本的哲学原理。

费尔巴哈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做了正确的解释，他的哲学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但是，费尔巴哈仍没有摆脱旧唯物主义的局限

性,因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它进行了深刻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观点。

革命实践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决定作用。在谈到认识的出发点、标准和目的等问题时,马克思认为人的认识是否正确,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认识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其真理性。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他还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但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则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人的实践活动不仅改变环境,而且也改变了人本身。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人生活于社会之中,人的实践是社会性的,在实践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都发生关系,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能从事生产实践。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中,是各种特定社会形态的产物。

另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还宣扬彻底的无神论,并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形而上学。他指出,仅仅把宗教归结于世俗基础是远远不够的。宗教产生于这个世俗基础的矛盾之中,产生于社会对抗之中,因此,要铲除宗教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马克思用革命实践来对抗旧唯物主义的直

观,以辩证的唯物主义来取代旧唯物主义。对此,他一语中的地指出,以往的哲学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新唯物主义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它。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本人新哲学思想体系的构思,其内容相当丰富深刻。它尖锐地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思想观点,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这些新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第二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发展。所以《提纲》虽然篇幅很短,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却是十分重要的。如同恩格斯所说,这是一份“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份文件”。

在巴黎居住期间,马克思开始对政治经济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并打算写一本大部头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为这本书定名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与一位巴黎书商卡·威·列斯凯签订了出版合同。到布鲁塞尔后,马克思继续从事这项研究,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写这样一本洋洋大观的经济学论著,仅仅有构思和经济学观点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必须有充分翔实的资料作为依据。于是,马克思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一头钻进图书馆和档案室中,大量搜集摘抄各国

各地区的有关经济方面的论著和资料,特别是有关机器的使用、价格的变化、货币、金融以及人口问题,等等。与此同时,他还阅读了大量经济学论文和著作,做了深刻的研究分析。

这一时期,他特别注意认真阅读了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进行了极其全面认真的研究,写下了一篇题名为《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读书笔记。在这份笔记中,马克思一方面认真分析了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同时对这一学说中某些明显的谬误进行了批驳。他批评了李斯特全盘否定英法经济学家的理论,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反对自由贸易的观点。他认为李斯特的这种经济学说实际上代表了经济不发达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李斯特企图以超阶级的所谓“国家利益”和“民族特性”来掩盖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共同经济规律,保护德国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掩饰尖锐的阶级矛盾,维护本民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的剥削压迫。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写作工作进展很快,到1846年初,它的第一卷(一共两卷)已基本写完。但是,这本耗费了马克思大量心血的书最终却未能出版,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在该书即将完稿之际,学术界接连推出了

几部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例如两卷本的《重农学派》等。马克思为了使自己的书稿更加充实完善，认为必须对这些新的科研成果进行研究，以便批判地利用，因此推迟了完稿的日期。

其二，马克思曾拿出一些时间来批判当时在德国十分盛行的哲学和社会主义流派，他认为：“为了使读者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这是必要的。”

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普鲁士反动当局出面进行了阻挠，他们指使警方与出版商交涉，不允许出版马克思的书。出版商吓坏了，要求马克思只写学术问题，不要牵涉到政治问题，遭到了马克思的断然拒绝，于是出版商单方面取消了合同。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虽未能面世，但马克思这一阶段的研究仍取得了重大成果，丰富完善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许多经济方面的思想观点日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

1845年7月份，在恩格斯的陪同下，马克思去英国进行了一次旅行。

马克思为什么要去英国呢？他是从两个方面考虑这个问题的：

首先，要想深入地研究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社会，

就必须到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去,做实地调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现象和特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收集利用那里极其丰富的科学文献(特别是经济学文献)。

其次,英国是世界上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去那里可以亲自深入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并与工人阶级建立起直接的联系,马克思对于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视的。

马克思原想独自去英国,但他的英语水平当时不过关,需要恩格斯(他在英国居住过两年,使用英语已十分熟练)的协助,而恩格斯本人也想去那里继续英国历史和经济的研究工作。于是这两位友人决定去英国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考察。

7月12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乘船踏上了奔赴英国的航程。

英吉利海峡烟波浩淼,风疾浪高。自古以来,它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保护着小小的英伦三岛。因此自诺曼人入主英伦后,英国人几乎不知道什么叫外来入侵。然而,这个素来热爱海洋的民族在近代史上却扮演了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世界征服者。

自从新大陆被发现以来,在“拜金狂潮”的驱使下,英国人纷纷沿着哥伦布、达伽马等人开辟的航路

到世界各地去“淘金”。他们从西非海岸象贩卖牲口一样掠夺黑奴,在北美洲疯狂地搜刮那里的贵金属和丰富的物产资源,对亚洲各文明古国则大动干戈,肆意烧杀劫掠,夺走他们的金银珠宝和价值连城的文物古迹。回到祖国以后,这些面目狰狞的江洋大盗却变成了道貌岸然、诚信可嘉的绅士和投资者,而世界各民族人民的血汗和生命则变成了他们得以跻身显贵阶层的万贯家财。就这样,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腥风血雨和随后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风暴中,英国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并最终引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产业革命。

英国产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上半期结束。它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使英国建立起了纺织、钢铁、煤炭、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五大工业部门,开始在世界工业和贸易领域居统治地位;它还改变了英国的经济地理和人口分布,使城市膨胀,煤铁蕴藏量丰富的西北地区成了国家的经济重心。但更为重要的是工业革命还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它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明显暴露出来,并使近代社会正式分裂为两大明显对立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

随着无产阶级苦难的不断加深,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不断蓬勃发展起来。到19世纪

三、四十年代，英国爆发了全国性的宪章运动，无产阶级为争取选举权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奋起斗争。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发表了纲领性的文件——“人民宪章”，在许多工业城市召集群众大会，发表政治演说，进行宣传鼓动，向议会递交请愿书，不断举行游行示威，甚至与政府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形成了一个波及全国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到英国进行考察时正是宪章运动方兴未艾的时期。

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到达英国后他们先来曼彻斯特住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马克思不久才知道恩格斯为什么急于到这里来——那位纯朴美丽的爱尔兰姑娘玛丽·白恩士正在苦苦等着他呢，他们相爱相依已经有好几年的光景了。

这座纺织城里也有马克思的所爱，这就是那座古老的切特姆图书馆。

这里在中世纪时是一座巨大的城堡，关过犯人，也屯过兵，还曾经作过修道院。1653年由当地商人汉弗莱·切特姆改建为图书馆，现已发展成为一座享誉欧洲的大型公共图书馆了，藏书极其丰富。马克思、恩格斯在靠近凉台的位置上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座位，这里很少有人走动，十分僻静，阳光从高大窗户上的红、绿、蓝、黄色的玻璃中折射进来，光线柔和

而明亮。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阅读了许多在欧洲大陆见不到的经济学和政治学著作,并作了大量的摘抄工作。从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笔记本中我们可以见到下列作者及其作品:詹姆斯·W·吉巴尔特的《银行史与银行原理》,埃·密塞尔登的《自由贸易,或使贸易繁荣的方法》,托马斯·杜克的《1793至1873年的价格与货币流通状况》,达维南的《关于在英国贸易政策下的公共进益问题的演说》,威廉·寇白特的《面对着黄金的纸币,或英国银行的历史和秘密》,勃朗宁的《英国的国内和财政状况》,等等。上述书目仅仅是马克思在英国阅读的材料的一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图书馆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恩格斯后来在回忆这段日子时写道:“前几天我又坐在小楼凸窗处的方形斜面桌前兴奋地工作,这是我们24年前坐过的地方,我很喜欢这个位置,那里有彩色玻璃,光照始终很充足。”

在曼彻斯特期间,马克思还认识了三位著名的德国流亡者:钟表匠约瑟夫·莫尔,卓越的工人运动领导人,演说家,后来在1848年革命中英勇牺牲;鞋匠亨利希·鲍威尔,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后来也积极参加了1848年革命;大学生卡尔·沙佩尔他当时边打工边从事工人运动,后

来与马克思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亲切会见了他们,并就英德等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理论等问题与他们全面交换了意见。

离开曼彻斯特后,他们一行又来到英国首都伦敦,在这里考察了英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并与宪章派领导人和正义者同盟等组织建立了联系。他们在这里结识的重要人物有:宪章派著名领袖乔治·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卡尔·沙佩尔,以及一些工人运动活动家。

8月中旬的一天,他们出席了宪章派在天使酒馆举行的会议,恩格斯还发表了即席演说,阐述了他和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政治观点,并支持建立国际性革命组织的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英国后不久这个组织就成立了,它的名字叫“民主派兄弟协会”。

马克思、恩格斯的英国之行收获颇丰,他们的几个主要目的都达到了,在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方面受到巨大启迪。回到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就着手整理从英国带回来的资料,继续进行经济学的研究工作。

但通过一个阶段的研究,马克思逐渐发现,要想建立起真正科学的、完善的新经济理论体系,就必须首先对旧的经济理论进行清算,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批判地改造其方法论基础,即它的哲学基础,对正在流行的哲学和社会学说进行系统的批判。因

此马克思决定把手头的工作暂时停下来，与恩格斯一起对德国的哲学体系（它代表了欧洲哲学的最高水平）作一次全面深刻的批判，写一部有分量的著作。他们把这部著作定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对自己修改写作计划的原因作了说明：“……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之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必要的。”

从1845年11月起，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部著作的写作之中，这一次他们采取了更为密切的合作形式。在写作《神圣同盟》一书时，马克思与恩格斯只作了简单的分工，划定好了每个人所写的章节，各负其责。但写作本书的过程可以说是一次真正的集体创作。他们两人共同构思，在共同研究切磋中共同执笔写作，两个人的思想和写作技巧几乎完全融为一体了。特别是该书的第一卷，完全是两人智慧的结晶，人们很难分辨得出哪一部分出自谁的手笔。

在这段时间里，恩格斯几乎天天在马克思家里工作，两人一边交谈商讨，共同研究革命理论，一边写作修改。有时为了赶写一个章节，他们常常不知不

觉地工作到后半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一天夜里，燕妮和孩子们都睡熟了。书房里仍然灯火通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为搞清楚一个哲学问题而紧张地工作着。他们有时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有时伏案奋笔疾书，有时又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冥思苦想之中。室内闷得令人窒息，空气中飘荡着劣质雪茄呛人的烟气，钟摆在墙上嘀嘀嗒嗒地作响，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最后，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突然，房门被推开了，忠实的管家琳蘅走了进来，皱着眉头严厉地说道：

“别笑了，孩子们都快被你们吵醒了！”

两位男子赶快收住了笑容，抬头看了看时钟，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了。于是他们悄悄地收拾好书籍稿纸，结束了一天的“战斗”。

望着他们那充满倦容的面庞，琳蘅既心疼又抱怨地叹了一口气，低声嘟囔道：

“真像两个顽皮的大孩子。”

现代科学呼唤集体性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式不仅需要严密科学的组织管理，更需要参与者具有高尚的合作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为人类作出了表率。

在他们这一时期的合作中，在制定理论和政治

观点方面,马克思起了主导作用,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他对恩格斯的意见一向十分尊重,认为恩格斯对本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还用自己流畅优美的文笔为书稿增色不少。而恩格斯则更为谦逊,他从不为自己评功摆好,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即使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仍然把主要功劳归于自己的这位好友。他严肃地向人们指出:

“……马克思比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就这样,这两位卓越的理论家和亲密朋友夜以继日地并肩工作着,战斗着,为了履行自己年轻时立下的誓言,为了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再苦再累他们也心甘情愿,无怨无悔。恩格斯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们那时都是大胆的小伙子,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天真的儿戏而已。”

他们写了将近6个月的时间,到1846年4月,这部包含着他们共同劳动结晶和心血的巨著基本完成了。

这部著作共分为两卷。第一卷题名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其中第一章阐述了作者的基本理论观点,另外两章则对青

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等人)进行了批判。第二卷题名为《对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主要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泽米希、马特伊和格律恩等人的哲学观点。《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包含了以下具体内容:

对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青年黑格尔派虽然反对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但他们认为达到这一目的不需要进行必要的革命斗争,只要进行理论的批判,即消除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的思想意识就可以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实际上在政治上极为保守。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调和劳资矛盾,削弱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思想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他们是一群空谈家,并深刻揭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阶级条件。

详尽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在从事政治、科技、文化和宗教活动之前,首先需要解决衣、食、住等问题,而要获得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只有进行生产活动,这是人类历史的最基本的条件。正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他们通过生产劳动改变了自然,同时也改造了人类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告诉人们:自然界

和物质是意识的源泉,而意识则是由自然界和物质派生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样一来,马克思、恩格斯就把唯物主义引入了社会和人类历史研究领域,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概况,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他们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由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这一规律所决定的,因此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把社会经济形态分为五类: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并指出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暂时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将为资本主义的消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充分的物质条件,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问题。他们指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象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社会革命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其

一是生产的高度发展已为它的私有制外壳所无法包容,而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必需的;其二,无产阶级队伍的空前发展使革命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因此,人类将通过社会革命消灭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还概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现存社会关系的研究,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了科学的预见。他们认为:这个社会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度,生产资料由社会共同占有,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将消失,国家也将消亡,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将不复存在。人们将调节生产并使社会的发展服从自己的规划,人的才能和天资得到全面发展和充分利用。人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同时,也改造自身,包括他们的意识,等等。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完成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重大时刻之一。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从空想变为科学,应归功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其中第一个发现便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第一次被全面阐释的。这样,唯物主义便被引入了社会和历史研究领域,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为人类提供了科学地认识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正确方法,也

使人们认识到,无产阶级是能够使全人类获得解放的社会中坚力量。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在该书中第一次论证了科学共产主义,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指出了美好宏伟的远大目标。

但是,这样一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书的命运如何呢?

其实,这部著作本身所具有的激烈的革命性质就已经决定了它的命运。在当时异常严厉的出版制度下面,这类书的出版是极其困难的,即使勉强出版也可能被立即查封,因此没有出版商敢于冒这种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决定寻求威斯特伐利亚的两个企业主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尔的帮助,因为他们一贯标榜自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起初,这两个人答应提供赞助,但当他们得知此书的内容之后便立即收回了原先的承诺,因为他们都是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1846年12月,马克思在给友人的信中愤怒地披露了该书未能出版的原因:“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代表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的利益的出版商。”

由于始终找不到出版途径,这本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巨大心血和智慧的著作,在他们生前未能与

读者见面，只是在杂志上发表过其中的若干章节，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气馁，他们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马克思后来在谈到这件事时写道：“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楚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

马克思的这句话是有充分道理的，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所阐述的理论为他日后的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不久以后，马克思就在其它著作里把这些理论更为完整精确地公诸于世了。

直到 86 年之后即 1932，《德意志意识形态》才第一次以德文全部出版。但由于老鼠啃咬，书中留下了不少残缺空白之处。

第十二章

创建组织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

为了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整整忙碌了一个冬天。他们原想这部著作出版后可以获得一笔稿费，改善一下捉襟见肘的窘迫生活。

但他们的希望完全落空了，书稿的出版遥遥无期，而他们的生活则变得更为艰难拮据。在来布鲁塞尔前，为了筹措路费，马克思和燕妮已经把家俱变卖一空，连人家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一盒精制的银质餐具也被人买走了。现在为了维持全家人的温饱，燕妮不得不忍痛把家中仅有的一点金银什物送进了当铺，但仍是杯水车薪，无法保障全家的基本生活。

这一天，琳蘅又站在厨房里发愁：钱用光了，用什么买食品呢？另外，还有卡尔时时不可缺少的雪茄烟。

突然，琳蘅眼前一亮，她找到了一个救星——马克思夫妇的旅行囊。她知道那里面有一些从家乡带来的纪念品，其中有两件是她亲手精心绣制的漂亮围裙。于是，琳蘅把围裙送进了当铺，用典当来的钱买了食物和雪茄烟。

吃午饭时，望着餐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马克思有点惊讶地说：“几天没吃上这么香甜的饭了，我们的好管家真是善解人意啊。”

琳蘅从衣袋里拿出一包烟，递给马克思，轻轻地说道：“这里还有雪茄呢。”

马克思非常高兴地点上一支烟，一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一边习惯性地把手伸进口袋——他想给琳蘅一点钱。但他掏了半天，一分钱也没掏出来。这

时他才恍然想起：他一文不名已经有好几天了。

尽管马克思家的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始终是快乐而充实的。他们在生活中互相关心体贴，在事业上相互理解，配合默契。常言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在这个为贫穷长期困扰的家庭里，人们都随时能深深感受到一种祥和温馨的高雅氛围。

马克思和燕妮都喜欢在节假日外出游玩或旅行。为了摆脱挫折和贫限所带来的烦恼，1846年夏季，他们暂时停止工作游玩了数日，从市中心一直逛到了郊区。他们在宏大巍峨、金碧辉煌的古代宫殿和城堡旁流连徘徊，在林荫道枝繁叶茂的梧桐树下款款漫步，在斯凯尔特河畔充满生命绿意的广阔原野上追逐嬉戏。有时候，他们像一对初恋的年轻情侣那样相依相偎，卿卿我我；有时候，他们又像两个无忧无虑的顽皮孩子，痛快淋漓地尽情玩耍嬉闹，甚至旁若无人地纵情大笑，常常引得行人驻足观望，留下许多赞赏的目光。

游玩中他们常常倾心交谈，话题十分广泛，漫无边际，涉及到工作、理想、友谊和爱情。但在这期间，他们谈论最多的还是自己那对宝贝女儿。

小女儿是在马克思从英国归来不久降生的，当时全家人快乐极了。为了给新生儿取一个最出色的

名字，他们特意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出席者有马克思夫妇、琳蘅和恩格斯。马克思郑重地提议，用他最喜欢的女性名字之一——劳拉为小女儿命名。这一“议案”立即被“全家人”一致通过了，因为他们都清楚地记得，在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曾用最美好的语言热情讴歌过这个名字。

大女儿燕妮此时已经两周岁了，这正是最招人疼爱的年龄。她长得活泼秀丽，胖呼呼的脸腮上总是红朴朴的，显得可爱极了。如果哪一天这两块红晕忽然消失了，马克思就会疑心她生了什么病，烦躁得坐卧不宁。但小家伙们给家里带来更多的还是欢乐，她们的存在使家中充满了生机和朝气。对于马克思来说，女儿的嬉戏喧闹是天下最美妙的音乐，而她们的笑声要比天使的歌唱动听百倍，简直胜过天籁。

马克思不仅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而且，他在布鲁塞尔还有一大批亲密无间的同志和朋友。关于这一点，本书在第十章中已经提及，就不再赘述了。但对于其中的几位特殊人物，还需要做一下介绍。

威廉·沃尔弗，一个毕生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坚强革命者，也是马克思最诚挚亲密的朋友之一。

沃尔弗出生于德国西里西亚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里，如同易北河地区广大受压迫奴役的农民一样，他的童年时代是在饥寒交迫之中度过的。那时，他每

天都饿着肚子，穿着破烂不堪的衣衫去地主田里干活，常常遭到地主监工凶狠的鞭打和责骂，一年到头辛勤劳作而不得温饱。沃尔弗很敬佩自己的母亲，这位善良纯朴的农家妇女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却具有内在的修养和一颗高尚正直的心，是她最先把“被压迫者神圣的怒火”点燃在儿子幼小的心底，又是她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送儿子去读书识字。

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沃尔弗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对美好理想的憧憬读完了中学和大学。由于他品学兼优，为人正直，并具有激进的革命思想，所以在学生中和社会上都具有很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影响力。后来由于他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被普鲁士当局以违反出版法的罪名逮捕入狱。沃尔弗机智地从监狱中逃了出来，辗转来到了布鲁塞尔，一面谋生，一面进行革命活动，并有幸结识了马克思。

马克思很快就发现这个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人竟是一位才智出众、思想机敏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所以他们之间很快就建立起了信任和友谊，肩并肩地投入到火热的工人运动和科学研究之中。而燕妮则像母亲那样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照。

沃尔弗与马克思一家的友情是真挚而深厚的，并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结。他曾经对马克思说过：“我一定要用我的实际行动和生命支持你的事业。”

沃尔弗忠实地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关于这件动人的事情,本书在后面还要谈到。

布鲁塞尔的革命流亡者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燕妮的弟弟,马克思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埃德加尔。通过深入考察各国无产阶级的状况及其革命斗争,埃德加尔逐渐接受了马克思的政治观点,并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工人运动和革命宣传工作。在动荡不安的流亡生活中,姐弟俩能并肩战斗,互相关照,这使燕妮感到了由衷的欣慰。

埃德加尔是一个有才华和革命精神的人,但他的性格中存在着明显的弱点:摇摆不定,容易凭感情用事。因此,他始终没有找到适合于自己的职业,也未能持之以恒地投身于革命事业。1847年他去了美国。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埃德加尔曾一度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但不久又孤身一人到得克萨斯务农去了。尽管如此,马克思和燕妮仍然对埃德加尔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认为革命事业需要他这种“有才能、骑士精神和勇气的人”,并一再告诉他:除了母亲外,他永远是他们最亲的亲人。

在这一时期,还有许多革命者为了逃避反动政府的迫害纷纷来到布鲁塞尔,这些流亡者们也带来了各国革命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并把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向马克思做了

详细的介绍。

来自方方面面的信息使马克思敏锐地感觉到：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日益临近。

自从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工业革命的浪潮在欧洲迅速蔓延，资本主义在各个国家有了长足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的实力逐渐壮大起来，因此，他们开始要求扫除一切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并要求得到相应的政治权力。与此同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斗争的历史舞台。

但是，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国家还笼罩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巨大阴影之下，许多国家还保留着腐朽的封建制度，有些国家虽然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但仍然存在浓厚的封建残余，一些国家中的民族矛盾则表现得异常尖锐。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影响着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从整个欧洲的情况来看，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呈现出一种极不相适应的局面。另外，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高度发展，也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特别是在一些工业发达或比较发达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越来越激烈。

总之，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正在不断地发展并日益尖锐化，欧洲社会中正孕育着一场巨大的革命

危机。历史的发展已经对各个国家提出了不同的革命任务：法国是扫除封建残余，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德意志是实现民族的统一，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意大利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消除异族压迫；波兰和匈牙利则是反对外来压迫，实现民族独立，等等。

在前一阶段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已经成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这一历史规律，但是他创造这一理论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做做宣传，而是为了改造世界，即革命理论要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变成改造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但是在当时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刚刚诞生，如同列宁所说：“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之一而已。”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仍然是空想社会主义和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

马克思认识到，为了使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识和接受，变成改造世界的动力，在未来的革命风暴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就必须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进行广泛的接触，使他们接受科学的革命理论，并在进行理论宣传的同时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肩负起了建党——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

但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不是一件可

以一蹴而就的事情,这是一件十分艰巨复杂的政治任务,只能一步一步地进行,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具体工作。

马克思认为,首先必须加强思想工作,把科学的革命理论深入到工人运动中去,使工人群众相信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但是,马克思也看到在当时的许多国家中,工人运动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大型企业中的产业工人的数量还不多,在工人阶级中占据优势的仍然是手工业工人,根据当时的资料统计,即使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巴黎,产业工人也只占工人总数的八分之一。无产阶级的队伍不够壮大,并处在比较分散的状态,所以难免会受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进行思想工作也是比较困难的。

马克思决定:建立一个通讯委员会式的组织,通过这种方式在各国革命者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相互传递信息,了解各国工人运动和理论研究的动态,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批判危害工人运动的各种错误思潮,逐渐统一思想,以便团结真正的革命者,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事实证明,马克思的这一构想是完全正确的。

1846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建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

恩格斯和日果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在这一组织中进行工作的还有：威廉·沃尔弗、斐迪南·沃尔弗、约瑟夫·魏德迈、埃德加尔·威斯特华伦、路易·海尔堡、威廉·魏特林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通讯委员会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很快就与欧洲各国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特别是同英国的宪章派领导人、德国进步的知识界、法国工人领袖和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们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同时，一些同情工人运动但并不赞同共产主义的人士也曾一度参加过该组织的活动。该组织的通讯活动是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委员会的名义进行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则印制成公告下达到各地。

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的活动很快就扩大了范围，并在巴黎、勒阿弗尔、哥德堡、哥本哈根、科伦、伦敦、爱北斐特、汉堡、马德堡、基尔、莱比锡等城市建立起了分会。在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分会之间经常书信往来，及时交流各地工人运动和理论研究的情况，开展共产主义理论讨论，团结工人阶级队伍，为建党做准备。

为了使各地的分会在本国的革命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还帮助各地分会制定了他们具体的策略路线，例如，马克思曾向

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建议,支持资产阶级争取宪法和民族自由权利的要求,参加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促进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马克思认为,这样可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理论研究和革命宣传,在这一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许多争论和思想交锋,社会上流行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决不会自动地消失,特别是那些对工人运动影响很大的思想流派(例如魏特林的“平均的共产主义”和格律恩、克利盖等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马克思、恩格斯毅然决然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这些错误的社会主义流派会把工人运动引入危险的歧途,所以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一次“澄清工作”是刻不容缓的。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遇到的第一个强硬的对手是“平均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魏特林。

威廉·魏特林(1808—1871)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他出身贫苦,早年以缝纫为生。曾参加过莱比锡起义,后来到奥地利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成为一位出色的理论家和政论家。1835年在巴黎参加了正义者同盟,并成为其领导人。1838年,魏特林的首部著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

发表了,该书揭示了劳动群众贫穷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的不均”,并指出了财产共有共享的可能性。后来曾主编过《德国青年的呼吁》和《年轻一代》等刊物,宣传其平均共产主义思想。1842年他又出版了《和谐与自由的规律》一书,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主张只有这种社会制度才能保障社会的和谐自由,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旧制度,但他的所谓暴力革命其实只是少数人的密谋暴动。1843年,魏特林因发表《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而被官方逮捕,释放后在布鲁塞尔参加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魏特林曾经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他对资产阶级和私有制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揭露,认为在这种社会中,劳动者在被剥削和饥寒交迫的生活中饱受煎熬,而资产阶级则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巨大财富,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因此,私有制度是罪恶的根源,统治阶级的政府和法律是压迫劳动群众的工具,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这一制度。

但是魏特林所幻想的是一种虚幻的平均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与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没有什么两样,其绝对平均的观念则是小生产者的“一种天真的幻想”。在如何改造社会的问题上,魏特林的观点也是漏洞百出,他虽然赞同进行革命,但他不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把无产阶级看作革命斗争的主力

军,同时也没有把工人阶级与流氓无产者区别开来,主张少数人进行密谋暴动,在24小时之内就过渡到共产主义。另外,他的理论还带有浓厚的宗教痕迹,认为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精神是一致的,甚至宣称新的救世主就要降临并领导这场社会大变革。而他所说的救世主就是他本人。

鉴于魏特林对工人运动做出过贡献,马克思对他早期的研究工作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他指出:“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

虽然马克思对魏特林的平均的社会主义持批判态度,但为了团结更多的革命者共同创建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对他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帮助他认清理论上的失误,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马克思向他指出了平均的社会主义本身的巨大缺陷,告诉他: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指导,以革命政党为领导核心。

但马克思等人的一番苦心白费了，此时的魏特林已狂妄到了无法自持的地步，他认为自己的理论观点是十全十美的，还以救世主自居，对任何人都不屑一顾，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天真年轻的帮工裁缝，被自己的才能所震惊，力求弄清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了。这时他是一个由于自己卓越而受嫉妒者追逐的大人物，到处都觉得有竞争者、隐蔽的敌人和陷阱；这个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个国家的预言家，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副药方”。（恩格斯语）由于魏特林坚持错误立场的态度十分顽固恶劣，对工人运动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对他的理论和活动进行批判。

1846年3月30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召开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出席了会议，与会者中有埃德加尔、海尔堡、日果、魏德迈、载勒尔和魏特林等人。马克思等人再次做魏特林的工作，试图说服他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但魏特林十分顽固，不仅拒不接受劝告，反而猖狂地向与会者兜售自己的错误观点，说什么理论宣传已毫无用处了，共产主义革命已近在咫尺，应立即鼓动工人行动起来，实施他的所谓“革命计划”。

讲到这里，魏特林显得异常狂热，他非常自负地

用一种傲视天下的口吻说道：

“有人叫我空谈家，可是欧洲所有的劳动者都知道我！我正在用正义和友爱的名义把他们团结在我的旗帜下面。……我知道我的学说的重要性，它要比在书房里作学问重要得多，因为那些学问都无视人民的疾苦。我们必须立即付诸于行动！”

面对这个已经丧失了理智的狂妄之徒，马克思忍无可忍了。他突然站立起来，用铅笔敲击着桌面，打断了魏特林的话。

“激发人民，却不向他们提供科学的理论武器，就等于是欺骗人民，这只能给工人运动带来灾难！……魏特林，你颠倒了是非！没有政治理论的人才会使工人蒙受灾难，使革命事业陷于失败的境地！”最后，马克思用一种雷霆般的声音说道，“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

会议不欢而散了。但马克思的观点得到了通讯委员会中大多数人的支持，魏特林的错误已经被人们所识破。此后，他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中日益陷于孤立，他对正义者同盟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了。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已经战胜了长期影响正义者同盟的魏特林主义。

面对这位已经失去了理智的狂妄之徒，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对魏特林

的错误言行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魏特林的说教只是想激起工人的幻想,而不是给工人科学的理论武器,因此全是骗人的谎言,这只能给工人运动带来灾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动得到了通讯委员会中许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在同魏特林进行斗争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看到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也不可能避免了。

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盛行于德国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实际上是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与蒲鲁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大杂凑。其主要成员是一些新闻记者、诗人和评论家,他们控制着一些报纸刊物作为宣传阵地,例如《莱因社会政治年鉴》、《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人民论坛报》、《社会明镜》,等等。主要代表人物有莫泽斯·赫斯、海尔曼·克利盖、卡尔·格律恩、海尔曼·皮特曼、奥托·吕宁等人。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阶级斗争,宣称自己热爱人类,同情穷人,并美化小私有制,宣扬和平改良主义,主张用所谓超阶级的“博爱”和“人道”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追求一种以爱为基础的田园牧歌式的共产主义理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

“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过深刻的批判,这一批判主要集中在几个问题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维护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宣扬阶级调和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等等。

但是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当时没有与广大读者见面,所以它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未能见到成效,而批判这一错误思潮的工作越来越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了。

首先,团结广大革命力量组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的任务要求对形形色色的错误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批判,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工人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其次,“真正的社会主义”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照搬到了德国,但他们没看到德国当前的重要革命任务并不是批判资本主义,而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完成民族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只能对德国的革命运动起消极的作用;其三,“真正的社会主义”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招摇撞骗,兜售他们的错误思想,造成了视听上的极大混乱。

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已成为当务之急。而且魏特林自从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以后,不仅不思悔改,反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克利

盖等人勾结起来，顽固地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这就使得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变得更为紧迫了。

海尔曼·克利盖是个德国新闻记者，1845年来到美国，在纽约创办了《人民论坛报》，宣扬“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爱”的王国，可以用爱把所有的人团结起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一篇论文中，他竟然一口气列举出35种形式的爱，并把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归结为爱。在另一篇论文中，克利盖宣称爱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而妇女则是爱的“祭司”，号召妇女们用爱来治疗社会的疾病，使人类得到幸福。克利盖还提出过一种设想：如果在北美划出一块土地（14亿英亩），把土地无偿地分配给贫苦的劳动者，就可以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实现“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梦想”。

听到克利盖这种荒唐透顶的说教，马克思、恩格斯感到气愤难忍，认为这只能损害共产主义的声誉，于是他们写了《反克利盖通告》一文，给予驳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排除了魏特林的阻挠，通过了这份文件，把它寄发到世界各地。

《通告》指出，克利盖的说教绝不是共产主义的宣传，它只能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世界上没有

抽象的爱,爱也不能使所有的人团结起来,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批判了克利盖的社会改良思想和美化小私有者的幻想。他们指出,使每人拥有一小块土地并不能解决一切社会矛盾,而且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小生产者必将发生分化,小土地所有制是难以维持下去的。使每个人都成为小土地所有者也绝非工人阶级的愿望,而是那些小资产阶级、农民和破产小业主的虚幻的梦想。

《反克利盖通告》一文在世界各地公开发表了,它深刻揭露了克利盖的思想和计划的实质,给了他以致命的打击,使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迅速消失了。通过对克利盖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也认识到魏特林已经完全堕落了,遂宣布与他彻底决裂。

燕妮与魏特林私交甚好,因为当魏特林遭到反动政府迫害,贫困潦倒地逃到布鲁塞尔时,是燕妮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在生活上接济他,在政治上给他以巨大的支持,并争取他认识马克思主义。但魏特林顽固地坚持错误立场,并在最后的争论中指责马克思是想与他争夺荣誉,燕妮认为这是对自己丈夫的莫大侮辱,所以她不仅支持马克思与他决裂,而且还催促他这样做。

不久,魏特林去了美国,企图在那里建立所谓共

产“公社”，实现他的社会理想，但遭到了失败。很快他就脱离了工人运动，在政治上彻底堕落了。对于一个从贫困中奋斗成材并对工人运动作出过一定贡献的政治思想家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为了彻底清除“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危害，1846年8月，恩格斯受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的委托，亲自前往巴黎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格律恩等人作斗争。

恩格斯在巴黎住了近一年的时间，他深入工人群众，向他们讲解德国的历史和现状，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并深刻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虚伪面目，批判他们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在恩格斯的耐心说服教育下，正义者同盟中的大部分人都接受了他的观点，表示赞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暴力革命等观点，这样就彻底击溃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这股危害工人运动的错误思潮。

在巴黎时，恩格斯还向正义者同盟的成员简要地解答了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什么这一重要问题，他的答案是：第一，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第二，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第三，暴力革命是实现这些目的的唯一手段。

在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和燕

妮也有自己的痛苦,因为这批人中有一些是相当出色的思想家和作家,还有一些人则与马克思夫妇并肩战斗过,并且私交甚笃。莫泽斯·赫斯夫妇就是一例,他们正是为了接近马克思夫妇才从巴黎来到布鲁塞尔的。但由于这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拒不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大肆宣扬极端错误的理论,给工人运动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所以马克思夫妇才从原则立场出发,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后来在谈及这件事情时,燕妮十分风趣地写道:

“像赫斯这类人,确实是纯粹的妄想家,他们本来就没有血和肉的实体,只有血和肉的抽象,他们一旦把吃饭问题作为终身职业,就不得不在空中楼阁中上下求索。赫斯永远迷糊在错误的计划之中,但是他对人却一直在施加神秘莫测,无法解释,不可思议的个人影响,这也是他的职业:扮演预言家和大祭司的角色……我无限地高兴,我亲爱的卡尔,你的头脑始终高人一筹,你一直做你的急躁和热望的主人。我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勇气而爱你——你是我的丈夫!”

第十三章

共产主义者同盟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

许多人要正义,即要他们称为正义的东西,但他们并不因此就是共产主义者。而我们的特点不在于我们一般地要正义——每个人都能宣称自己要正义——而在于我们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在于我们要财产

公有,在于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对我们同盟来说,要有一个合适的名称。

——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7年年初,马克思家中传来弄璋之喜——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了。这个孩子长得并不漂亮,刚出生时皮肤呈奶汤色,相貌也显出几分丑陋,但他却是全家人日夜企盼的心肝宝贝。燕妮更是欣喜若狂,她感到家中终于又有了一个像马克思那样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了!她和马克思用她弟弟的名字为新生儿取名为埃德加尔。满月后,小埃德加尔长得越来越活泼可爱了,他经常睁大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好奇地观察着这个美妙无比的世界,并不时兴奋地发出甜蜜的微笑,令全家人欣喜不已。三岁的小燕妮和两岁的劳拉整天蹦蹦跳跳的,她也为增添了一个小弟弟而欢天喜地,经常围着弟弟的摇篮打转转,为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而忍俊不禁,允呼雀跃。

这一个时期,燕妮感到累极了。她不仅要与琳蕻照顾好三个孩子、料理家务和接待客人,还要协助马克思做各种各样的工作:进行理论研究,做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筹备工作,同时还要花费很大精力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此时,继击败了魏特林主义

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之后,马克主义者又投入了对另一个危害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之中。

比埃尔·纳瑟夫·蒲鲁东(1809—1865),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出身于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早年当过船夫和排字工人,后来开办了一家小印刷馆,但由于竞争激烈,资金短缺,惨淡经营了几年就倒闭了。蒲鲁东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那时就像一只可怜的鸟儿,惨遭暴风雨的蹂躏,找不到一丝绿枝遮蔽我的小巢。”

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憎恨,蒲鲁东后来转入了理论研究领域,并于1840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什么是所有权》一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揭露批判,指示:资本家通过雇佣工人劳动获得取财富是一种盗窃行为,“财产就是赃物”。关于这一点,蒲鲁东认为是自己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他写道:“这样的话一千年来没有人听到过。除了对财产的这个定义之外,我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但我认为它比百万钱财还宝贵,可以断定,这是路易·菲力浦时代最大的事件。”但实际上,蒲鲁东本人对所有权等问题并没有真正搞清楚,他也不主张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1846年,蒲鲁东又发表了《贫困的哲学》一

书,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系统地阐发了他的社会改造计划。

蒲鲁东主义的主要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主张建立以“私人所有”为基础的“自由”“平等”的“互助制”的社会,把人们都变成小私有者;对用革命手段改造社会持否定态度,鼓吹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组织工会和进行经济斗争;还宣扬反动的家庭观念,反对实行男女平等。可见,蒲鲁东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是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相对立的,要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有组织的革命斗争,就必须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严肃的批判,捍卫被蒲鲁东歪曲了的共产主义思想。

马克思与蒲鲁东是 1844 年春天在巴黎结识的,但并没有过深交。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建立以后,为了加强各地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及时互通信息,马克思于 1846 年春天给蒲鲁东写了一封信,诚恳地请他定期通报一下巴黎方面的情况。

在回信中,蒲鲁东很勉强地同意“偶尔地”汇报一下巴黎的情况,同时,他用很大的篇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写道:“……现在,我奉行几乎是绝对的反教条主义。不需要用混乱的思想给人类制造麻烦,而要给世界树立一个明智的、有远见的和忍让的榜样。不要充当新宗

教的倡导者，哪怕是崇拜逻辑和理智的宗教。我认为：用文火慢慢地烧毁私有制度要比给私有者安排一个‘巴托罗缪之夜’（指大屠杀——作者注）好些……”

很明显，蒲鲁东在信中向马克思传达了一个信息：他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反对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而这些正是马克思认为会给工人运动带来混乱的那种理论。更有甚者，蒲鲁东在信中还傲慢无礼地告诉马克思：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如何解决私有制问题的书，而且他估计，该书出版后一定会遭到马克思的攻击，而他则将予以反击。

这封信的内容表明，蒲鲁东已经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了，并且公开提出了挑战。

马克思感到气愤填膺。他立即准备应战——只要蒲鲁东的书一出版，就与他展开公开的论战。

大约在同年的12月中旬，马克思收到了友人从巴黎寄来的蒲鲁东的那部著作，即《贫困的哲学》。马克思立即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把它从头至尾详细地研读了一遍。他认真地分析了书中提出的每一个观点及其论据，并在书页的边缘处写满了批注。12月28日，他给友人安年柯夫写了一封信，概要地阐述了他将要写的批判蒲鲁东主义的著作的一些要点：在方法论方面，揭露批判蒲鲁

东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在社会学方面，揭露他对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它的性质、实质和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都不甚了解，因此他不可能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意义；蒲鲁东主义的阶级属性，等等。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还重申了他所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对生产方式的依赖关系，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以及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取决于生产力与现在生产关系之间的不适应，等等。在信的结尾处，马克思写道：“……他像一个圣徒，象一个教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情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1847年初，马克思开始写作了。这一次，他决定使用法文，其目的是为了为了使蒲鲁东不用翻译就能直接阅读原著。但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马克思希望这本书能为更多的法国人所知晓，以推动他们同蒲鲁东主义作斗争。

马克思是在一种强劲激情的冲动下投入这场战斗的，燕妮称之为创作热情。在写作这部书期间，其他的事情他几乎一概不做，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奋

笔疾书，通宵达旦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甚至睡梦中有时也在思考问题。文稿写完后，他又进行了多次修改，润色，直至自己感到满意后才住笔。从这一点上看，他很像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位欧洲诗人，据说，这位诗人有一张奇怪的书桌，桌上有100个抽屉，他每写一首诗都要反复地修改，修改一次就换一个抽屉，直至稿子从第100个抽屉取出时，诗作才算完成。

书稿终于完成了。给它起一个什么名字呢？马克思颇费了一番脑筋，还与燕妮认真商讨了这件事。

“就把它叫作《哲学的贫困》吧，”马克思说。“你觉得怎么样，亲爱的？”

“我觉得挺合适”，燕妮思索了一下，说道，“蒲鲁东哲学思想是多么贫乏枯燥啊。”由于经常帮助丈夫为书稿起名，她在这方面已经是行家里手了。

6月15日，马克思为《哲学的贫困》一书写了一篇序言。7月初，该书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正式出版了。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对蒲鲁东主义方法论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批判。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是唯心主义者，也根本不懂辩证法，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玷污了。例如，他试图把辩证法引入经济学领域中，但由于他不了解辩证法的实质，结果人为地用经济学的抽象范畴拼凑出一些经济矛盾，结果陷入了诡辩论的泥潭。蒲

鲁东还误解了黑格尔的扬弃的概念,以为扬弃不是发生质的革命转变,只是消除现存事物中与“好的方面”相对立的“坏的方面”,因此他认为不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用进行社会革命,只要进行社会改良,消除商品生产中“坏的方面”就可以了。蒲鲁东的这种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自相矛盾的空想,他既想使小资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发展对它的打击,又想保存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度。

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是永恒的,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观念。马克思指出,任何经济范畴都是历史的产物,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因此都不是永恒的,蒲鲁东犯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犯过的错误。蒲鲁东认为资产阶级学者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好的方面,社会主义者则指出其坏的方面,他本人只要对两者的观点加以批判综合,就可以找出解决问题的捷径,因此他已经超越了所有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一幼稚可笑的观点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并揭露他的主张的阶级实质是旨在拯救那些濒于破产边缘的个体小生产者,因此,他不仅不能超越前人,而且他的观点是完全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

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还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缺陷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他们

把货币、价值、分工等说成是永远不变的范畴,这是想把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描绘成永远支配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极其错误的。他认为每个生产阶段都是随着特定的历史时期而产生和消亡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也必将如此。同时,他还对经济学的许多范畴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不同意蒲鲁东把价值仅仅理解为纯粹思想中的概念,他认为价值是体现在商品中的人的劳动,它起源于劳动的产品成了商品对象的历史阶段,它是由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只有在生产具有社会性,而劳动还不是直接社会劳动之时,人们生产出的产品才能变成商品,并具有价值;价值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们的社会关系,等等。

马克思还在书中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例如,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方式更替的推动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等等。他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必将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并进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他还认为,生产力不仅仅是指生产工具而言,而且还包括了劳动者自身在内。

马克思在书中初步提出了他所发现的剩余价值论的一些原理。虽然他此时还在使用古典经济学派的一些概念,如劳动价值、劳动价格和作为商品的劳

动,等等,但古典经济学家只是把劳动看成同其它商品同样的商品,而马克思则赋予这些概念以新的内涵。他把劳动看作特殊的商品,通过使用这种商品资本家可以获得财富,而工人则饱受剥削,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造成一些阶级日益富裕起来,而另一些阶级则在贫困中遭受煎熬,造成极大的贫富不均。这些理论后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另外,马克思在书中还批判了蒲鲁东否定工人进行罢工斗争、经济斗争和组建工会的意义。马克思认为,对于工人来说,工会是阶级斗争的学校,也是工人向剥削制度发动进攻的一种准备形式。资本主义把劳动者变成一无所有的工人,工厂主剥削他们,竞争则使他们陷入分裂状态,而工会组织把他们团结起来向资本家进行战斗。在争取改善生活状况所进行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的觉悟也将逐步提高,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因此,通过经济斗争、罢工、组建工会等斗争方式,对于团结教育工人群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这样,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蒲鲁东耗尽心机构建起来的外表恢宏壮观的大厦,在马克思犀利无比的批判之下,顷刻间化成了一片废墟瓦砾。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马克思是思想的巨人,就像搏击

长空的雄鹰,比任何人都站得高,看得远。而蒲鲁东则是一个理论上的侏儒,形象些说,是一只羽翼未丰却雄心勃勃的公鸡,虽心比天高,却至多能飞到树梢上,向着它脚下的芸芸众生高傲地鸣叫。

马克思写这本书虽然用的时间很短,但这部主要研究经济学的书却是马克思第一批成熟的著作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通过这部著作,马克思严肃批判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说教,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恩格斯亲切地称这本书为“我们的纲领”。

随着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无产阶级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把自己的阶级力量团结和组织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革命实践和从事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也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和通讯中都表达过这一思想。恩格斯后来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写道:“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他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积极活动,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条件日益成

熟了。

一段时间以来，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秘密革命组织始终处在他们的高度关注之下，这个组织就是正义者同盟。

正义者同盟的前身是由德国的政治流亡者建立的秘密团体“流亡者同盟”。1837年，一部分激进的民主派分子从这个组织中分离出来，在巴黎正式成立了“正义者同盟”，其成员主要是手工业工人，著名领导人有魏特林、沙佩尔等人。该组织曾深受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后来又受到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蒲鲁东主义的影响，法国的巴贝夫和布朗基等人也与它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该组织的社会思想是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一切人自由平等，他们认为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少数人的密谋暴动。他们参与了在法国举行的密谋起义（“四季社”起义），但遭到失败，组织也受到了严重破坏，大部分人被捕。后来，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等人又恢复了正义者同盟的组织。

卡尔·沙佩尔是德国人，早在上大学期间就参加过秘密团体，是一个英俊魁梧，性格倔强，富有献身精神的革命斗士，在斗争的风浪中成长为一个著名的职业革命家。沙佩尔在科学理论的研究方面并没有什么超人之处，也受到过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

义思想的影响,但他具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实干精神,发现自身存在的错误后勇于改正,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亨利希·鲍威尔也是德国人,工人出身,思维灵活机敏,具有较高的组织才能,其思想深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是一位有影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在观察正义者同盟的发展状况,与其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不断与影响该组织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坚决斗争,并向该组织的领导人和广大成员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巴黎和伦敦等地的正义者同盟盟员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发现,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不能解答他们在革命斗争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而马克思创建的科学理论则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只有这一理论才能为工人阶级的斗争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1846年11月,正义者同盟的中央机关——人民议事会迁到伦敦,其主要成员亨利希·鲍威尔、约瑟夫·莫尔和卡尔·沙佩尔等人此时思想上已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决定于1847年5月召开国际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由于在制定纲领时遇到了困难,于是他们决定请求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派遣莫尔带着正式委托书前去布鲁塞尔和巴黎,分别拜

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约瑟夫·莫尔是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以前是德国的一个钟表匠，长得结实魁梧，强健有力。他的口才甚好，待人真诚热情，具有一种外交家的风度。1847年春天，他只身渡过拉芒什海峡来到布鲁塞尔，当天晚上就拜会了马克思。

“我是代表正义者同盟的多数成员来的，”莫尔谦虚地说。“我们读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散发的许多东西，也研究过你的著作，使我们获益匪浅。我们相信你的观点是正确的，也感到必须把同盟从旧的传统作风和形式中解脱出来。所以，我们请求你们加入我们的同盟。我们愿意接受你的理论，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说罢，莫尔递给马克思一张纸。这是正义者同盟的委托书，有沙佩尔等人的亲笔签名，上面写道：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伦敦通讯委员会授权约瑟夫·莫尔，委托他代表我们同你们进行谈判，口头汇报我们的工作情况。同时，恳请你们对莫尔给予信任，可以同他谈判任何重大问题，并可以把有关伦敦委员会的任何事情告诉他。”

通过与马克思的几次谈判，莫尔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同时，他也更迫切地希望正义

者同盟能够得到马克思本人的正确指导。于是，他更加恳切地敦劝马克思等人加入同盟。

在一次谈话中，莫尔说道：“如果你们加入同盟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制服同盟内部的那些老糊涂虫，同时，也可以教育提高我们的那些真正的战士、无产者，把他们引入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

这天晚上，马克思与燕妮就正义者同盟的邀请一事进行了认真的交谈。这是他的一种习惯。对于他来说，燕妮已经成了一位不可替代的助手和革命战友，他不仅需要她誊写文稿，迎来送往，处理日常的工作文件和来信，有时还希望她就一些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因为她能够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直观细致入微地洞察到一些非常敏感的细节问题。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燕妮说，“我们已经对正义者同盟做了大量工作，现在它的多数成员已经觉悟了，看到了自身的缺陷，所以才主动要求我们加入同盟。他们是真心诚意的。”

“这样一来，我们将拥有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了！”马克思十分兴奋地与燕妮拥抱在一起，“我们将能够团结一大批坚强的革命者，共同摧毁这个旧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以前也曾接到过正义者同盟发出的入盟邀请，但他们没有接受，原因是他们不赞成

当时同盟中盛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和狭隘的组织原则。但此时他们已清楚地看到同盟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另外他还得到了莫尔的保证:他们可以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宣传他们的革命理论,并把它写进同盟的纲领之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可以利用这一有利的时机用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对同盟进行革命的改造,使它发展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于是他们接受了入盟邀请。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接受入盟邀请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条件——既然他所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已经为同盟所接受,那么他要求同盟不能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他指出,应该把所有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从章程中删除掉。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和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从不盲从和迷信任何权威,他所追求的只是真理,而在真理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他坚信: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该具有科学的头脑、创造精神和批判能力,应该善于独立思考问题,推陈出新,不断进取,而绝不应是一个跟在大人物后面匍匐爬行的庸人。马克思这一闪烁着人类智慧之光的思想的正确性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被历史所证实。

正义者同盟接受了马克思的这个要求,并殷切

地希望他能亲自出席定于1847年6月在伦敦召开的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给予直接的指导。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经济上的困难,这位革命伟人竟然连往返伦敦的路费都凑不足,所以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是,马克思委托自己的好友威·沃尔弗代表自己前去出席会议,并对他作了详尽的指示。恩格斯是作为巴黎的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的。沃尔弗和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马克思认为他们与会足以使大会保持正确的方向。

伦敦是世界著名的“雾都”——即使在盛夏时节,它也沉浸在乌蒙蒙的雾霭烟瘴之中。这里是无与伦比的“日不落”帝国的首都,也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

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中檣桅林立,万帆竞渡,从世界各地搜购来的原材料由这里大批量地运进,经工厂加工后,又大批量地销往世界各地,使伦敦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贸易中心。经商发财的精神渗透了整个英国社会,就连顽固保守的地主贵族也纷纷向工商业转移,而合股公司的兴起则把几乎所有的富人(包括宫廷大吏在内)都卷入到了商海之中。男人们挖空心思地赢利挣钱,把大笔大笔的金钱投资于工商企业。而一些发财心切又别无长物的年轻女性则公开做起了美色与金钱的交易,使伦敦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嫖娼卖淫之所。在这个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中,金钱似乎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伦敦成了世界资产者和冒险家的乐园。

然而,1847年的夏季,这里却迎来了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盛大的节日。

1847年6月2日至9日,正义者同盟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了。会议的历史使命是彻底改组同盟,创立一个具有新的思想原则和组织机构的新型革命组织,因此这实际上是新同盟的成立大会。根据会前做出的决定,这次大会的具体日程包括:委员会的总结报告,选举新的同盟领导机构,选定中央委员会的驻地;改组同盟和修改章程;通过同盟的纲领;创立同盟的机关报;组织和宣传等工作。

代表们决定,抛弃同盟过去的带有密谋色彩的组织名称,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名称鲜明地体现了该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把自己与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运动区别开来。马克思在解释更名问题时写道:旧名称“已不合时宜,丝毫不能表达我们的意愿。许多人要正义,即要他们称为正义的东西,但他们并不因此就是共产主义者。而我们的特点不在于我们一般地要正义——每个人都能宣称自己要正义——而在于我们向现存的社会制度

和私有制进攻,在于我们要财产公有,在于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对我们同盟来说,要有一个合适的名称。”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名称恰恰能够做到这一点。

代表大会通过讨论规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消灭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型社会。大会还决定,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口号代替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错误口号。同时还规定,同盟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其委员会成员经由民主选举产生,可以随时罢免,等等。

大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制定同盟的章程。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章程草案》经讨论获得了通过,大会决定把它寄发给各个支部进行讨论,以便提交到下次代表大会上正式表决通过。该章程共分10章50条,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建党思想。章程的第一条规定了同盟的目的。第二条较详细地规定了盟员的条件,例如,赞成共产主义,不参加反共产主义团体,服从同盟决议、保守同盟机密,进行革命宣传工作以及必须获得一致通过才能被接收进某一支部,等等。这些要求表明,只有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才能加入同盟。章程还规定了同盟的组织制度和

盟员的民主权利,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等等。这个章程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一个党章,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指导思想。

这次代表大会还讨论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这份文件是由恩格斯起草,由沙佩尔和沃尔弗作为大会主席和秘书签署的。它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重点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阶级关系、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奋斗目标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等重大理论问题。在谈到共产主义者的奋斗目标时,《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指出:“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全部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废除私有财产,代之以财产公有。”这个文件中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但也残留有旧同盟某些观念的痕迹,大会决定,把这份文件发到各地由盟员进行广泛的讨论、修改,使之更加完善,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表。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突出事件,它向世人宣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者

在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盟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使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它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十四章

革命宣传

为了捍卫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思想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要同资产阶级的学理主义者论战,而且还要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论战。

——彼·费多谢耶夫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此马克思感到十分欣慰。但他看到建党的工作仍然很艰巨,需要在多方面付出努力,于是他立即

行动起来,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为完成同盟提出的任务和召开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

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是完成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加强共产主义者同盟。恩格斯在参加了一大后从伦敦返回巴黎,然后又来到布鲁塞尔。他同马克思就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并在布鲁塞尔共同创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和区部,马克思被选为支部主席和区部委员。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还有沃尔弗、荣克和日果等人。该区部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局部地区,它不但要对比利时各个支部行使领导权力,实际上还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思想指导中心,对欧洲的各个支部都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就连设在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在遇到重大问题时也来征询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的意见,另外,马克思等人也时常主动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

就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很快就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占据了支配地位。除了布鲁塞尔区部外,马克思的亲密战友魏德迈和毕尔格尔等人当选为西德意志各个支部的领导人,恩格斯则参加了巴黎区部的领导工作。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必须立即开展广泛

的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工作。但在当时各国的反动统治之下,共产主义者同盟还是一个秘密组织,处于非法活动状态。马克思对这种情况作了分析,他认为要想使同盟充分发挥其影响和作用,就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加强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在同盟周围建立起一些合法的群众团体,进行公开的活动,否则的话,同盟还会陷入它的前身的那种密谋团体的孤立无援的状况之中。

于是,马克思等人立即着手进行这一方面的工作。很快,同盟盟员们建立了教育协会,定期举办面向工人的各类专题讲座,建立了歌咏队,设立了图书馆,开展多种多样的宣传活动。

1847年8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建议下,布鲁塞尔成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这是一个合法的工人组织,但实际上处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之下。开始时会员人数很少,但不久就增加到了一百多名。工人协会立即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马克思对协会的工作给予了关心和指导,并亲自参加了协会的许多活动。

工人协会的会员们定期在天鹅饭店里集会,一般来说,星期三晚上是研究社会和政治问题,星期六晚上是对时事政治进行评述,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马克思是这里的常客,并做了一系列关于经济

学方面的报告,向工人群众讲述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特别阐释了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的深刻根源,极大地启发了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热情。

燕妮对工人协会的工作也很关心,她常常在星期六晚上与工人们一起进行娱乐活动,例如,演戏,文学朗诵和跳舞。但燕妮最喜欢做的事情还是为与会者朗诵世界名著。她的才华和魅力为晚会增色不少,工人们都非常喜欢她那甜润优美的嗓音,从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巨大的精神快慰和鼓舞。一位与会者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其中写道:“在演出中,马克思夫人显示出了她那卓越的朗诵才能,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关于优秀妇女为无产阶级教育出力,她是值得学习的榜样。”

在向工人协会做的一系列报告中,马克思以通俗简洁的语言向工人群众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压迫的阶级斗争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后来这部稿子中的一部分在《新莱茵报》上公开发表了,题目为《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是继《哲学的贫困》之后,马克思发表的第二部较大部头的经济学著作。

这本书旨在阐释这样一个中心问题:揭示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工人受奴役的地位和资本

主义剥削的实质。纵观全书,马克思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个主题,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深刻地表述了自己的科学观点。

马克思在书中指出,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生产中,人们不仅与自然发生关系,他们相互间也发生一定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在发展。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为处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资本主义也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种社会形态,它存在两大基本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人靠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为生。从表面上看工人是自由的,但他这种自由至多是可以把自己的劳动换一个买主而已,工人阶级实际上受到整个资产阶级的奴役。资本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关系。资本家占有资本,他们用自己掌握的交换价值购买劳动力,剥削雇工,从而使交换价值保存并增值,转变为资本。

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利益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资本的所得份额愈大,劳动的所得份额就愈小,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就愈来愈不平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因此,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工人阶级也处在日益贫困化的过程中。

马克思在工人协会做的报告中的另一部分内容在他生前未能公开发表,直到他去世后才在他的遗稿中被发现,其中有些内容是对《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补充。例如,他认为:资本的不断增长也为社会的革命改造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他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竞争和世界市场的出现,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新社会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无产阶级队伍的日益团结壮大使得它有能力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造。而在资本的统治下,劳动力成为商品,一切都成了买卖的对象,金钱关系变成了唯一的关系,因此工人阶级认为:“一切他们都能摆脱,都能割弃。”

《雇佣劳动与资本》反映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在40年代达到的最高水平,较清楚地阐释了剩余价值论的某些原理,为他后来建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部著述在当时对于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受到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和赞誉。

应该指出的是这部作品产生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时期,其中所涉及的某些概念并不十分精确。例如,他此时还把劳动看作商品,未能把劳动与劳动力区别开来,显然还带有古典经济学的某些痕迹。这些问题由马克思本人在50年代时做了全面订

正和修改。

1847年的欧洲正处在革命的前夜,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要想在未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有所作为,就必须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同盟,对欧洲各国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因此,他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和进行政治宣传工作的同时,也十分关注欧洲的民族民主运动,与各国的民主势力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积极参加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活动。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于1847年9月27日,参加者是来自欧洲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分子和社会主义者。此时恰巧马克思不在布鲁塞尔,恩格斯被提名为协会副主席的候选人。恩格斯起初不想竞争这一职务,一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尚年轻,二是由于他即将离开布鲁塞尔返回巴黎了。但经过认真思考,他认为有必要得到这个职位,以便与民主力量团结起来,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于是他同意出任候选人,并向主席提出声明,建议在他离去后由马克思接替他出任候选人,因为马克思是最合适的人选。

马克思于10月初返回布鲁塞尔,立即投入了创建民主协会的工作。经过正式选举,比利时的梅利奈将军(此人参加过1830年比利时革命,为民主运动

做出过贡献)出任名誉主席,律师若特兰当选为主席,马克思和法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雅各·阿贝尔当选为副主席。

马克思以副主席的身份为民主协会做了大量工作,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准备,使布鲁塞尔民主协会逐渐变成了欧洲革命民主力量的中心。在这一过程中,这个组织与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

经他们的倡议和筹备,1847年底,“民主派兄弟协会”大会在伦敦召开,以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171周年。马克思以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代表的身份前去参加会议(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1月29日,他在恩格斯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设在磨坊街的会议大厅,向大会做了“关于波兰问题”的发言。

为了能亲身领略马克思的声音和风采,大厅里早已挤满了操着各种语言的人,马克思走上讲台时,他们以极其热烈的欢呼声向他表示致敬。

“毫无疑问,旧波兰已经死亡了,”马克思洪钟般的声音响彻了大厅内外,会场上一片静寂,人们热切的目光全部集中在马克思那张黝黑刚毅的面孔和炯炯有神的眼睛上”。我们绝对不希望它复活。不过死亡的不仅是旧波兰。旧德国、旧法国、旧英国——整

个旧社会都已经过时了。旧社会的死亡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而一切现代国家里的极大多数的人所处在状况正是这样。”

在讲话中,马克思详尽阐述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民族矛盾的解决有赖于阶级矛盾的解决的思想。他指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千万民族压迫和剥削的原因,而要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只有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可以消除目前引起民族冲突的原因,并使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因此要使各民族团结和睦,只有消灭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接着恩格斯走上了讲台,用一种清晰有力的嗓音发表了精彩的讲话。当他说到“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就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时,全场沸腾了,各个民族的人们——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和意大利人纷纷站立起来,以雷鸣般的欢呼声表示赞同。接着全场脱帽肃立,高唱《马赛曲》。顿时,各个民族的不同语言在这雄浑激越的旋律之中完全融合为一体了。

从伦敦返回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又积极参与了民主协会的各项工。12月19日,他向协会做了伦

敦之行的报告。26日,他参加了协会的讨论,主张吸收被法国政府驱逐的革命者为会员。1848年1月,他还前往根特出席当地民主协会的成立大会。不久又亲自主持会议,听取恩格斯汇报他被法国当局驱逐的详情。2月22日,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在黑衣修女街“古宫”大厅隆重举行纪念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大会,马克思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他指出克拉科夫起义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把民族问题、民主问题和阶级问题联系起来看待,这是极其可贵的。因此他们认识到只有进行民主革命,波兰才能获得独立,无产阶级在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时必须依靠革命民主力量,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与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并领导了民主协会的工作,使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有了更广泛的同盟者,从而为即将爆发的民主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战斗力量,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使各国的反动政府感到惊恐不安的了。

为了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必须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这一重大革命任务要求革命者必须掌握舆论工具,因此马克思等人越来越迫切地感到拥有一份自己的刊物是多么的重要。

起初,他们想自己创办一个新刊物。1847年夏

季,马克思曾打算用招股的办法在比利时创办一份评论性的刊物,但在筹办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未能成功。不久,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的领导人在马克思、沃尔弗等人的支持下创办了《共产主义者杂志》,刊物上赫然印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但由于资金周转发生了困难,这个刊物很快就停刊了。

自己创办刊物未能成功,于是马克思认为应该去争取那些现存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创办的刊物。很快,《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引起了他的注意。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论家阿达尔贝特·伯恩施太德于1847年初创办的,每周出版两期。伯恩施太德兼任该报编辑,发表了不少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文章。但由于各派政治势力都可以在报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该报的政治倾向和理论观点显得杂乱无章。马克思的好友维尔特和沃尔弗等人为该报撰稿后,该报的政治色调开始转变,马克思的朋友们对它的影响越来越大。

后来,该报在经济上发生了严重困难,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吸引马克思等著名学者为报纸写稿,以提高报纸的影响力,增加订户,伯恩施太德对办报方向做了重大调整,同意尽量使报纸适合共产主义宣传

的要求。因此从1847年8月起,《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政治倾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久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成了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从这时起直至该报的最后一期(1848年2月27日)为止,该报实际上完全处于马克思等人的控制之下,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非正式机关报,而伯恩施太德只不过是挂名的主办人而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一共发表了20多篇文章。他们用深刻犀利而又机敏灵巧的文笔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确地阐述了工人阶级在未来革命中的地位和任务,揭露了各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错误思想流派的虚假面目,鼓舞和推动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迅速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争取获得诸多资产阶级民主(如: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人民代表制度,等等)。但他们告诉人们,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参加民主革命只是为了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必要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始终贯彻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真正动力的观点。另外,马克思还对反动统治者利用基督教维护统治的伎俩进行了揭露批判,

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宗教道德之间的根本对立性以及基督教义宣扬驯服、温顺、自卑和忍受现世的苦难等愚民思想的消极作用。

为了揭穿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欺骗性和虚伪性，阐明共产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一些基本原则，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继续对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他为参加布鲁塞尔国际经济学家会议所准备的发言稿就体现了他这一时期的部分研究成果。

1847年9月中旬，在布鲁塞尔举行了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国际经济学家会议，出席者大都是来自欧洲各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工商界人士。马克思、恩格斯和维尔特以及他们的一些朋友参加了会议。他们把这次会议看作是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进行正面交锋的一个机会，决心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对资产阶级的经济观进行严厉的批驳，宣传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学原理。

这次会议是由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召集的。所以在会议前两天的发言中，他们的代表占据了会议的讲坛，喋喋不休地宣扬他们的经济理论，主张实行彻底的自由贸易政策，国家不干预贸易活动，废除全部进口税。他们还不顾事实地宣称：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

在会议的第三天,维尔特和马克思要求发言。维尔特在发言中首先进行了质问:为什么讨论工人状况的会议却不邀请工人代表出席?然后,他以活生生的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给无产阶级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天然对立。他告诉人们:工人阶级虽然赞成自由贸易,但这决不是说自由贸易给他们带来了实际利益。在他们看来,保护关税政策并不保护工人,自由贸易也不能改变他们受奴役的地位。无产阶级之所以赞同自由贸易是由于自由贸易可以使资本家更自由地活动,从而加剧了劳资矛盾,导致社会革命迅速爆发。

维也特的发言语惊四座,博得了他的战友和进步人士们的热烈欢迎,却吓坏了那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正当马克思准备发言时,主持人却突然宣布辩论结束,会议在一片混乱之中草草收场了。

马克思的演说虽然被资产阶级分子蛮横地阻止了,但他们的这种不光彩的举动只能进一步证明他们的虚伪和卑鄙。9月29日,比利时的《民主工场报》发表了马克思的文章《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和工人阶级》,1848年元月初,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上作了题目为《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报告,全面阐述了马克思原准备在国际经济学家会议上发表的演说的内容。

马克思在演说稿中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说自由贸易政策保护了工人的利益,这完全是欺骗性的宣传。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做了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指出,保护关税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都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保护关税政策对于保护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有积极的意义。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除了德国等国以外,在已经建立起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里,保护关税政策就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因此一般来说,保护关税政策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政策则是进步的。

但是,马克思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不仅不会消除资本家与工人的对抗,反而会加深资本主义的矛盾,使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变得更为剧烈。而且,资本不仅剥削本国人,也残酷地剥削其他国家的劳动者。但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并不反对自由贸易,因为这种政策会导致过去的民族解体,使劳资矛盾的对立达到顶点,从而加速社会革命的到来。他写道:“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

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

马克思的这篇演说稿立场鲜明,分析透彻,语言精辟有力,对资产阶级关于保护关税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的辩解做了科学的剖析和严厉的批判,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们企图用人民群众的利益掩饰其剥削压迫行径的卑鄙伎俩,深深教育了广大革命者和工人群众。

为了宣传和捍卫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和观点,马克思不仅要进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要对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进行批判,同时还要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进行论战。在1847年下半年发生的与海因茨的论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卡尔·海因茨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曾作过德国的小官吏,因写书揭露普鲁士的官僚制度受到当局的通缉,被迫流亡国外。为了使他能纠正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马克思等人曾经花了很多精力与他进行对话和争论。但海因茨不思悔改,迁居到瑞士后继续发表文章,对共产主义者进行攻击污蔑。他还号召德国人民立即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君主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海因茨的宣传鼓动在社会和工人中间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奋起反击。

恩格斯发表了《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茨》一

文,详细阐述了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和斗争策略,对海因茨的采取一次革命行动就能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驳。看到恩格斯的文章,海因茨竟恼羞成怒,于10月21日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再次发表了一篇恶毒攻击谩骂共产主义者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代表”》。

此时恩格斯已离开了布鲁塞尔,于是马克思对海因茨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回击,他写了《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连载在10月底至11月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批驳了海因茨的无耻谰言,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原理。

马克思认为,政治权力的性质取决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针对海因茨的“政治权力造成了财产关系的不平等”的肤浅观点而提出的。

马克思在文章中科学地论证了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问题,指出财产的不平等不是由政治权力造成的,而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决定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政治制度并不能单凭主观愿望随意加以推翻,无论是推翻封建制度还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都必须具备成熟的物质条件。但另一方面,政治上

层建筑对社会的维系作用也不容忽视。因此,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消灭旧的上层建筑,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社会,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新的社会制度也必须如此。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用无产阶级的统治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针对海因茨认为实现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就能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错误观点而说的。

海因茨认为,德国社会中存在的一切苦难根源于封建君主制度,因此消灭了君主制,在德国建立起联邦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可以彻底解决德国的社会问题。对此马克思指出,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君主制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因此消灭封建专制政体已经成为德国革命的当务之急。但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完成并不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反而会使社会矛盾变得更为尖锐,这种情况在发生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里已经屡见不鲜。所以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便成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代之以无产阶级的统治。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

虽然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能够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的观点是庸俗的,但是他清楚地看到,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资产阶级革命是革命斗争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它是“工人革命的前提”。因为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必须首先消灭封建的财产关系,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可以加速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日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开始之时,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制度之后才能开始。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参加资产阶级革命,虽然这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还要继续战斗,直至用无产阶级的统治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议论精辟,逻辑雄辩,批驳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错误谬论,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并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当前的斗争策略和伟大的历史使命。

第十五章

《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7年时马克思才29周岁，正是风华正茂之年。他肤色黝黑，长着满头蓬松的黑发和一脸浓鬓，

天庭饱满，目光炯炯有神，肩膀宽厚有力，显得魁梧健壮，精力旺盛。此时，他已经在对黑暗旧势力的斗争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勇气和才能，成为一位享誉欧洲的著名学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了。但是，他也是一位具有丰富生活情趣和细腻感情的普普通通的人。

马克思一生都非常喜爱孩子，他对待孩子一向和霭可亲，从来没有任何架子，相互间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在孩子们眼中，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而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和忠实的大朋友。因此，孩子们常常不叫他爸爸，而是亲切地喊他“摩尔”。^①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左尔格后来在谈到马克思的家庭生活时说：“凡是熟悉马克思家庭的人都会留有深刻的印象，马克思始终言行一致，作为一个反对迷信权威的人，他从不在孩子们面前追求权威。”

马克思的工作非常繁忙，有时忙得连睡觉休息的空儿都没有。但一到节假日或周末，他常常要放下手头的工作，听从孩子们的指挥，与他们一起嬉戏游乐。

一个星期天，马克思正在书房里与恩格斯研究哲学问题。突然哗啦一声，房门打开了，小燕妮和劳拉冲了进来，非常严肃认真地说道：“这还了得，怎么

^① 摩尔一词出自希腊文，欧洲人常用它来称呼皮肤黝黑的人。

星期日还工作？”马克思感到自己理屈，没有进行辩驳。两个小家伙还不算完，不由分说就把两个大人拉出了书房，把他们当作“马”骑在了身下，驾驭着他们在院子里不停地奔跑，跳跃，而她们则兴奋得大喊大叫。

马克思最喜欢与孩子们一起做的事情是外出远足，野炊，风景优美的公园和充满大自然原始气息的山林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有时，他也利用工作的间隙时间与孩子们一起做游戏。孩子们很喜欢与他打水仗；用纸做成各种兵舰，在盛满水的脸盆里交战。马克思与孩子们一起玩的时候非常认真投入，他觉得这是人世间最天真无邪的时光之一，也是最有效率的一种休息方式。

但是，马克思不愿过分地溺爱孩子，他没有忘记一个父亲应尽的职责，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都能在社会中自立，做一个具有高尚情操和真才实学的人，所以他十分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

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他喜欢给他们讲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来自书本，有的来自民间的口头传说，还有的则是马克思自己编出来的。每次到野外郊游时，他总是一边走，一边给孩子们滔滔不绝地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其内容丰富多彩，奇妙无穷，而故事的篇幅则随着路程的长短而发生变化，孩子们常常听得

入了迷,以致忘记了旅途的劳累。

马克思讲的故事中,最奇妙的恐怕要算《冈斯·吕克尔》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冈斯·吕克尔是一个聪明善良的魔术师,他有一个很大的玩具宝库,里面有各式各样有趣的玩具:木头娃娃,矮子和巨人,工人和老板,国王和王后,马匹和车辆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可是,冈斯·吕克尔很穷,总是慢还不清欠魔鬼的糊涂债,只得常常把玩具卖给魔鬼。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后来,这些玩具又象变魔术一样回到了冈斯·吕克尔身边。

马克思讲述的这些故事大多富有一定的寓意,趣味横生的故事情节中孕含着一些深刻的哲理和人生教诲。他希望用这些故事把孩子们的注意力调动起来,让他们的思绪随着主人公命运变化而起伏波动,以提高他们的智力、想象力和道德情感。他也时常讲述一些英雄人物的传说,使孩子们从小就树立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光明必将压倒黑暗的坚定信念。当孩子们稍稍长大时,马克思又引导他们看一些有意义的书籍,例如诗歌、童话、世界名著以及一些初级的历史读本。

在旅居布鲁塞尔期间,燕妮总觉得每天的时间太短了,而她要做的事情又太多。她不仅要去做儿女们的好母亲,抚养和教育他们,使他们健康快乐地成

长,而且还要与琳蘅一起操持繁重的家务,为维持一家人简单朴素的生活而奔忙。另外,由于马克思长期用脑过度,时常生病,燕妮还要对他的身体进行精心的护理照料。虽然由于不断生育,燕妮这些年的健康状况也不佳,但她还是坚强地忍受住了身体上的种种不适,总是不知疲倦地做这做那,而且始终显得那么和蔼安详。因此只要有燕妮在,家中的一切就会显得井井有条,温馨而舒适。日夜沉浸在激烈精神搏斗之中的马克思是多么需要这种祥和宁静的环境啊!

在布鲁塞尔期间,马克思几乎每天都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智慧进行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拼搏。而燕妮则充当了他最忠实的助手和秘书,日日夜夜服侍他写作,帮助他整理书稿。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马克思博学多才,思路敏捷,在写作时,手中的笔常常随着疾速跳跃的思维迅速地划动,龙飞凤舞的字迹使外人很难看得懂,只有与他朝夕相守,相爱相知的夫人燕妮才能流利地阅读他的书稿。

燕妮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她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工作着,出色地完成了为马克思整理和抄写书稿的重大使命。有时候,燕妮还要帮助马克思收集资料,写信,与外界进行各种交涉,等等。同时,她还时常走出家门,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工人

协会的工作。在工人协会组织的文娱活动中,燕妮常常扮演重要角色,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特长,尽力把协会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燕妮出众的文学才华和组织协调能力在协会中是有口皆碑的。

马克思和燕妮,一个是才华横溢、智慧过人的大学问家,一个是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大家闺秀。如果他们想要为自己谋取福利,过上富贵安稳的生活,这是不难做到的。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人生旅途中将充满艰难险阻和数不清的苦难。

他们刚刚结婚时家中几乎一贫如洗,仅仅靠马克思的稿费收入和燕妮带来的一点积蓄为生。后来,燕妮得到了一笔遗产,但这对初入社会的青年人却不善于理财,他们把这笔钱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来做客的朋友们谁需要便可以随便取用,很快这笔遗产就用光了。

随着儿女们陆续出生,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就更加拮据了,他们不仅需要养育自己的孩子们,还要招待来自各国的朋友和革命同志,有时还要关照那些不期而至的政治流亡者。有的时候,由于反动政府的迫害,马克思写的稿件不能及时发表,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稿酬没有了,生活陷入了无以为继的窘境。为

了填饱全家人的肚子,燕妮便不得不去当铺当掉自己陪嫁时的金银首饰和衣物。他们有时还因缴不起房租而不得不四处寻找租金便宜的小旅馆居住。

生活虽然这样清贫,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始终是非常充实的。为了实现人类最崇高美好的理想,他们甘愿象普罗米修斯那样忍受人世间最大的苦难。他们在努力着,拼搏着,踏踏实实地实践着自己年轻时立下的诺言,一时一刻也不懈怠。

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做了大量的工作。同盟的中央委员会向各地组织发出了许多重要文件和指示,要求各地支部围绕同盟的章程和《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等文件展开研究讨论,并把讨论的结果上报到中央。中央委员会还派遣专人到美洲和瑞士等地宣传贯彻大会精神,指导各地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领袖创建组织,开展活动。马克思领导的布鲁塞尔区部也不断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活动经验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并加强了与各地组织的思想交流。因此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同盟各地方组织的活动开展得比较活跃,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特别是布鲁塞尔区部、伦敦区部以及美因茨、莱比锡等地,同盟的某些活动相当积极活跃,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各地工作的开展情况是很不平衡的。有些

地区的工人运动迟迟没有发动起来，同盟的基层组织处于涣散无力的状态。还有些地区的组织负责人对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路线持反对态度，个别地方支部甚至动用组织经费进行反共产主义宣传。特别是巴黎、汉堡、瑞士等重要地区，工人运动在组织和思想上都处在十分混乱的状态，“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和魏特林主义的思想影响仍然广泛存在。

面对这种情况，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在 1847 年 11 月底召开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批准同盟的章程和纲领，把第一次代表大会取得的成果巩固下来。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非常希望马克思能出席这次代表大会。鉴于他由于经济原因未能参加同盟一大，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个多月，中央委员会向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提出建议——让马克思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在信中写道：“如果马克思能够出席，我们真是荣幸之至！并将努力减轻你们的经济负担。”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赞成召开新的代表大会，他们分别被选为布鲁塞尔和巴黎的盟员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制订一个科学的党纲,阐明党的理论和政策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早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期,同盟就讨论了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当时的大部分代表对这份文件持赞同态度,但他们认为制订同盟的纲领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应该持慎重态度,因此决定把这个文件传达到各地支部,经讨论修改后再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各个支部就这个文件进行了广泛认真的讨论。巴黎支部在讨论后提出了赫斯写的修正案,但未能得到多数盟员的赞同。

受同盟盟员们的委托,恩格斯对《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做了全面修改,共编写了 25 个问答,其内容已大大超过了原来的文件,恩格斯为它定名为《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原理》更全面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策略、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条件以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向共产主义过渡所应采取的措施,该文件通篇贯穿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

但恩格斯并不感到满意,仍然认为这只是一份纲领性的草案,还要做进一步修改,而且采取问答的形式也不太合适。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马克思,得到了马克思的赞同。马克思认为必须把这份文件写成一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战斗宣言。

为了为第二次代表大会做一些准备工作,这两位友人约定在赴伦敦开会的途中先在比利时的海滨城市奥斯坦德会面,共同商讨有关同盟的章程和代表大会的其它有关问题。当时与马克思同行的还有一位著名的比利时法学家维克多·特德斯科。

11月2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奥斯坦德的一个旅馆中会面,马克思阅读了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原理》,他们一致决定暂不把它提交给代表大会讨论。

1847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27周岁生日,他与马克思一起渡海来到了英国首都伦敦。29日,他们参加了“民主派兄弟会”在这里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17周年国际大会,马克思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论述了加强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等问题。

11月29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了。由于当地的许多与会者白天不得不为谋生而忙碌,所以会议不得不在夜晚举行。大会一共进行了十余天,来自法国、瑞士、德国、比利时和英国等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们选举沙佩尔出任大会主席,恩格斯担任秘书,他们二人负责签署所有带有决议性的会议文件。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

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会议展开了多次辩论。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充分显示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风采，他坚持真理，学识渊博，坚韧不拔，充满了革命的激情，但又十分谦虚坦诚，头脑异常清醒冷静，与那些夸夸其谈，但腹中空洞无物的政客们迥然不同。马克思在大会发言中深入浅出地阐释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正在拟议中的同盟纲领的主要内容做了全面的论述。

在经过了至少八个夜晚的辩论之后，马克思的观点获得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信服。12月8日晚上，会议辩论结束。大会批准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章程的第一条明确地宣布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奋斗目标：“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正式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作为党的宣言公诸于世。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了，工人阶级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政党，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

马克思、恩格斯一向认为：要使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取得彻底胜利，就必须组建一个不同于任何政党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他们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努力。如今，这一美好愿望终于实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不感到振奋和激动。他们相信，不论这一革命组织在当时是多么弱小（她的全体盟员只有 500 余人），但她的建立仍然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她定会领导觉悟的工人阶级向旧世界发起猛烈攻击，并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还取得了另一个重要成果：同盟全面接受了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并委托他和恩格斯为同盟起草纲领。

二大结束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了布鲁塞尔，立即投入到紧张的起草党纲的工作之中。在写作时，他们认真参照了恩格斯的手稿《共产主义原理》，很快就草拟出了大部分章节。1847 年年底，恩格斯因故返回巴黎，最后的定稿工作便由马克思独自承担了。

这一次，马克思是以一种极为罕见的认真态度投入写作的，他几乎是在一字一句地斟酌推敲。有时为了修改一句话，他要查阅大量的资料和工具书，在进行长时间的思考与反复琢磨之后才做出定夺。此时，他仿佛不是一位作家，倒更像一个极有耐性和精益求精的能工巧匠，为了制作出一件精美绝伦的传世艺术佳作，而精心地加工着，雕凿着。

在那段紧张忙碌的日日夜夜里，燕妮再次充当了马克思的秘书。马克思每修改完一遍稿子，她都要一页一页地整理抄写好，有时还要笔录丈夫向她口述的草稿，时常忙碌到深夜。但她感到有些奇怪，丈夫对这部书稿提出的要求似乎比任何时候都高得多，甚至有几分苛刻。

一天夜里，燕妮一边抄写稿件，一边轻轻问道：

“卡尔，这已经是第三稿了，你把文稿精炼了再精炼，到底还要修改多少遍呀？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才能使你感到满意呢？”

“这是一部关系重大的书，”马克思以一种少有的严肃态度告诉妻子。“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婴儿那样格外珍爱它，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漏。否则的话，我们会遗憾终生的。”

其实，燕妮也意识到了这本书的重要性，所以她才以比以往更大的热情关注着它的完成。但是她并没有料到，眼下她帮助丈夫写作的是一部必将震撼世界和扭转乾坤的书，100多年以后，这本书成了世界上翻译版本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一部著作，并将世代代流传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

此时，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也在密切地关注着马克思的工作。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委员们越来越感到焦急，他们开始怀疑马克思是否能完成

他的使命。1848年1月25日,他们向布鲁塞尔发来一封急电,敦促马克思务必在2月1日前把党纲寄到伦敦,否则“将要对他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份电报反映了这个大部分是由年轻人组成的年轻的党的某种性格特征。

其实这种焦虑不安是不必要的,因为此时马克思已经把手稿寄往伦敦了。

这份题名为《共产党宣言》的手稿寄到伦敦以后,同盟中央委员会未做任何更动就把它送到了印刷馆,印刷所需费用由德国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支付,卡尔·沙佩尔担负了校对清样的工作。

1848年2月末,这部渗透了马克思、恩格斯多年心血的划时代的著作出版了。书上没有署名,作者想以此告诉世人:这不是一部个人的作品,而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战斗宣言。灰绿色的硬皮封面上清清楚楚地印刷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党宣言》回答了历史向人们提出的一系列十分严肃的问题:怎样才能消灭现存社会中的最大罪恶——剥削和压迫,使全人类过上和谐美满的生活?为什么一代代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为建立新的理想社会而英勇奋斗,最终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通过宣传说教和社会改良等办法都未能根本

触动旧的社会秩序？这是多少个世纪以来人类为之苦苦探索而又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共产党宣言》被列宁称之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它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概括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多年研究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和国际工人运动积累的丰富经验。书中还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概要性的论述，并批驳了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潮对共产主义的诽谤和歪曲。

《共产党宣言》不愧为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经典之作。它不仅孕育了闪耀着科学光芒的博大精深的革命理论体系，而且文体优美，语句生动，简洁有力。它既像一首优美典雅的英雄史诗，行文如飞瀑流水，跌宕起伏，振聋发聩；又像一首高屋建瓴、犀利无比的战斗檄文，具有一种拔山盖世、摧枯拉朽般的雄浑气势，读罢令人不禁心潮澎湃，荡气回肠。它在开篇这样写道：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出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宣言》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证明了资产阶级的失败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合乎历史规律的。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它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不断成长壮大，并最终推翻封建主阶级的统治，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进步的作用。但是，这个阶级本身带有严重的局限性。它用资本家的剥削代替了封建剥削，用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代替了封建宗法关系和伦理道德，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使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劳动从属于资本，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工人阶级陷入了赤贫如洗的状态，生产资料和财产日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

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空前繁荣的表象下面却蕴含着深刻的矛盾，特别是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严重困扰着资本主义社会，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冲突，并引发了社会的竞争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这些情况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已经不能包容它所造成的社会财富了,而这一矛盾是不可能由这个社会本身加以解决的,社会化的大生产要求改变现存的占有方式,即要求废除私有制,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公有制度取而代之。因此,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

《宣言》论证了阶级斗争对于推动人类历史前进所起的作用和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自动消亡的,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摧毁这一社会制度。他们认为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阶级斗争一直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成了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奴隶,处于受剥削压迫的社会最底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抗构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只有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工人阶级集中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这种状况不仅培养了他们的组织纪律性,而且使他们最易于团结起来与敌人战斗;他们与社会化的大生产相联系,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具有远大的

政治眼光；受剥削压迫的处境又使得他们成为最彻底的反资本主义战士；他们自身一无所有，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并最终消灭人对人的剥削压迫。

《宣言》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并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某些基本特征做了较详细的描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尖锐的矛盾斗争，这一斗争在最初阶段采取了自发的暴动和捣毁机器等方式。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日益成熟，他们开始联合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最后必将发展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权利，然后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使全部生产工具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宣言》中虽然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但已经较系统地论述了建立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进行了描述，他们认为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剥削和社会奴役将被消灭，民族压迫、殖民统治和战争也将消失。物质生产达到真正的繁荣，生产力获得高度发展，劳动不再为少数剥削者发财致富服务，而是为

了所有人的幸福服务。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将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对立将被消灭,妇女同男子一样自由平等地发挥她们的才智。婚姻也不再是金钱交易,孩子们生活在幸福的环境之中,全社会都关心他们的教育和前途。共产主义社会体现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原则,人们享受到真正的自由,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一致,等等。

《宣言》还深刻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重要性和历史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组建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政党,阶级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完成夺取政权和改造社会的历史重任,共产党始终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宣言》中写道:“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夺取政权。党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剥削和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共产党人要善于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

益结合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农民和其他劳动阶层结成同盟,同时坚持共产党人的独立性,决不放弃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

《共产党宣言》具有划时代的不朽意义,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资产阶级的庸人们一直把资本主义宣扬成自由、平等、博爱的永恒社会,而这本书却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个社会描绘成一座阴森可怖的地狱,人类罪恶的渊藪,并大胆地预言:铲除这一罪恶制度的日子必将到来,而伟大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则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这样,全世界第一次听到了一个响彻寰宇的声音,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终于有了科学思想作为指导,并必将沿着通向人类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奋勇向前。因此,《共产党宣言》不仅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战斗纲领,而且至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20多年之后马克思写道:“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列宁则指出:“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

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恩格斯都是 30

岁左右的年轻人,全世界还处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共产主义被各国政府当作“幽灵”遭到驱逐。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却不畏强暴,向整个旧世界发出了庄严的宣战。这篇充满了科学和献身精神的战斗檄文鼓舞着各国无产阶级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底层挺立起来,举起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与农民等劳动阶层联合起来战斗,使所有的旧势力都在他们面前惊恐不安,瑟瑟颤栗。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告的:“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一个多世纪以来,《宣言》一直像灯塔一样指引着国际无产阶级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奋勇前进。

第十六章

革命风暴

当时只有上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各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层文武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虽然暂时赞助自由主义反对派，但已在以异常的方式议论着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

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時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以后，欧洲各地的工人运动空前活跃，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在的布鲁塞尔和巴黎等地区，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同盟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所有这些都使得各国的反动统治阶级感到惶恐不安。于是，他们派出警察和便衣对同盟的活动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并企图寻找机会对同盟的领导人进行政治迫害。

1847年12月的最后一天，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们召开了一次盛大的除夕宴会，庆祝和总结过去一年中工人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恩格斯在宴会上发表了即席演说，用充满激情和深入浅出的语言向与会的工人和手工业者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探得这一消息后，法国政府立即以“煽动反对政府”为借口向恩格斯发出通知，限令他在三天之内离开法国，否则便将他遣送到普鲁士去。警察还于当

天夜里对恩格斯的住宅进行了彻底的搜查,想找出加罪于恩格斯的证据。但由于恩格斯早已有所防范,他们的这一企图未能得逞。就这样,恩格斯被迫离开巴黎回到了布鲁塞尔。

法兰西人一向以热情好客闻名于世,他们骄傲地把巴黎称作世界的“万都之都”,说它是流亡者们的“第二祖国”,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在这里都会受到公平友好的对待,聚首言欢。但如今,它却粗暴无礼地把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人逐之门外。顷刻间,人们煞费苦心编织起来的美丽神话被统治阶级的暴行彻底打碎了。

就在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突然爆发了。1848年1月12日,革命首先从意大利的巴勒莫开始,很快蔓延到邻近各国,不久就波及到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

为什么欧洲各国几乎在同一个时期爆发了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革命呢?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场革命之所以发生,在各国有一些不同的具体原因,但从总体来看,革命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化所引起的,同时也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当时在欧洲各国发展十分迅速,工业资产阶级随着实力的增强要求扫除一切

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并获取政治统治权力，无产阶级也形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是，当时许多欧洲国家还保存着封建制度或浓厚的封建残余，有些国家还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这种极度不适应是导致革命最终爆发的主要原因，而 1845—1848 年爆发的席卷全欧的农业灾害和经济危机则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 1848 年欧洲革命中，法国革命的进程表现得最为激烈和曲折动荡。在 1848 年 2 月，法国的巴黎爆发了“二月革命”，这次革命是七月王朝的反动统治和法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状况相矛盾的一个必然结果。

1830 年爆发的法国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复辟王朝的统治，建立起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国王的七月王朝。七月王朝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上层——金融贵族集团的利益，所以它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具有反动腐朽的性质。例如，它使金融贵族集团操纵了法国的政权和国民经济，并利用苛重的赋税残酷剥削广大劳动阶层和中小资产阶级，同时还疯狂地镇压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1831 年和 1834 年的两次里昂工人起义就是在他们的血腥镇压下失败的。面对这种局面，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日益成长起来的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十分迫切地要求立即进行改革,从根本上扭转国家的现状。

但是,随着 1840 年基佐内阁的上台,七月王朝的历史翻开了最黑暗腐朽的一页。基佐内阁采取了一系列极其保守的措施,严厉地压制人民大众的改革要求,结果导致了国内矛盾的日益尖锐化。而就在这一时期,法国经济也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农业欠收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不断袭扰着法国,并造成了社会的急剧动荡。法国的阶级矛盾迅速激化,革命的形势成熟了。

1848 年 2 月 22 日,巴黎人民高举着象征革命的三色旗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大街小巷里响彻了雄壮有力的《马赛曲》的歌声:

发抖吧,暴君!
你这个梦想逃亡的叛逆,
你专搞卑鄙的阴谋,
你就是要在惩罚面前战慄。
我们法国人个个是英雄,
祖国的声音在召唤我们,
我们前仆后继,勇敢战斗,
要压倒一切敌人。
公民,武装起来! ……

当天夜里，充满革命激情的巴黎群众迅速武装起来，他们砍倒了4000多棵街树，构筑起1500多座街垒，准备抵抗政府的镇压。23日，和平示威变成了大规模的武装对抗。24日，国王路易·菲利浦看到大势已去，签署了逊位诏书后匆忙地逃往英国去了。很快，武装群众占领了土伊勒里宫，把路易·菲利浦的宝座扔到巴士底广场上纵火焚烧。就这样，七月王朝垮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起来。

法国二月革命是一个信号，在它之后，革命浪潮迅速波及到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波希米亚、德意志南部和中部各邦，很快就具有了全欧洲的规模。

听到革命爆发的消息，马克思并未感到惊愕，因为他早就预测到了革命即将发生，并在事先从一个巴黎朋友雅克·昂克尔^①那里得到了巴黎人正在酝酿起义的情况，他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到来了，人民群众

^① 雅克·昂克尔，一个德国革命流亡者。二月革命后被任命为土伊勒里宫的警卫队长。革命前他正在巴黎，介入了二月起义的筹备工作，他把这一消息通知了马克思。接到这一情报后，马克思于起义前五天离开了偏远的郊区，搬到了市中心居住。

将在这场伟大的革命风暴中横扫旧世界的一切污泥浊水,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也将得到全面检验和进一步发展。

革命的风暴很快就吹到了比利时,各界进步人士纷纷行动起来,投入到火热的民主运动之中。布鲁塞尔的主要街道上挤满了激动的人群,有人在那里进行大胆的革命演说,还有许多人在酒店和咖啡馆里进行热烈的讨论,纷纷主张立即废除君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是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女婿,是一个既顽固守旧又老奸巨滑的政客。面对汹汹而来的革命浪潮,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防止自己垮台。他召集资产阶级议员们前来开会,以一副虔诚可怜的面孔宣布,如果人民要求他下台的话,他将马上逊位,并许诺将给予人民民主和自由。他的这套骗子伎俩发生了戏剧般的效果,这些议员们竟然反过来安慰国王,表示自己绝对没有“逼宫”的野心。这场闹剧刚刚演完,利奥波德就派军队驱散了布鲁塞尔街头的民众,并对外国革命流亡者进行严密的监视,想方设法把他们驱逐出境,威廉·沃尔弗就是在这时期被驱逐的。布鲁塞尔警方甚至对各个咖啡馆和酒店老板发出了警告,不允许革命流亡者在这些场合集会。

面对反动派的淫威，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为所动，他们照旧举行集会，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这时期，马克思刚刚得到了父亲的一笔遗产，他立即捐献出几千法郎去购置军火，以便武装工人阶级。对于马克思的这一举动，燕妮是完全赞同的，虽然她已饱尝了贫困生活的煎熬，很希望改善一下家庭的现状，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但为了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她认为做出这点牺牲是非常值得的。

2月27日，马克思得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通知，得知中央鉴于欧洲的革命形势，决定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转交给布鲁塞尔区部。这样一来，领导这场革命的重任实际上就落到了马克思和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的肩上了。接到通知后，马克思立即召开布鲁塞尔区部会议，商讨当前的局势和需要采取的行动。

形势的剧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系列活动深深刺激了比利时当局，他们立即采取了断然措施，逮捕了若干名同盟的盟员和革命流亡者。此时布鲁塞尔的局势已经不允许同盟公开进行革命活动了，所以布鲁塞尔区部以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指示马克思离开布鲁塞尔，到巴黎去建立新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全欧洲的革命。

正当马克思准备离开布鲁塞尔时，突然于3月3日接到了比利时政府的驱逐令，勒令他在24小时之内离开比利时。

当天夜里，前来送行的朋友们已经离去了，马克思正在忙着收拾行装。突然，一阵急促的枪托撞门声打破了午夜的沉寂。十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察违反夜间不得擅入民宅的法律，破门而入，并以马克思没有身份证为借口逮捕了他。其实，马克思不仅拥有当局允许他在此地居住的法律文件，而且还向警方出示了刚刚收到的当局的驱逐令，但这些都无济于事。

全家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惊慌失措。燕妮气得哭了起来，琳蘅愤怒地用围裙遮住了脸，大声咒骂警察，三个幼小的孩子被吓得又哭又叫。只有马克思仍然那样镇定自若，竭力地劝慰全家人。最后，他深情地吻了三个孩子，轻声鼓励了琳蘅几句，与燕妮紧紧地拥抱后，毅然走出了房门。

此时天正下着蒙蒙细雨，马克思昂着头走在警察们的前面。布鲁塞尔的雨夜是那么美丽神秘。月亮从遮掩它的乌云后面透露出几许微明，给山川大地涂上了一层斑斓陆离、若明若暗的诡谲色调，巍峨壮丽的宫城、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建筑的尖顶、气势雄浑的大钟楼和在微风细雨中瑟瑟发抖的菩提树的身影，这一切都在夜幕中时隐时现，飘飘渺渺，使雨夜

中的古城显得更加妩媚动人,如梦如幻。马克思回过头去,向着他居住的那间老屋告别,心中不禁波澜起伏,浮想连翩。

“卡尔,我不能没有你!”

随着一声凄婉哀伤、令人心碎的呼叫,燕妮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家门。她使出全身的力气推开了警察,拼命抓住了马克思的一只手,仿佛这样就能把他救回来似的。但很快,他们就被警察粗暴地分开了。

在凄风苦雨之中,燕妮连夜在全城到处奔走,一家一户地寻找那些相识的熟人,急切地恳求他们帮助营救马克思。

清晨时间,一个警察突然抓住了燕妮,以“游荡罪”为名把她投入了监狱,与一些妓女和流浪的女人关押在一起。那一夜燕妮是在极度的焦虑和恐惧之中度过的。她在事后写道:“……突然一个哨兵抓住了我,也把我逮走并关进黑暗的牢狱。那是收容无处栖身的乞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不幸的被遗弃的女人的地方。有人把我推进一间黑屋。我抽泣着走了进去,里面有一个不幸的女难友把她睡的床让给了我,那是一张很硬的木床,我就倒在上面。”

燕妮不知道,就在她坐牢的这天夜里,马克思和一个狂暴可怕的疯子被关押在同一个监牢里!

第二天,警察对马克思夫妇进行了严厉粗暴的

审讯,但一无所获,也未能找到任何所谓的“罪证”。反动当局对马克思的迫害,特别是对燕妮粗暴无礼的举动激怒了广大群众和进步人士,他们纷纷对当局的专横行为提出强烈的抗议和指责。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马克思夫妇很快就被释放了,政府还被迫把逮捕他们的警官撤了职,但对马克思的驱逐令仍然有效。

就在这时,马克思接到了法国临时政府发来的一封友好的邀请信,欢迎他到法国去居住。信中写道:

“勇敢正直的马克思:

暴政把您驱逐了,自由向您召唤,法兰西向所有为神圣事业和各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斗争的人们敞开着大门。”

3月5日,马克思携家小一同来到了巴黎。

此时的巴黎革命的硝烟刚刚散尽,街道上还依稀可以见到战争留下的累累伤痕,王宫和土伊勒里宫等高大建筑物上飘扬着革命的象征——三色旗和红旗,白色的自由神像矗立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人们还在兴奋地谈论着革命,憧憬着美好幸福的未来。草木已经复苏了,大地散发出勃勃的生机,温暖的早春滋润美化了巴黎,而革命的风暴则使这座千年古城又一次焕发了青春,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巴黎街头上

不时出现盛大的游行队伍，处处可以听到《马赛曲》那雄壮激越的旋律：

前进，法兰西祖国的男儿，
光荣的时刻已来临；
专制暴政压迫着我们，
祖国大地在痛苦呻吟。
你可看见那凶狠的士兵，
到处在残杀人民？
他们从你的怀抱里，
夺去你妻儿的生命。
公民，武装起来！
公民，决一死战！
前进，前进！
万众一心，
把敌人消灭净。

初来巴黎时，马克思曾在新麦尼尔蒙坦街 10 号暂住了几日，后来又搬至格腊蒙街 1 号居住。但马克思一家具体住在什么位置上，史学家们很长时间未能查清。根据马克思这时期发出的一些信件来看，他们的确切住址应是“格腊蒙街 1 号‘曼彻斯特’饭店”。但人们后来在探寻马克思遗迹的时候，却从未

发现这座饭店的踪迹。后来才弄明白，这座“饭店”实际上是警察局的一些办公机构，当时的局长科西迪耶尔先生是马克思的朋友，是他把马克思等人安顿在这里的。而“曼彻斯特”则很可能是恩格斯给它起的雅称，因为在此之前，只有恩格斯与那座城市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他又是一个非常幽默风趣的人。

于是，格腊蒙街 1 号“曼彻斯特”饭店成了各国革命者汇聚和工作的一个重要地点。

来到巴黎后，马克思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与同一时期来到巴黎的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和沃尔弗等人组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主席，沙佩尔出任秘书，瓦劳、沃尔弗、恩格斯、鲍威尔和莫尔等人当选为委员。在马克思催促下，恩格斯也于 3 月 21 日从布鲁塞尔来到了巴黎。

在巴黎，马克思和燕妮与他们当年的老朋友海涅、海尔维格等人重逢了。但这次重逢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愉快的印象。

由于家族内部围绕财产问题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纠纷，海涅得了重病，瘫痪在床已有多年了。他的夫人玛蒂尔黛是个轻浮的坏女人，只对钱袋和饲养的鸚鵡感兴趣。海涅没有贴心的知己，又丧失了写作能力，晚境十分孤寂凄凉。在探望这位缠绵病榻的

老友时,马克思夫妇的心情格外沉重。他们知道,这位才华盖世、浪漫狂放的诗人已经在贫病和社会的重压之下垮掉了,他生命的航船已经走到了尽头。

马克思来到巴黎后不久就与海尔维格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并导致了他们之间友谊的破裂。由于1848年欧洲革命来势迅猛,许多国家的革命都取得了胜利,给人以极大的振奋和效舞。在巴黎的许多革命流亡者被胜利的消息冲昏了头脑,他们想组织“革命义勇军”回去解放自己的祖国。海尔维格和原《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辑伯恩施太德在这股狂潮中起了领头羊的作用,他们在马克思到巴黎之前就开始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许多流亡者在巴黎处于失业状态,很想随“义勇军”打回祖国去,法国临时政府也想乘机把这些人赶走,所以对“义勇军”的行动在物质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马克思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他认为:这种“输出革命”的做法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危害性,这些缺乏装备和训练的队伍一旦开进自己的国境,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于是马克思立即行动起来,多次主动与海尔维格等人交涉,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希望他们立即停止错误行动,以免给革命事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一天，马克思又与海尔维格就组建“义勇军”一事进行了认真的谈话。

“我希望立即把所有的德国流亡者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军团。”海尔维格以他那特有的诗人气质狂热地向马克思兜售他的“惊人计划”。“我们可以一起来领着他们东进，越过国境线。在革命力量的沉重打击下，容克地主和国王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在德国发生骚动的时候侵入德国，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马克思严肃地反问道。“这意味着破坏德国的革命。外部力量的介入只能加强德意志封建统治阶级的力量，而我们的义勇军则会被德国的正规部队迅速地摧毁！”

“卡尔，你怎么变得这么怯懦了！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不能单凭头脑活着。”海尔维格不耐烦地打断了马克思的话，他开始怀疑马克思对他的事业有妒嫉心。

“人如果失去了头脑，就会变成一只没有脑袋到处乱撞的苍蝇。”马克思不失时机地开了一个小玩笑。

“我是说人是应该有一点冒险精神的！”海尔维格强词夺理的辩解道。“再说法国当局也支持我们的行动，他们答应每个士兵每天可以得到 50 生丁的饷钱。”

“革命不是商品，它是不能随便输入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以一种坚定的口吻告诉海尔维格。“法国政府为什么这样殷勤？因为法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失业现象，他们想借机摆脱掉这些竞争的劳动者。而我们最优秀的工人兄弟将会在德法边境上被国王们的正规军轻而易举地消灭掉！”

看到说服不了海尔维格，马克思等人只好采取行动了。他们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德国工人俱乐部，把大批德国工人流亡者团结起来，向他们宣传无产阶级正确的斗争策略，劝告他们不要参加“义勇军”的冒险计划。马克思等人的宣传使一部分人觉醒了，他们退出了“义勇军”，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

但是，仍有一部分工人参加了“义勇军”。不久，这支只有数百人、装备简陋的队伍出发了。他们举着革命的红旗，高唱着响亮的战歌，雄赳赳地跨过了莱茵河，走在最前列的是身穿战斗服装、骑着高头骏马的诗人统帅海尔维格。正如马克思所料，部队刚进入巴登境内就遭到了敌人正规军的毁灭性打击，几乎全军覆没。海尔维格在夫人的帮助下躲在一只木桶里才逃过了这场劫难。后来，他们装扮成短工逃到瑞士去了。

海尔维格等人的左倾盲动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为了消除他们造成的恶劣影响，马克思

等人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并向各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和成员发出信息,要求他们同这股错误潮流划清界限,避免出现重大的失误。在这方面,燕妮帮助马克思做了不少工作,向欧洲各地寄发了许多信函,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主张。她在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写道:

“……他(指马克思——作者注)让我请你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报》上发一个通讯:在这里成立了几个德国团体,其详情吕宁先生知道。但旅居伦敦的德国人沙佩尔、鲍威尔、莫尔和旅居布鲁塞尔的德国人马克思、沃尔弗、恩格斯、瓦劳、波尔恩所领导的德国工人俱乐部同伯恩施太德、海尔维格、福尔克、德克尔等人领导的德意志民主协会毫无共同之处……有必要向法国和德国表示坚决同这个团体划清界限,因为它将会使德国人丢脸。

本来还想告诉你一些这里不断变化的有趣的运动情况……但我还要料理家务并照顾三个小家伙,忙得团团转,只得抽这点时间,从远方向你和你亲爱的夫人衷心地问候。

致以兄弟般的敬意

你的到处流浪的女公民

燕妮·马克思

此时，欧洲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1848年3月，德意志联邦境内也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发生了大规模武装起义，反动的梅特涅政权被推翻了，哈布斯堡王朝被迫同意改组内阁，召开国民议会，制订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

3月18日，柏林也爆发了武装起义。在黑、红、黄三色旗的指引下，手持棍棒、刀剑和枪枝的人民群众同政府军展开了激战。次日早晨，被击败的政府军灰溜溜地撤离了柏林。人民胜利了，鲜花、彩带和红旗飘扬在柏林上空。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国王威廉四世携王后走上王宫的阳台，向死难的革命烈士脱帽致哀，并保证给予资产阶级政治权力，促进国家的统一事业，撤消对德国革命者的通缉令。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革命取得的重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但同时他们也清楚地看到了三月革命后德国的新形势：以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为首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上台组阁后，同保皇派勾结起来，共同与无产阶级为代表的进步势力相对抗。面对这种紧张局势，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立即组织了几百名德国工人流亡者逐个返回德国，以便推动国内的革命运动深入进行下去。

马克思认为德国革命绝不能就此止步,只要大地产不被消灭,各个封建邦国不被推翻,国家分裂的局面不消除,德国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就有重新丧失的可能。为了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领导工人阶级沿着正确的革命道路前进,当务之急是制订出共产党人在这场革命中的纲领、战略和策略。而要起草这样一份文件必须对当时的历史背景作出恰如其分的估价。

那么,当时德国的形势如何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当时的德意志实行的是封建专制统治,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全德境内分布着大小 38 个邦国和 4 个自由市,它们划地为牢,各自为政,造成了各地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的巨大差异,阻碍了商品的流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同时,封建贵族仍拥有许多特权,控制着国家机器,他们顽固地维护旧的封建关系,镇压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但是在 19 世纪上半叶,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已经日益壮大,人民大众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也蓬勃兴起。这种社会状况决定了 1848 年德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实现国家的统一则成为德国革命最主要的任务。

根据当时德国的这种历史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的几天里共同起草了一份文件,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审阅后正式印刷出版,它的标题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该文件一共有17项条款,其中第一款规定:“全德国宣布成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把这一条款列在第一位,显示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历史和德国革命性质的深刻理解。

纵观《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其基本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

《要求》的第一部分指出了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推翻封建制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例如: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建立代议制国会,实行普选制;议员拥有薪金,以便工人代表能够参加议会;建立人民的武装力量;实行政教分离和普及国民教育;废除封建义务,等等。

《要求》的第二部分提出了一些过渡性的革命要求,其目的在于将民主革命推向胜利,并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内容包括:没收各邦国君主的封建领地和其它封建性地产为国家所有,把矿山、矿井、银行和交通运输工具收归国有,组织大规模农业生产,限制继承权,实行高额累进税,建立国家工厂,消

除失业现象,限制资本的增长,等等。

文件最后还向德国人民发出呼吁:“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必须尽力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了这些措施,一直受少数人剥削,并且今后还有可能受少数人压迫的德国千百万人民,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政权。”总之,只有实现了《要求》中所列举各项条款,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为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制度的锁链下面解放出来创造有利的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主要任务和目的。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一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重要文件,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具体行动纲领。这份文件发表后立即被欧洲各国许多刊物转载,并且在德国各地广为流传。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把这份文件和《共产党宣言》赠送给那些回德国参加革命的盟员,这两本小册子所激发出的革命力量具有比任何武器都更为强大的威力。

1848年4月初,马克思离开了巴黎,返回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德国。

屈指算来,马克思离开故土已经将近5年了。在这期间,去国怀乡之愁时时萦绕在心头。他曾经无

数次想回故乡看一看，也曾为自己的儿女成了异国的公民而感到悲哀。但由于普鲁士当局对他下达了通缉令，所以德国在他的心目中总是显得那样虚幻飘渺，如同海涅所说：是一种“遥远的爱”。

如今革命爆发了，他终于在这个鲜花盛开的季节里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他又听到了亲切的母语，看到熟悉的山川大地和久违了的亲朋故旧，这里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使他感到亲切，令他流连忘返。但是，他没有时间去慢慢地品味这种游子归来的美妙感受，也无暇携妻子儿女去故乡寻根问祖。他必须迅速地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为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和她的人民而勇敢地战斗。此刻，他的脑海中蓦然闪现出莎士比亚笔下的一句台词：

“我重视祖国的荣誉，甚于自己的生命和我所珍爱的儿女。”

恩格斯是与马克思一块回到德国的。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安排下，同时期还有 500 多名革命者逐个返回了德国，他们要到那里去亲身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为了工作方便，马克思安排燕妮和琳蕙带着孩子们去老家特利尔暂住。

特利尔虽然远离革命的中心地区，但革命风暴在这里也掀起了重大的波澜。到处可以看到举着三色旗和戴着三色帽徽的革命者，而许多青年人则参

加了由民主派组织的市民保卫团，手持武器在街头巡逻，广大市民的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燕妮过去就是这里引人注目的女性，她在革命高潮时期回到故乡自然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受到尊重，人们时常向她打听马克思的消息和各地革命斗争的动态。燕妮当然很同情家乡人民，但她并不愿在特利尔久留，她觉得这个时候丈夫最需要她。因此她决定：只要马克思有了较稳定的住所，她就立即回到他身边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行于4月7日到达了美因兹，在这里逗留了几天。在决定回德国之前，马克思派遣同盟中央委员卡尔·瓦劳来到美因兹（瓦劳是当地人），指示他用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教育工人群众，并设法把他们组织起来参加革命。4月5日，瓦劳等人以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的名义发表了呼吁书《告全体德国工人书》，号召在全德范围内建立工人联合会，其任务是团结全体工人阶级，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马克思、恩格斯来到美因兹后，立即就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和今后的行动等问题进行了磋商，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应该是这个组织的核心力量。

但是，马克思认为美因兹并不是他们的久留之地。原因是这里过于偏僻，与德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和工人组织联系起来很不方便,不利于他们对全德范围内的革命运动进行观察和指导。通过一番选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伦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科伦是莱茵省的省会,工业发达,无产阶级的力量比较雄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里建有支部,而且这里有一定的出版自由,五年前马克思曾在这里编过《莱茵报》,在当地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些都是开展革命活动的有利条件。就这样,他们决定把科伦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政治中心,于是他们来到科伦居住了下来。

来到科伦后,马克思立即向市政当局申请获得在当地的居住权。很快,申请被批准了。不久,燕妮带着三个孩子辗转来到了科伦。他们在科伦老城的一条狭窄的街道——塞西利街找到了一处简单清静的住房,全家人在这里安顿了下来。又过了一段时间,马克思的朋友帮他把留在布鲁塞尔的家当——餐具、衣物、其它日常用品,其中最贵重的要属马克思珍藏的书籍——搬运到这里。于是,这套小小的居室里又传出了全家人欢快的笑声,充溢着家庭生活的脉脉温情。这里距离科伦工人集会的场所很近,马克思和燕妮随时可以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

第十七章

《新莱茵报》

今朝前往杜塞尔多夫，
我与一位尊贵的枢密顾问同行，
一路上他恶语咒骂，
对《新莱茵报》忿忿不平。
——格奥尔格·维尔特

为了巩固同盟的各个地方支部，并在同盟的支持下在全德范围内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肩负起

领导革命的任务,马克思早在巴黎期间就派遣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如瓦劳、维尔特、波尔恩和沃尔弗等)和数百名工人奔赴德国各地开展工作。马克思和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迁居到科伦后,又派遣了一批特派员到德国的各个大城市去进行革命活动,例如,沙佩尔到美因兹和威斯巴登,德朗克到科布伦兹、卡塞尔、法兰克福等地,沃尔弗到布累斯劳,恩格斯则到了爱北斐特和巴门。

但后来反馈回来的各种信息表明,德国工人阶级此时还处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严重影响之下,还未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工人运动内部在如何对待革命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斗争,因此他们还认识不到建立一个独立的、不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即使有少数觉悟的工人和同盟盟员在各地积极进行活动,但由于他们人数少,与同盟中央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因此不能担负起领导运动的重担。另外,由于革命形势瞬息万变,革命斗争的发展很不平衡,所以同盟中央也很难对各地区的革命运动进行具体的指导。

这种形势向马克思提出了十分严重的问题——共产主义者同盟如何领导这场革命?它运用什么方式及时向各地盟员和工人革命者发出指示呢?

马克思认为,鉴于当前复杂多变的斗争形势,同

盟中央不可能向每一个地区发出具体的指示,只能给予全国的盟员和革命者以一般性的指导。在这种情况下,创办一份日报是执行这一任务的最好办法,因为当时只有报纸能够及时地把同盟中央的精神和各种消息传递到各地去,从而充当同盟中央的宣传喉舌,与各地区的革命运动建立起频繁的、积极的联系。

但是办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创办一份大型的日报困难就更大了,不仅需要强大的编辑力量和一定外部条件,还要花费相当一笔资金,在那种动荡不安的革命年代里,创办报纸就更难了。但为了促进革命事业的迅速发展,马克思毅然承担起了这项异常艰巨的工作。

这一时期,科伦地区的民主派人士正在筹办一份讨论研究地方事务的报纸,并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马克思闻讯后前去与他们交涉。经过一整天循循善诱的说服工作,这些人同意由马克思接手创办这份报纸。为了强调这份报纸要继承老《莱因报》的战斗精神和光荣传统,同时也指出两者之间的区别,马克思为它取名为《新莱因报》。由于马克思有很高的威望,在办报方面又是行家里手,所以很快就确定了办报方针和纲领,并落实了编辑和出版发行等工作。

但此时，他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缺乏资金。

由于马克思此时已是一位闻名欧洲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大多数资产者对他畏之如虎，不愿向他提供资金，就连过去《莱因报》的老股东们也纷纷退避三舍。老《莱因报》的后台老板、大资本家汉泽曼此时已当上了财政部长，与他的朋友——现任首相康普豪森共同掌握着普鲁士的国家大权，他们认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应该终止革命。因此他们对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持强烈的仇视态度，想方设法阻止他们创办革命报纸。

向谁去筹资呢？《新莱因报》的支持者同盟盟员和工人阶级大都一贫如洗，从他们手中得到的钱是很有限的。

马克思等人对这种局面研究后决定，采取招股办报的方式，遂派出许多人到全国各地去招股。但这项工作进展得很不顺利，派出去的人只筹到了很少的一笔钱，许多资产者表面上很激进，其实骨子里对革命恨得要死，叫他们出钱是非常困难的。

为了筹款，恩格斯也急匆匆地返回了家乡，希望能从当地的朋友和亲戚那里得到一些支持，但结果却令他十分失望。有些人过去曾经慷慨激昂地侈谈革命，言行十分激进，但后来由于经营工商业变成了

资产者，便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宣传，根本不愿意出资办报。但最让恩格斯感到伤心的还是他父亲的顽固保守态度。

老恩格斯是一个殷实的资本家，过去虽然对威廉四世的专制统治颇有烦言，但其政治态度暧昧保守。自从康普豪森和汉泽曼组阁以来，他感到满意了，认为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政体，对于儿子从事革命运动很恼火，态度也很强硬蛮横。他对前来要钱的恩格斯说：

“你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分钱，我宁愿让您们吃一千颗子弹，也不会送给你们一千塔勒！”

但恩格斯并不气馁，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和革命信念，跑遍了巴门的各个地区，用令人信服的理由、非凡的口才和外交手腕去说服那些革命的同情者。终于，他找到了 14 名股东。

但一直到 5 月下旬，筹得的款项仍远远达不到办报的要求。最后，马克思只好把父亲遗产的大部分捐献出来，恩格斯也拿出了家庭给他的生活费，才使报纸勉强开印了。

1848 年 6 月 1 日，《新莱茵报》的创刊号在欧洲革命的暴风骤雨之中诞生了。

在创刊号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的反动保守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揭露和批判。他们指出：德国国

民议会中资产阶级代表的行为极其怯懦，他们把人民选出的权力机构变成了一个软弱无力的清谈馆。他们还大胆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一切主权归人民，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制定德国的宪法，消除现行制度中一切违背人民主权原则的东西。

创刊号的内容中充满了革命的战斗精神，像重磅炮弹一样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全欧洲的目光都在密切注视着它。广大工人群众和社会主义者为之感到由衷的兴奋和鼓舞，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也逐渐被吸引到革命阵营中来，而那些顽固的资产阶级分子们则感到愤怒和极度的恐惧。

一些资产阶级股东们被《新莱因报》的激进色调吓破了胆，纷纷要求退股。其中一部分人纠集起来，涌入报社编辑部，对工作人员横加指责，气极败坏地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这是欺骗！”一个股东火冒三丈地狂吼道。“我们拿出钱来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让你们剥夺我们的权利吗？这简直是在我们的床下放定时炸弹。”

面对这股汹汹而来的退股风，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表现得很坦然，似乎早已料到了这种事情终将发生。他们很快就为这些人办理了退股手续，但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作出一丝一毫的让步。为了使报纸能

够继续办下去，马克思又设法筹得了一笔资金。

一份大型日报应该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编辑队伍。但由于经费紧张，《新莱茵报》的编辑人员不多，其主要成员有：马克思、恩格斯、德朗克、维尔特和沃尔弗等。其中，马克思出任报纸的总编辑，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为副总编，沃尔弗担任秘书工作。马克思是《新莱茵报》的精神领袖和灵魂人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提出的主张“对我们来说都是理所当然和无庸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首先是由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使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

作为总编辑，马克思要负责确定报纸的纲领和原则立场，拟定每天的编排计划，选择各地寄来的稿件，同各地的通讯员和其它进步报刊进行联系，同时他还担负了一定的编辑工作和管理财务。马克思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办报人和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不仅把报纸的所有业务工作安排得井井有序，而且还经常亲自动笔撰写文章，一些重要的社论也出自他的手笔。

马克思非常善于用人所长，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可以说，他的编辑部里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各显神通。

恩格斯是军事和外交问题的专家，他和马克思

负责撰写最重要的论文,大部分社论也由他执笔。威廉·沃尔弗对德国农民阶级的情况和土地问题做过深入的研究,马克思让他写德国革命中农民的状况和土地问题等方面的文章。格奥尔格·维尔特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擅长写幽默的讽刺诗和优美的散文,马克思鼓励他用辛辣的笔去揭露普鲁士容克阶级反动顽固的丑恶面目。恩斯特·德朗克是个经验丰富的政论家,虽然他曾经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但马克思仍然给他以充分的信任,安排他写关于德国、波兰和意大利等国革命状况的报导和评论文章。德朗克没有辜负马克思对他的期望。

从1848年10月起,另一位著名的诗人菲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也加入了《新莱茵报》的战斗行列。弗莱里格拉特是马克思夫妇在布鲁塞尔时期的挚友,那时,马克思全家都非常欣赏他的诗作。来到科伦后,他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创作工作,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些充满战斗激情的不朽的诗篇,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也使他的创作生涯达到了顶峰。在战斗中,他与马克思一家结下了更为深厚的友谊。

此时,聚集在《新莱茵报》编辑部中的是一群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其中马克思30岁,恩格斯只有28岁),但他们大多已在革命斗争的风风雨雨中

经受了多年的磨练和考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增长了才干智慧，也锻炼出了坚韧的意志力。如今，他们把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全部奉献给了壮丽的革命事业，奉献给了《新莱茵报》。于是，这份普普通通的日报在他们手中变成了一座巍峨雄伟的革命堡垒。站在这里，人们可以俯看到全德国、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它的每一个字母都是一发复仇子弹，每一个版面都充满了战斗的激情。这些非凡的青年人个个才华横溢，胸怀大志，他们不仅仅是在破坏旧世界，他们是在为人类创造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而战斗。他们不愧为人民的骄子和时代的精英。

《新莱茵报》还有一个副标题——《民主派机关报》，许多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其中也包括马克思的一些亲密朋友。其实，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为贯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战略方针所制定的一项具体的斗争策略。

他们看到此时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无产阶级中的多数是手工业工人，处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深刻影响之下，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只有少数工人认识到了自己的地位和历史使命。从另一方面看，1848年欧洲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参加这次革命运动的阶级和阶层相当广泛，除了无产阶级外，还有广大的农民、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此这时还不具备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领导革命的条件。如果共产主义者同盟继续以秘密组织的状态存在下去的话，势必会陷入脱离现实的宗派主义的泥坑，游离于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之外。

有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新莱茵报》必须以民主派中的左翼——彻底的革命派的面目出现，联合民主派和其它社会阶层一起进行革命斗争。只有这样，才能结成广泛的革命同盟，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但是马克思又认为，《新莱茵报》与民主派的联合应该是有条件的，不能无原则地混为一谈。它应该保持其政治上的独立性和远大的政治眼光，它要比民主派的行动更为坚定彻底，在与民主派联合时要随时注意揭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始终为实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纲领而努力，因为它所代表的仍然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新莱茵报》也是这样做的，它始终贯彻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所提出的政治纲领——这实际上是一个民主主义的纲领，其基本要求是：实现德意志的统一，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当时的情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只能打着民主

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

为了贯彻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在民主派的旗帜下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德国的民主运动。一个时期以来，德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了大量的民主协会，参加协会的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有不少工人。马克思等人认为，民主协会是共产党人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通过在民主协会中的工作，不仅可以在政治上影响没有脱离民主派的工人群众，还可以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结成广泛的革命同盟，共同推动德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于是，马克思回国后不久就在科伦参加了民主协会。

在民主协会中，马克思等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他们主动团结广大民主派人士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并广泛动员工人群众和各界人士支持民主协会的工作。马克思等人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民主协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协会领导人和广大会员

的高度赞扬。

6月中旬,全德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大会做出了关于建立区域委员会的决议。在马克思等人的促动下,科伦的三个民主组织(科伦民主协会、科伦工人联合会和科伦工人与业主联合会)联合组成了莱茵区域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广大民主人士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齐心协力,为推动德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在关于德国革命的纲领和策略等问题上,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斗争。个别机会主义者总是找各种理由诋毁和反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正确主张,哥特沙克和波尔恩是他们中间两位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是一位著名医生,当时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委员,并担任着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等职务。此人在政治上没有确定的原则立场,常常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化而左右摇摆,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关于革命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方式等重大问题上。起初,哥特沙克曾劝导工人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以建立所谓充满人类博爱精神的乌托邦。后来他又主张超越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立即发动内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所谓的“工人共和国”,并反对无产阶级联合民主力量和广大农民阶级

一道进行革命,执行了一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另外,哥特沙克还采取了错误的宗派主义立场,号召工人抵制全德国民议会和普鲁士国民议会选举,结果使得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处于孤立状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哥特沙克的错误言行进行了耐心中肯的批评教育,希望他尽快改变错误立场,与广大同盟盟员和进步势力团结战斗。但哥特沙克等人一意孤行,1848年5月11日,他竟然威胁要退出同盟。为了顾全大局,防止科伦工人联合会脱离革命阵营,马克思没有公开与他进行论战,但坚持向工人阶级宣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正确方针政策。后来哥特沙克等人还是退出了同盟,自立山头,可耻地堕落在无产阶级的反对派。

斯蒂凡·波尔恩是1848年革命爆发后成立的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和“工人兄弟会”的主席,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波尔恩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工人阶级应该把注意力放到日常的经济需要上来,无须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他把社会革命简单地归结为工作日的长短和工资问题,并认为:“这些问题都可以和企业主协商解决。”

波尔恩的思想是路易·勃朗和蒲鲁东主义的大杂凑,在工人阶级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马克思和

恩格斯对波尔恩的错误说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他的思想妨碍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政治觉悟的提高。

《新莱茵报》自诞生以来始终高举革命民主主义旗帜,对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给予了大量的宣传报导和强有力的支持。它坚定地站在广大革命人民一边,鼓舞他们对封建专制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对于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法国巴黎六月起义的宣传报导就是典型的事例。

法国二月革命后,工业资产阶级篡夺了国家政权,执行了一系列仅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内外政策,于是,巴黎无产阶级决心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社会共和国”而斗争。这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遂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阴险狡猾的资产阶级政客们做了一系列准备,例如,排挤临时政府中的工人代表,组织反革命武装“别动队”,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等等。在做好准备工作之后,他们便立即向无产阶级发起了进攻。他们把工人代表驱逐出政府,解散了国家工厂,使几十万人成了流落街头的失业者,并且任命屠杀北非人民的刽子手卡芬雅克

出任陆军部长，调集重兵进入巴黎，准备打击无产阶级。

工人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逼入了绝境，如果不想饿死，只有起来进行反抗。

6月22日，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走上了街头，高呼“全部企业社会化”、“打倒剥削制度”和“如果没有工作，不如战斗而死”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23日，和平示威转变为武装起义。面对20多万装备精良的政府军的疯狂进攻，4万多只有简陋武器的起义者进行了殊死的抵抗。

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巴黎全城到处是猎猎的红旗、战斗的号角以及呼啸的子弹和爆炸声，工人阶级以视死如归的精神英勇战斗着，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有的人把妻子儿女也带到了战场，他们觉得与其养活不了她们，不如一块儿为正义事业而战死。在一个街垒上，一位妇女高举着象征胜利的红旗，鼓舞工人兄弟们勇敢作战。突然，随着一声罪恶的枪响，这位妇女倒在了阵地上。顷刻间，街垒中又冲出一位妇女，继续举起这面沾满鲜血的旗帜，子弹又击中了她，另一位妇女又挺身而出。巴黎街头上，工人阶级的鲜血流成了河，他们与反动军队浴血奋战了整整4天，并曾一度占据了绝对优势，攻打到了市政厅附近。但在政府军重兵围剿和强

大炮队的狂轰滥炸之下，起义最后被淹没在血泊之中。

几万优秀的工人牺牲了。他们有的是阵亡在激烈的街垒战中，有的是被俘后遭残酷折磨而死的。资产阶级用它令人发指的兽行给工人阶级上了生动的一课。

马克思在二月革命之后就曾经预言：法国社会内部的劳资矛盾必将日益加剧。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六月起义进行期间，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一刻也不离开编辑部，始终以极大的热忱注视着从法国传来的各种消息。恩格斯连续写了几篇文章，论述了起义的性质、力量对比状况和军事进程等问题。

六月起义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激动悲愤的心情在《新莱茵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对起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真正的阶级大搏斗，它告诉人们一个事实：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还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巴黎工人的英雄壮举，对杀害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刽子手进行了无情的鞭笞，把他们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工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英勇精神真是

令人惊叹，”恩格斯激动地写道。“……工人被击溃了，并且大部分被残酷地消灭了。……但是历史将给他们以特殊的地位，把他们看作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决战的牺牲者。”

马克思则用他的如椽巨笔深刻地揭示出了这次起义的根本性质和社会含义。他写道：“这就是 fraternite，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昭示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fraternite）。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

在革命期间，科伦的政治局势始终是动荡不安的，马克思的家庭生活同样也很不安宁。

马克思的工作负担很重，他常常一连几天几夜泡在报社里，或者外出从事危险的革命活动，有时甚至音讯全无，生死未卜。在这种时候，燕妮不仅要独自承担起维持家庭和扶养孩子的重任，还要做好各项革命工作，其艰辛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每当马克思回到家里，全家人都快乐极了，尤其是三个孩子，他们常常把爸爸包围起来，抓住他的手欢呼雀跃，亲热不已。但现在，马克思却根本拿出时间来与他们嬉戏玩耍——他要做的事情简直太多

了,而且件件都那么紧急。马克思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后半夜:研究来自欧洲各国的报道和消息,召开各种会议,接待来自全德和国外的革命者,日夜不停地写文章……

在这火热的岁月里,马克思的家是一个战斗的司令部。但同时,这里又是一个充满友爱和温暖的革命大家庭,对于那些英勇的革命战士们来说,它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在这里,他们就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随意而舒心。他们时常欢乐地聚集在这里,热烈地讨论目前的革命斗争和美好的前景,毫无顾忌地倾诉他们对反动派的痛恨和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之情。有时,这些四海漂泊的铮铮铁汉们还动情地讲述自己的私人生活和各种忧虑烦恼,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夫妇永远是最值得信任和尊敬的忠实朋友。除了《新莱茵报》的主要工作人员外,经常来这里聚会的还有:沙佩尔夫妇、约瑟夫·莫尔和他们在科伦结识的新朋友——坚强忠诚的革命家罗特兰·丹尼尔斯医生。

但是,这些革命者在科伦聚首言欢的时光是有限的,因为此时,他们正面临着十分艰难危险的战斗:自从巴黎六月起义失败后,欧洲的形势开始恶化了。

六月起义的失败,对于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的革

命进程都发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它是 1848 年至 1851 年欧洲革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欧洲各国的反动势力感到他们东山再起的时机到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反动派乘机开始酝酿对革命进行反攻,而资产阶级则卑鄙地出卖了曾经与他们一起进行战斗的广大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

在德国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反动势力的逆转,各邦的反动集团开始对参加革命的阶级和阶层公开采取进攻的态势,甚至对资产阶级自由派也不能容忍。

在巴黎六月起义之前,普鲁士的反动势力就向康普豪森的自由派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并迫使其辞职,由奥尔斯瓦特的自由派贵族政府取而代之。这个新政府一上台就宣称要恢复“法律秩序”,并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措施来与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相对抗,其打击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聚集在科伦的革命势力。于是 7 月 3 日,科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被逮捕了。

马克思认为科伦事件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敌人精心策划的一次挑衅性的行为。他们希望以此激怒工人群众,使他们过早地举行缺乏准备的武装起义,以便乘机把革命力量一网打尽。于是他与《新莱茵报》的成员们向公众揭露了敌人的这一险恶用心,使

当局的这一罪恶阴谋未能得逞。这样一样,《新莱茵报》更成为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就是在这种极其险恶的形势下面,马克思领导的《新莱茵报》仍然继续坚持战斗着,工作着。德国的封建贵族、大资产阶级对他们又恨又怕,不仅派遣反动军警和密探迫害他们,而且还动用了一些反动的舆论宣传工具,对《新莱茵报》和无产阶级进行诋毁和污蔑。

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马克思等人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共产党人在德国革命中的原则立场,不断向读者们报导各地革命的经验教训和进程情况以及反动势力对革命者残酷镇压的丑恶行径,并鼓励无产阶级和民主人士积极地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击退任何反对革命的反动逆流。

在进行政治性宣传鼓动的同时,马克思还充分发挥了该报小品栏目的作用。在他的指导下,维尔特和弗莱里格拉特等人进行了巨大努力,使小品栏目成为该报最具特色和最吸引人的一部分内容,发表了许多充满战斗性而又辛辣幽默的短文、随笔和诗歌,有力地揭露了敌人,维护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例如,弗莱里格拉特的一些最杰出的诗篇《死者致生》、《维也纳》和《勃鲁姆》等就

是这一时期发表的。维尔特曾发表了著名的《今晨我前往杜塞尔多夫》一诗，对德国反动派的政治蠢人们的行为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鞭笞。诗中写道：

今朝前往杜塞尔多夫，
我与一位尊贵的枢密顾问同行，
一路上他恶语咒骂，
对《新莱因报》忿忿不平。
他说：“这里的编辑，
都是可憎的恶魔，
他们不畏惧亲爱的上帝，
甚至连检察官魏费尔也不放在眼里。

他们认为唯有一个办法，
可以化解人世间的一切祸患，
那就是成立红色共和国，
将财富全部掌握起来。

全世界将要重新分配，
划分为无数等份，
同样多的土地，同样多的沙粒，
连海涛也要分配得均匀。
每人分到一块土地，

个个皆大欢喜，
其中最好的地段，
当归《新莱因报》的编辑。

他们还想实行共妻，
要废除婚姻关系，
人们将放任自流，
随意地结对交媾。
经过一番全新的改造，
世界将会面目迥异，
《新莱因报》的编辑们，
会把最美丽的女人拥入怀里。

他们简直是要毁灭一切，
亵渎神明，现世不恭。
将私有财产之神，
弃之如敝屣……”

至此顾问先生便默默无语，
而我却惊诧万分，
在这狂放不已的世纪中，
竟然还有这样一位贤达之人。

尊敬的大人，
与您同行是我三生有幸，
而说到《新莱茵报》的编辑，
我本人便名列其中。

好，请继续前行吧，
请将我们的名声随您传遍世界。
身为大人物和枢密顾问，
您具有无穷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
于是这位好大人又继续前行，
我将在快乐的小品栏中，
为他树立一座丰碑，
读者们知道如何估价荣誉。
并非每一个蠢人，
都能挨到我们的脚踢，
亲爱的枢密顾问，
我有幸向您表达敬意。

第十八章

反革命的进攻

1848年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不是人们赢得了东西,而是他们失去了东西——他们丢掉了幻想。

——马克思

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利用革命来回答它。

——马克思

巴黎六月起义失败以后，欧洲的局势开始全面逆转。在波兰、意大利和波希米亚等地，封建反动势力相继把革命力量镇压了下去。在奥地利等国家和地区，反动军队对起义者进行了野蛮的屠杀。欧洲各国的反动势力已经行动起来，企图恢复旧的封建秩序。他们不仅要打击日益壮大起来的无产阶级，甚至也要把资产阶级远远地抛开，重新恢复到革命以前的状态。

面对这股汹汹而来的反革命逆流，革命民主阵营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德国资产阶级吓破了胆，他们卑鄙地出卖了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波兰人民，同时也出卖了他们的革命同盟者——农民阶级。在革命爆发之初，德意志的农民群众自发地起来消除了压在他们身上的封建义务和苛捐杂税，但资产阶级竟然不敢在法律上确认这一事实，因为他们不敢触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反之，当反动势力在7月份制定了一部损害农民利益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农民必须向地主交纳高额赎金方可赎回自由和土地）时，他们竟然表示赞同。

此时的欧洲潜藏着一个巨大的危机：反动势力磨刀霍霍，正在为全面反攻做准备，而革命民主阵营内部却呈现出一种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无法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量。因此马克思认为：当前的一项重要

工作是努力加强无产阶级和民主力量的团结,继续推进革命。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经常论述这一观点,在实际斗争中,他也始终在坚持这样做。不论编辑部的工作有多么繁忙,他仍然抽出时间深入到火热斗争中去,在民主协会中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这一时期,科伦的一些革命民主主义组织成了马克思活动的重要舞台。尽管科伦当局已经明确表示拒绝恢复马克思的公民权,被驱逐的危险象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悬在他的头上,但在8月份,马克思仍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活动。

8月初,马克思在科伦民主协会对魏特林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刻批判。在这次演说中,他指出了魏特林把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截然分开的观点的荒谬性,重申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参加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而这一斗争必将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创造条件。

在科伦民主协会的另一次大会上,在马克思的主持下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重申了反对把波兹南并入德国的原则立场,表示:正在争取自由的德国反对压迫其他民族,绝不参加镇压波兰人民的行动,而应该帮助其他民族争取自由和独立。这一决议充

分体现了马克思一贯倡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8月13日至14日,莱因省民主主义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在科伦召开。马克思在会上发表了重要的演说,再次阐述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提出的主要政治主张,得到了与会者的赞扬和支持。当大会主席宣布马克思也是当地人时,与会者向他发出了热烈的吹呼声。这次大会的情况表明,马克思已经在革命民主主义者中间建立起了崇高的威望,他的一些重要主张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一位与会的青年代表卡·舒尔茨在描述会议的情形时写道:“他(指马克思——作者注)个头不高,体格健壮,宽宽的额头,黑发浓须,眼睛炯炯有神。他很惹人注目。人们在谈到他时都说,他是一个杰出的学者……他的讲话切实而有深度,逻辑缜密……现在我还记得他说到‘资产者’这个字眼时的尖刻讥讽的声调。”

进入1848年9月份,普鲁士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动荡,人民大众同普鲁士反动统治当局的矛盾日益加剧了。

这一危机可以追溯到1848年的春天。当时,丹麦国王试图把主要由德意志人居住的施勒斯维希和霍尔斯坦两个公国并入丹麦的版图,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和抵抗,德意志各地爱国主义者组成

的志愿部队也纷纷开赴这两个公国，双方发生流血的冲突。在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强有力的推动下，普鲁士政府也派军队进入了这一地区。但由于受到了欧洲列强的外交压力，更重要的是为了调回军队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普鲁士政府于8月26日与丹麦实行了休战，并把霍尔斯坦因和施勒斯维希交给了丹麦国王。这是对两公国和德意志人民民族感情的严重伤害，也是对德意志民族统一事业的背叛，遭到了各界人士的普遍反对。

为了揭露统治当局的丑恶面目，粉碎他们企图镇压革命运动的罪恶阴谋，马克思立即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主主义者投入了斗争，而《新莱茵报》编辑部成了这场群众运动的直接组织者。

9月12日夜，科伦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的代表们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马克思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决定：于第三天召开民众大会，揭露批判当局的反革命图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出相应对策。9月13日，大会在弗兰肯广场召开，出席者达到了五六千人，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会上选出了有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沙佩尔等人参加的安全委员会，其宗旨是保卫人民用鲜血取得的革命成果不被侵犯。最后还通过了由恩格斯起草的致柏林议会书，要求议员们以民族利益为重，顶住各种压力，不

要批准普鲁士与丹麦的休战协定。

安全委员会是一个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机构,实际上具有革命政权萌芽的性质。为了巩固扩大它的权威和影响,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安全委员会多次召开了民众大会。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9月17日在科伦附近的沃尔林根召开的,各地民众如同参加盛大的节日一样纷纷前来与会,出席者达到了一万多人。会场上高悬着象征国家统一的黑红黄三色旗和红旗,还广泛散发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等文件。大会通过了一份致法兰克福议会书,呼吁议员们抵制统治当局阻碍民族统一、破坏革命事业的阴谋。全体与会者一致赞同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但是,人民的正义呼声未能阻止住普鲁士统治阶级的背叛行径,而资产阶级的软弱怯懦更助长了他们的反动气焰。9月16日,法兰克福议会以微弱的多数批准了同丹麦的休战协定。

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更大义愤。9月18日,法兰克福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但很快就遭到了早有准备的反动军队的镇压。此后,普鲁士政府日益走向反动,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压制人民群众的强制性措施,并逮捕了许多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在这种危险的形势下面,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的

同事们丝毫没有退缩,继续与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号召人民行动起来,打击反革命势力的猖狂气焰。9月20日,在马克思等人的组织下,无产阶级和民主力量又组织了一次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向人们宣传法兰克福起义的真相,动员人民群众采取有效的行动,支持法兰克福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团结广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的同时,马克思始终没有忘记当前所进行的革命的主要任务。他一再提醒人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就是消灭封建专制制度,在德国革命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与英法等国不同,德国在1848年之前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各个邦国仍然盛行着封建农奴制度和严重的封建割据局面,封建义务和苛捐杂税象沉重的大山一样压在人民的头上,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1848年德国革命的任务是解决资本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之间的矛盾。革命爆发后,人民群众通过革命手段摧毁了封建庄园和封建义务,取得了巨大的革命成果。但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只同意农民用赎买的方式废除封建义务,阻挠一切革命行动和激进的改革措施,从而背叛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

民阶级。对此，马克思愤怒地指出：“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农民阶级。……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了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专门论述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农民问题。他指出，德国革命的历程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担当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任务了，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农民也不敢联合。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承担起资产阶级放弃了的责任，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应该全力支持农民进行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工农联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

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坚决支持各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反对欧洲列强对弱小民族进行侵略和欺凌。他们清楚地看到沙俄、奥地利和普鲁士在1815年结成的神圣同盟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大障碍，其中沙皇俄国又是封建反动势力的支柱。它们把维护欧洲的封建反动秩序和镇压人民革命看作自己的“神圣使命”。因此，要想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必须与这股反动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对波兰问题十分关注。他们认为，波兰在历史上被俄、普、奥三个列强野蛮地瓜分了，因此波兰人民于1848年春天举行的反对外族统治的斗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恩格斯认为：“从1815年开始的，有一部分甚至从法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开始的欧洲反动势力，首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建立在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神圣同盟的基础上。而这个同盟是靠什么结成的呢？靠瓜分波兰，这三个同盟者从瓜分波兰中取得了利益。”“这三个强国对波兰进行瓜分的路线，乃是一根把它们互相连结起来的链条；共同的掠夺用团结的纽带把它们联系起来。”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了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建立民主的波兰对于建立民主的德国，乃至对于反对神圣同盟的斗争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这一任务完成了，神圣同盟就将被摧毁，这就为整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重视反对沙皇俄国的斗争。他们看到，沙俄害怕它的西边出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德国，它认为德国的统一不仅会影响

它对东欧的控制,而且统一的德国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也会形成对它的巨大威胁。所以沙俄与德意志的封建反动势力相互勾结起来,竭力阻碍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的发展。因此,要想使德国革命取得成功,必须狠狠地打击沙皇俄国这个欧洲反动势力的顽固堡垒。

在马克思和编辑们的不懈斗争和努力下,《新莱茵报》的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受到了人民大众的赞扬和支持。但随着局势的恶化和《新莱茵报》表现出了日益强烈的革命战斗精神,又陆续有部分资产阶级股东退了股。

一天清晨,报社的大门刚刚打开,一个绅士模样的股东就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

“真是大逆不道!”这个气喘吁吁的胖子大声喊道。“你们不仅支持巴黎的暴乱,还想煽动普鲁士的百姓闹事。现在全德国都知道,你们是唯一一家替下等人说话的报纸。我为什么要资助你们干这种荒唐事呢?”

编辑部里很安静,没有人理睬这个疯子,大家都在忙着做自己的事情。这个家伙看没人搭理他,气极败坏地冲着恩格斯发难了:

“当初我就是听信了你的话才入股的,是你欺骗了我。我要退股!”

“你是自欺欺人。”恩格斯用一种鄙夷的口气对他说道。“当初你觉得革命快要成功了，想乘机捞取一点政治资本。现在有了一点风吹草动，你就吓得退缩了。告诉你，我们从来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号召人民行动起来，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垃圾统统铲除干净！”说完这些，恩格斯立即转回身去，招呼同事们继续工作。

退股风又造成了办报资金的短缺。为了筹措经费，同时加强同莱茵地区以外的无产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系，马克思于8月23日启程，到柏林和维也纳进行了一次旅行。

在柏林，他与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讨论了时局的变化和当前的政治任务，另外还同一些左派议员和同盟盟员进行了会谈。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普鲁士王朝是德意志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它不仅不让本国人民享受基本的政治权利，还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对外进行侵略和奴役，谋求普鲁士的霸权，阻挠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他认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反对普鲁士的上层反动统治者。

8月27日，马克思来到了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这是一座举世闻名的音乐城，几乎每一个窗口里都能流淌出美妙动听的音乐声，或激越深沉，或委婉抒情。宏伟壮丽的宫阙和各个时代的文物古迹灿如繁

星般地遍布全城，把整座城市装点得绚丽辉煌，多姿多彩。绿油油的草坪、五色缤纷的花卉和浓荫密布、苍翠欲滴的街树则构成了市区的另一条风景线。但是，美丽如画的景象却掩盖不了这座城市内部的动荡和不安。仅仅在几天之前，这里还发生了政府军与示威群众的流血冲突，封建贵族已经向人民举起了屠刀，而资产阶级则被巴黎六月起义吓破了胆，宁愿卑躬屈膝地与封建统治阶级妥协。

马克思来到维也纳以后，立即与这里的民主力量和无产阶级组织进行了接触，详细了解了奥地利革命的现状。8月28日，他在民主联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尖锐地指出：目前这里的局势与巴黎一样，“问题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他严厉地批判了某些资产阶级分子企图与各邦君主实行妥协的卑鄙行为，号召人们要紧密团结和依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不要再对资产阶级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8月30日，马克思还在维也纳工人联合会的会议上发表了一次演讲，题目是关于欧洲的社会关系和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他详细地论述了欧洲各国的革命形势、阶级矛盾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并高度赞扬了德意志工人在巴黎六月起义中的英勇表现，鼓励工人群众像这些英雄的同胞一样，勇敢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

在这次旅行中，马克思还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团体和政治家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希望他们对《新莱茵报》给以资金上的支持，但收获甚微。只有波兰革命者们表现出了巨大的热忱，他们虽身处困境，但仍然慷慨解囊相助，给了马克思 2000 多塔勒。

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引起了欧洲各国反对派的巨大恐慌。特别是普鲁士王国政府把他们视为最危险的敌人。随着普鲁士的政局逐渐恶化，当局开始公开对他们进行迫害。

9 月中旬，反动政府把大批军警调到科伦，实行紧急戒严，警方下令《新莱茵报》立即停刊，并通缉逮捕该报的几位重要成员，其中便有恩格斯的名字，同时受到通缉的还有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恩斯特·德朗克、斐迪南·沃尔弗、威廉·沃尔弗和卡尔·沙佩尔等人。

形势十分危急。怎么办呢？恩格斯表现得非常镇定，他希望留下来与马克思一起继续战斗。但马克思认为：如果当局抓住了恩格斯等人的话，一定会长期或永远地把他们驱逐出境的，因此他们必须尽快到外地去，避一避风头。很快，恩格斯等人秘密地离开了科伦。临行前，马克思与恩格斯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这两位亲密的战友互相勉励，嘱咐珍重，他们希望不久就能胜利地会合。

反动当局没有抓住恩格斯，于是下达了一道通缉令，上面写道：

下列人犯，违犯了刑法之 87、91 和 102 条，现已畏罪潜逃。兹根据科伦检查官缉拿等之命令，务请各有关机关和官员采取措施查访。一经查获，即予逮捕。

代理最高检查官 格克尔

科伦，1848 年 10 月 3 日

“姓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阶层：商人；籍贯：巴门；宗教信仰：新教；年龄：27 岁；身高：5 英尺 8 英寸；头发和眉毛：栗色；前额：正常；眼睛：灰色；鼻和口：匀称；牙齿：健全；胡须：栗色；下颚和脸：椭圆……”

离开科伦后，恩格斯先回到了老家巴门。追捕的军警闻讯而至，他藏进了祖父古老的空宅里才侥幸躲过了搜捕。几天后他逃到了比利时，由于没有带证件被警察抓了起来，被装在囚车里遣送出境。后来他辗转来到了巴黎。但此时巴黎已经变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六月起义中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反革命分子到处在耀武扬威，狂欢宴饮，令恩格斯既伤心又非常厌恶。恩格斯后来在回忆

当时的情形时写道：“卡芬雅克的榴弹把巴黎人不可遏止的欢乐轰得烟消云散了。《马赛曲》……的歌声沉寂了……。工人们没有面包，没有武器，咬紧牙关，把仇恨藏在心里……。可是巴黎已经死了，……我不能在这个已死的巴黎久留。”于是，此时已经一文不名的恩格斯毅然徒步走了两个多星期，来到瑞士暂住了下来。马克思在科伦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给他寄去了钱和衣物。

恩格斯的离去使马克思失去了一位最得力的助手，《新莱茵报》的工作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在最困难的时候，报社里只剩下了马克思和维尔特两个人。不久，检查机关指控马克思违反了出版法，对他进行传讯，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许多朋友都劝他立刻离开科伦。但是为了使《新莱茵报》能尽快复刊，马克思毅然留了下来。此时，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的较量仍在进行之中，反动派还不能完全控制局势，所以经过马克思等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新莱茵报》终于复刊了。

但是，由于报纸停办了一个时期，办报经费已经全部耗尽了，怎么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现去集资筹款已是远水不解近渴了。

这时，马克思忽然想起母亲那里还存放着一笔父亲留给他的遗产。由于这是他和燕妮的最后一笔

财富，他们曾经商定：除非家里发生了意外，决不轻易动用。现在，马克思决定把这笔救命钱拿出来办报。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燕妮，并让她好好考虑一下。

这天深夜，三个孩子已经睡熟了，大地沉浸在一片漆黑静寂之中，只有清风徐徐地吹拂着窗外的柳枝，发出轻柔的沙沙声。马克思和燕妮静静地坐在孩子们的床前，他们相互依偎着，深情地凝视着小天使们可爱安祥的面庞，陷入了深深的遐思之中。他们想到了孩子们动荡不安的童年，也想到了他们的未来，但想的最多的还是眼下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它的成败将关系到千千万万贫困的劳动者及其子孙后代的命运。

“我们已经把一切都献给革命了，我们的一切希望都寄在这上面。”燕妮那双深如秋水般的眼睛亲切地看着丈夫那日渐消瘦的刚毅面孔，轻轻地说道。“你把钱拿去用吧，只要用在革命事业上我一点也不心痛。你放心好了，就是再苦再难，我也能把孩子们抚养成人。”

就这样，《新莱茵报》又重振旗鼓，继续战斗了。不久，威廉·沃尔弗和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等人陆续返回了科伦，编辑部里又洋溢着往日的欢声笑语，充满了战斗的活力。

反动派施展了卑鄙的伎俩,但并没有达到目的。相反,由他们导演的这场闹剧使《新莱茵报》经历了一次真正的考验和洗礼,更坚定了马克思等人的斗争意志,他们甚至从与敌人的斗争中尝到了无穷的乐趣。格奥尔格·维尔特在这时期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事情,
比刺痛敌人更叫人兴奋,
比快乐地戏弄那批蠢货,
更令人愉悦。

我这样想,并定好弦,
心里自然安祥,
外面又开始了一场闹剧,
神圣的科伦宣布戒严了。

遍地是刺刀,城市如同箭猪,
普鲁士的大天使包围了新市场,
从那里奔涌到鸡栏,
接着又来到干草市场。

一个少尉走到我们门前,

他的手下如临大敌，
在震耳的鼓声中宣布了
《新莱茵报》的死刑。

但是，新的政治迫害又接踵而来了。由于马克思卓越的政治活动和《新莱茵报》所做的大量革命宣传工作对欧洲各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得普鲁士和各国的反动势力感到寝食不安，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进行打击陷害。11月14日，科伦地方法院再一次传讯了马克思，给他扣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企图加害于他。反动派的这一无理举动激起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他们纷纷自发地来到法院的大院里，高呼口号向法院示威，要求立即无条件地释放马克思，否则将采取暴力行动营救他。在群众力量的巨大威慑下，法官们屈服了，不得不宣布马克思无罪。

此时，封建反动势力正酝酿着更大的政治阴谋，其反革命的步伐在步步向前推进。

10月18日，普鲁士封建贵族发动了军事政变，霍亨索伦皇族的后裔勃兰登堡伯爵接管了政权。他上台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延期召开国民议会，将政府从柏林迁至勃兰登堡，以便远离“闹事”的人民，为了下一步全面反攻倒算作准备。

面对反革命势力的猖狂挑衅,马克思感到非常愤怒,决定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号召人民拒绝纳税——来进行反抗。他认为:这样做可能断绝政府的财源,从而迫使其向人民屈服。

11月14日,马克思以莱因省民主主义区域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号召:要求莱因省居民立即行动起来,拒绝向政府纳税。另外,他还在《新莱因报》公开发表了一份要求人民拒绝纳税的呼吁书。这一呼吁发生了巨大的反响,许多地区的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掀起了不纳税的热潮,甚至连国民议会也接受了马克思的主张,通过了拒绝纳税的决议。

马克思在这份呼吁书的结尾这样写道: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们应当拒绝纳税。弗兰格尔和勃兰登堡之流都知道……,他们佩着军刀,领取制服和俸禄。但是军刀、制服和俸禄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点他们就不知道了。……

王权不仅反对人民群众,而且也反对资产阶级。

因此,要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战胜它。

怎样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战胜王权呢?

应当用饥饿来制服它。

怎样用饥饿来制服它呢?

应当拒绝纳税。

你们好好想一想吧！普鲁士亲王们、勃兰登堡们、弗兰格尔们全都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你们，只有你们自己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

马克思的革命言行再一次强烈地震撼了反动统治当局，于是，无休止的政治迫害又拉开了帷幕。11月17日，莱因省督对马克思提出严重警告，指责他公开号召拒绝纳税，叫嚣要严厉打击这种破坏法制的行为。11月20日，科伦检查部门又控告马克思等人企图煽动叛乱，于是马克思又受到了法院的传讯。

1849年2月8日，法院对马克思进行了公开审讯，原告给马克思安上的罪名是“公开号召叛乱”、“诽谤中央政府”和“反对政府”，等等。面对气势汹汹的反动统治势力，马克思毫无惧色，他在敌人的法庭上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说，公开阐述了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原则立场，深刻揭露了普鲁士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反动和资产阶级对革命事业的背叛。

马克思指出，德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由于这两大阶级是建立在两种绝然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了它们之间进行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一个社会必然获得胜利，而另一个社会必然遭到失败，这是它们之间唯一可能的和解”。马克思还深刻地揭露了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本质

和资产阶级议会的软弱妥协性。他指出,普鲁士政府历来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上,它把革命看作暴力和罪恶,要用反革命暴力消灭革命,并凌驾于议会之上。而资产阶级议会则不敢团结和依靠广大民众,更不敢诉诸革命暴力,表现出了明显的软弱性。马克思说,对于顽固的反动派必须诉诸暴力手段。在谈到原告指控他犯有叛国罪这一问题时,马克思义正辞严地指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法律历来是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而革命正是要消灭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旧的法律体系,因此对于革命者来说,这里并不存在什么犯法的问题。

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全场鸦雀无声,听众们都屏住呼吸,认真地聆听着。大厅里响彻了马克思那充满浩然正气的洪钟般的声音:

“我完全无法理解,检查机关怎么还敢根据已被王权本身蹂躏了的法律来控告我们。”“这是一种怯懦的法制伪善。”

“查理一世不止一次地获得胜利,但是,到头来还是上了断头台。诸位先生,谁又能向你们担保:现任内阁以及过去和现在都是现任内阁手中的驯服工具的那些官员,将来不会被本届议院或它的继承者宣判为国事犯呢?”

听到这里,在场的一些贵族和官员完全被马克

思大义凛然的气势震慑住了。他们感到脸热心悸，惊惧得抬不起头来。

“政府接二连三地采取暴力行动。它肆无忌惮地违犯极重要的法律……。它在戒严的幌子下任意实行无限制的军事专制。它甚至把人民代表本身都给赶跑了。而当一方蛮横无理地违犯一切法律的时候，却要求另一方甚至最严格地遵守会议规则！”

“这样看来，在这两个社会之间不可能有和平。它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使得它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个社会必然获得胜利，而另一个社会必然要遭到失败。这是它们之间唯一可能的和解。因此，在这两个社会的最高政治代表之间——在国王和人民代议机关之间，也不可能有和平。”

在整篇演说中，马克思根本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一切言行的出发点是实现全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所以根本无须进行辩护。相反，他认为自己所需要做的就是无情地批判和揭露旧世界的黑暗和罪恶，抨击那些执掌国家权力的反动腐朽势力，推动革命事业在德国以及全欧洲迅速地发展。他那滔滔不绝、逻辑雄辩的演说语惊四座，使得那些反动的原告们个个无言以对，焦头烂额，而在场的革命群众则感到欢欣鼓舞，并受到了巨大的启发和教育，甚至连法庭工作人员也不禁对马克思

肃然起敬。最后，法庭再一次宣布马克思是清白的。

法院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的几次传讯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反动势力蓄意制造的一系列政治阴谋的一部分，是巴黎六月起义失败以后欧洲政治日益走向反动的重要表现。反动统治者的这些拙劣表演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慨，马克思每次出庭受审，革命群众都自发地赶到现场旁听，一方面保护马克思的人身安全，一方面为他的讲话鼓掌喝彩。人民群众的呼声常常使法官的审讯无法进行下去，敌人的法庭成了马克思的讲台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集会的场所，弄得反动当局狼狈不堪。反动统治者迫害马克思的阴谋不断遭到失败，暂时到国外避难的恩格斯等人也于 1849 年初陆续返回科伦，他们又聚集在《新莱茵报》的旗帜之下团结战斗了。

在审判失败之后，反动当局并没有放弃对《新莱茵报》的迫害，他们不断变换手法，对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领导人进行直接的人身威胁和恫吓。面对这种情况，《新莱茵报》的工作人员们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他们购买了 8 条枪和 280 发子弹，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或歹徒们的捣乱。

这样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1849 年 3 月初的一天，在反动当局的唆使下，几名反动军人突然闯入马克思的住宅，以无赖式的手

段对马克思及其家人进行恐吓。

“你就是马克思吗？”一个军官厉声问道。

“我就是。”

“你的报纸犯了侮辱和诽谤罪，你必须把 2 月 28 日那篇文章的作者交出来！”另一个军官粗暴蛮横地狂吼起来。

“那篇文章有什么问题？”马克思镇定地反问道，脸上毫无惧色。

“它攻击了冯·乌滕霍劳上尉，从而使我们第十六步兵团八连全体官兵蒙受了耻辱！”

“这纯属无稽之谈！”马克思愤怒而轻蔑地回答道。“你们自己去看报纸吧，我没有时间与你们谈论这个问题。”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士兵就要擅自采取行动了！”一个军官恶狠狠地说道，脸上露出一股杀气。

“威胁和恫吓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马克思一边说着，一边摸了摸衣袋里露出的枪柄。

几名军人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去。马克思立即与这伙人的上司进行了严正交涉，抗议这种粗暴无礼的军阀行径。敌人的阴谋再一次破产了。

从 1848 年革命爆发以来的进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毫无例外地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同时，各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表现

得软弱动摇,这些问题在德意志诸邦表现得最为突出。历史已经证明,要想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取得胜利,就必须团结和依靠广大的工人阶级,而德国的工人阶级只有组成一个独立的全国性的政党才能焕发出巨大的革命力量,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这正是革命开始之时马克思及其战友孜孜以求的一个奋斗目标,只是由于当时的条件尚不成熟而未能实现。

到了 1849 年初,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进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特别是在马克思领导的《新莱茵报》的宣传教育之下,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为数众多的地方性工人组织从分散走向局部联合,并开始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为捍卫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工人运动中出现的这种走向联合的趋势,并给予大力的支持,以推动全国性统一工人政党的产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亲自出任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一职,对该联合会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1849 年初,他还与工人兄弟会的领导人波尔恩进行了会谈,就如何团结广大工人群众进行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5 月 6 日,莱茵和威斯特伐里亚两省的工人联合会召开代表大

会,实现了这两大工人组织的联合,马克思被选入该组织的领导机构。

马克思不仅直接参加了建立全德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筹备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和恩格斯利用《新莱茵报》这一宣传机器,对工人群众及其政治组织做了大量的政治和思想工作,力图使这个正在筹划之中的全国性工人阶级政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处于更为成熟的状态。

1849年的春夏之交,马克思、恩格斯曾数次召集《新莱茵报》的全体编辑人员开会,讨论并布置了这一阶段的办报方针。

“我们所要建立的是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群众性政党。”在一次会议上,马克思严肃认真地指出。“在反革命之后,新的革命高潮将会到来,但是它将不会从小市民的立场出发,这个阶层太软弱无力了。我们必须唤醒民众。无产阶级在未来的革命中将起重大作用,它在法国是站在革命最前列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无产阶级必须创建自己的政党。”

“我们应该在报纸上大量报道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等国)的政治情况,”恩格斯补充道。“我们用这些生动的事例来教育工人阶级,激发他们的热情和觉悟,也传授给他们一些建立组织的经验。”

为了使工人阶级更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4月5日起,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连载了自己撰写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在这部重要著作中,马克思以十分通俗的语言详细论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赖以生存的经济关系,资本剥削的本质和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指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这部著作发表后立即被广大工人群众争相传阅,极大地提高了千千万万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

第十九章

红色终刊号

再见吧，再见，这战斗的世界。
再见吧，激战中的大军！
再见吧，被战火熏黑的战场，
再见吧，刀枪剑戟！
再见——但并非永诀！
他们不能将精神杀死，兄弟们！
很快我将身披铠甲，铿锵作响，
很快我将策马驰骋，回到你们身边。

——弗莱里格拉特

从 1848 年下半年开始,全欧洲的反动势力逐步抬头,准备向革命阵营发动全面反攻。反革命的气焰日益嚣张,整个局势呈现出一种动荡不定、扑朔迷离的状态,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都在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鹿死谁手尚在未定之中。

在这股汹汹而来的反动逆流面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可耻地退却了。他们的头面人物或者与封建反动势力和外国干涉者同流合污,联合起来共同镇压革命,或者脱离了火热的革命斗争,躲进议会中侈谈所谓民主、博爱和权利。只有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坚强的无产阶级勇敢地高举着革命的大旗,继续与整个旧世界进行战斗。1849 年春天以后,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新莱茵报》的立场观点也越来越激进和鲜明,它的每一期,甚至每一个版面都充满战斗的气息,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狠狠打击反革命势力的进攻。

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决战终于开始了。在德国,这场决战是以“护宪运动”的形式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被卷入到了这场风暴之中,并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谓“护宪运动”就是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1849 年春天发生在德意志西南地区,特别是莱茵、巴登和普法尔茨等地。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柏林三月革命之后,全德预备国会在法兰克福市开幕,会议决定选出 50 人组成的委员会。5 月 15 日全德国民议会(简称法兰克福议会)在法兰克福开幕了,议会就对待德意志邦联议会的态度、法兰克福议会的权力等问题,展开了长时期的争论。由于各方面意见差距较大,相持不下,争论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直到 1849 年 3 月 28 日,才制定出了一部统一的帝国宪法。

帝国宪法规定,德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但仍保留原来的 36 个邦,各邦在内政上是独立的。普鲁士国王为帝国的皇帝,拥有广泛的权力。宪法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例如,统一掌握内外政策、宣战媾和、关税立法、统一币制等权力。帝国议会是最髙立法机关。宪法还明确规定了人民应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这部宪法虽然具有明显的妥协和保守色彩,但与封建专制局面相比较仍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特别是它主张国家统一和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所以人民群众对它是支持的。

宪法通过后还要经各邦批准才能正式生效。但是,除了若干中小邦表示赞同这部宪法外,德意志的各个大邦(例如奥地利、汉诺威、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等等)都采取了拒不承认的态度。法兰克福议会曾派出专使给普鲁士国王送去了一顶“德意志帝国”皇

冠,但却被普王轻蔑地拒绝了,他以揶揄的口吻说道:“这不是皇冠,而是奴隶所戴的锁链圈,戴上它,国王就变成了革命的奴隶。”

封建反动势力的这种做法和他们对革命运动的镇压激起了普遍的愤慨。当各大邦拒不承认宪法的消息传开后,舆论哗然,全德境内立即掀起了一场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至1849年5月,护宪运动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这一运动的最初发动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则始终是运动的中坚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全力支持这场运动,他们希望通过这一斗争壮大革命阵营的力量,并力图使这一斗争具有更高的自觉的目的,即为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而战斗。

起义是从萨克森开始的。5月3日,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首先燃起了起义的烈火,工人们攻打了军火库,构筑起街垒,要求政府立即承认帝国宪法。国王奥古斯都被起义吓破了胆,惊慌失措地逃离了首都,政权转移到了自由派占据优势的临时政府手中。但由于临时政府优柔寡断,不敢发动依靠人民群众推进革命,结果给反动派留下了喘息的时机。奥古斯都很快就从其它地区和普鲁士请来了援兵,疯狂地镇压起义群众。一万多名起义者与装备精良的敌军

血战了三天三夜，在寡不敌众的形势下于5月9日撤出了德累斯顿。

就在起义军从德累斯顿撤离的时候，在其它各邦（如威斯特伐利亚、莱茵、普法尔茨和巴登等）相继爆发了起义。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并通过《新莱茵报》及时地对各地的运动给予指导。

5月9日，爱北斐特起义爆发了，听到这一消息，恩格斯立即奔赴起义前线，《新莱茵报》对此事做了详细报导：“5月10日，《新莱茵报》编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科伦赶往爱北斐特，他从佐林根带去了两箱子弹，这是佐林根工人在袭击格莱弗拉特军火库时缴获的。”到达爱北斐特后，恩格斯立即向起义领导机构——安全委员会作了关于局势的报告，安全委员会派遣他负责修筑军事工事等工作。在这里，恩格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干，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组建工兵连，修筑并改建了许多街垒，拟定了新的防卫布署计划，参加了军事会议，并向起义群众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

恩格斯高超的领导能力和出色的工作表现很快就赢得了起义群众的高度信任，但一些起义的领导人（主要是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却对他的革命思想感到十分惊恐。不久，他

们采取了一些卑鄙的手段迫使恩格斯离开了爱北斐特，但恩格斯高大的形象和政治主张却给这里的工人阶级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新莱茵报》在一篇评论中写道：“让那些对我们的编辑表示出深厚的情谊和恋恋不舍的贝尔格和马尔克的工人记住，现在的这个运动只是另一个更为重要得多的运动的序幕，那个运动涉及的将是他们工人切身的利益。这个新的革命运动将是现在这个运动的结果，而只要这个新运动一开始，恩格斯便会（工人们可以相信这一点）像《新莱茵报》的所有其他编辑一样，立即出现在战斗岗位上，到那时，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他离开这个岗位了。”

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停止战斗。在返回科伦的途中，恩格斯组织了一支小规模工人武装，突然袭击了格莱弗拉特军火库，夺得了大量军械。这一时期，《新莱茵报》也连续发表措辞激烈的文章，支持并指导各地的革命运动，大胆地揭露反动势力的凶残面目和资产阶级可耻的背叛行径。恩格斯后来在回顾这段战斗经历时写道：“在整个德国，人们都因为我们在普鲁士的头等堡垒里敢于面对着八千驻军和岗哨做出这一切事情而感到惊讶；但编辑室内的八枝步枪和二百五十发子弹，以及排字工人头上戴着红色雅各宾帽，使得我们的报馆在军官们的眼

中也成了一个不能用简单的奇袭来夺取的堡垒。”

1849年初夏是一个令人惬意的季节。美丽的莱茵河水日夜不停地缓缓流淌着,发出轻柔悦耳的淙淙声,就象一位古老传说中手持六弦琴的行吟诗人在那里低吟浅唱,如怨如诉,如诗如梦。街头茂密的菩提树的枝头繁花盛开,暖风把阵阵幽香轻轻地送入千家万户。而《新莱茵报》报社里却永远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缭绕不断的雪茄烟的烟雾和印刷机械发出的浓郁的油墨味相互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股特殊的混合气味,人们都在认真专注地忙碌着自己的工作,只有编辑室里不时地传出热烈的讨论声和爽朗的笑声。整个报社就象一部巨大的机器,以一种高效率的节奏运转着,行动着。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它已经成了德国及至全欧洲最令人瞩目的报纸,不仅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和战斗性,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搞得有声有色,丰富多采。马克思恩格斯的政论文高屋建瓴,思想深刻,笔锋犀利,具有一种摧枯拉朽般的宏大气势;沃尔弗的研究论文资料翔实,深入浅出,逻辑雄辩,读来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维尔特和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歌和小品文风趣幽默,生动活泼;而散居在各处的通讯员们寄来的报导则带来了各地革命斗争的大量信息,使读者可以一览整个欧洲革命的动态和全景。《新莱茵报》是第一家根据科

学共产主义原则创办的报纸，也是德意志无产阶级的第一家日报，它既坚持了高度的科学性和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又具有策略上的灵活性和形式上的多样性。所有这些都使它具有不同于民主派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报纸的鲜明特色，成为“优秀的无与伦比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机关报”（列宁语）。

但是，从当时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欧洲革命此时正在逐渐走向低谷，在反动势力猖狂进攻和资产阶级背叛的形势下，一些地区的起义相继失败，反动派认为时机已到，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进行公开的迫害了。

恩格斯刚刚返回科伦就接到了当局的通缉令。5月16日，马克思也接到了驱逐令，限令他在24小时之内离开普鲁士，理由是“查最近几号《新莱茵报》愈益坚决地煽动居民蔑视政府，号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共和国”。随后，其他编辑（如德朗克和维尔特等人）也先后受到驱逐和制裁。这一切都意味着《新莱茵报》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恩格斯后来在回忆时写道：“对此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政府有整个军团作为后盾，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枪枝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

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刷了它的

终刊号。马克思在《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一文中指出：

“试问，难道只是在‘最近几号’《新莱茵报》里我们才认为必须明显地以社会共和的精神发表言论吗？难道你们没有读过我们关于六月革命的文章，难道六月革命的灵魂不就是我们报纸的灵魂吗？

……

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但是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是残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论上是胆怯的、隐讳的、虚伪的，而在这两方面都是无耻的。”

在致科伦工人书中，《新莱茵报》编辑部对工人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他们保证：“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终刊号上还刊载了著名革命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写的一首悲壮的战斗诗篇——《〈新莱茵报〉的告别词》。这首诗的前半部已在本章篇首引用；后半部是这样写的：

等到最后的王座垮台，

等到人民在法庭上无情地宣判；
“他们有罪”，
到那时我们就会相见。
我这个被放逐的叛逆者，
忠于革命的人民战士，
将在多瑙河和莱因河畔，
用笔和剑进行战斗！

《新莱因报》停刊了，此时，马克思夫妇必须火速离开科伦，否则，他们就会被反动派逮捕，或被送上军事法庭，面临被长期监禁的危险。但在此时，马克思没有忘记那些曾经为《新莱因报》工作过的工人、职员、记者、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们。他认为在离开科伦之前必须设法支付应该发给他们的薪水，另外还要偿还报社欠下的债务。但由于反动派的迫害，单凭报社的经费是无法做到这些的，而马克思自己的积蓄也全部用在办报上面了。

怎么办呢？

突然，马克思的目光落在了那架高速印刷机上——这是当初办报时他和燕妮花 800 塔勒购入的。

“卖掉它。”马克思刚想到这里又忽然犹豫起来：“这可是家中唯一一件值钱的财产了，况且，将来或许还用得着它呢。”

但马克思又想起了那些与他患难与共,如今已身陷危险和困境的战友们。于是,他还是下决心卖掉了这部机器,同时燕妮又变卖了一部分家产,另外还借了 300 塔勒,这样才偿付了所有的工资和债务。到此时为止,马克思夫妇为《新莱茵报》总共损失了 7000 塔勒(约合 21000 马克),他们变成了真正一贫如洗的无产者,所剩下的仅仅是一些藏书和一点点衣物。马克思夫妇在困难时刻仍时时惦念着战友和同事们的高尚品质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暂时退却了。但是这种退却绝不是惊慌失措地溃逃,也不是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样卑鄙地放弃革命,而是为了投入另一个地方的战斗。不久,人们在护宪起义最为激烈的南德地区又见到了这两位杰出战士的身影。

马克思把燕妮、琳蘅和孩子们安排回了特利尔老家,然后与恩格斯一道前往南德地区。他们先来到了法兰克福,试图说服法兰克福议会中的左派议员建立强有力的革命政权,采取坚决的革命措施,废除封建义务,从而使护宪起义具有全德国的性质,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但是,此时的法兰克福议会中弥漫着浓厚的悲观失望情绪,议员们拒绝支持南德人民的起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建议被拒绝了。

马克思、恩格斯以为呆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了，于是他们迅速赶往正在举行起义的巴登地区。恩格斯向巴登起义者提出了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军事计划：不在要塞和有驻军的城市中进行局部起义，因为这只能白白耗费力量。应在小城市、工厂区和农村中实行佯攻，以牵制政府军，同时集中兵力于一个防御工事良好的、最方便的地区，建立起革命军的核心。但由于这里的起义处在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控制之下，起义领导人没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在行动上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当然也不敢接受恩格斯大胆的作战计划。后来，马克思又向巴登委员会提出另一项军事建议：立即把起义扩展到法兰克福，派出强大部队去捍卫法兰克福议会，推动革命事业在全德境内发展。但这一主张立即遭到了大多数委员的激烈反对。

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又辗转来到了普法尔茨，这是一个仍控制在起义者手中的小邦。他们在凯则尔斯劳顿找到了临时政府，试图说服它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战略构想，但同样遭到了冷遇。

离开普法尔茨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黑森公园境内突然被当作起义者逮捕了。在当时，如果他们被提交给军事法庭审判的话，很可能被立即处决。可能是由于他们两人没有暴露身份，这伙反动武装后来在法兰克福境内把他们释放了。

在经过一番周折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针对目前的形势商定了对策，然后决定各自的去向：恩格斯返回普法尔茨继续从事革命活动，马克思则携带着普法尔茨民主派的委托书赶赴巴黎，没法求得法国民主派对德国革命的援助。

这样，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之中，这两位亲密的朋友再次分手了。临行前，他们在莱茵河畔长久地徘徊漫谈。天气闷热得令人窒息，似乎在预示着一场巨大风暴的来临。江面上的船只已经早早地收帆定锚了，只有莱茵河水仍旧从容不迫地流淌着，一群勇敢的飞燕贴着起伏涌动的水面迅猛地疾驰，不时地发出欢快愉悦的鸣叫。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地讨论了当前的局势和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并互相勉励，嘱咐珍重，然后，他们紧紧地握手，在依依不舍的目光中惜别了。

燕妮与马克思分手后先来到了宾根，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小城里暂住了几日，直到当掉几件银器筹得了一笔生活费用，才带着琳蘅和孩子们回到了老家特利尔。

每当提起特利尔，燕妮自然会产生出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因为这里是她和马克思出生成长和相识相恋的地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景一物都能从她的心底唤起一种久违了的温煦愉快的回忆。塔楼上的

大钟仍然以那熟悉的洪亮的声音准确地报时，中心广场上的喷泉群依旧汨汨地喷涌翻滚着，就连马克思家旁的那座花园也风采依旧，姹紫嫣红。返乡期间，燕妮前往马克思家探望了年迈的婆婆。在这里，她最熟悉的是那张布满纹饰的桦木大沙发，卡尔就是在这上面降生的，后来，燕妮和卡尔的姐姐索菲亚又经常在这里读书、聊天、做手工，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还有入门处的那间宽敞的书房，当年，卡尔时常在这里翻阅父亲的图书，与父亲亲切地交谈，燕妮也常常来聆听老人家那讲不完的有趣的故事……如今早已物是人非了，但当年的情景却永远地留在了她的记忆里，仿佛历历在目。

但这次返乡，燕妮也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失落和世态炎凉。特利尔此时已经被反动势力控制了，革命者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全城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虽然由于马克思在全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燕妮家又是当地最显赫的家族，地方当局尚不敢对燕妮下毒手，但此时燕妮仍然感到了革命失败给她带来的巨大压力。她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当局警察部门的严密监视之下，而且还时常遭遇到反动分子们的恶毒咒骂和那些小市民们幸灾乐祸的目光。同时，她还要忍受家族中某些亲戚对她施加的巨大精神压力。但最使她难过的是，一向对她关怀备至的

慈母也对她改变了态度，整日里唠叨不休，抱怨燕妮自做自受，给家庭带来了烦恼和灾难。这位老人原指望革命能使女婿飞黄腾达，从此彻底改变女儿的命运，但可悲的现实使她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6月底的一天，心事重重的燕妮给一位女友写了一封信，倾诉了自己心中的烦恼和忧愁，她写道：“我知道，我对你说的和不能对你说的一切，你都能理解。慈母变多了，你知道，痛苦的感觉压在她可爱的心灵上，有多么可怕啊！压抑的生存环境，年迈和孤独在平日那么温柔体贴的心灵上造成固执、自私的性格，使亲人伤心到了极点。你可以想到，在日常生活中有多少细小的接触，我可以这样说，我在这儿还没有自由地呼吸过。而且特利尔平时也是个微不足道的、可怜的小地方，充满流言蜚语和可笑的地方崇拜。这些已经足以使我的心充满痛苦忧虑，况且还有更大的忧虑压在我心头：我思念的爱人，我为他担忧。你会想到，当我得知巴黎起义的时候，我是多么惶恐不安，似乎那里蔓延着可怕的霍乱，我的心一直忐忑不安。另外，我还为我们党所蒙受的严重而普遍的危难和失败而痛苦，为几乎所有为新世界的原则而斗争的人暂时陷入困境而忧愁。甚至当想到亲爱的卡尔迄今幸运地逃过了一切危难时，我感到后怕。我感到还有更大、更可怕的灾难在等待着他。而且我还根本

没有最后确定我们最近的生活环境。亲爱的卡尔始终是心情愉快而令人快慰的，他把当前压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困难看作我们的人生即将大获全胜的先兆。迄今为止，他在巴黎还平安无事，他的愿望是留在那里，也让我们跟他去……”

此时，燕妮的心早已飞到了马克思的身边。她对家乡的一切已经感到厌倦了，她渴望听到丈夫的声音，看到丈夫那虽十分疲倦但始终充满男子汉阳刚之气的面容，与他耳鬓厮磨，日夜相守，哪怕再苦再危险也心甘情愿。不久，燕妮接到了马克思从巴黎发来的信，她立即和琳蘅带着三个孩子匆匆地踏上了旅途。7月中旬，她们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法国的首都巴黎。

此时的巴黎已经与1848年4月马克思离去时的情景大不相同了。那时，二月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工人阶级还掌握着强大的武装力量，政权掌握在以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主的临时政府手中。而此时，经过了震惊欧洲的巴黎六月起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和派两败俱伤：无产阶级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元气大伤；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势力也受到了严重削弱，他们还因镇压了六月起义而身败名裂。此后，法国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逆转，政权落到了法国大资产阶级君主派的代表人物路易·波拿巴的手中，他利用巴罗

为首的资产阶级秩序党组织了秩序党内阁。

路易·波拿巴是威震欧洲的一代枭雄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这位“伟大的伯父的卑小的侄子”是一个志大才疏、野心勃勃的流氓加骗子式的反动政客，他梦寐以求的目标是继承他伯父的事业，当皇帝，统治欧洲。为了实现这一政治野心，他一上台就开始着手创造条件，消灭敌对势力，排除异己，为他通向皇帝的宝座扫除障碍。在马克思夫妇来到巴黎时，他正在利用秩序党内阁镇压无产阶级，打击削弱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加强自己的统治权力。法国的政局正在日益走向反动。

马克思来到巴黎就与这里的民主派和无产阶级组织取得了联系。他看到路易·波拿巴的反动统治已经在人民群众中引起普遍的不满。他们组建了许多秘密革命团体，准备再次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推翻波拿巴的反革命暴政。马克思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但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阻挠，原定的武装起义变成了一场和平的示威游行，结果遭到了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巴黎实行了戒严，政府在全城范围内实行大搜捕，革命的力量遭到了严重损失。

更令马克思夫妇感到难过的，是他们在巴黎耳闻目睹了革命在全欧范围内遭到了失败：7月下旬，他们接到朋友来信，得知巴登—普法尔茨的起义已

惨遭镇压，幸运的是恩格斯死里逃生去了瑞士；在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建立的罗马共和国经过浴血奋战最终被法、奥、西联军所摧毁；8月，由科苏特领导的匈牙利革命在沙皇俄国的出兵干涉下失败了，著名诗人裴多菲在革命中英勇献身。整个欧洲处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厄运很快就降临到马克思夫妇身上了。7月19日，巴黎警察当局派人来到马克思的住宅，命令他立即迁出巴黎，搬到莫比安州居住。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得知这一消息后，把这称之为“丑行中的丑行”，因为莫比安州位于布列塔尼沼泽地带，是一个寒热病肆虐的危险地区，反动派企图以这种方式迫害马克思一家。面对敌人卑鄙无耻的行径，马克思被激怒了，他拒不执行驱逐令，并向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

到这时为止，马克思差不多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接到恩格斯的音讯了：

“他还活着吗？现在在哪里？”他时刻在为朋友的命运而忧心忡忡，情绪也变得极为烦躁。

6月的最后一天，燕妮突然接到了一封来信，拆开一看，写信人竟是他们日夜思念的恩格斯。她立即兴冲冲地把信交给马克思，激动地告诉他：“恩格斯还活着！”

听罢，马克思立刻拿过信来，迫不及待地一口气

把它读完。信中写道：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您和马克思想必都会感到奇怪，我竟这么久没有给你们一点音信……就在我从凯则尔斯劳顿写信给马克思的那一天，传来消息说，霍姆堡已经被普鲁士人占领，因而同巴黎之间的交通已被切断。当时我不能再发信，就到维利希那里去了……我参加了四次战斗，其中有两次，特别是拉施塔特战，是相当重要的；我发现，备受赞扬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质。在整个战役中，虽然发现不少胆怯的行为，但我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在战斗中畏缩不前。而“蛮勇举动”却不知有多少！

“在我们的军团掩护巴登的军队撤退以后，我们比其他一切部队都晚 24 小时进入瑞士，于昨天到达了斐维这里。在战役中以及在进入瑞士的行军途中，我根本无法写信，即使只写一行也不行。但是现在，我要赶快报告一下情况，赶紧写信给您，尤其是我在巴登某处听说马克思已在巴黎被捕。我们看不到任何报纸，因而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究竟真是假，我根本无法断定。您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多么为此焦急不安，我万分迫切地恳求您安定我的心，把有关马克思的命运的真实情况告诉我。因为马克思被捕的这个传闻还没有证实，所以我们希望它不是真

的……”

看完信件，马克思不禁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喃喃地说道：“他还活着。”

突然，马克思哈哈大笑起来，对燕妮说道：“你看，他还担心我被捕了呢！我们必须马上回信，要不然他会睡不着觉的。”

在回信中，马克思向恩格斯介绍了自己目前的处境，并对恩格斯顺利脱险表示祝贺。另外，他建议恩格斯立即写一篇关于南德地区革命的报导，对反动派凶残丑恶的面目进行深刻的揭露抨击。

8月23日，法国官方再次对马克思下达了驱逐令，限令他在24小时之内离开巴黎。此时，马克思的生活正处在最贫困的状态中，无法支付全家人的路费，燕妮也快要分娩了。于是，马克思只得忍痛把燕妮和孩子们暂时留在巴黎（燕妮费了一番周折才获得居留到9月15日的许可），他只身一人于24日乘船去了伦敦。

轮船从法国海滨启航了。马克思久久地伫立在颠簸起伏的甲板上，扶栏远眺，任凭思绪的翅膀纵横驰骋。弹指一挥间30年过去了，这是他人人生旅途的前半程——幸福而又充实的金色少年与充满思辩精神、创造冲动和战斗激情的青年时代。在这个时期里，他深入考察了社会，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并获取

许多宝贵的经验。虽然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灾难和挫折接连不断地落在他的身上,命运把他从一个国度驱逐到另一个国度,但他始终无怨无悔。因为,在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中,他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往人类幸福彼岸的光明大道。

眼望着渐渐远去的欧洲大陆,马克思的眼眶有些湿润了。他想起了处在腥风血雨之中的苦难的祖国,想起了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和法国惨遭蹂躏的土地,想起了那些战死沙场和囚禁在牢狱之中的战友,也想起了滞留在异国他乡孤苦无靠的妻子和孩子们。此时此刻,马克思的心情是极度复杂的,既充满去国怀乡之愁和对爱妻绵绵不尽的挂念,也怀有对死难烈士深深的哀思,但更多的则是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对革命事业更加执著的追求。逐渐地,一条新的地平线在远方升起,那是英国广阔无垠的漫长海岸,新的使命和更伟大的战斗又在向他召唤了。

第二十章

初在伦敦

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八年、而法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年空前的斗争吗？资产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帝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的时候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吗？……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

——马克思

恩格斯在瑞士接到了马克思从巴黎寄来的那封信。他为马克思安然无恙感到万分宽慰，并接受了马克思的建议，在洛桑找了一个十分僻静的去处，开始撰写关于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论著。恩格斯是这一地区革命的参加者，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起义军对反动势力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似乎就发生在眼前，时刻激励着他，鼓舞着他，所以，恩格斯满怀激情和理智很快就完成了这部著作。这部题为《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书是一部政论性的历史著述，也是一部恩格斯的革命亲历记，书中较详细地介绍了南德地区革命运动的曲折过程，并明确地阐释了在武装斗争中革命者所应采取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显示了恩格斯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

9月初，恩格斯收到了马克思于8月23日从巴黎给他发出的最后一封信，得知马克思已经接到了驱逐令，即将奔赴英国。信中写道：“去瑞士不给我护照，所以我必须去伦敦，而且就在明天动身。……我在伦敦创办德文杂志有肯定的希望。……所以，你必须立即前往伦敦。而且你的安全也要求这样做。”

1849年8月26日，一艘渡轮载着马克思一行缓缓地驶入了伦敦港，这大概是马克思第三次踏上英国的土地了。恩格斯晚年时曾对一位朋友说过：伦敦

不如巴黎豪华,但却比它气派,也更加丰富多采。此话一点也不夸张。

伦敦此时大约有 200 多万人口,是一个世界性的工商业大都市。由于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英国在 19 世纪 40 年代末进入了经济空前繁荣的时代。它的庞大的商船队把世界各地廉价的原料搜刮回母国,加工成成品后,又源源不断地销往各个国家。英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伦敦则成了一个巨大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工业基地。经商发财的欲望已经深深地渗入了英国的国民精神之中,并与当地传统的理性主义和求实作风巧妙地结合起来,于是,许多“伦敦佬”变得更加老于世故、工于计算了。对于刚刚来自烽烟弥漫的德国大地和充满浪漫激情的法国人中间的马克思来说,这一切都使得他感到格格不入,一时无法适应。

然而,这个光怪陆离的资本主义乐园也有它的另外一面——伦敦又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历史文化名城:宏伟壮丽的现代化建筑,令人流连忘返的名胜古迹和田园风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众多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无不给马克思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最令马克思感兴趣的还是伦敦各个图书馆中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的图书杂志和文献资料,这为马克思完成他那宏大的科学研究计划提供了良好

的工作环境。另外，英国还有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无产阶级队伍，宪章派的组织是欧洲最大的工人组织之一，这也为马克思考察研究工人运动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而生活在伦敦这个资本主义现代化大城市里，也使得马克思能够更深入地对资本主义社会杂的体系及其微小的细胞进行全方位的科学研究。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英国（除了北美和瑞士之外）成了各国革命者流亡的一个中心，马克思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随着这股移民潮移居英国的，打算在这里暂避一时就返回欧洲大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伦敦竟成了他多年漂泊生涯的最后一站，英国成了他的第二祖国，他此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9月中旬，燕妮、琳蘅和孩子们也来到了伦敦。在朋友的帮助下，马克思夫妇在切尔西区的安德森街找到了一处窄小的住宅。

11月5日在当地是一个重要的日子——200年前的这一天，一个名叫盖伊·福克斯的人在议会大厦的地下室里安置了几桶火花，试图把伪善卑鄙的议会炸掉，但事泄被捕牺牲。从此以后，当地人每年的这一天都要烧稻草人，燃放爆竹，以纪念这位追求正义的勇士，而议会里则充满了恐惧气氛，军警们戒

备森严，四处搜寻，以防不测。

1849年11月5日，伦敦人民又在欢庆一年一度的盖伊·福克斯节，到处可以听到乒乓作响的爆竹声和人民大众的欢声笑语。这一天马克思家里也有一桩喜事：燕妮生下了一个男婴。他们用马克思的父亲的名字称他为亨利·吉多·马克思，但家里人都喜欢称他为小福克斯，有时也戏谑地喊他“小火药阴谋家”，以纪念当地人民心目中的那位英雄。

同许多流亡者一样，初次来到英国的燕妮开始时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环境。在她的眼中，伦敦似乎是一个巨大的缺乏生命活力的城市，到处都是单一的灰色调，大部分房屋、公共建筑、广场和街道都是铅灰色的，甚至连天空也常常被蒙蒙迷雾所遮掩。雾，灰色的云雾已经成了伦敦城的一种象征，它不仅构成了伦敦特有的景致，而且影响了当地人的性情、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苏格兰的英雄史诗、爱尔兰和英格兰的人物传奇在这里都被罩上了一层凝重淡雅的冷色调，甚至连当地画家笔下的四季景物也显得那么晦暗迷蒙。

由于最初接触到的人主要是那些小商贩、房主和店铺老板——被称为“伦敦佬”的小市民阶层，所以，燕妮对这里居民的第一印象也不佳，觉得他们大都比较偏执、保守、喜欢占小便宜和窥探别人的隐

私。另外，市政当局对他们的态度也很不友好，甚至一度想把他们驱逐出去。所有这些都使燕妮感到很不舒服，这种不良感觉一直伴随了她很长时间才逐渐有所改善。

当马克思来到伦敦的时候，欧洲的革命运动正在逐渐走近尾声。面对革命的失败，马克思并没有感到气馁，他清楚地认识到这场波及整个欧洲的大革命有力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专制制度，彻底动摇了封建农奴制度的根基，摧毁了反动的神圣同盟，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虽然各国的反动统治者们试图开历史的倒车，恢复革命前的旧秩序，但这种企图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时间过得越长远，1848年欧洲革命的成果就越能明确地显露出来。马克思坚信，欧洲迟早还要进行更彻底的改造，从而完成1848年革命所未竟的事业。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革命者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但是当务之急是立即对那些革命的流亡者进行救助，使他们不致于冻饿而死。

与马克思到达英国的同时，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和大批革命流亡者为了逃避本国政府的迫害也相继来到这里，伦敦成了欧洲各国流亡者汇聚的一个中心。这么多没有职业和财产的人一下子涌

到了一个语言文字不同、风俗习惯迥异的国度里，他们的生活遇到了巨大困难，许多人流落街头，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因此，马克思认为救助这些革命流亡者是当前最紧迫的一项工作。

9月中旬，马克思向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立即建立一个旨在救济革命流亡者的委员会。这项建议被采纳了，马克思被选为该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设法筹得资金和物资，救济那些生活无着的流亡者，减轻他们的生活贫困。马克思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设法开辟新的捐助来源。他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与各地的同情者和社会团体进行了广泛的联系，以筹集款项和物资，还发动了大规模的募捐运动。他们在一份呼吁书中这样写道：“我们希望用武器为人民的自由而战者不致于沦为街头的乞丐。”

由于马克思等人的积极努力，不久，捐款就从英国各地以及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源源不断地寄来了。救济委员会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需要救济的流亡者身上，大大缓解了他们的生活困难。与此同时，委员会的成员还要设法为他们寻找工作，安排住处，为那些希望去北美的人提供路费。

马克思的家始终对流亡者们敞开着大门，许多人在这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马克思夫妇知道，在这

危难之际，往往一顿热茶热饭或者一句贴心的话和一番热情的鼓励，就能给予这些落难者从困顿潦倒之中暂时解脱出来，并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从而顽强地生活下去，坚持自己崇高的政治理想。此时马克思本人在经济上也十分困难，燕妮正处在产期，极需要照顾，但他还是带头遵守了救济委员会立下的规矩，没有从救济金中领取过一点补助。

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是重建党的组织。马克思认为，应该立即做大量的工作并采取有效的组织措施，把由于革命失败而分散的革命力量重新聚合起来，加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并与德国的盟员恢复联系。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无产阶级不仅要不断壮大自己的阶级力量，提高政治觉悟，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为未来的革命作准备，而且还要抵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错误思潮的影响。在当时，政治流亡者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把所有的流亡者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放弃自己独立的阶级组织。

但是，原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已不起作用了。各地的支部和区部或者被敌人摧毁，或者处于自由涣散状态，同盟过去的领导人有的牺牲或被捕了，有的则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革命运动。为了完成重建党组织的任务，马克思等人采取的

一项重要措施是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实行改组,建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主要成员有:马克思、恩格斯、亨利希·鲍威尔、卡尔·沙佩尔、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和卡尔·普劳德等。奥古斯特·维利希由于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功绩卓著(他是恩格斯在巴登—普法尔茨参加的起义军的司令),经马克思提议也被选入了中央委员会。另一位德国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康拉德·施拉姆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经常把同盟的一些重要成员邀到自己家中,一起就当前局势和革命理论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另外,他还积极参加了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作,并向会员们作了多次政治报告,主要是讲述经济问题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在这一时期,马克思遇见了一位年轻的革命流亡者威廉·李卜克内西。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本人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哲学、语言学和神学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曾在柏林大学等高等学校讲过学。威廉·李卜克内西坚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立志毕生献身于为工人阶级求解放的斗争。1848年革命爆发后,他积极参加了巴登地区的起义和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手持武器同反动军队进

行了英勇的搏斗。革命失败后逃亡到英国,在这里他
有幸与马克思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肩并肩地
投入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代大潮之中。

1848年欧洲革命最终失败了,但是,无产阶级能
否从这次失败的革命中汲取继续战斗的力量?这次
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是什么?

马克思来到伦敦后就一直在认真思考这些问
题。他认为只有及时地对刚刚结束的革命进行全面
总结,不断地丰富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提高无产
阶级的政治觉悟,才能使无产阶级在未来的革命运
动中成为独立而成熟的领导力量,从而推动革命走
向胜利。那么,采取什么方式去总结革命经验,进一
步地发展和广泛地宣传革命道理呢?在当时的条件
下,报刊当然是信息量最大和社会覆盖率最高的一
种宣传媒体。但是,马克思认为如果利用现成的非无
产阶级的报刊去进行宣传活动的話,无疑等于束缚
住了自己的手脚,不能有效地进行科学的理论研究
和革命宣传工作,只有无产阶级自己创办的定期出
版的报刊才能完成无产阶级政党当前面临的艰巨任
务。

创办一份刊物是非常困难的,对此马克思深有
体会。但为了推进革命事业的继续发展,马克思还是
承担起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他四处奔走,给朋友和熟

人们写信,想方设法征集股份,筹措资金,并物色出版商和撰稿人,还要操办购买印刷设备等事宜。恩格斯于1849年11月抵达伦敦后,立即与马克思联手开展办报业务。为了工作方便,他在距马克思寓所很近的麦克斯菲尔德街6号租了一所住房。

为刊物起一个什么名字呢?马克思、恩格斯希望它仍然打着《新莱茵报》的光荣旗帜进行战斗,以此表明无产阶级并没有因革命失败而屈服,但由于它是一份定期刊物,遂取名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根据马克思的构想,该刊物应该成为对无产阶级和同盟盟员进行政治理论教育的工具,起到共产主义者同盟机关报的作用,并应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各地的书店和同盟盟员个人)来发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马克思等人在1849年整个秋冬季节的努力,新刊物的创办工作进展十分迅速。汉堡的克勒尔、舒贝特书局承接了刊物的印刷出版业务,刊物的主编和副主编分别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担任,暂定为月刊,计划以后逐渐发展成为日刊。1850年1月初,康拉特·施拉姆在德国的一些报纸上发表了该刊物的出版启事(启事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指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使命是评述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件,研究最近阶段的政治经济形势,剖析整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

虽然由于出版商感到稿件的内容太激进而推迟了出版时间,但在1850年3月初,该刊物的第一期终于在汉堡出版了,一年内总共出版了6期。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稿件体裁和内容都是丰富多采的,有连载的学术著作,还有论文、书评、综述和小品文。威廉·沃尔弗、约瑟夫·魏德迈和埃卡留斯等都是它的经常撰稿人。但是,那些内容最深刻、文笔最犀利的文章都出自马克思恩格斯之手,他们的一些精典之作就是在这份刊物上面世的。例如,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等等。此外,他们还合写了许多精彩的文章和评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文章和著作总结了欧洲革命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发展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但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在出版发行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其中,资金短缺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曾派一些人奔赴各个国家去筹措资金,但没取得多大收获。但刊物遇到的最大困难其实来自它的出版商。汉堡的书商和其他经销人被刊物上激进的革命内容吓破了胆,有的书商则被反动政府收买了,他们对刊物的出版

发行工作故意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导致大量刊物销售不出去，造成了资金周转严重不畅。另外，反动当局也对刊物施加了巨大压力，制造了不少麻烦。到 1850 年底，《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到第六期就被迫停刊了。

就这样，马克思夫妇刚刚踏上英国的土地就开始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日夜奔波操劳了，为此他们甘愿付出所有的精力、青春和财产，甚至宝贵的生命。然而，他们自己却日复一日地在与贫困作斗争。由于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马克思的一生都是非常清苦的，但由于反动派的迫害和局势的变化，1849 年至 1853 年是马克思一生中生活最为艰苦的一个时期，饥饿，寒冷，疾病，甚至死亡，不断地威胁着他的家人。正如恩格斯所说：“不仅作为政治家，而且作为公民都遭受着迫害，整个资产阶级都以使我们挨饿为乐事，甚至认为这是他们的义务。”

燕妮产后身体很虚弱，非常需要雇一个奶妈。但奶妈工钱太高使她望而怯步了，只好自己来哺乳。然而，燕妮的奶水实在太少了，饥饿驱使着小福克斯拼命地吸奶，有时把燕妮的乳头都吸破了，鲜血常常流进他的小嘴里。由于营养严重不足，小福克斯的身体一直很弱，不断闹病，常常剧烈地抽风，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

一天，燕妮正在给孩子喂奶，突然女房东闯了进来，无理地要求立即付给她 5 英镑。看到燕妮实在拿不出来，她便叫来了两个警察，查封了马克思全家的家俱和衣物，甚至不顾女孩儿们的啼哭，把她们手中的玩具也强行夺走了，并限令燕妮两小时内交钱取物。第二天，马克思夫妇决定从这里搬走。当时天正下着雨，阴冷潮湿，马克思四处奔走，却找不到一个愿意收留他们的房东，好不容易才在莱西斯特广场附近找到了一个破旧的小旅馆，并在朋友的帮助下付清了房租。听说马克思夫妇的家产被查封了，吓坏了那些见利忘义的债主，他们纷纷找上门来讨债，毫无一点通融的余地。此时天色已晚，房东也不放马克思夫妇走，说马克思的财产中可能混有他的东西（英国法律规定，晚间不允许搬运东西）。第三天，马克思把家中的物品全部变卖掉，清偿了一切债务，总算迁走了。

马克思原认为《新莱因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出版可以缓解他贫困的生活状况，但却未能如愿。由于新刊物的赢利很少，马克思的生活仍然十分拮据。不久，他们又被从那个小旅馆赶了出来，一年之中，他们连续搬了多次家，燕妮流了数不尽的眼泪。她曾经千里迢迢跑到荷兰去找马克思的一个叔父求助，但这位殷实的商人不仅不愿意帮忙，反而教训了燕妮

一番,说什么现状是不可改变的,而人则应该适应现状。

面对严酷的现实生活,燕妮悲伤过,但她并没有因此对丈夫的事业失去信心。她坚信丈夫所从事的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事业,并且一定能取得成功。每当想到这一点,燕妮总感到无形中增添了一股力量,于是她咬紧牙关,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去克服生活中难以想象的困难。她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不要认为这些小事造成的烦恼就把我压倒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丈夫就在我身旁,他是我生命的支柱。……任何时候,甚至最可怕的时刻,他从未丧失对未来的信心,仍保持着极其乐观的幽默感。”

出于对丈夫的深刻了解,燕妮十分清楚:凭借马克思的才华和学识,只要他从事一项与赢利有关的职业,全家人肯定会过上富足的日子。但是,为了实现丈夫的(也是她本人的)远大革命理想,燕妮还是无保留地支持他在英国不从事任何市民职业,全身心地投入到毫无赢利目的的科学理论研究工作中。做出这种选择,燕妮要比马克思付出更大的勇气和牺牲,要知道,她是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一个操持着七口之家家务的主妇。

此时,恩格斯的处境也十分糟糕。家庭早已与他断绝了经济联系,理由是他不为家庭的事业出力,反而在外面惹是生非。为了在伦敦生存下去,与马克思并肩奋斗,他曾经尝试从事文学工作,但没有成功。恩格斯对当时的形势做了全面分析:自己只身一人,靠写新闻稿尚能勉强度日,但对于家庭负担很重的马克思来说,情况就极为严峻了,贫困不仅会把全家压垮,甚至会埋没他的天才。恩格斯认为与其和马克思在贫困中共同受煎熬,从而两人都无法正常地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不如自己作出牺牲,以便在经济上能够支持马克思的研究工作。

于是,恩格斯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愿意回到商界的意愿。对儿子的天赋一向很看重的父亲很快就回信了,他要求恩格斯立即去加尔各答赴任,他已在那里为儿子安排了一个“肥缺”。

接到信后,恩格斯感到烦躁不安:加尔各答距伦敦有数千英里之遥,如果接受了这项工作就意味着远离了马克思,从而脱离了革命事业。最后,恩格斯毅然决定放弃这份待遇优厚的工作。

第二封信来得很迟。在信中,父亲同意了恩格斯去曼彻斯特工作的请求。但为了能使儿子安分守己地留在商界,他规定的条件是十分苛刻的:恩格斯到任之初只能拿一般办事员的薪金。

就这样，恩格斯忍痛回到了他万分厌恶的生意场。恩格斯知道他将会遇到许许多多困难和烦恼：没有充足的时间去从事心爱的理论研究工作；流亡者中的很多人将会指责他背叛了革命事业，而他又不能公开阐明自己的真实思想，等等。而且，他到底要在“该死的鬼商业”上干多久——三年、五年、十年？……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

在 1850 年秋末冬初一个朦胧阴暗的早晨，恩格斯与马克思夫妇依依惜别，怀着抑郁怅惘的心情迁居到曼彻斯特，重新回到了欧门——恩格斯纺纱公司。

1850 年 11 月 19 日是马克思家不幸的一天。早晨 10 时左右，正在嬉戏玩耍的小福克斯（此时刚刚度过他的一周岁生日）突然抽风病发作，剧烈地痉挛不已。这个营养不足的可怜孩子像只孱弱的小羔羊一样紧紧依偎在燕妮的怀里，呼吸越来越微弱，不久就在痛苦之中死去了。小福克斯是在马克思夫妇最困难的时期出生的，燕妮拖着羸弱的身体亲自哺育了这个孩子，付出了巨大的母爱和牺牲，但仍未能挽救他的生命。燕妮悲痛欲绝，几次哭昏于地。她后来回忆道：“我多么痛苦啊！这是我失去的第一个孩子。我当时还年轻，不成熟，不知道还会遇到这么大的苦难，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痛苦的了！”

马克思强忍住悲痛,竭力安抚劝慰燕妮,但却无济于事。他立即于当天给恩格斯发了一封信,写道:“……我们的小火药阴谋家小福克斯死了,……你可以想象这里出现了何种景象。恰在这个时候没有你在旁边,我们感到非常孤独……如果你心情好的话,请写几句话给我的妻子,她已经完全失常了。”恩格斯十分理解处在悲痛之中的马克思夫妇的心情,给他们写来了语句感人的慰问信,并寄来了钱。不久,他还亲自来到了马克思家,在心理上和生活上给了他们巨大的安慰和关照。

马克思一家所受的苦难是巨大的,如果放在别人身上恐怕早就承受不住了。在当时那种危险的革命低潮时期,的确有许多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者感到心灰意冷了,他们相继脱离了革命队伍,有的人甚至成了可耻的叛徒。在猖狂的反动逆流面前,马克思如同中流砥柱般巍然挺立。他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无产阶级中酝酿着巨大的革命力量,迟早会摧毁腐朽反动的旧世界。这种坚定的信念及其产生出的乐观精神使马克思能够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仍然超负荷地工作。当然,燕妮和琳蘅体贴入微的关心照顾也给了他很大帮助,她们尽量不让恼人的琐事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能够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科学理论研究和革命斗争中去。

小福克斯死后不久，马克思夫妇把家迁到了伦敦索荷区居住。这里的居民大多数是穷人，主要依靠打工艰难度日，其中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政治流亡者。尽管这里的卫生条件和生活服务设施非常差，并且还有疫病流行，但马克思夫妇都没有感到有多大的不适，因为他们觉得这里的居民都很纯朴善良，他们不以贫穷为耻，也很少有小市民的庸俗习气。

马克思一家居住在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这个住宅只有两间简易居屋，燕妮和琳蘅把小的一间辟为马克思的书房和工作间。由于房间面积太小，几乎所有的空间里都堆满了书籍、报纸杂志、各种资料和写作用具，显得十分杂乱。但马克思却不愿别人替他收拾，因为他的书刊和用具的排列是乱而有序，需用什么可信手拈来，十分方便，他生怕别人打乱了这种“秩序”。稍大的另一个房间是燕妮、琳蘅和孩子们的居室。虽然这个房间又潮又乱，但却是全家最好的处所了，因此又兼作“客厅”，如果有贵客临门又变成了他们的“客房”。1851 年 3 月 28 日，马克思夫妇的第五个孩子就降生在这里，燕妮忍痛把她送回了老家，因为自己家里实在住不开了。

就是在这种简陋艰苦的环境之中，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勤奋地工作着，耕耘着，用他智慧的大脑勾勒着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蓝图，设计着

创建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规划。就如同希腊神话中从天堂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一样，他把光明和温暖带给了人类，自己却默默忍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巨大痛苦。

当时，一位普鲁士警探奉命对马克思夫妇进行了跟踪监视。事后，他就马克思平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秘密报告。其中写道：

“尽管马克思性情暴躁，但作为父亲和丈夫，却无比温柔和体贴。他住在伦敦一个最糟糕因而房租最低的地区。他有两个房间，临街的一间是客厅，后面是卧室。在这套住房里没有一件家具是干净牢固的。一个旧货商人也会对脱手这么一堆惊人的破烂货感到羞愧。

走进马克思的房间，迷蒙的烟雾会刺得你两眼泪流不止，以至于一时感到似乎是在洞穴中摸索徘徊。随着对烟雾渐渐适应，就能够辨别出一些从迷雾中显现出来的东西，每件东西都很脏，布满灰尘，因此坐下来竟成了危险的事情。这边的一把椅子只有三条腿，那边的一把椅子有四条腿，而孩子们正在上面作炊事游戏。这就是给客人坐的椅子，但上面还留有孩子们做的饭，如果你贸然入座，你的裤子就别想要了。

……只要马克思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时，他会不顾疲劳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没有固定的睡觉和起床时间。他常常彻夜不眠，然后午间时倒在沙发上和衣而睡，直到夜晚。从不为进进出出房间的所有外界情况所惊动。”

第二十一章

总结经验

目前这个表面平静的时期，正应当利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

轰轰烈烈的 1848 年欧洲革命以失败而告终，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尚需耐心地等待，革命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进入了它的低潮时期。但这种局面并未能

使马克思产生丝毫的悲观动摇,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经踏上革命的道路,即使遇到失败,也总是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漂游得愈久,就变得愈坚强。”为了全面深刻地总结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发展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素质,以新的姿态迎接未来的革命高潮,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写下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和论文,其中大部分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

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著述中,最重要的当属他的两部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农民战争》。其中,前者是一部政治性的历史著述,详细介绍了南德地区的革命运动(特别是革命的最后阶段)的曲折经历,明确阐释了在武装斗争中革命者所应采取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显示了作者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军事天才。

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恩格斯全面深刻地研究了发生在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详细分析了战争爆发的原因、历史进程和结局。他还指出了农民群众中酝酿的巨大革命积极性,他们历来是革命运动的重要力量,从而阐明了无产阶级取得对农民领导权的重要性。恩格斯在书中还尽情颂扬了农民战争中涌现出的许多杰出人物和德国人民的英勇战斗

表现,旨在宣扬德国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激励他们振作起精神,踏着前人的足迹奋勇前进。尽管这是一部研究德国历史的学术著述,但人们仍可以从字里行间清晰地感觉到疾速跳动的时代脉搏。

1850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先后起草了两份《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分别于3月和6月分发给同盟盟员。在这两份文件中,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欧洲革命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他们写道:“共产主义者同盟已在革命时期经受了两方面的考验:第一,其成员到处都积极地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纸上,街垒中以及战场上,都是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其次,共产主义者同盟受过的考验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

在谈到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革命的失败与大资产阶级的背叛有关,他们不积极领导人民打击封建反动势力,反而与反动派妥协,反对工人和农民,最后自己也受到封建势力的打击迫害。关于1848年革命的教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工人阶级的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领导,他们应该“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工人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

划清界限,不受他们的利用,不再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工人阶级在联合民主派与敌人斗争时,应该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以便在革命胜利后不会失去胜利的果实。他们不仅应当建立自己的政府、代表机构和工人委员会,还应当拥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强调,德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建立一个(具有秘密组织和公开组织的,独立工人政党,把同盟的各个支部变成合法的工人联合会的核心。

在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的历史经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具体的分工:恩格斯负责总结德国革命,由马克思对法国革命进行全面总结。这一时期,马克思发表的最重要的著作是《1848 年至 1849 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经典之作以《从 1848 年到 1849 年》的标题连载在《新莱因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头三期上。1895 年该书再版时,恩格斯把他与马克思合著的《国际评述(三)》并入了这部著作,并改名为《1848 年至 1849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在这部重要的著作中,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对法国革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深刻地分析了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因、性质、过程和无产阶级的作用,其中特别对有关巴黎六月起义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还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例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阶级斗争和建党学说,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无产阶级在社会的经济改造方面的历史任务,等等。其中,马克思在几个问题上的论述对于推动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

第一,革命是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马克思在书中充分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认为革命是加速历史发展进程和解放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事变。他把这形象地概括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指出,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人民在和平时期只能忍受压迫剥削,没有出头之日。只有革命才能打破反动的统治秩序,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生活方式,从而大大推动历史的进步,促进人民群众创造力的发挥。他认为革命并不是一种“社会病态”,而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解放社会基本矛盾的决定性的手段,只有革命才能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推动社会形态的更替。

第二,关于工农联盟问题。在法国二月革命之

前,马克思恩格斯已初步形成了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战胜反动统治阶级的重要保障。1848年法国革命的失败进一步证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因此,马克思在总结革命时认真研究了农民问题,分析了农民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指出六月起义之所以失败,除了无产阶级自身不成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民没有支持工人。他认为农民与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剥削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因此他们是天然的同盟者。他写道:“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因此要夺取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必须(而且也有可能)与农民结成联盟。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在写《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已经有了这一思想,但他当时只是使用了“无产阶级的终治”这一字眼来表述问题的。在这部光辉著作中,马克思首次运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阶级性的概念。他认为小资产阶级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空想在革命中彻底破产了,事实证明,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本阶级的专政。他在文中写道:面对强大的资产阶级国

家,工人阶级只能提出“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他还写道:“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以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第四,不断革命。这一思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已经提出来了,他指出无产阶级应该参加民主革命,但不能就此止步,应该进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使他清楚地看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改良主义者对革命所抱的目的是很有限的,因此,马克思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和《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都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在这两部著述中,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目光短浅,只想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微小的改良。他指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都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者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都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

止。”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同时,他们重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工作进展也很快,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各地的组织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仅在德国就建立了18个支部和6个总部。所有这些都使得欧洲各国的反动派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普鲁士政府更是坐卧不宁,时时在寻找机会,企图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其领袖马克思、恩格斯进行迫害。不久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时机——柏林发生了刺杀国王事件。

1850年6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遭到谋刺。案件本来已经水落石出了,凶手是一个极端的保皇党人、陆军中士泽弗洛盖。但是,反动政府却不想轻易了断这件事,它企图嫁祸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和马克思。普鲁士政府立即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怂恿它打击迫害马克思,把他从英国赶走。英国政府对马克思的革命活动早已感到十分头痛了,也想借机对马克思进行政治迫害,于是派出许多警察和暗探连续多日对马克思全家进行了极其严密的监控,并利用报刊散布谣言,说什么案件发生时马克思正在德国,可能与案件有牵连。警察和暗探的监视活动十分频繁猖獗,使马克思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

受到了极大的妨碍。

为了反击敌人的无耻溢言，粉碎他们的政治阴谋，马克思、恩格斯决定立即把反动政府的阴谋和卑鄙伎俩公诸于世。不久，《旁观者》、《地球》和《太阳》等报纸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公开信。马克思在信中指出，他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时致力于反对普鲁士统治方式的斗争，后在政府的压力下被迫离开了德国，但普鲁士政府始终没有忘记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和迫害，它先后迫使法国和比利时政府驱逐了他，并对他进行了多次指控。现在他来到了英国，普鲁士政府又试图迫使英国政府驱逐他，为此不惜采取卑鄙的手段。马克思在公开信中把反动政府的政治阴谋曝了光，使广大民众了解了事实真相，纷纷谴责政府的拙劣行径，英国政府的这次迫害行动不得不就此收场了。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已经对 1848 年欧洲革命作了深刻的总结，但是，他并没有就此停止对法国革命和革命后急剧变化的局势进行观察研究。路易·波拿巴上台以后，法国的政局不断向右转，统治阶层日益走向反动。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发动反革命政变，控制了整个巴黎，强行解散了法国国民议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搜捕，建立起了波拿巴专政。恰好一年之后——1852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在大资产阶级的拥戴之下自封为法国皇帝,建立起了法兰西第二帝国。这两个重要事件都发生在12月2日,看似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但实际上完全是路易·波拿巴精心策划的——因为在历史上,路易·波拿巴的伯父老拿破仑曾经在12月2日做过两件大事:1804年12月2日,老拿破仑携夫人约瑟芬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从此开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统治;1805年12月2日,他又取得了他一生引以自豪的一次战役——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胜利。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说明,路易·波拿巴企图效法他的伯父,在法国重建老拿破仑式的独裁统治。

反动政变发生之后,恩格斯立即给马克思写信,建议他写一篇评论这次事变的文章。马克思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立即着手收集材料,日夜伏案写作。

马克思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写作这部著述的。他的经济状况仍然十分糟糕,常常要靠典当衣物度日。他的一件大衣曾经在一年内两次被典当,以解燃眉之急。此时,他已经深深体验到了什么叫作贫困,因为他本人和妻子儿女们就正在这种生活状况中苦苦地挣扎,并且时时濒于死亡的边缘。为了使全家人摆脱这种状况,他曾经一度想移居北美洲,象许许多多德国流亡者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所做的那样,但因缺乏路费而未能成行。由于反动派的残酷迫

害和长时期超负荷工作，马克思的身体也遭到了摧残，1852年初生了一场大病，整整一个月卧床不起。但是，马克思依然抱病坚持写作。他几乎每天都要写到深夜，有时甚至几天几夜连续工作，累了就大量地抽廉价的雪茄烟，目困了就披着大衣在沙发上小憩一会儿。就这样，凭着坚韧的毅力和革命责任心，他在短期内就写出了一部经典性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3月25日，书稿最终完成，后来发表在已迁居到美国的老友魏德迈创办的《革命》杂志上。

这是一部研究法国的阶级斗争和政治状况的学术专著，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独特的风格。正如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如果憎恨、轻蔑、对自由的热爱曾经在什么地方用燃烧、破坏和激昂的语句表达过，那就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里，这书把塔西伦的严肃的忿怒、尤维纳利斯的尖刻的讽刺和但丁的神圣的怒火综合在一起了。”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再次深刻地总结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对革命后的政局变化（直至路易·波拿巴政变）做了全面研究，进行了科学的理论总结。在同时代人中，尚没有一人能够对上述问题做出正确的分析解释。例如，几乎在同一时期，伟大的法国浪漫主义文

学大师维克多·雨果发表了著名的揭露性论著《小拿破仑》，书中把波拿巴政变说成是一个普通人的个人欲望膨胀的结果；蒲鲁东同期也发表了题名为《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的著作，对波拿巴的行为和思想做了公开的辩护，并大加赞赏。只有马克思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对法国发生的事情做了科学的阐释。

马克思深刻剖析了波拿巴政变发生的社会原因和波拿巴主义的特点。

马克思指出，这次政变是法国阶级斗争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法国社会内部严重的阶级对抗使得资产阶级特别害怕无产阶级革命积极性的高涨，为了保存剥削制度，他们甘愿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形式，决定把国家权力完全交给一小撮野心家、军事独裁者。波拿巴政变表明，资产阶级的反动性日益加强了，而且他们当时也不能借助议会制度进行统治，而此时工人阶级也没有力量发动革命，阻止反动政变的发生。

马克思认为波拿巴主义代表了法国社会中最反动阶层的利益，它的特点是：在各个阶级之间纵横捭阖，进行蛊惑性的宣传，以掩盖其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真实面目。它依靠军阀、官僚进行血腥的恐怖统治，采取欺骗、贿赂等种种卑鄙的方式对付人民群

众。马克思指出,这个充满内部矛盾的政权必定遭到彻底的失败。

书中有一段话对波拿巴组织的流氓团体“十二月十日会”的社会成分进行了全面透彻的分析,这也是对波拿巴集团的丑恶面目进行的最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的揭露和鞭笞。马克思写道:“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放荡者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逃脱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沉浮流荡而被法国人称作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的十二月十日会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的成员都和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是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这就是不加掩饰的波拿巴。

马克思论述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国

家的关系的原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全面研究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考察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建立和倒退到第二帝国的历史。他认识到,在斗争中,一切剥削阶级都要把国家机器夺到手中,并不断地完善它,用它为自己的剥削和统治服务。他指出:“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夺取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根本不同,它要消灭一切私有制和剥削者的反动统治,因此它不能利用旧的国家机器为自己服务,而必须集中全力摧毁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后来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还深入研究了法国的农民问题,进一步阐述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马克思在谈到农民对波拿巴政变的态度时指出,农民之所以支持波拿巴是由于他们政治上的落

后、同城市文明和政治生活相隔绝造成的。另外，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苛捐杂税也使得农民希望小拿破仑能象老拿破仑一样维护小农的利益，他写道：“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

马克思在揭示农民身上的保守性的同时指出，农民阶级也具有革命的倾向，特别是随着小农经济的瓦解和资本剥削的加重，必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摆脱对波拿巴的迷信，农民阶级的理智和利益必将会使他们与无产阶级采取共同的革命行动，他们终将把负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使命的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同盟者和领导者。马克思指出：如果有了农民作为同盟者，“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在这里，马克思对工农联盟的原理做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论述。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还对关于一个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与该阶级本身的关系问题做了重要的论述。

马克思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思想家必须与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群众具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这是十分庸俗的。马克思认为，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某一阶级的思想家，主要取决于他在理

论上得出的结论是否与这个阶级的成员通过自己的物质利益所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而并不完全取决于他本身的社会生活方式。例如,并不是说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本身就应该是小业主或者作坊主。

在认真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的前途进行了大胆的预测。但在这方面,他们的认识曾经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在 1850 年夏季之前,马克思恩格斯一度相信新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因为新的经济危机爆发在即,它必然会引起新的革命高潮。这种观点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研究》第二期的国际述评中有所反映。但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经过研究,以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否定了这一结论。1850 年夏季之后,马克思认真研究了欧洲的经济形势,他认识到 1847 年的经济危机(它曾经为 1848 年欧洲革命做了充分准备)已经完全过去了,资本主义正处在繁荣发展的阶段,1849 年和 1850 年则出现了空前的经济高涨,因此,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企图都会失败。欧洲的反动势力增强了。在这种形势下,资本主义世界中暂时是不会爆发革命的。

那么新的革命高潮在何时才能到来呢?在此,马克思强调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新的革命只能在

新经济危机爆发后才有可能出现。他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本主义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新的危机产生之后，新的革命高潮才会到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面，经济危机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的革命也迟早会到来。

马克思做出上述结论是需要付出极大勇气的，因为这不仅是一场激烈的自我批判，而且意味着他在近期内返回故乡的希望已十分渺茫了。另外，共产主义者同盟还必须改变其战略和策略，即共产主义者同盟现在不是在为一次即将到来的革命作准备，而是在为未来的革命长期地、异常艰苦地聚集力量。为此，他需要说服同盟的其他成员接受自己的看法。但是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遇到了十分严峻的挑战。

尖锐的反对意见首先来自流亡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公开叫嚷新的革命即将来临，并成立了所谓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为回国发动革命夺取政权做准备，甚至扬言要建立一个全欧共和国。这些人的领袖人物是马克思以前的朋友卢格和哥特

弗利德·金克尔,他们喋喋不休地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制订的革命策略,并恶毒地污蔑马克思挥霍掉了援助流亡者的款项。

但更令马克思感到痛心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也出现了新的宗派集团,其领头人是生性莽撞的奥古斯特·维利希和马克思多年的战友卡尔·沙佩尔。他们不断地制订十分冒险的“革命”计划,试图立即在德国发动武装起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稍具理智的人都会知道,这种政策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和不良影响,只能有利于反革命势力。

马克思、恩格斯花费了大量时间对这些持左倾观点的人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他们告诉这些人,党在决定政策和策略时,依据的不是主观想象而是真实的客观条件,从1848年下半年开始,资本主义已转入繁荣期,革命则进入了低潮。共产党人当前的任务是发展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培养干部,长期地为革命积聚力量,而不是进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所谓“革命”。

但维利希、沙佩尔等人不仅不听从劝告,反而指责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立场不坚定,背叛了革命事业。由于双方谁也服说不了谁,中央委员会分裂成了两大派,不断发生激烈争吵。为了分清是非,避免分

裂,马克思出了一个“权宜之计”:把同盟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在伦敦则成立两个区部委员会,二者互不隶属,但都同属于一个党,以便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把持不同意见的人团结起来。但是,持左倾盲动观点的少数人企图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同盟中央委员会,于是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以马克思为首的多数派与维利希、沙佩尔等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一次会议上,马克思首先发言。他提出了中央迁址和伦敦成立两区部的建议,并对这一构想做了认真的阐释。

“我为什么提出这个建议?”由于情绪有些激动,马克思讲话的嗓音显得很宏亮。“因为有人企图用唯心主义取代《共产党宣言》中的唯物主义原则。他们从狭隘的民族感情出发,主张立即发动革命,夺取政权。而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明白无误地告诉工人阶级:切勿轻率冒进,做好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

“没有毅力和意志就没有革命的胜利!”维利希以1848年革命的英雄自居,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架势,声嘶力竭地叫嚷道。“靠耍笔杆子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么马上进行革命,要么就躺下来睡大觉!”

“有些人企图把《宣言》的维护者说成是保守反动分子,这种办法是不能奏效的。”马克思丝毫没有

被维利希的猖狂气焰所压倒，他以一种镇定而又十分坚决的语气给维利希以有力的回击。“那些叫嚷要即夺取政权的所谓‘革命英雄’只能把人们引入歧途，使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从而葬送掉革命事业。”

“坐在书斋里搞理论研究只能坐失革命的良机，这是一种可耻的懦夫行为，是对工人阶级事业的背叛！”沙佩尔早已坐不住了，也加入到论战中来。“现在敌人已经举起了屠刀，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如果你们不愿意参加我们的战斗，咱们就分道扬镳吧！”

“革命绝不是儿戏！”面对这伙已经丧失理智的狂热分子的表演，马克思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你们号召人们立即举行武装起义，但又知道这样做必然会失败。你们可以借机发泄自己的急躁情绪，可以成为‘英雄’，永垂不朽，而把广大工人群众和革命者的生命却视如草芥，这能说明你们才是真正的革命家吗？目前的经济形势决定了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只有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的党才能做出夺取政权的决定！”

马克思等人据理力争，把维利希、沙佩尔驳斥得体无完肤，哑口无言。但是，他们不仅不接受正确的意见，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同盟内部的斗

争也日趋激烈，维利希与施拉姆之间还进行了一场流血的决斗。

后来维利希、沙佩尔等人在党内组织了一个宗派集团，另立“中央”，公开进行分裂活动。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及时地制止他们的分裂活动，以防造成更大的危害，1850年11月，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中央委员会（此时已迁至科伦）把这些分裂分子开除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把这件事通报了全体盟员。

虽然恩格斯已于1850年11月迁居到了曼彻斯特，但他与马克思之间依然保持着非常频繁密切的联系，两颗伟大的心始终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只要有会或经济条件允许，他们总是要到对方的家中小住上一段时间，共同切磋研究理论问题，制订写作计划，或者纯粹是为了休息了一下。每逢节假日，马克思全家都迫切地盼望恩格斯能前来做客，因此，燕妮时常在过节前夕专门写信，询问恩格斯是否到伦敦来。

1852年的圣诞节，恩格斯是在马克思的家中度过的。他给孩子们和燕妮带来了珍贵的节日礼物，马克思夫妇此时虽然生活很拮据，但还是买了一棵贵重的圣诞树，张灯结彩，把简陋的居室装点一新。晚饭后，当孩子们正在兴高采烈地玩他们的新玩具时，

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到了小小的工作间，面对面地坐在写字台前，促膝畅谈起来。

他们讨论了整个欧洲的经济形势和工人阶级的斗争，研究了德国统一运动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他们认为虽然革命正处于低谷，但新的革命高潮终将来临，共产主义者现在必须集中力量从事革命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为未来的革命培养骨干力量。

“我要抓紧一点一滴时间，”马克思认真地说道，似乎是在字斟句酌。全力以赴地从事经济学的研究。某些盲动主义者说这是脱离革命斗争，恰恰相反，我的一切研究工作都是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你放心地去干吧！”看着马克思那日渐憔悴的面孔，恩格斯深情说道。我坚信，你的选择百分之百地正确。经济上的问题不要担心，我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这时，燕妮走进了房间，恩格斯立即站起来，说道：“我看我们还是为节日再干上一杯。我的箱子里还有几瓶酒，那是咱们家乡的摩塞尔葡萄酒，是上等的佳酿，琳蕻也要喝上一杯。”

喝着恩格斯带来的家乡美酒，马克思和燕妮都非常激动，他们仿佛又看到了家乡美丽的葡萄园，看到了摩塞尔河两岸旖旎多姿的风光。在这个圣诞之夜，马克思的家里充满了喜悦温馨的节日气氛。

虽然室外的气温已经远远地低于冰点,但身体状况不佳的马克思执意要亲自送一送恩格斯。他冒着纷纷扬扬的飞雪和茫茫夜色,穿过了大半个伦敦市区,一直把恩格斯送到了火车站。

由于过度兴奋和受了风寒,马克思患了重感冒,回到家就病倒了,卧床休息了好几天。恩格斯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写来了慰问信,并向燕妮表示了深深歉意。但在回信中,燕妮没有流露出任何一点怨言,她甚至说“这样的特殊事件通常会得到非常有益于健康的效果”。

但由于长期旅居两地,各自都有非常繁重的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互间进行联系的主要手段是通信。因此,在他们浩繁的著述当中,书信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如其人。如同树叶的脉络和人的指纹各不相同一样,每个人的文字都具有各自的风格和特色。单从这两位伟人的书信来看,马克思的文字犀利深刻,感情奔放,气势恢宏,他在信中喜欢旁征博引,时常表现出一种思想上的跳跃性。而恩格斯的文字则典雅严谨,流畅鲜明,具有浓厚的幽默感和深邃的穿透力。文风虽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文字所表达的精神境界却如此地接近,大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对

人类进步事业的关注和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在这些浩若烟海的书信当中,这两位伟人所讨论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语言学、军事学和自然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等等。他们也时常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策略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通过这些书信,人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两位思想巨人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发展轨迹,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和这两位伟人的生平事迹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信中也时常就当时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一些日常琐事及时地交流信息,发表自己的见解,对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学者的反动观点进行揭露和批判,并评价分析他们读过的书籍。有时候,他们也在信中畅谈自己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是一部记载着他们伟大革命生涯的编年史,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光辉的共产主义思想、伟大的政治抱负和高尚的革命情操,是他们留给后人的一笔无法估价的宝贵财富。

第二十二章

痛苦与欢乐

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重痛苦！欢乐固然值得颂赞，痛苦亦何尝不值得颂赞！这两位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她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魂。她们是力，是生，是神。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凡能体味她们的，方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生时的甜蜜。

——罗曼·罗兰

1851年,蒲鲁东在巴黎出版了他的新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概念》。在这本书中,在他充分阐释了他的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鼓吹组织由劳动者入股的“交换银行”,发放低息贷款,用和平的、纯经济的方法进行社会改造,建立一个“没有权力的社会”。在这部著作中,蒲鲁东继续坚持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任何权威和国家制度的错误立场。

马克思是在这一年的夏季读了蒲鲁东的这部著作的。他认为当前欧洲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一些人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悲观失望情绪,在这种形势下,蒲鲁东的错误说教会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中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涣散人们的革命意志,因此必须予以坚决的回击。于是,他立即给恩格斯写信,告诉他自已决定写一篇批驳蒲鲁东主义的论文,并请恩格斯也参予这项工作。

恩格斯欣然接受了马克思的建议,于百忙之中立即开始动笔写作,10月底,他把自己整理好的材料寄送给了马克思。马克思非常赞赏恩格斯提出的基本观点和搜集的材料,决定修改后在魏德迈创办的《革命》杂志上发表。他在给恩格斯的回信中写道:“我在这里又读了一遍你的批判……如果再添上一些我的废话,它可以由我们两人一起署名出版……”

但就在这时，法国发生了路易·波拿巴政变，马克思把主要精力转到了评价这次反动政变上，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便暂时停止了。

此时，马克思暂时放弃对蒲鲁东的批判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正在忙于应付发生在德国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下半年迁往科伦后，在恢复同盟组织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使得德国的反动势力感到极为恐慌。与此同时，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从同盟分裂出去之后，公开叫嚷要组织暴动，掀起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引起了反动当局的高度关注。但统治集团的头面人物们十分清楚，真正给他们的统治地位造成威胁的并不是这些空想家和盲动主义者，而是以马克思为首的那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的柏林警察总监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现在有理由这样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它要比所有流亡者、鼓动家和中央委员会文明得多，因为它确实掌握着很多知识和精神力量。马克思本人是知名人物，众所周知，他脚趾尖里的精神财富要比其它一切社团和人们脑袋里的精神财富还要多。”于是，普鲁士政府开始着手迫害这些真正的共产党人了。

1851年5月的一天,普鲁士警方在莱比锡车站逮捕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秘使诺特荣克。警察从他身上找到了《共产党宣言》、《告同盟书》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等文件,另外,还搜出了部分盟员的通讯地址。根据这条线索,反动军警立即进行了大逮捕,许多同盟盟员和中央委员会成员被野蛮地投入监狱,其中有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贝克尔和勒泽尔等著名的革命活动家。著名诗人、同盟盟员弗莱里格拉特幸运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捕,火速赶赴伦敦,向马克思报告了这一消息。

马克思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非常沉痛,因为这些被捕者大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优秀成员和骨干力量,也是他亲密的朋友。马克思立即把这件事情通报了恩格斯,共同商议组织营救战友的行动。

普鲁士当局采取这一措施是蓄谋已久的,他们的目的是一举摧毁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心腹大患,使其丧失活动能力,因此他们并不想轻易地了结这件事,而是决定在科伦组织一次能引起轰动的审判,把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定为“叛国罪”。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并采取了最卑鄙的手段,四处搜集所谓“罪证”。普鲁士的政府派出了以警察顾问施梯柏为首的大批警官,到欧洲各地进行活动,与各国反动政府相勾结,物色利用可耻的叛

徒，盗窃情报。他们伪造证据，散布谣言，企图一举消灭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共产党人。正如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H·格姆科夫所指出的：“通常，都是为了弄清犯罪而进行审讯，但现在，却是为了能进行审讯而去犯罪。”

被捕的革命者们在监狱里受到了非人的虐待，有的人甚至遭到了野蛮的刑讯。例如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罗兰特·丹尼尔斯被关在潮湿发霉的监牢中达半年之久，其间既不准家人探视，也不准阅读书籍，受到了残酷的折磨，身体完全垮掉了。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表现都很英勇，使敌人一无所获。

马克思时刻惦念着在狱中受煎熬的同志们，他一方面积极开展营救工作，一方面派人前去探望照顾他们的家属，以便减轻他们的痛苦。燕妮也给她所熟悉的受害者家庭写了慰问信，她在给丹尼尔斯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通过我丈夫的朋友给你写来几行信，对你致以衷心的问候，并再次向你保证对你的命运的真诚的同情。……科伦人的长期拘留使我丈夫十分痛苦，他以极大的同情怀念着你亲爱的丈夫。我们许久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了，我们期盼能得到它。最近几天，你可以在《科伦时报》上看到卡尔的一个声明。这里的流亡者背后议论愈来愈多，有必要把

盖子揭开。……希望很快听到你的好消息,再次致以衷心的问候。”

为了粉碎敌人可耻的政治阴谋,揭露他们散布的种种谎言,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同盟的其他成员们积极地行动起来。他们想方设法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批驳敌人的阴谋和谣言,并且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揭露警察当局制造假证和散布谣言的丑恶行径。为了做好这些工作,马克思在伦敦专门组织了一个办事班子,负责搜集整理材料,了解案情。这个班子为科伦共产党人的辩护律师提供了非常翔实确凿的辩护材料,在法庭审讯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

对于马克思当时的工作情况,燕妮在 1852 年 10 月 28 日致美国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描写道:“我丈夫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了揭露警察部门的伪造,必须提供官方确认的酒店老板的证词和经官方验证的所谓记录人李卜克内西和恩格斯的笔迹。而后必须把全部文件抄写 6 至 8 份,通过各种途径经由法兰克福和巴黎等地寄往科伦,因为写给我丈夫的信和从这里寄往科伦的信总是被拆开和截走。这些就是目前警察当局为一方与我丈夫为另一方所进行的斗争。他们把所有一切和整个革命,甚至把对诉讼的领导,全部归罪于他……总之,如果不亲临其境,发生这些事情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我们现在甚

至可以期望我们的朋友被判无罪。同这种以金钱和一切斗争手段武装起来的官方势力作斗争自然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斗争的结果我们胜利了,那就更加光荣……”由于以马克思为首的共产党人团结一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当局一手策划的这场骗局很快就被彻底揭穿了。在铁的事实面前,原告提出的重大“罪证”纷纷不攻自破,连警方也不得不承认其中大部分纯系伪造。反动派的卑鄙伎俩和险恶用心在全世界公众面前暴露无遗。如果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审判的话,所有的被捕者都应被宣判无罪,但是,普鲁士政府对法官和陪审员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1852年11月12日,法庭宣布11名被告中的7人有罪,其中:列斯纳被判有期徒刑3年,赖夫、奥托和贝克尔5年,毕尔格尔斯、诺特荣克和勒泽尔6年。丹尼尔斯虽然被宣告无罪,但由于他在拘留中得了重病,出狱后不久就去世了。马克思愤怒地指出:这些人的罪名是事先就确定好了的,因为他们是站在“由陪审法庭所代表的统治阶级面前。”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虽然结束了,但斗争仍然在继续。诉讼结束后不久,在马克思的指导下,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旨在对被判罪的共产党人及其家属进行救济。马克思为该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呼吁书,呼吁有觉悟的工人帮助这些受害者们减轻痛

苦。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写了一部新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是一部用辛辣锐利的语言写成的论著,它通过大量事实说明:科伦审判完全是反动当局一手策划的,他们使用了最卑鄙下流的手段,以达到陷害共产党人的罪恶目的。书中还对普鲁士国家制度的丑恶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批判,揭露了司法部门的不公正性和陪审制度的阶级性。这部手稿在瑞士印刷成书,但在运往德国途中被反动当局全部查获了。后来,这本书在美国的一家报纸上陆续发表,并流传到了欧洲大陆。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被捕和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之后,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陷入了瘫痪状态,新的迫害又接踵而至。鉴于这种形势,马克思认为,欧洲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新的革命高潮不会马上到来,如果同盟继续存在下去,还会遭到敌人疯狂的迫害,因此,共产党人再利用旧的形式进行活动已经不合时宜了。1852年11月17日,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委员会通过决议,宣布同盟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解放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结束或者失败,同盟的精神并没有消亡,它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依然响彻于全世界,它培养锻炼出来的千千万万革

命者成了以后欧洲各国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在新的形势下,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保存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的骨干力量,加强同进行革命活动的工人组织的联系,发展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满怀信心地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是不会停止的,它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直至取得最后胜利。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他们不可能把《新莱茵报》、《宣言》以及类似的东西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他们的一切号叫也无济于事。”

在整个欧洲,19世纪50年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年代。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失败了,大部分国家又恢复了专制统治,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普遍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报刊被强行查封了,人民大众被剥夺了一切自由和民主权利。英国虽然受到的冲击较小,但统治阶级的政策也在向右转,两大执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都激烈地反对任何进步的改革。激进分子和政治流亡者受到了最严厉的监控,他们在政治上倍受歧视,经济上则陷入困顿。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马克思及其家人的生活也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

自从来到伦敦后,由于反动派的迫害和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马克思一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生活非常贫困。马克思虽然组织过对政治流亡者的

大规模救济活动,但他自己从未动用过一点救济款。当时伦敦的物价高得惊人,单单住房一项就要花去不少钱,因此在最初阶段,居住问题竟成了马克思全家面对的最大困难,他们曾经多次被房主赶走。

1850年12月,经过了数次搬迁的马克思把家安在了索荷区第恩街。这里是人烟稠密的贫民区,参差不齐的破房鳞次栉比地座落在一起,到处是晾晒在绳索上的破衣烂衫,显得杂乱无章。胡同里肮脏狭窄,随处可以见到一个个垃圾堆和臭水沟,一到下雨天,街道就变成了沼泽,令人无法插足。这里没有自来水和医院,街灯也少得可怜,生活设施和卫生条件都极差,有时还流行可怕的霍乱。在两间阴暗潮湿的房间里,马克思一家居住了整整6年之久。

1856年,燕妮先后从一个叔父和母亲那里继承两笔不大的遗产,于是,他们全家人迁居到了西北郊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这里的环境和居住条件都比原来好许多,但由于家境仍不够宽裕,他们用的家俱都是从别人手中买来的二手货,除了马克思使用的写字台和书架外,房间里只有一张破破烂烂的茶几,几把摇摇欲坠的椅子和吱嘎作响的床,就连窗帘和摆在壁炉架上的花瓶都是旧的。

不仅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吃饭问题也是如此,马

克思常常要为全家人的一日三餐而四处奔波,劳心费神。他曾经在给朋友的信中幽默地写道:“一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帐,我不能再吃肉。”几个星期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个星期,我每天不得不奔走6小时找那倒霉的6便士,为了能在牙齿上放点什么……”

政治迫害和营养不良长期困扰着马克思一家,再加上操劳过度,病魔也不断光顾他的家门。马克思原本十分强壮的身体逐渐垮了下来,他患上了眼疾和风湿,后来又染上了肝病,妻子燕妮和管家琳蘅也经常病魔缠身。我们可以从1852年9月8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深刻体味到马克思家中的这种窘境,他写道:“今天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收到你的信。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在现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饮食自然没有什么益处。给德纳的文章我没有写,因为我连读报用的便士也没有……”

但最令马克思、燕妮担忧的还是他们的孩子们。

马克思夫妇的子女都出生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漂泊不定的生活和拮据的经济状况使他们从小就缺乏充足的食物和良好的居住环境,饱受贫困的

煎熬，还时常与父母一起遭受反动当局的迫害。另外，由于马克思夫妇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之中，拿不出充裕的时间照顾自己的子女们。在这种恶劣的生活环境之中，孩子们的体质大都比较差，病魔时时威胁着他们弱小的生命。

燕妮生过 7 个孩子，其中竟有 4 个过早地夭折了。儿子亨利希（即小福克斯）于 1850 年 11 月死于肺炎，当时他才刚满周岁。此后不到 4 个月，燕妮在忧伤和病痛之中生下了女儿弗兰契斯卡。为了给这个生来就十分衰弱的孩子购买营养品，马克思费尽了周折。由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已被封闭了，马克思此时正债务缠身，过去的股东们都不愿借钱给他，于是马克思只好向岳母求助。但岳母告诉他此时她也无能为力，因为燕妮的弟弟埃德加尔带着燕妮的一笔钱去了墨西哥。马克思不得已只好转向与自己一直不睦的母亲借钱，但遭到了拒绝。后来，还是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寄来了一笔款子，才算暂时解了燃眉之急。但由于恩格斯此时刚到那里去工作，手头也不富裕，还难以把马克思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在这种极端贫困的状况下，小弗兰契斯卡的身体情况一直没有根本好转，时常患病。虽然马克思夫妇在她身上倾注了不少心血和慈爱，但她最终还是没有避免小福克斯的厄运，只活到了一岁多一点就病逝了。

伤心的燕妮在一封信中写道：“可怜的孩子同死神搏斗了三天，受了许多罪。失去灵魂的小尸体停放在后面的小房间里，我们大家都搬到前面的房间里来，夜晚逐渐降临，我们睡在地板上，三个活着的孩子同我们在一起，我们在哭停放在我们身边的小天使，她已经冰冷地长眠了。”女儿死了，马克思夫妇竟然拿不出钱来为她买一口小小的棺材。燕妮发疯似地四处求人，最后，还是一位法国流亡者向他们提供了这笔钱，才使这个弱小的灵魂有了一个安息之所。

但是灾难并没有到此结束。1855年春天，马克思夫妇遭受了一次最沉重的打击——他们8岁的爱子埃德加尔死了。

埃德加尔长得活泼可爱，是全家人的宠儿。他天赋极高，聪慧好学，又很听话，全家人都很喜爱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穆希”（意即“小麻雀”），恩格斯则常常叫他“穆希上校”。穆希3岁时，燕妮在一封信中这样描绘了他：“我们的胖小子十分滑稽有趣。这个小土神整天拖着嗓门唱些滑稽可笑的歌，当他引吭高唱弗莱里格拉特的马塞曲时，房子都在颤动，他唱道：

“啊，六月呀，来吧，你这立功的时刻，我们渴望最勇敢的行动。”

马克思的朋友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小男孩，愿意

跟他逗着玩。有一次，一个叫皮佩尔的同盟盟员送给穆希一个漂亮的笔记本，事后又假装要收回这个本子。穆希很害怕，赶快把本子藏了起来，并悄悄地对父亲说：“摩尔，我已经把本子放在一个最秘密的地方了。如果皮佩尔再来要，你就告诉他：我要把它送给一个要饭的。”

穆希的童年是在极其贫困的生活境况中度过的，他最讨厌的人是那些上门讨债的家伙。一天，面包房老板又来讨债了。当他问马克思是否在家时，穆希眨了眨机警调皮的小眼睛，大声回答道：“不，他不在楼上！”说罢，迅速地从老板的篮子里拿走三个面包，藏在胳膊下面飞快地跑上了楼，给马克思报信去了。马克思非常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儿子，把他看成全家人未来的希望，时常与他一起玩耍交谈，给他讲各种各样奇妙有趣的故事。

1855年初春，埃德加尔得了一种严重的胃病，身体变得异常虚弱，骨瘦如柴。马克思和燕妮对他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料，昼夜守候在他身旁，并鼓励他与疾病作斗争。小穆希遵从了父母的教诲，勇敢地与疾病搏斗了一个月，病情一度有了明显的好转。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欣喜地说道：“穆希显著好转已有几天了，医生也给了我们最美好的希望。如果以后一切都好，就必须马上把穆希送到农村去。他自然是非

常虚弱,而且瘦极了。”但是,穆希的病情不久就迅速恶化了,明显地一日不如一日。4月6日清晨五六点钟,他静静地长眠在马克思的怀中。望着他那天使般纯洁可爱的面庞,全家人痛哭失声,一连数日茶饭不思。马克思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孩子曾经使家中充满了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后,家中自然完全空虚了,冷冷清清。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么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直到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

为了使马克思一家的生活能够维持下去,使他有可能继续从事艰巨的理论研究和革命活动,恩格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于1850年11月到曼彻斯特去从事“讨厌的商业”。虽然恩格斯在经济理论方面很有造诣,但由于他很讨厌这种充满铜臭气的行业,所以工作得并不舒心和轻松。

起初,他在公司里任职员、经理助理,每天都要在阴湿的房间里工作10个小时以上,做一些单调乏味的事情:收发来往信函、摘录业务情报、研究交易所行情、做各种业务记录,还要同商界中那些尔虞我诈的商人们打交道,只有晚间和星期日才能从事自己所钟爱的理论工作。

在过去,恩格斯与马克思一道为无产阶级的事

业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虽然危险艰苦,但那毕竟是自己所选择的最崇高的职业,他已经十分习惯了。现在他不得不远离自己的战友,生活在一种与自己的思想情操格格不入的环境之中,这使他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失落和无限的怅惘。他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最渴望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鬼商业,它占去了一切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只要我还在经商,我就什么也不能干。”但是,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了使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他甘心情愿做出这种牺牲。只要革命事业向他提出这种需要,他会毫无怨言地一直这样干下去。

恩格斯在经商的初期收入并不高,没有固定的薪水,只有为数不多的交际费和生活费。但他总是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给马克思汇去,一镑、三镑、五镑。起先是不定期地寄,后来每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要寄一次。每次接到恩格斯寄来的钱,马克思总会感到一阵激动,同时也产生出一种歉疚感。他知道这些钱是恩格斯牺牲个人事业换来的,虽不足以使他的一家摆脱穷困,但却能使他们免遭冻饿之苦。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

它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

马克思虽然为生活所累,但他却从不把家庭看作一个负担。他认为如果说生活是一片波涛起伏的浩瀚大海,那么家庭则是一个充满温馨祥和氛围的宁静港湾,无论外面有多大的风浪和危险,只要一投入她的怀抱,所有的忧愁烦恼、苦涩辛酸都全部化为乌有了。

虽然马克思夫妇已经成亲多年,但马克思仍然像年轻人那样狂热地爱着自己的妻子,燕妮也对马克思保持着初恋时的那种真挚的情感。他们在一起生活、工作得十分协调,在许多事情上早已达成了默契和共识,有时根本用不着用语言来表达,每一个眼神或手势都代表着一种特定的信息,可以使对方心领神会。但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思考,他们常常克制着自己不去看对方。可是稍不注意,他们的目光还是能碰撞到一起,这个时候,他们往往会禁不住相视一笑,有时甚至能笑得前仰后合,不能自持。他们的小女儿爱琳娜后来在回忆父母时写道:“他们无限的乐观情绪几乎和他们对工人事业的忠实一样使他们紧密结合在一起,谁都不像他们那样爱开玩笑和说俏皮话。我经常看到,他们有时不敢彼此面对面地看一下,因为他们知道,只要目光一接触,就会忍不住大笑起来。有时他们就象小学生一样,竭力忍住

笑,尽量躲开对方的眼光,故意看别的东西,可最终还是忍不住大笑起来。……无论在苦难、斗争,还是在失望的时候,他们总是快乐的一对。”

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生活完全可以用一位英国诗人的著名诗句加以概括:“爱,既非环境所能改变;爱,亦非时间所能磨灭。”他们就像一双在蓝天上自由翱翔的比翼鸟,相依相伴,形影如随,须臾不可分离。如果他们暂时分开了,哪怕是很短的一个时期,强烈的思念之情便会油然而生,甚至弄得他们寝食不安。1856年夏天,燕妮带着女儿们去故乡特利尔看望重病之中的母亲。此时马克思已经年近40了,但暂时的分离仍使他坐卧不宁,产生出一种十分焦虑的情绪。在燕妮离去一个多月后,马克思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动笔给燕妮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长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

“我的亲爱的:我又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孤独,因为我感到难过,我经常在心里和你交谈,你根本不知道,既听不到也不能回答我。……你好像真的在我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你,夫人!’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

“……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离,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

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示出它的本来面目,像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热情。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吻遍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

马克思对燕妮的爱是甜蜜而执著的,这里面没有任何虚饰和矫揉造作的成分,他从心底为有这样一位贤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而且忠于革命理想的妻子而感到无比骄傲。在搬到第恩街后不久,他郑重地指定燕妮为自己的秘书。这样,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就更加紧密地融为一体,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并肩战斗了。

但担任马克思的秘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由于马克思肩负着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的历史使命,因此他对自己和他的同事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充当他的秘书不仅要聪明机敏,办事沉着干练,而且还必须具备渊博的学识和坚定的共产主义

立场。燕妮完全具备这些条件，她早已把自己的命运与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而且她本人也非常热爱这项工作，并为“秘书、马克思之妻”这一特殊身份而感到由衷的自豪和幸福。

燕妮的职责范围相当广泛。她不仅要安排好马克思的饮食起居，热情地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和工人运动活动家，而且要抄写丈夫的著述，处理丈夫的一部分信函，代表他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和集会，为出版丈夫的著作与出版商和经销人进行交涉。另外，她还要常常为丈夫的研究工作收集材料和情报，并认真阅读丈夫的著述，提出修改意见。

燕妮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卓越的才智、敏锐的观察力和明确的分析能力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承担的各项任务。在与出版商打交道时，她显示了高超的商业才能，把事情办理得十分妥善。她代替马克思写的信件充满了女性的温柔和智慧，而且立场坚定，目的鲜明准确，后来她的友人把其中的一部分汇编出版了，被认为是重要的政治和文学文献。燕妮每次办理重要交涉和出席重要的会议，都要向马克思作出书面汇报，这些报告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评价和赞赏。另外，马克思的手稿都要经过燕妮的审阅，并由她誊写清楚，马克思对她提出的每

一条修改建议都非常重视。杰出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拉法格后来回忆说：“马克思很敬佩燕妮的智慧和批判能力，他的一切手稿都要给她看，并很尊重她的意见。在听到燕妮的意见和评论之前，他是不会把任何东西付印的。”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包含着燕妮的智慧和心血。

燕妮出身于贵族家庭，天赋过人，才貌出众，受过良好的教育，本可以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但她自愿嫁给了马克思，毕生都是在清贫和磨难之中度过的。然而，燕妮从不后悔，她忠于自己的丈夫及其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并为之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青春、精力和才华。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燕妮，马克思的一生会是一番什么情景。

第二十三章

真挚的友谊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融为一体了，不能设想这一个人没有那一个人，他们凭藉他们的友谊和战斗团结才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中的两位——而今天他们确已成了最伟大的人物中的两位。

——H·格姆科夫

历来的资产阶级政客们大都对马克思抱有一种

既仇视又恐惧的心理,因此,他们把这位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描绘成一个狰狞可怖、残酷无情和生性古怪的人物,说他是一个冷漠的禁欲主义者,一个因饱受苦难、憎恨一切而失去了人类情感的革命者。这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的确,马克思的一生十分贫穷。特别是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十年间,他一直在与贫困进行着殊死的搏斗。这是一场很难打赢的恼人的战争,它扼杀了马克思四个孩子的生命,剥夺了他本应从事伟大创造的宝贵的时间,还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体。讨债人、密探、叛徒和形形色色的反动派轮番上阵,像讨厌的瘟疫一样折磨着他,给他带来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如果换一个人的话,或许早就被生活的重压摧毁了。但是,这一切不仅丝毫没有动摇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也没有泯灭他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家人、朋友的亲情和友谊。他是一个具有丰富而真挚的情感世界的人,并始终是他人的贤夫、慈父、良师和益友。

马克思非常热爱家庭生活,钟爱自己的子女们,只要与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轻松和愉快。1855年1月,马克思夫妇又添了一个小女儿——爱琳娜,由于不久后他们的小男孩“穆希”去世了,全家人便把对“穆希”的爱全部转到了小女

儿的身上,于是她成了家中的宠儿。虽然马克思的工作一直很繁忙,但他从来不会因孩子们的嬉戏打闹而生气,他曾经说过:“‘家庭生活’,‘孩子们的喧闹’整个这——‘小小的微观世界’比‘宏观’世界有意思得多。”他甚至认为,与孩子们在一起可以便自己的精神得到放松,身体得到休息,精力也能迅速地恢复。

在孩子们面前,这位叱咤风云的革命斗士变得连一点自卫能力都没有了,像一头温顺的羔羊一样听凭她们的摆布,分享她们的一切乐趣和爱好。为此,他常常会中断自己的工作,毫不吝啬地花费掉许多宝贵的时间。马克思也从不在孩子们面前摆家长架子,他们是最亲密的朋友和伙伴,全家人的身份都是平等的,相互亲密无间,无拘无束。孩子们称呼马克思为“摩尔”,称燕妮为“妈咪”,管琳蘅叫“尼姆”,而孩子们也各有自己十分有趣的绰号:小燕妮是“中国皇帝乖乖”;劳拉叫“白鸚鵡”,由于她善烹调,喜吟诗,大家又喊她“厨娘”和“女诗人”;小爱琳娜的绰号也有好几个:“杜西”、“中国王子古古”等。

每当工作之余或者周末,马克思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与孩子们做游戏。起初,他们喜欢打“海仗”,后来又愿意玩“骑兵游戏”:孩子们把马克思当作一匹“好马”,她们骑在他的脖子上,驾驭着他奔跑、跳跃。

有时孩子们还把椅子搭成“马车”，让“马”拉着她们在空地上转圈，一直玩到“马”汗流夹背为止。有时候，来访的客人也被邀请参加了游戏，有的当“马”，有的当“车”，玩得兴高采烈。

马克思与孩子们玩耍时非常认真投入，仿佛自己也变成了一个顽皮的孩子，有时还表现出一种孩子似的“虚荣”和“任性”。例如，马克思自认为是第一流的象棋手，并宣称发明了一种独特的走法，可以打败所有的对手。但当他与李卜克内西对弈时却常常输棋，使得他一连几个小时都很不高兴。后来在燕妮的劝告下，李卜克内西就不再与他下棋了。于是，马克思开始教小女儿爱琳娜下象棋。但女儿的棋艺很快就超过了他，常常赢棋，使马克思感到很恼火。对此，燕妮无奈地称他为“my big child”（英语，意即“我的大孩子”）。

马克思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拿手好戏还是讲故事。当孩子们还在摇篮中时，这种活动就开始了，一直陪伴着她们度过了天真烂漫的青少年时代。

马克思给孩子们读过《奥得赛》、《唐·吉河德》、《尼贝龙根之歌》和《一千零一夜》以及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由于他的故事讲得非常生动，孩子们经常听得入了迷。爱琳娜成年以后还清楚地记得6岁生日时父亲送给她的那份宝贵的礼物——小

说《彼得·辛勒》。后来,父亲还送给她马利亚特和库伯写的书,并与她一起阅读欣赏,分析评价它们的内容和风格。爱琳娜被马利亚特小说中惊险动人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曾幻想要当一名英勇的“舰长”,为此她询问父亲是否可以“女扮男装”。马克思十分郑重地告诉她:“这是可以的,不过在计划尚未成熟之前,应保守秘密”。这一计划果然是不成熟的,因为爱琳娜很快又被别的精彩小说吸引住了。就是用这种方法,马克思努力向孩子们传授各种知识,教育她们从小就崇尚真理和正义,痛恨虚伪奸诈,并使她们初步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和人生的真谛。

当孩子们稍大一点的时候,马克思夫妇就开始为她们的学业操心了。在当时,女孩子在受教育方面仍受到传统习惯势力的重重约束,但马克思夫妇却认为她们理应享有与男孩一样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尽管生活十分贫困,马克思还是想方设法送孩子们到条件较好的学校里去读书。虽因家境贫寒,她们不可能象富裕家庭的女孩子那样穿着入时,但她们都很争气,学习成绩在学校里非常突出,是优秀生中的佼佼者。最后,她们都以优异成绩念完了普通中学。

由于受到马克思的熏陶,孩子们在语言学和外语方面的成绩都非常好,燕妮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她写道:“她们的英文可以运

用自如，法文学得非常好，意大利文能够看得懂但丁的作品，西班牙文也懂一些。”在学生时代，三个女儿也显示出了各自不同的爱好和特长：小燕妮在绘画方面颇有造诣。她经常在客厅里长时间地作画，或者外出写生，完成了许多绘画作品。刚入中学时，她给恩格斯寄去了一件圣诞礼物——一张仿拉斐尔的圣母像。恩格斯夸赞这是一幅优秀的临摹画，几乎可以乱真。劳拉在音乐和唱歌方面显示出了卓越的表演才华，时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歌诵演唱会。每当听到女儿唱歌，马克思总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打开书房门侧耳倾听。他特别喜欢听女儿唱贝多芬、莫扎特和舒伯特的抒情歌曲和苏格兰民歌，听到高兴处便情不自禁地随着歌曲的旋律而手舞足蹈。与两个姐姐比起来，爱琳娜是个多才多艺的小精灵，她特别喜欢运动，在语言方面也比两个姐姐更有天赋。这些女孩儿无论在才华还是在心智方面都要比同龄的孩子们高出一筹。

女儿们接受了基础教育以后，马克思还希望她们能继续深造，但在这方面他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因为，在当时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英国虽然在工业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女子教育方面仍然举步维艰。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他们受到了来自官方和社会舆论方面的

双重压力,况且,马克思的经济能力也是很有限的。

但是,为了把女儿们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自食其力的人,马克思夫妇甘愿付出最大的代价。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把女儿们送到享有盛誉的南汉普斯泰特女子学校就读。在这里,她们上钢琴课,学习舞蹈,读了很多书,受到了相当好的教育,特别在语言学和艺术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由于马克思夫妇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子女们的各方面的素质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真正成为有教养、有能力的新一代女性。她们的学识和语言文字能力不仅使她们以后能够帮助父亲从事科研工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她们完全具备了在社会上自立的能力,成为真正自食其力的人。对此,马克思夫妇感到无比的欣慰。

从哲学的意义上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活着,除了劳动、吃饭和休息之外,还非常需要一种极其珍贵的东西——真挚的友谊。但在伦敦这个为铜臭所严重污染的资本主义大都市里,人们却很难寻找到它的踪迹。然而,马克思的家中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情景,这里不仅充满了亲情和天伦之乐,而且还是一个洋溢着同志式的关切和诚挚的友爱的温馨祥和之所,它的大门始终是向所有的革命者敞开着。

马克思在伦敦的家虽然并不宽敞富贵,马克思夫妇的经济能力也很有限,但他们对那些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和背井离乡的政治流亡者仍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无私地向他们提供各种帮助,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尽最大的力量照料他们,甚至同他们分享最后一块黄油和面包。马克思的家真正成为了一切共产主义者向往的革命中心,许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们经常在这里汇聚,从事革命理论研究,讨论国际局势,收集和研究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并对各国的革命事业给予帮助指导。而有的时候,朋友们到这里来纯粹是为了休息娱乐,在愉快的气氛中消磨时光,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这一时期经常出入马克思家门的重要人物有:康拉德·施拉姆、威廉·沃尔弗、格奥尔格·维尔特、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卡尔·沙佩尔、威廉·李卜克内西以及拉萨尔,等等。

康拉德·施拉姆出生于德国的一个富商家庭,但他家的许多人都具有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本人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小就痛恨黑暗专制制度,向往民主和自由。施拉姆成年后继承了家传的经商事业,后到军队中服役,因痛恨残暴的军国主义而逃离军队,去了美国。1848年德国革命爆发后,施拉姆回国参加了革命斗争,亲身参加了流血的战斗,创办过

进步报纸。结识了马克思后，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特使在各地进行革命活动。在去巴登参加起义的途中被反动当局逮捕，后机智地逃了出来。

流亡到伦敦以后，施拉姆成了马克思家的常客，参加过救济流亡者和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等工作，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施拉姆为人正直善良，善于思考问题，充满幽默感，是马克思和燕妮的亲密朋友。但他有时也会因感情冲动而做出一些缺乏理智的事情来。有一次，他遇到一个人恶毒地污蔑马克思，气愤至极而与他进行了决斗。事后有人告诉燕妮施拉姆被子弹击中了头部，吓得燕妮几乎昏了过去，但不久他却神态自若地走进了马克思的家，头部只是受了一点擦伤。后来施拉姆去了美国，在那里从事工人运动。1857年他回来时已身染重病，马克思夫妇亲自把他送进了医院，不久他就去世了。对于他的死，马克思和燕妮都感到十分难过。

威廉·沃尔弗是马克思的老朋友了，在创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创办《新莱茵报》时期，他们就在一起并肩战斗。沃尔弗与马克思之间具有一种比血缘更为重要的关系，这就是他们选择了共同的奋斗道路和人生目标，因此，他们之间毕生都保持着非常亲密的私人友谊。马克思习惯于喊他“普鲁斯”，因

为他的年龄稍大又常叫他“老爷子”，由于“沃尔弗”的发音在英语中近似于“狼”(wolf)，一些爱开玩笑的朋友喊他“老狼”。流亡到伦敦后，由于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沃尔弗一个时期就住在马克思家里，只要还有一碗饭他们就一块分享，沃尔弗一生都铭记着这段非凡的经历。

由于在伦敦无法谋生，后来沃尔弗去了曼彻斯特，一边从事工人运动，一边作家庭教师。沃尔弗在工人阶级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造诣。他为人严谨，性格坚毅，头脑清醒冷静，对事物有极强的判断能力，马克思在许多问题上都喜欢征求他的意见。沃尔弗与马克思夫人和女儿们的关系也极为融洽，只要马克思去曼彻斯特，她们都要托马克思给这个老朋友捎信致意，而沃尔弗总是激动地把这些信件读了一遍又一遍，并小心地珍藏起来。

1864年5月9日，沃尔弗因病去世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守候在他身旁，在料理沃尔弗后事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位过着简朴的单身生活的人把一生积存下来的1000多英镑（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财产全部献给了德国工人组织和他的战友们，他在遗嘱写道：100英镑给曼彻斯特席勒协会；100英镑给恩格斯；100英镑给博尔夏特医生；其余600—700英镑和其他财产给马

克思。

有了这笔钱,马克思几年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从而使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资本论》的研究写作工作之中。后来,他把这部巨著的第一卷献给了他的这位不朽的朋友。1864年5月13日,马克思亲自参加了沃尔弗的葬礼,他在给燕妮的信中写道:“今天为我们的好同志举行葬礼。我们有意不邀请任何人,否则半个城市都会受到惊动……我发表了简短的悼词。这个使命使我如此激动,以致有几次嗓子都哽住了。”

格奥尔格·维尔特也是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时期的老朋友,是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著名诗人,他的鼓动性和感染力极强的战斗诗篇,曾经鼓舞着千千万万志士仁人在伟大的革命风暴中冲锋陷阵。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也流落到了伦敦,为生活所迫到了商界工作,成年累月为推销商品而忙碌。但只要有闲暇,他总要到马克思的家中来坐一坐。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感到非常快乐,经常与马克思一起回顾过去的战斗岁月,向马克思倾诉商业生涯的单调苦闷,畅谈对未来的美好理想。

维也特见多识广,性格开朗热情,口才甚佳,马克思认为与他交谈既是一种享受,同时也大有裨益。他为人忠实坦诚,乐于助人,始终是马克思家中最受

欢迎的人。受所在公司的委托,维尔特在经商生涯中几乎跑了大半个世界,1856年7月,他在古巴因患急病去世了,消息传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感到痛惜不已。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准备纪念维尔特的文章一直未能发表,直到25年之后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是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的编辑,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马克思全家都非常欣赏他的诗作。弗莱里格拉特与马克思私交甚笃,当他流亡到伦敦时,民主派分子极力笼络他,邀请他加入他们的团体,但他坚定地表示:他永远是马克思亲密的朋友。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结成联盟反对马克思的时候,弗莱里格拉特却选择仍然站在马克思一边,这使得马克思恩格斯都深受感动。

在初到伦敦时,弗莱里格拉特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得也很出色,他曾远赴美国为党的组织筹款,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诉讼期间积极参加营救活动,是科伦共产党人设在伦敦的“团结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并与马克思等人一道在“为被告人呼吁书”上签了字。但是,弗莱里格拉特没有坚守自己的政治信仰。为了赡养一大家人,他后来在一家瑞士银行中找到了一个职位,过起了中产阶级养尊处优的生活。他偶然写了几首平淡无奇的诗篇,受到了一伙资产阶

级民主派分子别有用心的颂扬吹捧，他的头脑就变得更加糊涂了，渐渐脱离了革命阵营。但是，他与马克思仍然维持着旧日的朋友关系。

在此值得一提的还有马克思过去的老友、曾经与维利希结成同盟反对过马克思的卡尔·沙佩尔。通过亲身参加革命实践和钻研理论，沙佩尔早已认清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且与维利希等冒险主义分子划清了界限。后来，他主动登门拜访了马克思夫妇，并坦率地谈了对所犯错误的认识。这样，这对老朋友从此尽释前嫌，又恢复了往日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这是一件令马克思感到十分惬意的事情。

在伦敦，与马克思一家接触较多的朋友还有威廉·李卜克内西。他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领袖，积极参加了1848年德国革命，于1850年来到了伦敦。与他同时来到伦敦的还有他忠实的女友——夫赖堡典狱长的千金，李卜克内西曾在那座监狱里坐过牢，她十分敬佩他的革命意志和高尚人品，偷偷与他结伴来到了英国，并幸福地结为夫妻。马克思非常器重威廉·李卜克内西，把他当作自己年轻的朋友，而李卜克内西则诚心诚意地把马克思看作自己的老师。

在相识初期，马克思与李卜克内西之间有过两次非常认真的交谈。

在第一次交谈中,马克思对李卜克内西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测试”,发现李卜克内西虽然具有共产主义信仰,但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还很肤浅模糊。因此,他送给这位年轻人一句忠告:学习,再学习。第二次会面时,马克思郑重地送给李卜克内西一张书单,上面密密麻麻地罗列了大量书目。马克思十分恳切地对他说:

“大英图书馆是对所有的人开放的,那里面很暖和,借阅也很方便,非常适宜于研究和写作。但是,一般的小市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业余消遣的场所,只有真正的智者才能从中汲取巨大的力量。我建议你把这些书籍认真地读一读。”

李卜克内西接受了马克思的建议。结果不久他发现,马克思送给他的并不是一张普通的书单,而是一把开启真理大门的钥匙,他一生都从中获益匪浅。

由于李卜克内西能够认真地学习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并能结合参加工人运动的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很快就有了很大的提高,深受马克思和燕妮的赏识。因此,他有幸成了马克思家中一个受欢迎的客人,能够经常来这里聆听马克思的教诲,并参加他的家庭活动。那篇著名的关于马克思漫游汉普斯泰特荒阜的描述就出自他的笔下。

汉普斯泰特荒阜是伦敦近郊一个很适于野餐游玩的丘陵地带。那里到处是美丽葱茏的小山、深邃幽静的峡谷和茂密苍翠的丛林，站在山头还可以鸟瞰伦敦郊区的美景。马克思一家常常喜欢在星期日来这里郊游，李卜克内西有幸参加了几次这样的活动。他与马克思全家一起向目的地进发，在汉普斯泰特荒阜进行野炊和阅读讨论，并举行了竞走、角力、掷石和唱民歌等活动。有一次他们在山上发现了一棵野毛栗子树，上面长满了成熟的果实，于是兴致勃勃地玩起了打毛栗子比赛，最后把胳膊都甩得生疼。大家玩得快活极了，几乎忘掉了尘世间的一切烦恼。李卜克内西在那篇描述中写道：

“想想我们在汉普斯泰特荒阜的郊游吧！再活上一千年我也忘不了……在那里度过一个星期日我们认为最大的快乐。孩子们要整个礼拜地谈起它，就是我们成年人（年老和年轻的）也喜欢这种漫游。连去那儿的途程也象过节似的令人高兴。女孩儿们健步如飞，象猫儿一样轻盈而不知疲倦……我们照例要在上午 12 点出发，有时要晚一些，因为伦敦人不习惯早起，而且把一切收拾好，把孩子们装束好，把篮子准备好，也要费一些时间。

“那个篮子呀！仍然那样生动，真切，那样吸引人，刺激人的胃口，摆在或毋宁说挂在我的‘精神眼

睛’前面，就象昨天我看见它挂在琳蘅肩膀上一样。”

但是在所有的朋友之中，与马克思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是恩格斯。很难设想，这两个人中没有一个人，另一个人会是一番什么情景，伟大的时代和艰难的岁月已经把这两位患难与共的老朋友紧密地融为一体了。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恩格斯甘愿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去曼彻斯特经商。在他的说服下，马克思忍痛接受了他的这一牺牲。因为马克思知道：恩格斯之所做出这一决定，不仅是出于对他全家人的热爱，而且是为了使他们的共同事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自己只有竭尽全力完成这一最艰巨的工作，才能不辜负恩格斯的一片赤诚之心。

自从来到曼彻斯特以后，恩格斯就被“鬼商业”几乎完全缠住了，既不能经常与马克思见面，也不能正常地从事理论研究，心情十分抑郁苦闷。他在一封信中告诉马克思：“我最渴望不过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鬼商业，它占去了一切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只要我还在经商，我就什么也不能干。”恩格斯曾多次下决心要离开这里，重返伦敦与马克思并肩从事革命工作。但当他一想到马克思一家为贫困和债务所累的情形，想到革命和友谊需要他做出牺牲，他就又强迫自己安下心来，继续从事经商工作。他暗

暗定下一个目标：在退出商界之前，自己所得到的收入必须能够保证马克思一家的生活。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恩格斯在交友方面的一个特点：一旦与他人结为志同道合的知己，他就感到自己对对方负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自从1844年那次伟大的会面之后，恩格斯就与马克思确立了他们终身的友谊，他甚至认为自己是属于马克思一家的，马克思的三个女儿就如同自己亲生的孩子，她们即使患了一点小病，马克思也必须向他详细地汇报，而他则会竭尽全力提供帮助。

当然，在马克思全家眼中恩格斯绝不是外人。马克思的孩子们都视他为第二父亲，亲切地喊他为“将军”。小的时候，她们喜欢与他一起作游戏，时常象对待摩尔那样把他当马骑。当她们稍稍长大了一点，又非常喜欢听他讲故事。恩格斯讲故事的时候表情极其丰富，语言优美生动，抑扬顿挫，因此极受孩子们的欢迎。

一天晚上，恩格斯给孩子们讲了一个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普罗米修斯高尚的行为和悲惨的命运深深地打动了孩子们的心，使她们听得入了迷。

“普罗米修斯被绑在天边的山岩上，”恩格斯用高亢激昂的语调讲道。“火辣辣的太阳和狂烈的风暴不时抽打着他的身躯。每天都有一只巨鹰飞来，用尖

利的爪和嘴撕开他的胸膛，啄食肝脏，使他血流如注，痛不欲生。一到夜间，他的伤口便自动愈合，以便巨鹰第二天再来啄食。但是，这位勇士丝毫没有屈服，宙斯的法术失败了！”

“为什么要把他绑在山岩上受罪呢？普罗米修斯不是帮助过宙斯吗？再说，他盗取天火也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啊！”孩子们非常惊讶地问道。

“因为我帮助了人类，
宙斯才严厉地惩罚我，
让我永远受难！”

于是，恩格斯开始用深沉的嗓音朗诵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著名诗篇，算作对孩子们的答复。

“凡是暴君都不相信朋友，
你问他为何这么折磨我，
我这样来解答。
他一旦继承父亲的王位，
便立刻把各种权利赋予众神。
而对于人类，
他不但漠不关心，

反而想把他们全部毁灭。”

“难道普罗米修斯要永远受折磨吗？难道没有力量能制止这种暴行吗？”孩子们都愤怒了。

宙斯是会屈服的，
不管他多么顽固死硬。
且让他心安理得地坐在那里，
挥舞着喷火的霹雳，
仰伏那空中的雷鸣吧。
可是，这些都不能使他避免
可耻的失败！”

故事讲完了。看到孩子们那一张张激动可爱的面孔，恩格斯爽朗地笑了起来。他温柔地抚摸着她们的头，轻声告诉她们：

“孩子们，应该记住，普罗米修斯是伟大的殉难者。他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光明和温暖。他毁灭了自己，但拯救了人类。”

当孩子们上了中学时，恩格斯仍是她们无话不谈的忠实的大朋友。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期间，他们之间经常互相通信，其中一部分信件保存了下来，信中的内容着实令人感动不已。1858年5月11日，恩

格斯给姑娘们回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我在给你们的妈妈寄这封短信的时候，不能不谢谢你们让摩尔带给我两张可爱的照片。它们暂时还放在壁炉上的镜子前面，不过过几天就会在墙上得到一个最好的地方……我高兴地看到你们两人都长高了许多，虽然你们现在已经是大姑娘了，但还是显得天真烂漫。你们可以相信，对于你们来说，我还是那个老样子。”

恩格斯是1850年11月去曼彻斯特的，他结束商业生涯返回伦敦的时间是1870年9月，也就是说，有近20年的时间他没有与马克思在同一个城市里居住。由于时间和金钱等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经常互访，因此，维系他们之间紧密联系的主要方式是互通书信。虽然他们已经不可能象从前那样在一个房间里（甚至在一张写字台上）并肩工作了，但他们可以通过通信的方式在理论研究和党的事务等方面继续进行合作。

在书信中，他们互相交流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自己的读书和研究心得、讨论拟订所要撰写的著作的主题、观点和写作计划，对稿件进行修改，等等。在许多信件中，他们还敞开心扉，畅谈自己对人生、理想、友谊和革命事业的真实感想，讲述现实生活中的苦辣酸甜和社会上的种种见闻。因此，马克思恩格斯

虽然失去了经常见面的机会,但通过书信往来,他们可以用更成熟的思维和更精确缜密的文字来研究问题。他们在书信中讨论的问题十分广泛,几乎所有重大的领域都涉及到了,他们发表的著作中的许多观点(甚至包括使用的一些词句)也来自于他们的书信。尽管他们在生活和事业上都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资产阶级的诽谤和迫害时时袭来,但他们都始终保持着巨大的幽默感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一点在他们的信件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以致于多年后他们翻阅这些信件时,仍然“笑得流下泪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 20 年中写的书信数量多得惊人,仅保存下来的就有 1300 多封。这些重要的信件是这两位伟人从事理论研究和革命活动的编年史,也深刻生动地展示了他们的友谊和私人生活。在这些年里,写信已经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们往往每天各写一封甚至数封信,一周内不通信的情况是绝少出现的。只要有几天未收到对方的信,他们就会感到忐忑不安,忧心忡忡。

有一次恩格斯未能及时给马克思写回信,马克思十分焦急地写信问道:“亲爱的恩格斯:你是在哭还是在笑?是在睡觉还是醒着?”

还有一次,马克思得知恩格斯经常参加骑马狩猎,骑术大有长进。对此他深感忧虑,担心恩格斯在

骑马时发生意外。于是他提笔写了一封信：

“祝贺你在骑猎上建立的功勋。然而，你不要再冒险跳越障碍了，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们定会有重大的事情，需要拿脑袋去冒险的。”

恩格斯没有听从马克思的劝告，因为他认为骑马一可以排解经商带来的烦恼，二来也是军事科目中重要的一项。但为了使马克思放心，他在回信中风趣地写道：请你放心，我的脖子绝不会在骑马时折断，而将另有所用。

恩格斯也同样对马克思的一切关心备至，希望能经常听到他的消息。有一段时间，恩格斯没有接到马克思的信，他感到焦虑不安，坐卧不宁，于是写信问道：

“老摩尔，老摩尔，大胡子的老摩尔！你出了什么事，怎么听不到你一点消息？你有什么不幸，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是病了？还是陷入了你的政治经济学的深渊？还是你已任命了小杜西做你的通信秘书？还是别的什么？”

除了通信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两家人也时常互相走动，可以说，这是他们生活中最快乐的日子。每当听说恩格斯要来伦敦，马克思全家人都象过节一样兴奋。燕妮和琳蘅的脸上洋溢着愉快的微笑，她们商量着如何款待这位老朋友。姑娘们则欢呼雀跃，每

天都要看好几次日历牌，掐手计算“将军”还有几天才能到家。当然，最激动的人当属马克思，在恩格斯到来的前几天，他就已经没有心思工作了。

恩格斯一般喜欢在假日或节日来伦敦小住，或者利用出差的机会顺便去看望马克思一家，给他们捎去生活费用或急需的物品，有时还给孩子们带去节日礼物。而马克思则差不多每年都要去一次曼彻斯特。他在恩格斯家往往住的时间较长，最多时曾经住过三个月，还带着全家一同去过那里。白天，恩格斯必须去上班，马克思就在恩格斯家里埋头读书写作。到了晚上或者是星期日，两位朋友便形影不离地聚在一起了。这时，他们全然忘却了尘世间的一切烦恼和痛苦，兴奋地投入到紧张的理论研究工作之中，有时还通宵达旦地饮酒聊天，纵谈天下大事。

第二十四章

经济学研究

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马克思

为了创建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一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写下了浩繁的理论著述。其中,马克思花费精力最大的一本书是他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这是他积 40 年研究的伟大成果,可以说是他大半生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是他的一部主要科学研究著作。

马克思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呢?

马克思在大学里学习的专业是法律,在研究哲学和历史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有很高的造诣。但是他在担任《莱因报》主编时发现:自己对经济问题发表意见时遇到了困难。这是马克思致力于研究经济理论的最初原因。

后来通过参加革命实践和从事理论研究,马克思进一步发现:要想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和罪恶的原因,不应从分析它的法律和道德观念入手,而必须剖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另外他还看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对工人运动发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使某些人不懂得社会发展规律,不懂得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规律,所以对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使命等重大问题存在着糊涂认识。如果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批判的话,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这一问题。

因此,马克思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写下了一些不朽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但是从总的来看,在 1848 年之前,马克思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哲学和历史上面,而在 1848 年欧洲革命期间,他又主要致力于检验和发展自己的政治理论和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问题。此后,为了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导致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没落的经济规律,给科学共产主义奠定雄厚的理论基础,在完成了对 1848 年欧洲革命的总结工作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重新开始了一度中断了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

在 19 世纪 50 年代的革命低潮时期,马克思把全部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中。他废寝忘食、兢兢业业地伏案读书写作,战胜了反动派施加的种种迫害和诽谤,克服了贫困和疾病所造成的巨大痛苦,以一种“发狂似”的精神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研究着。

马克思之所以如此勤奋地工作,正如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所指出的,是为了在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搞清楚。所以他此时的心理似乎有些矛盾:既希望目前的和平状态能持续下

去,以便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又迫切盼望革命高潮早日到来,以便能在革命实践中运用、检验并进一步发展他所创建的理论体系。他在另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指出:“最近的将来将是一个风暴的时代。假如我只是从自己的个人爱好出发,我也许会希望这种表面上的宁静再继续几年。无论如何,这是从事科学工作的最好的时候。”

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工作主要是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里进行的。

马克思选择这里作为他进行长期理论研究的地点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他认为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在这里可以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发展和没落的规律;而大英图书馆则是欧洲最大的图书馆,图书资料非常丰富,特别是“收藏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而且,这座图书馆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在当时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不仅借阅十分方便,而且有光线充足的阅览室和供暖通风设备,冬暖夏凉,对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十分有利。从1850年下半年起,马克思几乎天天都到这里来工作。

这一时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中采取了三大步骤:

第一步(1854年之前)是对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和著述进行系统的研究批判,并做一些收集资料的工作;

第二步(1857年之前),对前一阶段取得的成果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整理,并继续收集有关经济学的资料;

第三步,正式撰写政治经济学著作,并研究与经济学有关的各类科学。

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始终采取的是一种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讲究精益求精,从不敷衍了事,浅尝辄止。

马克思几乎天天都要在大英图书馆里工作八九个小时。每天上午10点的钟声刚刚敲响,马克思就准时到达这里(在60年代则要由女儿劳拉陪同),立刻开始伏案工作,直至晚上图书馆闭馆为止。由于他多年如一日,天天在这里埋头工作,以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很熟悉这位著名的德国学者了,总是为他保留着他常坐的那个座位。这个座位的编号为CN0.7,进门后靠右边的第五张桌子,旁边就是参考书架,使用参考书非常方便。

一天早上,图书馆刚开门,一个读者想占用这个座位看书,图书管理员赶快走过来对他说:

“对不起,先生,这是马克思博士的位置,请您再

换一个座位好吗？”

“马克思？就是《共产党宣言》的那位作者吗？你怎么知道他今天要来？”

“是的，就是那位马克思博士，他每天都会准时到这里来。这桌上的一大堆图书资料就是他使用的。”管理人员礼貌耐心地解释道。“你瞧，他已经来了。”

这位读者转过身，看到一位留大胡子的先生推开馆门，抱着一大叠资料走了过来。他个头不高，头发已经花白了，但肩膀宽阔，魁伟有力，两眼炯炯有神，眉宇间流露出一种睿智慈祥的光芒。

“这就是那位令各国统治者谈虎色变的工人革命家吗？”这位读者十分诧异地思忖道。“他多么像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啊！”

马克思每天都要在大英图书馆里工作八九个小时。

在图书馆中读书时，每当读到兴奋之处，马克思常常习惯性地用脚在地板上来回磨擦，经年累月，他常坐的座位下面的地板竟被磨去了一层，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晚饭后，他还要在家里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忙碌到第二天清晨。即使散步时他也要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以便随时记下自己思考的问题。由于他经常在房间里一边踱步一边考虑问题，时间一长，

他的地毯上也留下了一条清晰的痕迹。

马克思之所以如此呕心沥血地工作，主要是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在时刻催促鞭策着他，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兴趣和习惯使然。他从年轻时代就已经习惯于这样忘我地工作了，而且只要一投入他所钟爱的理论研究，他就会感到特别兴奋，完全沉浸在一个奇妙有趣而又十分高雅的世界之中，很快就会忘掉周围的一切。

在一些人眼中，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而已。但是，这确是一门十分复杂艰深的学问，它不仅包含和涉及到许许多多不同学科的理论，而且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去研究它。要想真正研究好这门科学，需要阅读研究的书籍和问题简直多如牛毛。许多人对此望而怯步了，或者采取了走捷径、投机取巧的办法，其结果只能是走入歧途。

马克思是以他一贯严谨求实的学风认真研究经济学理论的。他花费了巨大的气力收集并阅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材料和著作，特别是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有：罗·托伦斯、查理·劳顿、约·斯·穆勒、托·图克、约·富拉顿、威克菲尔德、萨德斯、唐森、休谟、马尔萨斯、格雷、威·艾利生、李嘉图、亚当·斯密、霍吉斯金、普莱斯科特、达布尔德、哈德斯尔、约翰·劳顿，等等。

同时,马克思还对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一些学科和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例如:殖民地问题、信贷和银行问题、农艺学、土地所有制问题、人口问题、劳动、利润和工资问题,等等。另外,马克思对数学、物理、化学、法律、文学等学科也进行了极其认真的钻研。在大英图书馆里,他的桌子上常常摆放着堆积如山的各类图书,以致使得许多管理人员很纳闷:他到底是研究哪一门学问的专家呢?

一天,一位管理人员耐不住好奇,向马克思斗胆问道:

“一般来说,每个教授只攻读一种专业,而您却可以同时研究几十种科学,您到底是在研究什么学问呢?”

面对这个十分唐突的提问,马克思有些不快,但他还是不失风趣地回答道:

“先生,只有采得百花,蜜蜂才能酿出好蜜来。人们要想真正了解世界,就不能只在一块草地上赏花啊!”

对于前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马克思采取了科学的态度,他总是把它们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进行客观的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予以批判的继承和发展,绝不片面地进行简单的否定或肯定。对于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甚至十分细

小的数字),他总是要做认真的研究和查实,从不轻易地放过。他一向不喜欢使用间接的材料,总是不厌其烦地查找原著,力求使他的著作中的每一个论据和数字都有确凿可信的材料基础。据不完全统计,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大约读了1500余部著述,仅在他写作的《资本论》中就可以见到800余部。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最终完成艰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除了他具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渊博的学识之外,也与他能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从不脱离社会和人民群众有密切关系。

马克思认为一个有作为的革命家决不可能是一个离群索居、不问时事的孤独的人,长期把自己封闭在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中,绝对创造不出有价值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时常抽出时间到社会中去,不仅认真地了解社会和工人阶级的状况,与他们一起讨论日常的柴米油盐和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予了热情的指导,时常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用热情洋溢、浅显易懂的语言向他们讲解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大量的革命实践活动不仅进一步增进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为他的政治经济学

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

另外,马克思雄厚的外语功底也对他的理论研究帮助不小。

马克思的外语水平一向很高,17岁时就较熟练地掌握了四门外语。但是他对此并不满足,他认为:“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因此他从来没有间断过外语方面的学习和锻炼,外语水平提高得相当快。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为了全面了解俄国的农业生产结构和社会现状,马克思在52岁时还刻苦钻研俄语。当时他正患着严重的疾病,但仍凭借着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流利地阅读俄文书刊了。

后来,马克思能够阅读几乎欧洲所有国家的文字,并且能够用英、法、德三国文字进行写作、能用日耳曼语系和罗曼语系的各种语言进阅读,还对古斯拉夫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有很深的研究。这种高超的外语能力可以使马克思轻松地阅读运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大量的资料和著述,及时地了解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也曾经受到过种种干扰和影响。其中有两个较大的影响因素,一个是贫困,另一

个是疾病的折磨。

关于马克思及其家人贫困潦倒的生活状况,前面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在此就不赘述了。需要提到的是为了维持全家人的基本生活,马克思花费了许多时间为报刊撰写了大量的稿件。

例如,在1851年8月,美国的民主派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先生来信,希望马克思能为该报撰写政论性的文章。马克思认为这是把全家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的一个机会,当然,他也看到加强美国的民主运动对于国际无产阶级来说也是有益的。于是,他毅然接受了这件相当艰巨的工作,因为他当时还不能熟练地用英语进行写作。在恩格斯的大力协助下,马克思在10年中先后为该报撰写了几百篇文章。要知道,马克思的写作态度一向非常严谨,从不愿敷衍了事,每写一篇文章,他都要翻阅大量的资料,反复进行论证探讨,写成之后还要不断推敲修改。仅仅这一项工作就占用了他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大量时间和精力。

疾病对马克思的折磨是由于反动派的迫害、生活贫困和他长时期超负荷地工作所造成的。

欧洲各国的反动派对马克思恨之入骨,不断地对他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使他一家人长期过着颠沛流离、贫困不堪的生活,严重地摧残了他原本十分

健壮的身体。马克思肩负着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使命,常常通宵达旦地进行工作和研究,为了抑制疲劳和振作精神,他就毫无节制地抽烟(他的经济状况使他只能抽那些质量低劣的烟草),结果使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先后患上了眼疾、风湿、肝病、痔疮和失眠等疾病,其中对马克思危害最大的是肝病,因为这是他家的遗传病,他的父亲就是患这种病而去世的。

疾病给马克思的身心都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对于精神上的打击要比对肉体的打击更大些。这是因为科学研究是马克思生活中的一条生命线,只有不断地进行写作,才能使他的心灵充实,并获得充沛的力量。但病痛却使他的写作灵感和创造力大大下降了,甚至不得不中断正常的研究工作,这是他难以忍受的。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不可能完全按照医生嘱咐进行精心治疗(例如旅行疗法),所以使治疗一事耽搁了下来。但他的病情之所以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主要是由于他本人不愿意放下工作好好地休息,即使疾病使他缠绵病榻时,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写作。而且马克思生来喜食辛辣和腌熏的食物,这对于肝胆病人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久而久之,他的病情日益加重了,沉疴折磨得他头晕

脑胀，浑身乏力，无法坚持正常的工作。对此，家属和朋友们都感到非常焦急，经常劝告他要珍惜自己的身体。恩格斯曾经在一封信中恳切地请求他：“……请你给我和我的家人赏个面子——去治治病罢。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整个运动会怎样呢？如果你这样一意孤行，事情必然弄到这个地步。说真的，在我使你不陷入这种境遇以前，我日夜不会平静；每天，只要得不到你的消息，我就忐忑不安，以为你的病又恶化了。”

在完成了大量的前期研究工作之后，马克思从1857年8月开始正式撰写政治经济学著作。他把这部巨著的结构初步分为“导言”和六个分册。在“导言”中，他高屋建瓴地全面论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以及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六个分册的内容分别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用劳动；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其规模和内涵都是空前绝后的，它的完成必将导致人类精神和物质文明领域内的一场剧烈革命，并将影响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

关于第一分册（“资本”部分），马克思原计划写四篇，即：资本一般；竞争；信用；股份资本。其中第一篇“资本一般”又计划写三章：价值、货币和资本。在

撰写这一篇的时候,马克思又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写下了一系列研究手稿,这样一来就使原订的篇幅大大地扩充了,原计划的三章后来改为两章,即:商品;货币或简单流通,马克思认为仅仅这一部分就可能单独成书出版。于是他决定:把这部著作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公开发表。

1858年11月,燕妮开始抄写书稿,至1859年1月下旬,书稿全部誊写完毕。马克思在该书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早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期间,马克思就开始筹划该书的出版事宜。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同柏林的出版商敦克尔建立了联系,商定将该书分册陆续出版,每册的篇幅在4至6个印张之间。

马克思原计划在1858年5月底将书稿交付印刷,但由于他对书稿的质量过于苛求,不断地进行充实修改,另外,他还曾因生病一度停止了工作,结果一直拖到1859年初才把书稿全部誊清。但这位伟大

的思想家此时发现,他身上竟然连一分钱也没有了,以致付不起邮寄书稿的邮费。这时候又是恩格斯帮了他的忙,他用恩格斯汇来的钱才把手稿寄送到了柏林。当年6月11日,《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了,首版印刷量为1000册。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的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对于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该书的导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作了科学的论述,阐明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以及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揭示了社会形态更替和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不可避免性。

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

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在这里,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研究历史和社会关系,从而得出了唯物史观的经典性结论。他以逻辑缜密的科学分析判处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永恒的、自然的形式,而是社会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如同它以前的各种经济形态一样,资本主义也必将走向灭亡,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还断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种对抗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出了解决这种社会对抗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提出的这些科学论断对于指导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整部著作中,要数《商品》一章的难度最大。

在这里,马克思运用了从较简单形式上升到较复杂形式的研究方法,通过商品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性质,为进一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指出,商品生产出现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从简单商品生产经历不同的阶段

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透过它可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马克思认为:商品(即买卖对象)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统一,它反映了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存在的矛盾。

在《商品》一章中,马克思还指出:使用价值就是使物成为必需物品,它是由具体劳动(即工匠和农民等的劳动)创造的;交换价值是经济关系,它是由抽象劳动(即“没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创造的。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深刻地阐释了在1857年至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关于劳动的二重性、关于抽象劳动是交换价值的源泉的原理,并从交换中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论证了价值是物化了的抽象劳动,而价值量则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马克思的上述研究成果对经济学中的许多复杂问题进行了正确的解释,为从逻辑上过渡到对货币和资本的分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货币或简单流通》一章要比《商品》的篇幅更大,对论题的阐释极为深刻,以至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对这一章所覆盖的内容只是作了重述。因此可以说,这一章的内容是对货币问题的全面深刻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货币和货币流通理论的成熟阐释。

关于货币的起源和价值与货币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指出:货币产生于流通本身,而不是为了流通方便加入流通的;货币具有价值,是由于它是劳动的产品,具有实在的价值,货币是价值的完成的最高表现,是由商品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矛盾、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的发展而形成的。关于货币的职能问题,马克思列举了历史上依次出现的货币的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存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此外,马克思还详尽地研究了金属货币和纸币的流通规律等问题。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发表是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的一场革命,他用比古典经济学家们优越得多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不仅推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某些被认为不可动摇的观点,同时,也是对蒲鲁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深刻批判,这本书始终是关于货币和货币流通问题的最好的理论著作。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价值学说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这是马克思在其全部研究生涯中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之一。

在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送去印刷之后,马克思又继续投入到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之中。为了保证高质量地完成自己制订的庞大的研究计

划,他在写作的同时,又收集并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资料和书籍,特别是欧洲发达国家有关这一方面的最新论著,并对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写下了许多政治经济学研究手稿。

但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马克思没有急于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其原因这是由于马克思的工作作风一向十分严谨,从不愿意轻易地发表自己认为还不够成熟的作品,生怕由于自己的失误或不慎而贻害读者。即使是修辞方面存在的小问题他也从不马虎,经常为修改著作中的某些词句而冥思苦想,反复推敲。

对于马克思这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恩格斯既十分赞赏佩服,也感到有几分焦虑——他多么希望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能早日与读者见面啊!为此,他曾经写过一封催促马克思的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你自己的著作哪怕就稍微马虎一次也好;对于那些糟糕的读者来说,这已经是太好了。主要的是要把东西写完出版;你所看到的缺陷,蠢驴们是不会发现的。不然,暴风雨时期到来,在你还没有写完‘资本一般’之前就不得不把整个工作终断,那你怎么办呢?我清楚地知道对你有妨碍的一切其它困难;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拖延的主要原因一直是你过于严谨。总而言之,书出版了总比由于这种疑虑而根本不出

版好些。”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意见一向非常重视,但为了使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更加成熟完美,经得起时代和风浪的考验,这一次他没有接受恩格斯的建议。

第二十五章

新的高潮

如同在 1848 年那样,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吸引更广泛的、更多的“平民”大众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以及无产阶级来参加,以扩大和加剧资产阶级民主运动。

——列宁

1848 年欧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给了各国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并迫使他们

实行了一系列带有进步性质的改革,从而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此后,随着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资本主义向东欧的扩散以及加利福尼亚金矿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推动了欧美各国经济蓬勃地发展起来。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清醒地预见到: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空前繁荣之中必然孕含着深刻的危机。

果然,到了 1857 年,欧美各国突然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经济萧条,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造成了剧烈的震荡。在此基础上,欧洲和北美出现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一个为争取自由、和平和民主而斗争的新时期到来了。

时刻注视着局势发展的恩格斯对此感到极为振奋,他立即写信向马克思通报了这一情况,并激动地写道:“我的突然异乎寻常高兴使当地的先生们非常生气。……危机将像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

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阶级力量对比状况和历史传统不同,因此,各国在这次民族民主运动高潮中所面临的历史任务迥异,并必将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从当时欧美各主要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当务之急是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经济落后的沙皇俄国,废除封

建农奴制度已经提上了历史日程；波兰和爱尔兰将继续进行一场反对外来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在美国则出现了革命的形势：南方黑人奴隶制度的废除已势在必行了。与此同时欧美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也日渐高涨，他们开始摆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影响，纷纷独立地开展政治斗争。

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和工人运动的高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必须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在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建设工作，使无产阶级尽快摆脱资产阶级的不良影响，在新的革命高潮中发挥重大的、独立自主的作用。

为了给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充分的理论准备，马克思加快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进度，于1858年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写作工作后，又投入了新的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与此同时，他还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制定无产阶级在新的革命高潮中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并设法加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治组织的联系，向他们传输科学的革命理论。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马克思不仅同英国各个地区的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工人运动活动家建立起极为密切的通讯联系，而且与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工人组织领导人建

立起了空前广泛的联系网络,书信往来极为频繁。他们共同讨论欧洲的政局和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研究确定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所应采取的战略和斗争方式以及革命斗争的策略等种种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给以科学的理论指导。

19世纪50年代末的意大利正处在革命爆发的前夜,因此,这里的局势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关注。

此时的意大利仍旧处在封建割据和外国的占领之下,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整个国家分为8个邦国和地区,北部最富庶的伦巴底和威尼斯地区处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奥地利还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中部的托斯坎尼、莫德纳和帕尔马等各国,教皇领地罗曼那驻有奥地利的占领军,法国军队则占据着罗马,西班牙的波旁王朝统治着南部的两西西里王国。国家的分裂与外族的压迫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意大利的主要政治特色。因此,意大利民族民主运动的首要任务必然是反对异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但是,在如何完成民族统一任务的认识上,意大利民族民主运动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贵族自由派主张在萨伏衣王朝的

领导下,自上而下地统一意大利,避免人民革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甚至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主张联合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共同对奥作战,把整个意大利统一在萨伏衣王朝的旗帜之下。但是与他们的愿望相反,意大利和法国对奥地利采取的联合军事行动很快就在意大利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各地燃遍了起义的烽火,许多地区的专制统治被人民群众推翻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大利政局的这种突变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必将唤起一切被压迫者,进行反对外族压迫和奴役的革命斗争,而意大利的革命则必将对全欧洲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意大利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状况给予了最密切的关注和理论指导,他们写下了一系列有关文章,对意大利民族民主运动的方法、策略以及外交路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总结。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写下的文章有:《意大利的统一问题》、《欧洲战争前景》、《路易—拿破仑的处境》、《法国的战争前景》、《意大利赢得了什么?》、《媾和》和《维拉弗兰卡条约》,等等。

在谈到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道路和策略问题时,马克思主张意大利人应该采取革命的方式解决

意大利的问题，因为意大利存在的尖锐的民族矛盾具有引发全面革命的可能。对于推行王朝战争路线的资产阶级——贵族自由派的反人民阴谋，马克思进行了严厉的揭露和批判。反之，他对以马志尼和加里波的代表为民主派的革命行动表示高度赞赏，并希望他们能够团结广大中小资产阶级、进步的知识界、工人和农民，进行伟大的民族起义，实现民族的解放和统一，并以民主的方式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推进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在文章中，马克思还对法国拿破仑三世介入意大利事务的真实意图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指出法国的真正目的是干涉意大利内政，防止它爆发革命，使其保持分裂落后的状态，以便对意大利进行控制。马克思对意大利人民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希望他们能够以坚决的革命行动制止资产阶级——贵族自由派的反动和法国的干涉，他还对意大利民主派领袖的高度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给予了热烈的赞扬，指出：马志尼反对法国干涉的行为是一件“英勇过人的具有爱国主义自我牺牲精神的壮举”。

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民主运动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祖国——德意志的统一运动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注视，并不断给予理论上的指导，不仅公开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对德国统一问题的原

则立场,而且还就德意志民族应如何对待意大利战争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这一时期,马克思就上述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政治性文章,例如:《普鲁士的战争前景》、《普鲁士对战争的看法》、《Quid pro quo》、《斯普累河与明齐河》、《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和《柏林的情绪》等等。

1848年德国革命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统一德国的一次尝试,但这次革命失败了,国家统一的任务没有完成,德国依然处在政治分裂和经济落后的状态之中。但1848年革命猛烈冲击了旧的统治秩序,带来了一系列进步的社会变革,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在此基础上,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统一的历史重任又摆在了德意志民族面前。

但是,当时德意志在实现统一的问题上存着两种可能性,或者说存在着两条道路。一条是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的道路,即在普鲁士或者奥地利的领导下,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建立统一的君主制国家,保留贵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和贵族阶级是这条道路的积极支持者和鼓吹者,而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再一次充当了贵族阶级的尾巴。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了德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之后得出结论:这是一条在反动的和军国主义的霸

权的庇护之下的道路,显然是不符合广大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利益的。他们认为要想建立起一个能真正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必须走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即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通过人民革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政治势力,结束封建割据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这样,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一条使德意志人民真正获得解放的正确的道路,但它能否实现还要取决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取决于阶级力量的现实对比状况。

与德国统一运动同期进行的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和拿破仑三世对意大利事务的介入引起了德国公众的广泛关注,人们普遍认为,法国对奥地利的进攻是它大规模对外扩张的前奏。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复杂的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讨论,并制订了无产阶级对待这一问题的策略。他们把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对待意大利冲突的策略立场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又又又拿破仑三世是镇压欧洲革命运动的刽子手,也是德国实现统一的严重障碍,所以击败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对于欧洲革命和德国的统一事业都大有好处。因此他们主张,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政府都应站在奥地利一方反

对法国,这并不是说要支持奥国对意大利的占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反对法国的战争将引发一场广泛的革命,会把普鲁士政府和奥地利政府一同消灭掉,从而既促进了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又能使德国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在阐述这一问题时马克思指出:“德国人民要坚决站在意大利方面来反对奥地利,同时又不能不站在奥地利方面来反对波拿巴。”恩格斯则写道:“在这样一个危机中,一切现存的势力都必然要灭亡,一切政党都必然要一个跟一个地覆灭,……必然出现一个时刻,那时只有最不顾一切的、最坚决的党才能拯救民族。”

欧洲各国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使马克思恩格斯迫切地感到:无产阶级革命都需要有便利的宣传阵地来传播自己的主张,这样才能有力地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他们认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显然不能承担这一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因为它不能直接地与欧洲的读者见面。1859年3月,马克思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由于时期不同了,我认为现在极其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占领阵地,哪怕暂时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占领地盘。”

就在此后不久,1859年5月上旬,由德国工人流亡者创办的一家伦敦的周报《人民报》的编辑比斯康

普向马克思发出了邀请,约他为该报撰稿。《人民报》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其它德国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但该报的编辑多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从其刊载文章的内容来看,主要表达了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它能否接受马克思激进的革命主张呢?马克思对此毫无把握。于是他决定做一些了解和试探,所以没有贸然接受比斯康普的邀请,只答应对该报给予一定的帮助。

马克思立即行动起来,为《人民报》收集信息、资料 and 筹集资金,并帮助该报征集选择稿件,例如,恩格斯这一时期在该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如《波河与莱茵河》、《意大利战争》等等)都是由马克思推荐的。很快,《人民报》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步成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报刊,这使得马克思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于是他决定尽全力支持并参与该报的工作。在6月中旬,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几位亲密战友正式参加了该报的工作,马克思主要是承担编辑工作,而恩格斯则以其犀利敏捷的文笔为该报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并出资予以赞助。

《人民报》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到1859年8月20日就由于经费难以为继而被迫停刊了,马克思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未能使它摆脱这一结局。

但是,《人民报》在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和进行革

命宣传鼓动方面仍然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例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导言和恩格斯对该书的评论等等,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坚决地捍卫了无产阶级和各被压迫民族的利益,鼓舞他们为获得自由和解放而勇敢地进行斗争。他们还就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问题和这次民族民主运动高潮的若干具体问题(例如意大利战争和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对外政策等)发表了许多精辟深刻的见解,对于推动欧美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另外,他们还对各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进行了宣传报道,其中对1859年7月伦敦建筑工人大罢工的报道写得详实精彩,对于提高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

此时,恩格斯仍然居住在曼彻斯特,与讨厌的“鬼商业”打交道。在革命高涨的年代里,他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到火热的政治斗争中来,与马克思密切合作,共同谱写了辉煌的战斗新篇章。但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做出这些不朽的成就时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忍受了多少生活的煎熬和痛苦。

1860年3月,恩格斯的父亲不幸去世了,这一噩耗把他召回到了阔别了十多年的祖国。事情刚刚过

去几个星期,他又一次踏上了返回故乡的道路,因为他最亲爱的母亲进入了病危状态。在家乡,恩格斯兄弟之间在继承遗产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这使得已处于人生暮年的老母亲感到格外忧伤。

看到母亲那张慈祥和因家庭纠纷而充满痛苦的面容,恩格斯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他感到:自己日夜在外面奔波,无暇在母亲身边尽孝心,这已经是很大的遗憾了,他不能在财产问题再使母亲伤心流泪了。于是,恩格斯毅然放弃了对父亲在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企业的继承权。他告诉朋友:“我还会有成百个别的企业,但我永远不会有另一个母亲。”

旧的伤痕尚未抚平,新的更为沉重的打击又接踵而至。1863年的一天夜里,恩格斯的夫人玛丽·白恩士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于睡梦之中。

对于恩格斯来说,这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使他悲痛欲绝。将近20年来,命运已经把他们紧密地联结为一体了,他们的感情生活就象野葡萄酿制的色酒一样,表面上平淡无奇,饮起来却异香扑鼻,甘甜爽口,而且时间愈久,就变得愈加浓郁甘醇。玛丽以自己质朴无华的心灵和表达方式爱抚和关心着恩格斯,而恩格斯也以同样真挚的爱回报了这位纯洁美丽的纺织女工。如今玛丽悄悄地走了,恩格斯的心灵突然感受到一种可怕的阴冷孤寂。他立即把这一不

幸的消息通知了马克思，因为他急需朋友的支持和慰藉。

但是马克思没有来曼彻斯特，只是写了一封信，对玛丽的死表示“意外”和“震惊”。恩格斯未能得到他期望的那种同情，感到非常失望和不满，在回信中，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情绪。

其实，马克思在接到恩格斯的第一封信时家中的情况糟糕透了：女儿卧病在床，家中缺少煤和食物，菜店老板拒绝再向他赊帐，全家人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房主也因他交不起房租而威胁把他们赶走。在这种令人绝望的状况中，马克思是不可能丢下孩子们外出的，况且，他也没有钱支付这笔路费。

但在发出了那封信后马克思很快就后悔了，燕妮也怪他没把意思表达清楚。接到了恩格斯的回信后，马克思没有立即回信，他希望恩格斯逐渐冷静下来。十多天后，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了一封语气非常坦率恳切的信，主动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并详细介绍了自己所处的悲惨境地。

在真诚地交换了意见之后，这两位伟大的朋友消除了隔阂，又恢复了往日的友谊。恩格斯再一次写信给马克思，毫无保留地敞开了自己私人情感的闸门，他在信中动情地写道：“同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她的死不能不使我深为悲恸。我感到，我

仅余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样埋葬掉了。我接到你的信时,她还没有下葬。应该告诉你,这封信在整整一个一个星期始终在我脑际盘旋,没法把它忘掉。不过不要紧,你最近的这封信已经把前一封信所留下的印象消除了,而且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自己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

在收到这封真挚动人的信件的同时,马克思还收到了恩格斯寄来的 100 英镑汇款,令他感动得歔歔不已。他致函恩格斯:“我简直无法表达对你的感激,虽然在我内心深切地感受到你的友谊是多么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而不需要再来证明。不过,如果你看到我的孩子们那种欢乐的情景,那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补偿。”

这一事件不仅丝毫没有损害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伟大联盟,相反,他们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深厚了。因为,在这个小小的风波之中,他们都进一步体味到了革命友谊的可贵和重要,并深深地感觉到他们两人早已在蹉跎的战斗岁月中被革命的烈火熔炼得浑然一体了,他们是须臾不可分离的。

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还有两件大事极大地牵动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注意力:美国内战和波兰民族起义。

独立战争胜利之后,美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

展道路,国家的领土面积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到20世纪上半期,美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都居于世界前列,很快就进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但是,由于独立后确立起来的政权是大资产阶级和种植场奴隶主的联合统治,所以一直到19世纪中叶,美国历史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南方的种植场奴隶制度和北方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

相对于当时欧洲大陆普遍实行的封建专制制度来说,美国北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制度,代表了当时美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南方奴隶制则是一个野蛮腐朽的制度,严重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成为寄生在美国社会肌体上的一大赘瘤。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局面引起了美国社会内部剧烈的矛盾对抗,例如,南方人把棉花等工业原料销往欧洲,又从欧洲输入大量廉价商品,并因此而竭力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且这些“棉花大王”们独霸一方,用野蛮的强制手段控制了大量的黑人劳动力。由此可见,由于南方奴隶制的存在,使得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几乎全部失去了南部的市场、原料和黑人劳动力,并使他们的工业保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样,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之间的矛盾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南北双方不断

发生剧烈的冲突。

1854年,代表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共和党成立,它鼓吹解放奴隶,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该党的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于1860年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政局发生了对南方奴隶主集团不利的变化,于是他们就公开制造分裂,发动叛乱,内战爆发了。

从1816年春天,南方诸州公开发动叛乱时起,马克思恩格斯就对美国内战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一直到1865年战争胜利结束才告一段落。在这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未作具体分工,但恩格斯的研究仍然主要集中于军事领域,而马克思则对美国内战的几乎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先后撰写了40多篇文章,其中大部分发表在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新闻报》上,也有一部分被《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了。

但是到了1862年初,《论坛报》编辑部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优势,马克思遂与该报断绝了关系。是年年底,《新闻报》因害怕马克思激进的革命主张而不敢采用他的稿件,马克思也停止了为该报撰稿。这样一来马克思失去了两个重要的宣传阵地,所以他发表的有关文章主要涉及到的是内战的初期阶段。但此后,他在给恩格斯等人的大量书信中对内战的进程

进行了深入的评述,这是对先前发表的文章的继续和补充。

马克思对美国内战的根源和实质等问题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进行了科学的研究分析。

马克思认为,美国内战根源于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的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斗争,其实质则是奴隶制问题。他在《美国内战》一文中对这一问题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当前南部与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它只能以其中一个制度的胜利而结束。”他还写道:“这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是“美国半个世纪的历史的动力”,“由此可见,整个过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

自然,马克思是非常同情北方的,因为,他认为反对种植场奴隶制的斗争关系到劳动者阶级的切身利益,因为南方奴隶制不仅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且还破坏了美国的工人运动。只要黑人的劳动还带有奴隶制的可耻痕迹,那么,白人劳动者也是不自由的。他写道:“这里的意思还不是说,现有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是否应当解放,而是说,北部的两千万自由居民是否应当继续屈从于 30 万奴隶主的寡

头统治；共和国的各个巨大领地是否应当成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还是应当成为培植奴隶制的地方；最后，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扩展奴隶制度是否应当成为联邦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马克思的这些科学论述为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们研究解决美国内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内战爆发时，美国北方在力量对比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在战争初期，北方军队在战场上却节节败退。马克思恩格斯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多次在一块儿研究搜集来的各种资料和情报。一天晚上，恩格斯又从曼彻斯特来到了伦敦，这两个老朋友整整讨论了一夜。

“北方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马克思激动地说道，语句十分严厉。“他们不干涉南方的奴隶制度，还反对武装黑人。如果长此下去的话，战争的胜利将是遥遥无期的。”

“这正是北方大老板们的阶级局限性的表现。”恩格斯很赞赏马克思的观点，同时以军事家特有的眼光指出了北方军队的一些失误：“他们还没有掌握打内战的方法，作战时往往两翼十分空虚，而且士兵的服役期一般只有几个月，所以造成了兵源不足和军队素质低下。”

“对！”马克思一边翻阅着桌子上的材料，一边急

切地说道。”对于美国来说,内战的规模是空前的,并很可能会持续若干年。因此北方人应该知道,他们必须紧密地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采取坚决的战争措施。”

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北方之所以失利,是由于林肯政府未采取革命的方式进行战争,在军事上表现得过于保守。他们严厉批评了这种状况,并明确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早在1861年1月马克思就写文章指出:应当打击“敌人最怕受攻击的地方、罪恶的根源——奴隶制度本身”。1862年夏天他又指出:“北部自己使奴隶制变成南部的军事力量,而没有使它转过来反对南部。南部把全部生产劳动放在奴隶肩上,因而有可能顺利地把它的全部作战力量投入战场。……只要有一个由黑人组成的团就会使南部大伤脑筋。”马克思还大力鼓舞北方工人阶级支持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因为这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他写道:“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合众国的一部分还处于残废状态,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都是瘫痪的。”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给美国内战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并推动林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逐渐改变了保守妥协的政策,使局面大为改观。对此马克思感到很兴奋,并立即撰文予以支持鼓励,他写

道：美国国会 1862 年制订的“一系列重要的法令”标志了准备向“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的战争”的过渡，“因此，不管军事上谁走运，现在已经可以有把握地说，黑奴制度的寿命不会比内战长”。

马克思还积极支持并高度评价了英国工人阶级反对本国政府支持美国南方叛乱集团的斗争。

19 世纪被称为“棉花世纪”，英国庞大的棉织业急需美国的棉花，与南方种植场主阶级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从战争开始，英国政府就对南方叛乱诸州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不断向他们提供武器装备和各种物资，并试图承认所谓“南部诸州同盟”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统治集团这种卑鄙的行为遭到了英国各界进步人士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激烈反对，他们不断举行各种抗议和示威活动，对政府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使英国政府承认美国南方叛乱者的企图遭到了失败。

对于英国工人阶级这种正义的行为，以马克思为首的共产主义者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高度的评价。马克思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公开演说，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阻止了官方支持建立奴隶制国家的企图，即使内战给英国棉织业造成巨大的危机，政府也不能煽动起工人阶级对美国北方的仇恨。他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

“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

马克思还对美国内战的伟大领导者亚伯拉罕·林肯这个人进行了全面的评价。

尽管马克思在内战期美国政府未采取革命方式进行战争等问题上批评过林肯，但他对这位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始终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称赞他言行朴实，讲究办事效率，具有求实精神，善于倾听下层人民的呼声。特别当他看到林肯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性措施，领导内战不断取得胜利时，他立即全力支持并高度赞扬了林肯的行为。他说《解放宣言》是“在联邦成立以来的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由于发表了《宣言》，“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

林肯遇刺身亡后，马克思深感震惊悲痛，发表了许多赞颂林肯的言论。在《国际工人联合会致约翰逊总统书》中，他用火一般热烈的语言指出：林肯“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退；他既不因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冲昏头脑，也不因人民的情绪低落而灰心丧气；他用

仁慈心灵的光辉缓和严峻的行动,用了幽默的微笑照亮为热情所蒙蔽的事态;他谦虚地、质朴地进行自己宏伟的工作,决不象那些天生的统治者们那样做一点点小事就大吹大擂。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就在美国内战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1863年初,波兰又爆发了反对沙俄压迫的民族起义。波兰的民族武装力量频频发动游击战,给外国压迫者以沉重的打击。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波兰事件,认为它与以往的波兰民族起义有所不同,因为在整个欧洲出现革命高潮的形势下,建立一个自由的波兰不仅可以严重地削弱沙皇俄国的势力,还可以推进奥地利、普鲁士等国的民主运动,因此这次波兰起义有可能引发整个欧洲的革命。马克思在一封信中曾这样问恩格斯:“你对波兰事件有何看法?有一点很明显,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的纪元。……但愿这一次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而不是相反……”

马克思当时认为,波兰起义要想获得成功,首先要争取广大农民积极参加运动,另外还要有良好的

国际环境,即在俄国也发生革命,并使两国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马克思的这一主张与俄波两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看法是基本相似的,1862年,这两个国家的革命者就相互支持革命一事达成了一项协议,并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但由于波兰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竭力阻挠,并实行“亲西方”政策,结果使革命高潮逐渐衰退。

为了推动波兰起义获得成功,马克思恩格斯做了大量的工作。

马克思亲自为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起草了一份文件,呼吁各界进步人士支持波兰爱国者的正义斗争。他还积极支持波兰人拉品斯基提出的建立德意志军团驰援波兰起义的建议,认为这是对波兰起义进行有效援助的加里波的式的远征,并委托恩格斯为组建军队一事筹款。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行动未能获得成功。但在马克思的鼓动下,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在工人中间进行了广泛的募捐活动,为波兰起义者提供了一大笔资金。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还试图通过宣传手段支持波兰人民。他们决定写作一本关于波兰问题的小册子,题名为《德国与波兰——因1863年波兰起义所作的军事政治考察》。他们做了大量的收集资料和撰稿工作,打算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俄、普两国对波兰的

民族压迫以及西欧对它们的支持。为了搞好这本书，马克思忍住剧烈的肝痛，工作了三个半月的时间，整整写满了三个大笔记本。但由于写作这本书需花费大量时间，无法满足起义的急需，这一写作计划半途而废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这次波兰起义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只有与欧洲的革命紧密结合起来，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这一结论对他们日后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二十六章

第一国际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马克思

在民族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也在普遍地高涨，他们迫切要求加强全德工人阶级的革命联合，摆脱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他们的不利影响，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政治组织。

为此，德国先进的工人阶级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1863年5月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结果。但不幸的是全德工人联合会选择了斐迪南·拉萨尔充任其主席，从而使这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处在了拉萨尔机会主义者的控制之下。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立毕竟重新开始了德国独立的工人运动，使德国先进的工人重新组织起来，从而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控制。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暂时未对拉萨尔主义的错误理论进行公开的论战。马克思指出：“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15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功绩。”

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并不是一个偶然和孤立的

现象,它与 1848 年革命后欧洲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革命的扩散和资本主义的空前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整个欧洲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 50 年代,产业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和北美的部分地区,机器生产迅速代替了手工生产,近代工厂制度在各国纷纷建立起来。产业革命的鼻祖英国的经济发展最为迅速,因而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霸主地位。法国、德国等国的工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是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到了 50 年代末期,欧洲的产业工人总数达到了 800 余万,手工业工人则有 1000 余万人。

但是,资本家阶级的发家致富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压榨工人的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空前繁荣的同时,无产阶级的灾难也在加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在经济蓬勃发展和世界市场日益形成的过程当中,资本主义各国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也必然加剧,从而导致了殖民地日益剧烈的反抗斗争。而 1857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则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都空前激化起来。于是,在 19 世纪 50 年代末期,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在欧美各国兴起,与此同时,各国的工人运动也逐渐转入高潮。

在英国,建筑工人于1859年举行了大罢工。这是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工人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他们的行动得到了法国工人兄弟的鼎力支持,最终取得了成功。1860年,由各行业工会组成的伦敦工会联合会成立了。1861年,工联的机关报《蜂房报》问世。

法国的工人运动也逐渐走向高涨,工人阶级不仅进行经济斗争也参加了政治斗争,并迫使政府废除了禁止工人罢工、集会和结社的《霞不列法》。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工人们建立了共产主义俱乐部和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他们不仅进行了反对资本压迫、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斗争,还积极参加了南北战争,反对罪恶的奴隶制度。

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各国无产阶级逐渐认识到:资本压迫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各国无产阶级都同样受到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各国资产阶级还联合起来镇压工人运动,并常常用输入外国劳工的方式破坏本国工人的罢工斗争。这些事实使欧洲工人深刻感觉到了加强工人阶级国际联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已越来越广泛地为各国的工人阶级所理解和接受,他们深深感到在新的形势下,各国工人阶

级必须统一行动，团结战斗。

因此，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工人组织来领导各国的工人运动便成为一种时代的需求。

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开始了创建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6 年建立了“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1847 年，他们又把“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次年年初，《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主义诞生。不久，轰轰烈烈的 1848 年革命在欧洲大陆爆发了。革命结束后，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低谷，反动势力在欧洲各国猖獗一时。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坚信：革命运动的高潮总有一天还会到来。于是，他们开始埋头从事艰巨的理论工作，特别注重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1859 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1861 年至 1865 年，他写下了 23 本经济学研究笔记；至 1865 年，他已经写完了《资本论》的草稿。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培养了许许多多工人运动活动家，与各地的革命者建立起紧密的联系网络，促进了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

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都为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各国的工人运动开始逐渐地联合起来。

1863年7月22日,英法两国工人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声援波兰民族起义的大会,抗议沙皇俄国对起义者的野蛮镇压。这次会议显示了国际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强大力量。会后,英国工人阶级发出呼吁,要求各国工人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并建立召开一个有各国工人参加的国际会议,以讨论支援波兰起义和各国工人联合斗争的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了法国等国家工人的热烈响应。

鉴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巨大贡献,英法工人组织决定邀请他出席这次盛会。于是,他们派遣了一位代表——法国人勒·吕贝来到了马克思的家。

“久违了,尊敬的马克思博士。”吕贝彬彬有礼地向马克思问候道。

“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马克思虽与吕贝有过一面之交,但平时并没什么来往,因此对于他的突然造访感到有些意外。“见到你我真感到高兴。”

“受英法两国工人的委托,我特意来邀请您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实现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大会。我们决定要联合起来。”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早就应该这样做了!”

“虽然工人阶级内部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您在工

人运动中的影响和地位是众所周知的。”吕贝希望能圆满完成自己的使命，所以说起话来咬文嚼字，十分客气。“因此大家都希望您能亲自参加这次大会，并发表演说。”

去不去参加会议呢？马克思起初有些犹豫。十多年来，他一般是拒绝这类邀请的，其原因，一是为了集中精力完成繁重的理论研究工作，二是因为自己是政治流亡者，希望能尽量避免公开介入英国的政治活动。但稍加思考，马克思便意识到了这次会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于是破例接受了邀请。但是他决定不在会上演讲，而是推荐了一名工人代表埃卡留斯在会上发言。

1864年9月28日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国际工人大会在伦敦圣马丁堂里隆重召开了。

这是一个团结奋斗、声势浩大的会议。会场外面汇集着一群群防暴警察，他们手提木棒，神色紧张地四下巡视着。而会场里面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情景：一面面鲜艳夺目的红旗悬挂在会场的上空，来自英、法、德、意大利等各国的数千名工人们汇聚一堂，他们激动地交谈着，兴奋地欢唱着，象过节一样快乐，表现出一种团结、热烈的气氛和战斗的激情。马克思被请到主席台就座，按他的说法是充当“一个哑巴的角色”。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实际上“只有

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 1848 年就向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

大会由英国工人联合会主席奥哲尔和英国水泥工会书记克里默主持。会上宣读了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呼吁书》以及法国工人的回信。埃卡留斯则代表德国工人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他事先同马克思讨论过他的演说稿）。埃卡留斯的讲话言词热烈、情绪激昂，真正表达了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压迫、要求加强国际团结的共同愿望，得到了与会各国代表的高度赞扬。当他提出“在这次大会上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建议时，全场沸腾了，代表们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发出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并用不同的民族语言齐声欢呼，对这一建议表示赞同。

经过讨论，大会正式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第二国际成立之后一般称它为第一国际）。大会进行了民主选举，产生了国际的领导机关——临时委员会，其主要成员有：奥哲尔（主席）、克里默（书记）、埃卡留斯（副主席）、鲁·沃尔弗、勒·吕贝、托伦和马克思等人。为了为这个新的国际组织制订文件，特别是制订纲领和章程，会议还选举产生了一个小委员会，马克思被选入其中，其他成员还有：奥哲尔、韦斯顿、克里默、

鲁·沃尔弗和吕贝。

起草国际的成立宣言和章程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工作。因为当时参加国际的成员成分非常复杂,思想很混乱,当时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流行的一些错误思潮对他们还有很深的影响。这个问题在小委员会起草文件的过程中明显地体现出来了,工联主义者想使国际成为进行纯粹经济斗争的国际性工联组织,蒲鲁东主义者想把国际办成一个“和谐的”国际信贷和合作社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则企图把它变成以马克思为精神领袖的权力机构。

在小委员会开会起草国际的宣言和纲领时,马克思因生病未能出席会议。后来当他拿到由鲁·沃尔弗、韦斯顿和吕贝等人起草的文件草稿时,感到非常不满意,对这些文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来小委员会对文稿几经修改,仍达不到要求,只好把修改任务交给马克思去完成。

马克思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他认为要想把各国无产阶级真正地团结起来,就必须制订一个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不致于把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派别置之门外的纲领,通俗些说,就是要把两个文件写得即要使持不同观点的工人代表都能在上面签字,又不违背《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马克思一方面坚持了《共

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国际工人运动的现状和其它社会主义流派在工人中的影响,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结合了起来。马克思是驾驭语言的大师,他所起草的文件行文非常巧妙,所以被当时的各派代表们接受了。10月27日,小委员会只做了较小的修改就通过了这两个文件的草稿。11月1日,马克思向临时委员会宣读了这两个文件,获得了一致同意。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取得的一个重要的胜利成果,它表明,第一国际在事实上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它的指导思想,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在征服世界的途中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成立宣言》首先回顾了1848年至60年代初期欧洲工人的历史命运。在揭示了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无产阶级的生活却日益贫困这一事实之后,马克思愤怒地指出:不论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进步,还是海外市场的扩大,“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情况恰恰相反,在现代的这种虚假繁荣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上的差别,使社会对抗尖锐化”。这一点再次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劳资利益的根本对立和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

接着,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英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取得的显著成就(例如:争取10小时工作制和开展合作运动等)。但他认为这些都不足以使工人获得真正的解放,因为剥削阶级总是利用手中的统治权力,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首先需要摧毁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特权。于是,马克思又重申了《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个重要思想:“夺取政权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还指出,无产阶级要想夺取政权,不仅需要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而且需要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必须用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武装他们的头脑。马克思写道:“……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要性,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现代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如果忽视了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他写道:“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因此,《成立宣言》用这样的战斗口号结束了全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同章程》开篇的几段话是一个纲领性的阐

释。马克思写道：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从属于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个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这个目标。”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目的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对统治者进行政治斗争则是无产阶级摆脱资本压迫的有效手段。要实现这一远大目标，就必须加强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共同进行革命斗争。

《共同章程》规定了第一国际的目的、任务和组织原则。它指出：这一国际组织“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它还规定，国际应每年召开由协会各支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工人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是大会闭会期间国际的权力机构和执行机构，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监督下属组织遵守国际的章程和条例。

在马克思亲自起草的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中,包含了《共产党宣言》所阐明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国际提出了正确的政治原则和组织路线,从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斗争的共同纲领和指南。

《共同章程》规定,第一国际的中央委员会(后改为总委员会)设各国通讯书记,负责与各国工人组织进行联系和处理有关事宜。通讯书记们(起初只设有4个席位: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各设一席)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总书记共同组成中央的常务委员会(后改为执行委员会)。马克思被推举为德国通讯书记,与他同时当选的还有吕贝(法国)、海·荣克(瑞士)和朱·方塔纳(意大利)。除了荣克是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内的忠实朋友和支持者外,其他两个人都成了昙花一现的人物。

由于马克思具有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高人一筹的写作才能,第一国际的几乎所有纲领性的文件(例如总委员会的决议案、代表大会的决议案等)大都要由他来执笔。所以尽管马克思从未走上总委员会的最高领导岗位(他也从未谋求过它),但是从第一国际成立之初起,他就显示出他是这个组织的“灵魂”。

第一国际的最高决策权属于总委员会,但由于

总委员会成员的成分相当复杂,所以内部分歧难免时有发生。为了捍卫第一国际的无产阶级性质,马克思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注意采取灵活的策略,努力团结大多数成员,力图把总委员会建设成一个有战斗力、有权威的革命化的领导机构。马克思的心血没有白费,到了1865春天,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在几乎整个欧洲的工人运动中确立起了它的崇高威望。

第一国际正式成立之后,小委员会继续保存了下来,其任务主要是为总委员会的会议准备材料,并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在马克思的领导下,这个委员会工作得井井有条,保持着很高的工作效率。马克思十分善于根据具体的形势正确地规定国际的具体任务,并提出能保证国际得到各地工人运动广泛支持的口号,这使得国际在开展各项工作时都获益匪浅。马克思同欧美各地的工人报刊、进步报刊、无产阶级组织和工人运动领袖们建立起了密切的通讯联系,广泛地关注着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动态,收集工人阶级提出的各种要求,而所有这些都是他在制订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时必须参考的最基本的材料。

第一国际成立以后,马克思就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国际的各项活动之中。他不仅做了大量的具体

工作,更重要的是充当了国际的精神领袖,用自己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对国际的重大原则和方针政策等问题给予指导,以保证国际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些工作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他的《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工作只好推到晚间去做了。

但马克思感到最遗憾的,是在这一时期恩格斯仍不能与他并肩战斗。

恩格斯也是第一国际的成员,并在曼彻斯特建立起了国际的地方组织。但他不是总委员会的委员,因为按照国际的规定,只有住在伦敦能经常出席会议的工人代表才能进入总委员会,目的是使总委员会成为一个工作实体,而不是一个松散的代表机构。尽管如此,但马克思仍然经常向恩格斯介绍国际的工作情况,并把大部分文件寄给他,以便恩格斯可以及时了解国际的工作和工人运动的状况,就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并发表意见。有时候,马克思还把国际的一些具体工作交给恩格斯去做,或者就某些问题征求恩格斯的意见,要他为自己出谋划策。马克思对于恩格斯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一向是非常重视的。

恩格斯看到马克思为了国际的工作和进行经济理论研究而日夜忙碌,而自己却不能直接参与这些工作,感到心急如火。于是,他想方设法给予马克思以各种帮助。他经常向马克思阐述自己对国际工作

的意见,与马克思就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磋商研究,并撰写有关的政论文章,而在经济上给马克思的援助则从来没有停止过。

由于总委员会和小委员会的工作十分繁忙,马克思有时就把会议安排在自己家中举行。因此,来自欧美各地的工人代表们大都认识马克思的家,而那些常住伦敦的国际重要成员则成了他家里的常客。马克思的家很快就成了国际的另一个大本营。

在整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马克思的一家经常生活在极度的困顿之中,这种局面一直到 1864 年初才有所好转。然而,这一转变却是起因于一件十分不幸的事情——马克思的母亲于 1863 年 11 月去世了。得知这一噩耗后,马克思立即日夜兼程赶回了特利尔。这次返乡他整整住了两个多月,料理了母亲的后事,并拜访了所有的亲戚。母亲的去世使马克思感到极度悲伤,但家乡久违了的一草一木却给他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美好回忆,从而冲淡了他心头的烦恼和忧悉。因此在乡期间他每天都要外出,或者走访亲朋故友,或者毫无目的地在家乡的街道上走走停停,寻寻觅觅,似乎是在某种感觉和激情的驱使下追寻故迹,顷怀往昔。他在给燕妮的一封信中写道:

“每天我都要去瞻仰威斯特华伦家的旧居(在罗马人大街),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吸引我,因为

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至宝。此外，每天到处总有人向我问起从前‘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上的皇后’。做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真有说不出的惬意。”

1864年2月，马克思从家乡返回伦敦。不久，他获得了母亲留下的一笔遗产，马克思夫妇用这笔钱偿还了所有的债务。看着三个渐渐长大的女儿，他们下决心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生存环境，于是他家迁到了伦敦城西北的哈弗斯托克山梅特兰公园路附近的莫丹那别墅。

新居的条件比以前要好得多，不仅明亮宽敞，而且美观大方，为马克思及其家人工作、休息和娱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马克思全家出动，自己动手把新居精心装饰布置了一番。

马克思的工作间就安置在起居室中，这里是全家最宽敞的地方，因此有时还兼作会客厅或会议室。马克思后来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后来描述道：“……一扇宽大的窗户可以俯瞰公园，光线充足。在壁炉旁和窗对面的墙边安置了装满书籍的书柜，上面堆着一包包报纸和稿件，一直擦到了天花板。壁炉对面靠墙的一边有两张桌子，也摆满了各种文件、书籍和报纸。房间中央光线最好的地方有一张很朴素的写字

台(三尺长两尺宽)和一把木制安乐椅。在椅子和对窗子的一个书柜中间放着一张皮沙发,马克思有时躺在上面休息。壁炉上面放着书,还有雪茄烟、火柴、烟盒、吸墨纸和女儿、夫人以及沃尔弗和恩格斯的照片。”

为了给室内增添几分生气,燕妮在工作间的地面上铺了一张绿色的地毯。但由于马克思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一样,经常一边踱步一边思考问题,因此地毯上很快就被踩出了一条清晰的痕迹,就像森林草地中的一条幽幽小径。

新居的厨房设在地下室中,平时主要由琳蘅操办全家人的伙食,而燕妮及其女儿们则是她最好的帮手,特别是劳拉,她号称“厨子”,有一手烹调绝技,做出的饭菜和馅饼美味可口。小燕妮特别喜欢植物,她在大厅里辟出了一个小小的花房,栽种了许多绚丽多姿的花草,又通过亲戚朋友搜集了一些名贵稀有的花卉,使全家一年四季都充满了浓郁的馨香。而爱琳娜则对小动物情有独钟,经常豢养一些小猫、小狗之类的宠物,给家中增添了不少生气。

马克思新居的外面就是美丽如画的梅特兰公园。这里以前是封建诸侯们游玩的场所,到处草木葱茏,浓荫密布,绿水潺潺,盛开着郁金香、紫罗兰和牡丹等名贵花木,绿茵茵的草坪上还有各种不知名的

野花和野葡萄等浆果点缀其间，姹紫嫣红，争芳斗艳，到处充满诗情画意。只要有闲暇，马克思就独自一人或携同夫人、女儿们来这里散步、休息。由于居室宽绰了，许多过去不常走动的亲戚也常来这里造访或小住，马克思的一些荷兰亲戚和他的妹夫尤塔就曾多次来这里做客，使得大半生漂泊海外的马克思夫妇感受到一种由衷的宽慰和惬意。

马克思一家在莫丹那别墅整整住了11年。在这所并不显眼的住宅里，马克思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领导着整个国际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

他亲自撰写了第一国际的几乎所有的宣言和重要文件，以及《资本论》的第一卷和其余部分的全部手稿。总委员会的会议也经常安排在这里举行，马克思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聚集在一起，热烈认真地讨论研究国际的各项重要工作和工人阶级的伟大斗争。同时马克思也非常注意倾听来自下层民众的呼声，他通过进行社会调查和通讯联络等种种方式，同各国的工人阶级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给予他们的斗争以强有力的影响和推动，并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这一时期，马克思十分注意帮助工人阶级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

马克思一向以为，工人群众进行经济斗争是十

分必要的,这不仅使他们有可能改善生活状况,而且通过罢工斗争可以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使他们在组织上经受锻炼,因此,他们不仅应该在本国从事这一斗争,而且应该支持其他国家的工人兄弟为提高劳动报酬而进行的罢工斗争。马克思本人也曾经亲自参与过支持法国、德国、英国和瑞士等国的工人罢工的活动。但同时,马克思也再三向工人们强调,无产阶级仅仅争取到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还是不够的,因为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他认为工会“更重要的是作了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来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和资本权力本身”。

但是,第一国际内部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蒲鲁东主义者和拉萨尔分子对工人的罢工斗争持否定态度,甚至在素有罢工斗争传统的英国工人运动中也有人不支持罢工斗争。空想社会主义者韦斯顿就持这一立场。他在《蜂房报》上发表文章,指责英国工联领导的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斗争毫无意义,理由是工人工资的提高必然导致消费品价格的普遍上涨。

在1865年6月下旬的两次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作了专题报告,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批判了韦斯顿的观点。他指出: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都包含在新创造的产品价值之中,它们间的比例关

系可以在价值不变动的情况下改变,可以靠降低利润来提高工资。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则可以对工资和利润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重要影响,所以工人阶级应积极参加经济斗争。因此,韦斯顿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马克思也指出,不应像工联领导人那样过高地估计经济斗争的作用,因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还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和社会革命,彻底地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1864年似乎是马克思一生中最走运的一年了:这一年3月,马克思家乔迁了新居;秋天,第一国际建立,马克思主义开始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他本人也受到了人们公开的尊重和盛赞。

然而在这段日子里,马克思一家也有他们的烦恼:由于马克思参加了国际的工作,家庭的开支日益增大;工作负担的加重使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恶化了,胸部不时剧烈地疼痛,咳嗽不止。为了节省钱,马克思没有去看大夫,而是根据往常的经验对症下药:喝自己熬的草药汁和柠檬水,节制抽烟,天一下雾就闭门不出。病魔不仅给他的肉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也使《资本论》的写作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1865年春天,马克思的慢性病复发了,不得不停止工作,专心休养。在这期间,他乘车来到扎耳特博默耳,在舅父——商人莱昂·菲利浦斯家小住了三个星期。

荷兰的原野上似乎看不到山峦和森林。目力所及之处都是平坦宽阔、一望无垠的绿色原野，茂草迷离、繁花似锦、较少人迹，只有一群群良种奶牛悠闲舒懒地啃食着肥美的嫩草。不时能见到耕耘得十分精细的大片农田，其间长满了五色缤纷的名贵花卉：水仙、郁金香、玫瑰和风信子，等等。还有一座座巨大的风车昂首耸立在晴朗湛蓝的天际，发出一种悠悠的声响，无休无止，如怨如诉。这种欧洲低地风光具有一种特殊的风情和韵味，平时只有在梵·高和凡·艾克兄弟的风景画中才能见到。扎耳特博默耳是荷兰的一座著名小城，也是一个葱翠幽静、令人赏心悦目的去处，马克思舅父一家就住在城内一幢漂亮的小楼中。

莱昂·菲力浦斯是一个殷实的富商，他虽然对工人运动抱有偏见，也曾经埋怨马克思过于激进，但他富有教养，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开明人士。他认为马克思的所作所为并非胡闹，而是在从事一项很重要的事业。于是在他那幢古老幽静的住宅里，舅甥两人就“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等重大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虽然最终谁也未能使对方完全接受自己的观点，但双方都感到大有收益。愉快的休养生活对马克思的病情发生了良好的疗效，高度紧张的大脑也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使马克思感到快乐的是在舅父家里他又见到了表妹南尼达,并且相处得非常愉快。马克思很早就对表妹有一种特殊的好感,但给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1863年冬天的那次拜访。当时马克思病在了舅父家,受到了舅父全家人,特别是这位“长着一双厉害的黑眼睛的、伶俐可爱的”表妹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从此马克思就与南尼达建立起了纯洁真挚的友情,他们之间的谈话总是那么深入投机,无拘无束。马克思十分喜欢南尼达开朗热情的性格和激进而又有几分幼稚的思想,他常常戏谑地称她为总委员会的“荷兰书记”、“好莱坞的女秘书”。而南尼达则非常喜欢与这位博学多闻的表兄争辩,并提出许多离奇古怪的问题要他解答。

在这次交往中,南尼达请求马克思填写一份《自白》,马克思愉快地满足了她的这个愿望。

马克思用一种严肃而又带几分诙谐的笔调认真地填写了这份《自白》,字里行间充分显示了这位时代伟人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理想情操。其中的几个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您喜爱的优点:……纯朴。

您的特点:……目标始终如一。

您对幸福的理解:……斗争。

您对不幸的理解：……屈服。

您能原谅的缺点：……轻信。

您讨厌的缺点是：……逢迎。

您喜爱的英雄：……斯巴达克、刻卜勒。

您喜爱的格言：……人所具有的都具有。

第二十七章

《资本论》

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日益广大的阶层所接受。现在，它已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

——恩格斯

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下,第一国际成立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民族民主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并组织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积极参与了这些斗争。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是他政治生涯的又一个高峰。对此,恩格斯曾经作过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摩尔的一生,要是没有国际,便成了控告了钻石的钻石戒指。”

第一国际的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的革命实践活动是丰富多彩的。例如,他们积极参加了1865年至1867年发生在英国的争取选举权利民主化的运动。马克思对这个运动极为重视,认为它虽属于民主主义运动的范畴,但对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民主化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并能够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锻炼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政治素质。在马克思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第一国际和广大英国工人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使之具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第一国际对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别是在国际成立的最初几个月中,马克思曾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论证国际对待波兰

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他认为国际工人运动应该尽力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波兰在西方的真正朋友是工人阶级,而不是统治集团。在60年代中期,第一国际曾多次发表声援波兰起义的决议,1867年1月还举行了纪念波兰起义大会,马克思亲自作了大会发言,鲜明地指出:“没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就不能确立。”

马克思对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也同样重视。他不仅积极领导第一国际,组织了各种活动,支持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还深入地进行理论研究,探讨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他以前认为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先决条件,通过研究,他纠正了这一观点,主张:只有推翻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才能给予英国工人阶级以必要的革命推动,使他们摆脱改良主义的束缚,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这一理论对于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具有深刻的普遍意义。

另外,马克思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对于德国的统一运动、法国人民反对波拿巴专政的斗争以及美国南北战争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并在斗争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在继续从事艰巨的理论研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在这些

方面他们也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在这一系列革命活动当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要与各国政府和反动社会势力的阻挠破坏进行斗争,同时还要与流行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内部遇到的最主要的敌人是蒲鲁东主义者。

蒲鲁东主义是 19 世纪中叶流行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蒲鲁东本人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持批判态度,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违背的“平等”学说,而共产主义公有制则破坏了“独立”原则。他希望在两者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建立一种既平等又独立的“自由社会”,他的口号是“想怎么干,便怎么干”,这实际上是一种小生产者的无政府主义社会。

蒲鲁东对用革命手段改造社会持否定态度,鼓吹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经济斗争,甚至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他的改造社会的灵丹妙药是:建立一种“交换银行”,小生产者可以把自己的劳动产品送到银行里,与其它产品直接进行交换,并得到银行贷款。蒲鲁东认为,这样一来小生产者就可以避免资本家的中间剥削,不至于遭到破产,而资本家则失去了资本,工人阶级可以逐渐掌握全社会

的生产资料。蒲鲁东的这一社会改造方案是极其荒谬的,而且危害很大,这一天方夜谭式的计划只能把工人运动引入灾难的深渊。

在第一国际建立后不久,蒲鲁东就去世了,但他的思想在一些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里仍具有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法国,蒲鲁东的荒谬计划蒙蔽了不少工人群众,蒲鲁东主义者不仅控制了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而且向马克思主义者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发动了政治攻势,企图用其错误思想影响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因此在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恩格斯与蒲鲁东主义者进行了严肃而坚决的斗争。

1865年9月25日至29日,第一国际在伦敦召开代表会议,各国工人代表和总委员会委员共38人与会,马克思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是马克思主义者创建国际而斗争的重要会议,大大巩固和提高了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蒲鲁东主义者首先在会上发难,公开兜售他们反对政治斗争的主张,反对将波兰问题列入会议议程,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只应注意“社会革命”,不应介入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马克思等人义正辞严地批判了他们的错误观点。他们指出,波兰起义是反对沙俄为首的欧洲反动势力,无产阶级应该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这一正义斗争。经过讨论和表决,会议以多

数票否定了蒲鲁东主义者的意见，会后，根据马克思的要求，恩格斯写了题名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的一组文章，澄清了蒲鲁东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认识。

这次会议争论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是关于代表大会的成员问题。蒲鲁东主义者提出任何工人都可以参加代表大会，这实质上是破坏代表大会的代表性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一荒唐的主张当即遭到多数代表的驳斥，最后会议决定：由各个正式成立并交纳会费的支部选出代表组团参加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蒲鲁东主义者的阴谋未能得逞，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但是，那些死硬的蒲鲁东主义者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在以后召开的第一国际的几次代表大会上不断挑起事端，企图在国际内部推行他们的路线。而以马克思为首的多数代表则坚持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问题。蒲鲁东主义者对用革命手段改造社会持否定态度，反对进行罢工和政治斗争，主张用“互助制”的社会和平地取代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者彻底批判了他们的改良主义方案，在肯定经济斗争和合作社运动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进行政治斗

争和夺取政权才能得到彻底解放。

第二,关于第一国际的性质和组织原则。蒲鲁东主义者认为国际应该成为一个国际信贷和合作社之类的机构,实行各自为政的支部“自治”,甚至主张不直接从事体力劳动者不能在国际担任职务,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排挤马克思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第一国际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从而确立了它的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组织的性质及其革命纲领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第一国际的几次代表大会还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功绩,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的狭隘的行会观念。

第三,关于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蒲鲁东主义者认为,民族解放运动是政治问题,无产阶级只应关心经济问题,而不应关心政治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民族解放运动与工人运动关系密切,它可以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

第四,关于所有制问题。蒲鲁东主义者认为保存和恢复小私有制是个人幸福的源泉,因此他们主张在合作制的基础上保存小私有制,反对实行公有制。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坚决主张必须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只有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真正的解放。

经过几次大会的激烈斗争,特别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不懈的努力,马克思主义者击溃了蒲鲁东主义的猖狂进攻,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蒲鲁东主义者在不断失去市场的同时内部开始发生分化,其左翼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逐渐接近马克思主义。例如,工人出身的法国革命家欧仁·瓦尔兰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最终认清了蒲鲁东主义的错误,转而支持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则变成了公有制的积极拥护者。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在进行理论研究和忙于第一国际事务的同时,马克思仍然十分关注德国的工人运动。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德国人,身兼第一国际的德国通讯书记,总是觉得祖国发生的事情与自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还是因为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日趋成熟,而建立这样一个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然而,德国工人运动中也有不那么令人乐观的一面:拉萨尔机会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影响非常严重。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出身于一个犹太富商家庭,早年在柏林大学学习哲学,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当过律师。从1846年起,他花了八年时间承

办索菲亚·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并把这一普通的财产纠纷案夸大成反对特权阶级的革命斗争。该案结束后,这位伯爵夫人获得了30万塔勒的财产,拉萨尔因此而过上了同一个革命者的身分格格不入的糜烂生活。1848年革命爆发后,拉萨尔参加了德国的革命运动,曾在《新莱茵报》工作过,此后与马克思有过较多交往。尽管他曾多次表示崇拜马克思,并剽窃过马克思的许多理论成果,但他始终未能理解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他的评价是:“他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很不可靠的朋友,将来的一个毫无疑义的敌人。”而燕妮对他的评价则更为生动形象,在一篇笔记中,她以一个女性特有的细腻笔法写道:

“他吃力地负载着学者、思想家、诗人及政治活动家所获得的荣誉,……剧烈的斗争折磨着他的灵魂。他没有触及到的科学领域还多得很!古埃及学领域至今尚未开发。‘我现在应该成为一个埃及学者而震动世界呢,还是成为一个活动分子、一个政治家、一个斗士、一个士兵而表现自己多方面的才能呢?’真叫人左右为难!他内心的思绪起伏不定,而这种心灵的斗争往往表现得十分可笑。他像鼓满风帆的船一样在我的屋子里打转,又喊又叫,指手划脚……以致邻居被这不寻常的喊叫吓坏了,跑来打听发生了

什么事。这是‘伟大’人物心灵斗争处于尖锐矛盾时的一种发泄。”

拉萨尔信奉社会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贫困是所谓“铁的工资规律”造成的，要消除贫困就必须建立生产合作社，使工人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果实，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依靠国家帮助，要获得国家帮助就必须取得普选权，必须建立工人组织进行合法的鼓动宣传活动，等等。他认为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获得解放，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他反对马克思提出的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支持普鲁士自上而下的统一德国。

拉萨尔十分善于伪装自己，他打着革命理论家的旗帜到处招摇撞骗，在德国工人运动中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1863年，德国第一个全国性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拉萨尔乘机窃取了主席之职。他利用这一政治资本把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到处宣传自己的改良主义理论，把全德工人联合会引入了歧途。他还背着德国无产阶级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秘密勾结，进行政治交易。当时俾斯麦为了使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国，急需要国内的支持，于是他投其所好，答应拉萨尔在统一后给予人民普选权，条件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必须支持

普鲁士统一德国，拉萨尔竟然全部接受了俾斯麦提出的条件。

1864年，拉萨尔在与情敌的决斗之中死去。但是，他的思想影响迟迟没有消散，他的追随者们继承了他的衣钵，继续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拉萨尔死后，柏林等地的工联组织领导人经认真讨论后给马克思写信，要求他回国出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领导德国的工人运动。但是，马克思婉言谢绝了他们的盛情要求。马克思作出这一决定是有多重原因的，例如，马克思的国籍一直未能恢复，回国后很可能会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此时，他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的写作进入了关键阶段，很难脱开身，而且，总委员会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他去做，等等。同时马克思也很清楚，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十分复杂，拉萨尔及其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仍然很大，其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必须紧密地依靠德国工人运动中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拉萨尔去世时曾留下遗嘱，任命伯恩哈特·贝克尔继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之职，这个遗嘱虽然遭到了许多会员的反对，但仍被执行了。贝克尔即任后，伙同施来泽等机会主义者继续执行拉萨尔主义

路线,拒绝接受第一国际的领导。他们甚至公开发表声明,表示绝不与国际建立密切的联系。

为了使德国工人运动走出错误的泥淖,使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到第一国际的大家庭中来,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方面,他们亲自在《柏林改革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对贝克尔等人的观点和行为进行严厉的批判;另一方面,团结依靠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同机会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期在实践中提高他们的觉悟,促使德国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早日诞生。

在这些先进的德国人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老朋友威廉·李朴克内西以外,还有一位十分出色的无产阶级战士——奥古斯特·倍倍尔。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德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他出身贫寒,在工厂当过旋工。19世纪60年代参加了德国工人运动,并加入了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倍倍尔在结识了李卜克内西以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很快就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参加并出色地领导了德国的工人运动,1867年他当选为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主席。

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同拉萨尔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特别是在德国统一这个重大

问题上,他们拥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即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革命的方式,消灭德国的封建势力,结束割据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他们坚决反对普鲁士推行的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王朝战争,并对坚决支持自上而下道路的拉萨尔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斗争。在进行这些斗争的同时,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马克思的大力支持下,根据德国的具体情况,积极进行筹建全国性的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工作。

在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努力下,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广大群众逐渐看清了拉萨尔主义者的真实面目,特别是拉萨尔派出卖工人阶级,与俾斯麦相勾结的丑行更激起了他们的义愤。于是他们纷纷行动起来,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进行斗争。其中以白拉克、约克等先进分子为首的一部分工人群众退出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与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工人组织实行了革命联合。

1869年8月7日—9日,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下,德国先进的工人阶级召开代表大会,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由于这次大会是在爱森纳赫城举行的,所以这个工人组织又称为爱森纳赫派,以示与拉萨尔派的区别。从历史上看,这是在民

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第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按照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制定了自己的党纲。虽然从中仍可以看出拉萨尔主义的某些痕迹，但是它坚持了第一国际的基本原则。社会民主工党是在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它拥护第一国际，坚持反对资本压迫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反对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和王朝战争道路，真正代表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它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巨大胜利，对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进行的反对资本压迫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的革命斗争的同时，马克思从来没有停止过革命理论的研究，特别是进入了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他的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最艰巨最繁忙的时期。

如果从 1842 年马克思主编《莱因报》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算起，到 18 世纪 60 年代中叶，他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已经足足有 20 多年的历史了。为什么他能够历尽艰辛，锲而不舍地从事这一艰苦的工作呢？

马克思对此的回答是：“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在他看来，经济关系是

一切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基础,要想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和罪恶,要想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科学的理论武器,就必须深刻地剖析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而要想把政治经济学这门艰深庞杂的学问真正地研究透,就必须扎扎实实地下大功夫,花大力气,绝对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中写下的那段名言,正是他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艰难历程的真实写照:“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关于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一书时所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巨大代价,他本人曾经说过:“也许没有一本这类的书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写成的,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由于本书在第二十四章中已经对这个问题作过详细的交待,在此就不赘述了。

但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马克思在写作这部划时代的著作时,其工作态度是极其严谨认真的。无论是研究理论问题,还是推敲润色词句,他都表现出了精益求精和一丝不苟的高度负责精神,从不马虎敷衍,草率了事。为了使书稿的内容更加科学、完善,经

得起时间和风浪的考验,他尽可能广泛地搜集利用不断出现的新的材料和文献,研究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问题,对书稿不断地进行修改和充实。例如,为了写关于工厂法的章节,马克思翻阅了大英图书馆中全部有关的蓝皮书。而这一大堆又厚又重的资料一向是无人问津的,它们以前唯一的用途是被议员们当作射击的靶子——根据子弹穿透的页数来检测他们武器的威力。因此,《资本论》的书稿大都经过了多次修订,完稿的日期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推迟了。

为此,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感到十分焦急,多次写信催促他尽快交稿,以便使这部能够推动历史的书早日与读者见面。但是,马克思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和力求完美的性格使他没有接受好友的建议,他认为:“如果我们贡献给劳动者的东西有一点不够尽善尽美的话,那就是一种罪过。”1859年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后,马克思曾计划在六个月内写完《资本论》,但由于上述原因,这一计划被整整推迟了8年。

《资本论》一书是马克思集毕生所学撰写出的划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但它的诞生与恩格斯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部震惊世界的巨著是这两位时代伟人无与伦比的友谊和精诚合作的结晶,可以

说,如果没有恩格斯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和科学上的通力合作,《资本论》一书的创作和出版都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朋友的无私援助,马克思始终是十分感激的。但恩格斯却觉得这是自己应尽的一点责任和义务,并且,他不希望这事让别人知道,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同任何人都不相干”。

关于恩格斯对马克思在经济方面的大力资助的动人事迹,前面已作过详细的介绍。在此需要补充的是恩格斯在学术上也给了马克思大力的协助,所以马克思在 1866 年说过:恩格斯是《资本论》的“合著者”。

恩格斯对《资本论》一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研究经济理论方面,恩格斯起步要比马克思早。马克思当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与恩格斯对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而《资本论》所依据的某些基本观点中也有恩格斯的贡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了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

其次,恩格斯的经济理论研究对《资本论》一书的写作发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始终与恩格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除了有时进行面晤外,这种联系大部分是通过通信的方式进行的。每当马克思要研究某个新课题或者有了重大的发现,

他要告诉的第一个人就是恩格斯，而恩格斯则在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向马克思阐释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引起了马克思的高度重视。恩格斯的一些有关著述（例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也为马克思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其中有不少内容被引证在《资本论》中。

第三，恩格斯还利用自己敏锐犀利的洞察力和决判力帮助马克思解决艰深庞杂的理论问题。如前所述，马克思具有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是一个力求完美的真正的学者和思想家，正是这一点使他创造出科学完善的理论体系。但是，他的这一性格特征也使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写作进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为他在没有确信对某个理论问题有充分的把握之前是不肯轻易下结论的。而恩格斯的思维则异常快捷机敏，善于迅速地把握问题的本质，作出正确的判断。他常常写信劝告马克思不要过于苛求自己，要敢于下结论，同时还就一些具体的理论问题畅谈自己的看法，力图给马克思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四，恩格斯还时常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实际问题向马克思提供现实的材料和各种建议，这是马克思十分需要的。由于恩格斯亲身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从事管理经营活动，因此他对资本主义世界

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了如指掌。所以马克思时常要求他就这样或那样的专门问题发表意见,提供具体的数据。恩格斯不厌其烦地详细回答了马克思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并提供了大量非常精确的资料,其中有不少被马克思引用在《资本论》中。

另外,恩格斯还为马克思的写作搜集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

1867年3月底,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了:马克思终于写完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书稿。他立即把这一消息通知了恩格斯。接到马克思的来信后,恩格斯感到欣喜若狂,他在回信中写道:

“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大喜事,我们终于胜利了!”

“乌拉!当我终于在白纸黑字上看到第一卷已经完成……我禁不住这样欢呼起来。”

《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也寄托着他的全家人、好友恩格斯和许许多多共产主义者的殷切期望,马克思十分担心稿件会在邮寄过程中丢失或被反动派没收,于是他决定亲自护送这部手稿到汉堡。

1867年4月初,马克思乘坐轮船从伦敦港出发了。船只刚刚驶入英伦海峡,便遇到了一场巨大的风暴,惊涛骇浪不时地拍击着船舷,使轮船不断发出骇

人的声响和剧烈的颠簸。马克思生平第一次晕船了，但是，这丝毫也不能减弱他心中的激动和兴奋。他索性走出船舱，伫立在船头，扶栏远望。狂风巨浪之中，他仿佛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轮已经启航了，它开足马力，破浪疾行，胜利地驶向光明的彼岸。

1867年4月中旬，马克思携带着《资本论》的手稿来到汉堡，把它亲手交给了出版商迈斯纳。8月16日校对完了最后一个印章后，他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

“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作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我的亲爱的、忠实的朋友，祝你好！

你的 卡尔·马克思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正式与读者见面了。

《资本论》第一卷的总题目是：“资本的生产过程”，旨在从资本处于生产过程的运动状态来研究资本，以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资本的形成及其本质，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马克思在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开宗

明义地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资本论》第一卷共分7篇25章。翻开书页，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这样几句话：

献 给

我的不能忘记的朋友

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威廉·沃尔弗

1809年6月21日生于塔尔瑙

1864年5月9日死于曼彻斯特流亡生活中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篇中，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成就，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一理论对世界产生了像晴天霹雳般的影响。

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有：商品二重性问题、劳动二重性问题、价值形式、货币问题和价值规律等问题。其中，劳动二重性问题是核心，马克思正是因发现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才揭示出了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价值的本质、价值量以及价值形式

和价值规律等问题,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二重性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一切产品来自于生产劳动,但只有生产商品的劳动才有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是在一定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如把铁炼成钢,把木锯成材,把布裁成衣等),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由具体劳动创造的,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劳动是撇开各种具体形态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是由抽象劳动形成的。通过对商品的剖析研究,马克思发现:不同商品之所以能互相交换,不是根据它们分别包含的具体劳动,而是根据它们分别包含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只有这样才能作量的比较。因此,商品是由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本身就是抽象劳动,它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篇中,马克思还研究了价值的表现形式,货币的来源和本质等问题,从而揭示出了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萌芽,为全面深刻地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至第六篇中,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创造了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创造剩余价值理论是从分析货币转化为资本入手的。他认为,资本最初表现为一定量的货

币,但货币并非从来就是资本。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出现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劳动力商品具有一种特殊属性:它能够创造价值,并能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

马克思分析道: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后便强迫他们从事繁重的劳动,其目的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例如,工人通过6个小时劳动就能创造出自身生活费用的价值,即抵偿了资本家支付的工资。但如果资本家只让工人工作6小时便无利可得,因此资本家必然会让工人工作更长的时间,例如12小时,这样,另外6小时就成了无偿劳动,被资本家白白占有了。可见,资本家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到补偿劳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以上,从而使劳动力的使用所创造的价值超过了劳动力本身的价值,而超过的这一部分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

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奴役工人的狡诈手段,告诉人们:追逐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另外,马克思在书中还分析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的本质,资本积累的实质、形式和发展规律以及剩余价值资本化问题,从而深刻揭示了资本主

义的内在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

《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是政治经济学领域内发生的一场伟大革命,是掷向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枚重磅炸弹。

以往的经济学家们大多是从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立场出发来对待社会和历史的,他们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性及其深刻的内在矛盾,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合理的,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视为永恒不变的普遍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从分析商品入手,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精辟透彻地阐释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出了资本剥削的奥秘,从而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过是历史发展中一定阶段的产物,必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走向灭亡。

马克思用极其富有逻辑性的语言说明了这个道理,他在书中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来是随着资本垄断而产生,并在垄断制度下发达起来,可是现在,资本垄断成了这种生产方式的桎梏了。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会被炸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

思的这一结论彻底打破了关于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神话,鼓舞了千千万万工人群众为推翻这一腐朽制度而进行的革命斗争,这种情况正如恩格斯后来所写道的:“自地球上有了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的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阶级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所以,《资本论》一书的问世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依靠剥削工人剩余价值为生的资本家阶级及其辩护士们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而广大无产阶级则热烈欢迎它的诞生,把它看作无产阶级的“圣经”,是提高自己阶级觉悟从而获得自身解放的强大理论武器。在1867年9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第一国际作出了学习《资本论》重要决定。1868年9月,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又专门通过一项决议,感谢《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为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很快,《资本论》第一卷被翻译成法文、俄文和英文等各种版本,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的经济条件有所好转,恩格斯开始考虑退出令人讨厌的“鬼商业”了。后来,随着欧洲形势的发展,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恩格斯结束经商生活的想法也日益强烈起来。

1869年7月,恩格斯最终作出了退出商界的决定,他立即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马克思:“真好啊!从

今天起不再搞这个‘可爱的’商业了，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了！”他在同一天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妈妈，今天是我自由的第一天，我觉得要更好地度过这一天，莫过于立即给您写信。我刚刚获得的自由使我高兴极了。从昨天起，我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年轻了十岁。”

恩格斯希望退出商界后迁居伦敦，与马克思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他把自己的这一打算告诉了女友莉希。

莉希·白恩士是玛丽·白恩士的妹妹。她比恩格斯小7岁，也是一个工人，多年来一直与玛丽、恩格斯生活在一起。虽然莉希没有多少文化，但她具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和强烈的革命精神，完全赞同和支持恩格斯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她性格热情大方，聪慧机敏，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姐姐去世后，莉希默默地承担起了照料恩格斯生活的任务。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关系由同情、理解发展到了相互爱慕，最终，他们幸福地结合在一起。莉希完全赞同恩格斯迁居伦敦的主张。1870年9月份，恩格斯料理完在曼彻斯特的全部事务后，携莉希乘火车来到了伦敦。

第二十八章

公社革命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

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一个新阶段。不管这种事情的直接结

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
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马克思

在 19 世纪 60 年代,法国仍处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皇帝路易·波拿巴利用手中掌握的 50 万官吏、50 万军队和十几万“黑衣大军”(天主教僧侣),对法国人民实行极其严厉的军事独裁统治,使 1848 年革命取得的民主成果几乎全部化为乌有,从而严重地激化了法国社会的阶级矛盾。

到 60 年代末期,法国人民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起来。第一国际在巴黎的支部达到了 25 个,其会员和支持者已有 30 万之众。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已从争取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发展到了政治斗争,并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路易·波拿巴的专制政权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为了挽救帝国的统治,波拿巴决定采取统治者惯用的伎俩——发动对外战争。他把战争的矛头指向了正在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国的普鲁士,企图用战争手段阻止德国的统一,掠夺其领土,并以此摆脱国内的统治危机。

但岂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波拿巴的如意算盘彻底打错了。

此时,德意志的统一运动已进入了关键阶段。在

1866年进行的普奥战争中，普鲁士击败了强劲的对手奥地利，夺取了德意志统一运动的领导权，从而走完了统一运动最重要的一步。眼下它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南德四邦在法国的支持下仍保持着独立地位。因此，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决定：通过对法战争，自上而下地建立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并夺取法国的重要矿产区和工业基地阿尔萨斯和洛林。为此，普鲁士在军事和外交上做了整整三年的准备。

1870年7月19日，在老奸巨滑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挑逗下，法国首先宣战，发动了对普鲁士的侵略战争。

虽然战争是法方发动的，但它却未做好作战的准备。相反，早已有充分战争准备的普鲁士军队抓住有利时机，突然向法国发动猛烈进攻，打得法军节节败退。交战刚一个月，法军主力就被普军分割成两部分：巴赞元帅的部队被围困在麦茨，波拿巴率领的军队被包围在色当。在9月1日进行的色当决战中，法军遭到了重创。次日，驻色当法军投降，法皇波拿巴也成了普军的阶下囚。

消息传来，举国震惊。9月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愤怒的工人阶级和市民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但政权落入了资产阶级

共和派控制的临时政府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十分密切地注视着法国、德国所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并根据友人和国际会员汇报给他的情况,认真分析研究了战争发生的迹象和动态。

作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一向很厌恶战争,认为战争是从私有制社会的矛盾中产生的(虽然他们认为战争也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永久的和平只有在推翻剥削制度之后才能出现。但他们认为对于某些战争,无产阶级虽然不能制止其发生,但确实应该对它们采取正确的态度和对策。普法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马克思立即与总委员会开会商讨对策,会议委托他写一篇关于第一国际对待这次战争的态度宣言。

此时,马克思的身体很虚弱,久治不愈的肝病几乎把他拖垮了,不能持久地写作。但考虑到形势的严峻性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他仍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工作,连续伏案写了4天,写出了这篇宣言,题名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通讯书记们审阅后都感到很满意,于是把它在《派尔—麦尔新闻》上公开发表,并印制成数千份传单,译成德文和法文,广泛散发,结果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在这篇宣言中,马克思对这场战争的性质作了明确的界定:对于法国来说,这是一场侵略战争,它有助于波拿巴个人权力的巩固,而且如果波拿巴获胜,德国的统一将会推迟几十年;对于德国来说,战争则带有防御的性质;但双方统治者是在为王朝利益而战。“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有可能对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士!正是俾斯麦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结,以期摧毁普鲁士内部的民主反对派,并使霍亨索伦王朝兼并德国。”

马克思在宣言中告诉德国人民:不要把德国人民的利益与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混同起来,要认清政府的反民主政策和它在对法战争中的掠夺意图,要以民族和平政策来对抗统治阶级的反民族的战争政策,不能容许这场战争失去防御的性质而转变为对法国的侵略战争“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防御的性质而转变为对法国的侵略战争”那么无论胜利还是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他同时还指出,法国工人也应坚决反对波拿巴发动的侵略战争,在这方面,德法两国无产阶级应团结起来,反对两国统治者彼此进行的非正义战争。马克思还富有远见地预测到:“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

在巴黎敲响了。”

在普法战争掀起的巨大风波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像往常一样做了分工。

马克思除了为国际起草重要文件，进行理论研究和决定重大方针政策之外，还把很大精力用于应付总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因为战争爆发后，几位通讯书记去了法国，总委员会的工作负担大大加重了），他把写作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的工作交给了恩格斯。特别是当《派尔—麦尔新闻》要求他撰写有关战事进程的文章时，他认为恩格斯是这方面的专家，于是建议恩格斯来做这项工作。恩格斯爽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答应每周提供 1—2 篇这类文章。

恩格斯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从 7 月 29 日起，他连续撰写了五六十篇军事报道和评论，发表后引起了巨大轰动。为此，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骄傲地认为，恩格斯不愧为是一位“伟大的将军”。

一个时期以来，马克思一直在认真研究无产阶级对战争的政策问题。他认为面对战争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绝不应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而应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立场，反对任何非正义的战争。当旅居英国的法、德两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开展反战运动时，马克思立即给予大力的支持。他认为虽然这些人抱有盲目的和平幻想，但在反对战争这一问题上，

他们与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十分接近。

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同支持普鲁士王朝沙文主义政策的拉萨尔派相反，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他们主张：德国人民应反对德国统治集团夺取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企图，与法国无产阶级携起手来，共同制止战争。

对于德国无产阶级的这一抉择，马克思感到十分高兴，他在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中满怀激情地写道：“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这个新社会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反，其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受同一个原则劳动支配！”

但是，在普鲁士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历史时期里，任何反对王朝政策的举动都可以被扣上叛国的帽子，随时会受到残酷的对待。

由于爱森纳赫派不断进行反战宣传，并在集会和各种政治活动中鼓吹和平，抗议政府的战争政策，结果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镇压。他们的报纸和刊物被封闭，政治活动屡遭破坏，以白拉克为首的一部分工人运动领导人被投入监狱，而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

(他们于 1867 年被选入北德意志同盟帝国国会)由于在国会中抨击了政府的战争政策,也被当局逮捕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即使在狱中他们也坚定地
向公众阐明无产阶级对于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和同法国缔结的掠夺性和平必将给各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

马克思强烈地谴责了这些暴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抗议普鲁士当局的野蛮行径,并积极组织募捐和营救活动。

9 月 4 日革命之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巴黎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此时,德国已没有什么理由继续进行战争了,但德军却以安全保障为借口继续向法国腹地推进,以期掠夺法国的领土。这样一来,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国成了侵略者,而法国则成为反侵略的一方。

这种情况是马克思早已预料到了的、于是,他又为国际起草了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9 月 9 日得到了总委员会的批准。

马克思在宣言中明确指出:德国此时进行的战争已失去了其防御性质,变成了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而法国所进行的则是防御性的正义战争了。马克思正确指出了法、德两国无产阶级所应采取的斗争措施:德国工人应反对本国政府掠夺法国的企图,迫使

它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并实现和平，而法国工人在反侵略时也不要被本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所迷惑。他还深刻地指出了德国侵略法国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报复行为将不可避免，法俄将结成同盟并与德国发生冲突，从而引发大规模战争——这一预言被40多年之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证实了。他还理智地告诉法国工人阶级，他们的处境极其艰难，革命有其自身的进程，不可操之过急，应该充分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加强自己的阶级组织，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他写道：“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

马克思十分重视争取各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因为他认为这能起到抑制德国掠夺法国和法国保皇势力复辟的作用。于是他立即行动起来，通过总委员会中的英国委员，在英国各地广泛开展敦促英国政府在外交上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很快，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的工人群众纷纷行动起来，举行集会、游行，对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

9月下旬，100多个工人组织的代表组成了一支庞大的代表团，在伦敦会见了首相格拉斯顿，要求政府立即承认法兰西共和国。格拉斯顿是个老谋深算的政客，他借口必须等法国国民议会批准了临时政

府之后才能予以承认，狡猾地回避了工人代表提出的问题。英国政府的这种暧昧态度遭到了马克思等国际领导人的严厉批驳，全国各地不断掀起抗议的浪潮。

在这段紧张忙乱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令马克思感到万分高兴的事情——他的分离了近 20 年的亲密朋友恩格斯又迁回了伦敦。

早在 1870 年 2 月，恩格斯就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迁居计划：“今年夏末秋初，我就要迁居伦敦，这件事现在已经定下来了。莉希向我表示，她想离开曼彻斯特，越快越好。”

接到这封信后，马克思全家老小高兴得跳了起来，欢呼雀跃，马克思甚至喝了“不该喝的一杯”酒。他们立即着手为恩格斯物色一处合适的住房。

虽然当时找房子并不困难，但为了使大家都满意，马克思一家着实花费了一番气力。他们的标准是：住房不仅要宽敞，室内布局合理，光线充足，拥有必需的设施，租金适当，而且地点还应距马克思家不远。这些过于“苛刻”的条件使找房工作拖延了一段时间，直到 7 月份，事情才有了眉目。燕妮在一封信中告诉恩格斯：“我已经找到了一所住房，燕妮和杜西与我一起去的。我们全都很喜欢它，这里环境优美，周围空旷，她俩还觉得它特别清洁雅致。”

得到这一消息后，恩格斯特地从曼彻斯特前来视察了一番，感到很满意，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1870年9月，恩格斯携夫人莉希搬进了这座新居。

恩格斯的新居在瑞琴特公园路122号，紧靠着美丽幽静的瑞琴特公园，去马克思家步行只需一刻钟。这是一幢当时中产阶级家庭常住的那种住宅，外表朴实敦厚，内部的布局讲究方便实用。厨房和储藏室设在地下层中，一层有两间起居室，宽大明亮，给人一种舒适愉悦的感觉。第二层也有两个房间，其中一个大间被辟为恩格斯的书房，摆放着写字台，四壁排满了书架。第三层是休息和会客的地方，有三间卧房，楼前还有一个相当不错的花园。这幢住宅座落在浦利姆洛斯山下的绿树丛中，整个环境十分静谧优雅，是一个读书写作的好地方。

这两位伟大的朋友又可以肩并肩地一起工作、战斗了，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广大工人阶级来说，这确实是一大幸事特别是在这国际风云剧变的时期里，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共同进行理论研究，商讨国际上正在发生的所有重大的事情。他们会面的地点大多数是在马克思的家中，也时常在恩格斯的书房里聚汇，偶尔还到瑞琴特公园和浦利姆洛斯山下的草地上去散步。人们常常可以从他们会面的地方听到慷慨激昂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

不久,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参加了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工作,担任比利时通讯书记,后来又先后担任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的通讯书记。

战争仍在继续,普军乘胜向法国腹地推进。马克思恩格斯对俾斯麦的侵略野心感到愤慨,对战争给法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更是痛心疾首,同时,也为打探不到此时正在法国的女儿燕妮的下落而忧心如焚。

面对强大的入侵之敌,法兰西人民表现出了真正的英雄本色,他们自发地行动起来,拿起简陋的武器,进行了极其英勇的抵抗。巴黎的无产阶级也迅速地组织起来,建立起自己强大的武装力量。普军对法国人民和抵抗运动采取了非常野蛮的手段,落入他们手中的抵抗战士几乎全部被杀害了,许许多多的村庄被烧毁,城市遭到蹂躏。

9月中旬,法国光荣的首都巴黎被包围了!

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局面,巴黎无产阶级和广大市民同仇敌忾,奋起保卫巴黎,保卫法兰西。到9月末,巴黎国民军又组织了194个新营,兵力已经接近30万,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地抵抗普鲁士军队的猖狂进攻。他们还怀着高尚的民族自尊心向国防政府提出了庄严神圣的要求:不与普鲁士谈判,实行普遍征兵,建立民警机构,选举产生自治机

关巴黎公社,改善巴黎的物质供应状况,等等。

但是,与人民的英勇抗争形成鲜明的对照,法国的统治者们却显得极其渺小、卑鄙、猥琐,他们对侵略者采取了另外一种姿态——卑躬曲膝,甚至举手投降。

10月27日,巴赞元帅率17万法军在麦茨向普军投降,而国防政府(1871年初,镇压过工人运动的刽子手梯也尔出任该政府的首脑)则背着法国人民与普鲁士政府秘密媾和,签订了屈辱的卖国条约。根据该条约,法国不仅要缴纳巨额赔款,而且还要割让大片极其富庶的国土!

就这样,在王朝战争的硝烟烈火之中,德意志统一了。但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期望的那种统一,它虽然使德国变得更繁荣强大,但同时也把德意志民族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威廉·李卜克内西曾经说过,新皇帝的加冕仪式应该在柏林“宪兵广场”举行,这最具有象征意义。但是,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却在法国的王宫凡尔赛镜宫不可一世地宣布了德意志帝国成立。对于伟大骄傲的法兰西民族来说,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简直是奇耻大辱!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对于法国、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是一种巨大的不幸,它在人类中间播撒了仇恨和战争的种子。

巴黎人民被这些空前的丑行和暴行深深地震惊了，激怒了！

面对普军的步步进逼和长期围困，面对国防政府卖国求荣的卑鄙行径，人民群众手持武器，奋起战斗，于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连续两次举行了武装起义，试图推翻国防政府，但都被镇压了下去。

此时的法兰西大地上已经是一片硝烟和虚墟，侵略者和反革命势力的气焰甚嚣尘上。而在伦敦马克思的住宅里，充满雪茄烟雾的空气中也弥漫着一种愤怒和战斗的气息。这一时期，马克思与恩格斯更加经常地坐在一起，密切地关注和认真地研究着法国事态的发展。

“这个新建立的国防政府是个什么货色？”此时的马克思情绪有些焦躁不安，他离开了安乐椅，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从目前它的表演来看，它绝不是一种社会成就，而是一个反动的政府，它既继承了崩溃了的第二帝国留下的沉重历史包袱，同时也继承了对工人阶级的恐怖。”

“它的头子梯也尔本身就是一个政客，既狡猾又反动，他所追逐的是阴谋和背叛。”恩格斯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着手中的材料，一边说道。“他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对工人阶级凶残毒辣，对侵略者却奴颜卑

膝，简直就象一只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巴黎工人应该承担起保卫祖国、反击外来侵略的使命，他们应该很好地组织起来。”马克思仍然来回踱着步子，使劲地抽雪茄烟。这是他们的义务，而且他们目前也具备一定实力，他们的武装已经达到200个营了，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也支持他们。”

“如果巴黎工人现在就夺取政权似乎为时尚早。”恩格斯放下手中的报纸，兴奋地说，“但是，抵抗已经在整个法国展开了，人民到处都在战斗，他们是不会允许统治阶级出卖民族利益的。”

是的，英雄的法国工人阶级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不仅顽强地抵抗凶恶的普鲁士侵略军，而且也旗帜鲜明地反对国防政府的卖国行径。新一轮更为激烈的较量已在酝酿之中了。

为了彻底打垮工人阶级的武装力量，梯也尔决定首先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并进而解除他们的武装。

3月18日凌晨，梯也尔军队偷袭了存放自卫军大炮最多的地方——蒙马特尔高地。在进攻中，几名国民自卫军战士牺牲了，大炮落入敌人之手。敌人在运送大炮的时候被附近居民发觉了，国民自卫军闻讯火速赶来，与反动军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许多居民也前来助战。走在最前面的是勇敢的巴黎妇女，

他们向偷运大炮的士兵们发动了宣传攻势,劝说他们认清楚敌我,站到人民群众一边来。军队动摇了,其中许多人向巴黎人民表示友好。有两个军官下令向妇女儿童开枪,结果引起了士兵的愤怒,当场把这两个反动家伙枪决了,许多士兵毅然站到了人民一边。

梯也尔夺取工人大炮的阴谋彻底失败了,并迫使巴黎无产阶级举行了武装起义。同一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宣言,指出:“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

巴黎人民长期积郁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他们向反动政府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梯也尔被吓破了胆,带着他的亲信和反动军队仓皇撤出了巴黎,逃往凡尔赛。不到半天的时间,国民自卫军就攻占了市政机关,革命的红旗——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巴黎上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3·18 起义胜利之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掌握了巴黎政权。为了尽快地把政权移交给民选产生

的机构,他们花费了很大力量筹备公社的选举事宜。3月26日,选举工作在巴黎隆重举行,广大无产阶级和市民群众踊跃参加了这一政治盛会。各区共选举出86人组成了公社委员会,但由于其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不久即退出和当选委员布朗基仍关押在梯也尔政府的监狱中,实际上公社委员只有64人,大多数是工人代表。其中著名的领导人有:弗兰克尔、瓦罗兰、杜瓦尔、里果、弗路朗斯和费烈等。

3月28日,巴黎市政厅前的广场上人潮如涌,红旗漫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巴黎公社正式宣告诞生了。

这是巴黎工人阶级的英雄壮举,也是全世界无产者共同的伟大事业!

公社革命的消息传到伦敦后,第一国际的大本营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欢呼声。总委员会立即开会,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

马克思非常密切地注视着巴黎的动态。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他曾经三次在这座城市居住过,这里不仅有他的许多亲密友人,而且正是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他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真正的共产党人。

尽管马克思在事先曾告诫巴黎工人不要贸然举行起义,但此时他还是为公社的成立而感到万分高

兴和激动,并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巴黎无产阶级一边。这是马克思在对待过早爆发的人民革命时所采取的原则立场。面对某些人发出的只有当具备取胜的条件时才能支持人民的斗争的论调,他坚定地表示:“如果斗争只是在极为顺利的必胜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马克思认为,公社革命是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在无产阶级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所进行的斗争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写道:“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种事情的直接后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3月21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做出决定,向无产阶级解释公社革命的性质,并号召他们支援巴黎人民的斗争。根据已掌握的情况,马克思还及时向巴黎的革命领导人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加强蒙马特尔北部高地的防线,警惕凡尔赛分子与普军用武力联合绞杀革命。马克思还敏锐观察到了3·18起义后巴黎领导人的某些失误,例如,未及时对梯也尔集团采取军事行动,为他们纠集力量反攻留下了喘息的时间,等等。马克思还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报刊撰稿,宣传公社革命,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巴黎人民。

第一国际和马克思的号召得到了许多国家工人阶级的响应,比利时、瑞士和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纷纷举行声援大会,就连法国的交战国德国的无产阶级也采取了行动,支援法国工人兄弟。汉诺威的数千名工人还通过了一项决议,上面写道:“法国工人!你们作为前卫为解放各国人民再次挺身而出。在此时刻,全体无产阶级都在注视着你们,对你们表示同情,并寄予期望!”另外,还有大批不同国籍、民族的工人和进步人士赶赴巴黎,亲身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3.18 起义以后,特别是公社成立之后,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从巴黎传来。巴黎无产阶级以其罕见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政权。

为了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两项重要的措施。

第一,消灭常备军。在3月19日和3月22日召开的会议上,他们集中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会议的决议规定:把留在巴黎的士兵全部编入国民自卫军。这一举措施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常备军和警察机构。3月29日,公社颁布法令,正式宣布取消常备军,用国民自卫军取而代之。

第二,摧毁旧官僚机构。3·18 起义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立即接管了旧政府的各个主要部门。此后又采取措施,撤消了那些离职不归的旧政府官员,由中央委员会委派职员取代。另外还接管了各个区政府,从而控制住了巴黎的全部政府机构。

为了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无产阶级进行了大胆的尝试,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例如,为了使公职人员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实行了公职人员的民主选举制度,并在选举中体现民主原则;实行名副其实的普选制,简化选举程序,使之有利于广大劳动者,实行无记名投票等;对政府人员行使监督和罢免之权,以防止产生新的官僚集团和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取消政府官吏的一切特权和高薪制,并做出具体规定:政府人员的年薪的不得超过 6000 法郎;加强法制建设,以防止政府官员欺压群众和保护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

在文化教育方面,公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做了许多改造工作。例如,用世俗教育代替宗教教育;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大办兴办职业教育,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类职业人材;规定了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鼓励发展文化艺术事业等等。

巴黎公社还决定并采取了许多社会经济方面的

措施。例如,4月16日,公社下令将那些因企业主逃亡而停产的工厂交给该厂的工人协作社组织生产;禁止企业主对工人无理罚款和扣发工资;采取了提高工人工资的一些措施;4月25日,下令没收逃亡富人的住宅给无房者居住;禁止面包房的夜工制;颁布了延期偿付债务的法令,等等。

巴黎公社所实行的无产阶级民主和革命措施是空前的伟大创举,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和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同时也发生了显著的社会效果。巴黎历来是一个纸醉金迷、藏污纳垢的罪恶之都,社会黑暗和腐败现象比比皆是。而在公社时期,这些丑恶的东西一时竟绝了迹。据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观察,这一时期没有听说发生过偷窃、凶杀之类的事情。

马克思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注视着公社革命的发展,注视着巴黎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们的每一个举措。他觉得公社社员们正在用自己的实践回答着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尚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马克思被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创举深深地感染了,震撼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

例！”他敏锐地意识到：公社战士们的这些尝试将开辟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他们的行为充分证明，无产阶级不仅能够夺取政权，而且有能力治理国家！

但是眼下，急需要做的并不是对巴黎发生的事情进行理论上的分析研究，而是尽快地向巴黎人民提供有力的援助。马克思夜以继日地注视着巴黎的动态，通过各种方式搜集整理有关公社的信息，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与巴黎公社取得联系。

马克思每天要读 7 种英文报纸、13 种法文报纸和国际会员从各地发来的大量信件，并立即把其中最有价值的情况通知受围困的公社战士。从起义开始，第一国际的许多会员就参加了公社的各级组织和领导机构，并直接参加了激烈的战斗。国际的委员赛拉叶和龙格一直驻在巴黎，一方面参加公社活动，一方面及时向总委员会汇报时局的变化。马克思还设法与公社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瓦尔兰、弗兰克尔等人）取得了联系，不断给他们以具体的指示和热情的鼓励，并提供有关重要情报。他甚至还通过一个往返于伦敦和巴黎之间的德国商人与公社进行秘密的联络。马克思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业绩，揭露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对公社战士的污蔑。另外，他和恩格斯还向欧美各国的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写了几百封信，号召他们声援公社革命。

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公社犯下的一些错误也没有回避,及时地提出了告诫。比如,他曾劝告公社派出人员到全国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各地的无产阶级投入战斗;劝告公社领导人要警惕内部的某些不可靠分子的阴谋活动,狠狠打击凡尔赛匪帮并警惕他们与普鲁士相勾结。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发觉了公社的另一些严重错误:他们对是否没收作为法国主要经济杠杆的法兰西银行犹豫不决,并容忍资产阶级的报纸在巴黎发行,对工人阶级进行诽谤,等等。但马克思十分清楚,当强大的敌人正在虎视眈眈,准备发动凶狠的反扑之际,任何背后的议论和争吵都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当务之急是使无产阶级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粉碎反革命的阴谋和巩固政权而英勇战斗。

第二十九章

《法兰西内战》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马克思

当巴黎公社的成员们进行建立新型无产阶级国

家的伟大尝试的时候，他们的敌人正在磨刀霍霍，一场血腥的反革命大屠杀日益临近了。

梯也尔集团刚刚逃到凡尔赛时只有一万多残兵败将，根本无力镇压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为了能够彻底绞杀巴黎公社革命，恢复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极其狡猾的措施。

例如，他们充分利用所有的宣传工具，对巴黎公社及其革命事业大肆污蔑诽谤，并指使隐藏在巴黎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与此同时，梯也尔还竭尽全力招兵买马，扩充他的军事力量。为此他不惜与民族敌人俾斯麦暗中勾结，以出卖民族利益为代价，换取德军释放法国战俘，以充实扩大他的军队。为了扑灭愈燃愈旺的革命烈火，俾斯麦也公开放弃了“中立”的诺言，提前释放了几万名法军战俘，让他们去攻打公社战士。

这样，到4月初，凡尔赛匪帮的兵力已达到了6万余人。梯也尔感到自己的羽翼已经丰满起来了，便下令向公社发动进攻。

4月2日，一万多名凡尔赛军队攻至巴黎城下，巴黎人民在公社委员会的领导下立即展开了英勇的抵抗。4月3日，工人出身的领袖杜瓦尔率领国民自卫军迅速出击，给敌军以重创，一直攻至距凡尔赛几公里处。但由于公社的战争准备不足，军事指挥也很

落后,不久便在敌人强大正规军的打击下退了下来。杜瓦尔战败被俘,遇害前英勇地高呼:“公社万岁!”

战斗愈演愈烈。数万凡尔赛军队不断向巴黎城下推进,疯狂地用重炮猛轰,把许多居民区夷为平地,大批抵抗战士和平民遭到杀害。5月10日,梯也尔在丧权辱国的法兰克福和约上签了字,德军立即释放了10万法军战俘,并同意法军增至13万(原定法军只能有4万人),还允许凡尔赛军队从北面穿过德军防线进攻巴黎。

12日,凡尔赛军队开始攻城,公社战士们拼死抵抗,阵地上洒满了他们的鲜血。许许多多妇女和儿童也走上了战场,与他们的丈夫、父亲和兄弟们并肩浴血奋战,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路易莎·米歇尔是一个女教师,早在1867年就参加了工人运动,3·18起义爆发后,她积极参加了公社革命。在巴黎保卫战中,米歇尔手持武器,始终守卫在第一线,是战斗到最后的人们之一。一位公社战士在战火中记下了他亲眼所见的一个动人情景:“一位19岁的年轻姑娘顽强地守卫在沙包里,整整战斗了一天。她有一张迷人而红润的脸庞,黑色的卷发,穿着水兵的服装。”17岁的菲里克斯杜兰和14岁的恩斯特是一对亲兄弟,他们跟随父亲走上了烽火连天的战场,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弟弟在把红

旗插上街垒时中弹倒下了，哥哥立即冲上去保卫红旗，也不幸中弹牺牲。他们的父亲一面流着眼泪，一面接过儿子手中的旗帜，勇猛地向敌人冲击……

另外，战斗的人群中还有许多国际主义战士，如波兰革命家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和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等等，他们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视死如归地战斗在前沿阵地上，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着巴黎的每一寸土地和神圣的革命事业。东布罗夫斯基在牺牲之前还在鼓励他的战友：“我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快去想办法拯救共和国吧！”

5月21日，反动军队在奸细的协助下攻入了圣·克卢门，接着又占领了数座重要的城门，凡尔赛匪徒们如潮水般蜂拥而入。至2日清晨，大约有10万之众的敌军攻入了巴黎城内。艰苦卓绝的巴黎保卫战开始了。巴黎人民据守在每一座街垒和建筑物的后面，与野蛮的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搏斗。

5月24日，敌军攻占了公社的所在地市政厅。26日，巴黎公社发出了最后的通告，号召巴黎人民同敌人作殊死的战斗。27日，一批公社战士退入巴黎东郊拉雪兹神甫墓地，同凡尔赛匪帮整整搏斗了一天，最后一阵枪声响过之后，他们高呼着“为我复仇”的口号全部牺牲在一堵墙边。5月28日，最后一道街垒被

敌人攻破了、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开始了，凶残的胜利者对战败者发泄出了一种近乎野兽般原始的疯狂。

梯也尔匪帮对参加过抵抗的战士和巴黎市民进行了血腥的报复，凡是衣服上有血迹的人，甚至相貌像工人的人，不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杀人者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大批公社战士被活埋，许多人被折磨致死，为了加速杀戮，他们甚至使用了榴霰弹。一些妇女和儿童为了挽救丈夫和父亲的生命，向士兵们苦苦哀求道：“也杀死我们吧！”果然，他们也遭到了杀害。世界历史名城巴黎竟变成了一座大屠场，塞纳河的河水被烈士们的鲜血染成了红色。据不完全统计，被凡尔赛军队屠杀、流放和监禁的人超过了10万。

自从4月初凡尔赛匪帮围攻巴黎以来，马克思及其家人都以一种万分焦急和激动的心情注视着巴黎事态的发展。反革命军队的疯狂进攻和野蛮屠杀激起了他们极大的义愤，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忧伤。面对着这些惨绝人寰的暴行，马克思承受了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次打击。他时常惦念着公社领袖们的命运，牵挂着巴黎的每一个普通的公社战士，也在焦急地四处打探自己的女儿劳拉和女婿保尔·拉法格

(1868年,劳拉与拉法格结婚后迁居法国,经常在巴黎居住)的下落。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一位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思想家和慈爱的父亲,他的心在滴血,剧烈地作痛,终于他病倒了。燕妮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很难向您说明,我们家处在怎样激动、惊恐和失望的境地之中。自从6月战斗以来,我还没有类似的经历。我十分担心,共产主义运动——这黑暗中的第一次闪光,消失了,而我们所有最优秀忠实的朋友也随同它一起消失了。”她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您无法想象,几个星期来我们是多么痛苦愤怒。需要20多年才能培养出这么刚强、精干、勇敢的人,现在他们几乎都在那里。有一些人还有希望,但优秀的都被枪杀了。”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被敌人的汹汹气焰和强大的外表所压倒,他坚信巴黎公社的精神将永世长存,他们的革命斗争经验是留给人类的一份极为宝贵的遗产,而他们播下的革命火种总有一无会燃起燎原的烈火,把整个旧世界烧个干干净净。

早在4月中旬,总委员会就委托马克思写一篇关于公社的宣言。此时,马克思正被肝痛和痛严重困扰着,连走路都感到困难,但他强忍住病痛着手起草工作。他让女儿和恩格斯为他收集各种资料,恩格斯

还为他提供了有关公社军事措施方面的分析材料。经过了许多个昼夜的伏案工作,就在公社失败后的第二天,他把手稿修改完毕了。次日,提交给了总委员会并获得了通过。1871年6月13日,这篇宣言以《法兰西内战》为标题在伦敦正式发表了,并很快被译成各种文字流传到许许多多国家和地区。到此时为止,这是马克思著作中传播得最广、最快的一部。

《法兰西内战》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的文件之一,马克思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情歌颂了“冲天的巴黎人”的革命精神,根据翔实的资料和铁的事实,深刻揭露了凡尔赛匪帮的可耻暴行和各种谣言诡辩,全面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关于国家、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列宁认为:这部著作对公社进行了“深刻的、准确的、出色而起积极作用的”估价。

《法兰西内战》一书的理论要点大致如下:

(一)无产阶级掌握武器是顺利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条件。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成分。剥削阶级总是依靠庞大的军事力量维护其反动统治,而无产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拥有强大的人民武装。3·18起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公社之所以能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生存72天,都是由于

无产阶级手中拥有武装力量。梯也尔上台后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企图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这件事也从反面证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公社战士用武器保卫公社革命的英雄壮举，同时也指出了他们没有乘胜追击，一举歼灭凡尔赛匪帮的战略错误，结果为敌人纠集反革命军队反攻倒算留下了时机，这是公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后来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他写道：“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付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二）无产阶级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

马克思在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时就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科学原理，巴黎公社革命实践了这一理论，并且提供了关于怎样打碎旧国家机器和建立新型国家政权的实际经验。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法国资产阶级国家

机器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指出:这个旧国家是剥削、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把它发展到了很完备的程度,所以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彻底摧毁它。

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不仅这样做了,而且随后还建立起了公社式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用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国家。他们用人民武装取代了旧的常备军,用普选产生的立法与行政统一的国家机关取代了资产阶级的官僚制和议会制度,用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代替了旧的官僚集中制,这些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从中,马克思欣喜地看到了一个无产阶级新国家的雏型,看到了代替被打碎的旧国家机器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形式。他指出:“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他们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

(三)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必须实行无产阶级民主。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巴黎公社第一次实行了无产阶级民主,给予了人民群众充分的民主权

利。例如,为了使公职人员成为人民的真正公仆,实行了公职人员的民主选举制度,并在选举中体现民主原则:实行名副其实的普选制,简化选举程序,使之有利于广大劳动者,实行无记名投票等;对政府人员实行监督和罢免之权,以防止产生新的官僚集团和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取消政府官吏的一切特权和高薪制,规定政府人员的年薪最高不得超过6000法郎。另外,公社还注意使无产阶级民主法制化,以充分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严格执法,对违犯法纪和欺压群众的公职人员进行处罚。

由于公社实行了高度的民主,使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了主人,从而焕发出了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建设公社和保卫公社的斗争中创造出了伟大的奇迹,也充分保证了公社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性质。

(四)无产阶级只有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时,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而巴黎公社的实践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公社革命本身代表了农民阶级的利益,而且公社所采取的许多措施也符合农民阶级的需要。在围城期间,公社也曾经采取措施,试图争取得到农民兄弟的支持,他们

曾用氢气球向城外撒出传单，指出农民与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明确提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等等。

但由于公社领导者开始时未重视农民问题，后来又受到凡尔赛匪帮和德军的重重围困，不可能与农民建立密切的联系，充分地动员和发动农民，因此他们未得到农民群众的支持，这也是公社陷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事实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工农联盟思想的正确性。

(五)无产阶级只有在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由于经济和政治条件的限制，当时的法国还没有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因此在公社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布朗基分子(多数派)和蒲鲁东分子(少数派)。在革命运动的有力推动下，他们参加了公社革命，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由于他们在理论上存在许多缺陷，所以也使公社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并最终导致了公社革命的失败。实践证明，无产阶级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坚强的、目标明确的革命政党的领导，它既不能取得胜利，也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早就得出的结论，现在又被公社革命的经验完全证实了。

《法兰西内战》不是哀伤悲切的挽歌，而是马克思为千千万万死难烈士们高唱的一首英雄颂曲。这

本书是用一种能够振奋人心的文体写成的——充满革命的悲壮和战斗豪情。这种文体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采用过，现在，马克思又用它来为失败了的公社革命放声高歌。在全书的最后，马克思用一段具有巨大震撼力量的语言作为结束语：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从6月初开始，大批公社流亡者如潮水般涌入了伦敦。他们蓬头垢面，精疲力尽，无衣无食，有的人还伤痕累累，悲惨地流落在大街小巷里，其中许多人还带来了家眷。这些人曾经怀着满腔的热情，为反抗外族侵略和实现伟大的革命思想而进行了光荣而英勇的战斗，如今却像逃难般流落他乡，听凭命运的摆布。为了救援这些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的公社战士，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立即发起成立了一个援助流浪者委员会，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救助这些受迫害的人们。

在这一方面，很少有人像马克思那样尽心尽力，充满了火热的激情。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他曾经这样做过。如今，当全世界的反动势力都在竭尽全力

屠杀、追捕和咒骂公社战士的时候，他又一次挺身而出，充当了他们的忠实的朋友和保护者。

马克思想方设法为流亡者们提供住所、食品和各種必需的物资（衣服和家庭用品等等）。为了使救援工作开展得更为广泛，具有实效，他还与战友们共同发起募捐运动，向社会各界（包括广大劳动者和社会名流）募捐，他本人则身体力行，先后几次慷慨解囊，恩格斯也常常为流亡者们“掏空了口袋”。为了帮助公社战士们逃出法国，免遭被审判和惩罚的厄运，马克思等人还积极想办法帮他们筹措路费和办理护照。

在救援工作中，马克思真正是耗费了苦心，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流亡者解决了许许多多具体的问题。例如，公社的一个重要军事指挥官罗兹瓦多夫斯基不懂英语，找工作遇到了麻烦。马克思等人设法先为他找了一个教法语的工作，让他在工作中学习英语，待语言过关后，又给他找了工程师的工作，并为他代付了许多费用，购置了服装。

在那段日子里，马克思的家成了流亡者们最安全舒适的接待站，有时候简直就象一座难民营——几乎所有的房间里都住满了公社战士，他们不仅急需衣食和生活上的关照，而且还需要巨大的精神慰藉。燕妮母女和琳蘅亲切地接待了他们，并给予了天

微不至的关心照料。当岁序更新之时,她们还邀请她们来家中做客,使这些身处异乡的流亡者们深深地感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虽然急剧增长的生活开支使他们难以承受,但她们还是想办法解决了困难。正如后来一家法国报纸所回忆的那样:流亡者们“在马克思那里受到了兄弟般的款待,为了帮助公社流亡者们,他倾其所有,并借空了朋友。没有一个流亡者没在他那里得到安慰和帮助。”

其实,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处境也十分糟糕。由于他全力支持公社革命,公社失败后领导了救援流亡者的工作,并公开发表了《法兰西内战》一书,因此引起了各国反动势力的恼怒和痛恨,他们携起手来一齐对马克思进行极其恶毒的咒骂、诽谤和攻击。资产阶级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给他扣上了煽动叛乱和叛国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把芝加哥发生的大火灾也归咎于第一国际。德国政府还发出了通缉令:只要马克思一回国,立即予以逮捕。有些反动分子还到处散布谣言,说马克思已经被逮捕了,云云。他们还对马克思及其家人进行威胁,并派遣了许多暗探秘密地跟踪监视他们。

1871年8月,马克思因病到一个海滨浴场疗养,散步时发现一个暗探像一条猎犬一样紧紧地跟踪着他,使他感到十分厌恶。于是马克思猛地转过身来,

用蔑视的目光紧紧地盯住这个坏家伙。在马克思的凛然正气和巨大威慑力面前，这个暗探吓得竟恭敬地脱下了帽子，然后悄悄地溜走了。

马克思是一个毕生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职业革命家，对于遭受打击迫害之类的事情早已习以为常了，面对敌人的种种卑鄙伎俩，他丝毫不为所动。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以一种乐观幽默的口吻写道：“我目前荣幸地成了伦敦受诽谤最多、受威胁最大的人。在度过 20 年单调的沼泽地的田园生活之后，这的确是很不错的。政府的报纸《观察家报》以向法庭起诉来威胁我。他们敢！对这帮恶棍我一点也不在乎！”

但使马克思感到十分担忧的是：他的孩子们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1871 年夏天，小燕妮和爱琳娜到法国去看望劳拉时，在边境地区被法国警察抓住了。他们被强行搜了身，并受到了严厉粗暴的审讯，护照也被无理地抢走了。但姑娘们都表现得很坚强沉着，使敌人一无所获，只好释放了她们。后来小燕妮写了一篇报道，详细介绍了他们的这次历险经历。这篇文章发表在美国的一家杂志上，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同情。

劳拉和拉法格夫妇虽在革命期间没有受到伤害，但公社失败后也受到了当局的通缉，不得已逃到

了西班牙边界小镇博索斯特暂住了下来。不料暗探们跟踪而至,企图把拉法格抓回法国枪毙,其罪名是:他参加了公社革命,并且是国际成员和马克思的女婿。碰巧拉法格不在,于是他们把劳拉抓了起来,进行了粗暴的审问。后来劳拉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脱离了虎口,与拉法格一起迁居到了马德里,在那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革命在反动势力的疯狂镇压之下失败了。但正如马克思在评价失败了革命运动时所指出的:革命死了,但革命万岁!

公社失败后,她的儿女们流亡到了世界的各个地方,带去了满腔的悲伤和愤怒,也带去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不熄的革命火种。其中,一位名叫欧仁·鲍狄埃的公社战士在战斗的硝烟尚未散尽之时,躲过敌人的搜捕,在蒙马特尔区一间简陋的阁楼里,用饱蘸着血泪和战斗激情的笔写下了一首激昂悲壮的诗篇。后来,这首诗被谱成歌曲,翻译成各种文字,传遍了全世界。这就是那首如今已脍炙人口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诗中写道: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第三十章

反对机会主义

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这一点已经最明显不过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不干预政治！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也就必须采取这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采取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愚弄。

——恩格斯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明确地指出：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如果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就不会取得成功，也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一再教育工人阶级要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以推动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

但是，第一国际内部围绕这一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少数人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拒绝任何权威和国家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其代表人物便是无政府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早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结识了别林斯基、赫尔岑等著名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后来辗转于欧洲各国，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和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等人交往甚密，并受到深刻影响。1848年，巴枯宁参加了欧洲革命，失败后被德国当局逮捕，并引渡到了俄国。

在监禁期间，巴枯宁自首变节，多次写下《忏悔书》，向沙皇摇尾乞怜。他在一篇忏悔书中写道：“陛

下,我将怎样描述我过去的的生活呢?它全部消耗在各种空想和无效的努力上面,最后以犯罪告终……这条道路使我坠入深渊,只有陛下的万能和慈悲之手,才能把我拯救出来……我将高兴地用汗和血来洗刷我的罪行。”但是巴枯宁的乞求未能奏效,沙皇下令将他终身流放。1867年,巴枯宁从流放地西伯利亚逃往英国,后来加入了第一国际。

巴枯宁是继蒲鲁东之后无政府主义的最典型和最坏的代表。

巴枯宁从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出发,认为阶级压迫根源于国家。因此,他主张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和权威,这样,无政府的社会就会到来,就能实现阶级平等,使每个人享有自由权利。巴枯宁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反对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巴枯宁还认为继承权是产生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和条件,是一切政治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因此他竭力鼓吹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巴枯宁十分推崇所谓“个人的绝对自由”,认为这是人性的基本条件,因此他的最终理想是建立一个“绝对自由的”、“平等的”无政府社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巴枯宁主义实际上反映的是陷于破产而又无法自救的小生产者的绝望情绪,在法国、意大

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等国家广泛流行，成为第一国际后期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

公社革命失败之后，欧洲各国政府和反动势力纷纷用最残酷恶毒的手段迫害第一国际的各个支部和广大会员。与此同时，巴枯宁主义者也加紧了分裂和破坏国际的阴谋活动。为了篡夺第一国际的领导权，他们竟然另立山头，偷偷地建立起了自己的秘密组织，与国际相对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受到无政府主义的严重威胁，第一国际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明确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任务，改进它的组织形式。

于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领导下，第一国际的广大成员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同巴枯宁阴谋集团展开了严肃而坚决的斗争。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建议，总委员会决定于 1871 年 9 月在伦敦举行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

为什么要召开一次秘密的代表会议呢？这是由于马克思考虑到国际当前面临的问题非常严重，而时间则十分紧迫，因此不可能组织有全权的代表大会，只能召开一次小规模秘密会议来解决问题。而且 1865 年时，国际曾经有过这种先例。

为了开好这次重要的会议，马克思、恩格斯认真地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根据他们的建议，总委员会决

定：代表会议主要讨论“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从而确定了会议的主题；委托小委员会为会议起草决议（小委员会中的多数人是马克思的支持者）；总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者有发言权；如某国代表不能与会，应由该国通讯书记代理，等等。

在这期间，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和旧病复发，马克思先后有两次不得不卧床休息。但每当病情稍有好转，他又立即投入了紧张繁忙的工作。

9月16日，总委员会通过了由小委员会起草的决议草案。此时，会议代表陆续到达了伦敦，马克思、恩格斯非常热情周到地接待了这些来自各个国家的代表们，即使在接待那些持不同政治见解的代表时，他们也表现得十分友好热情。同情巴枯宁的西班牙代表赛尔莫·罗伦佐一生都不会忘记马克思给他留下的极其深刻美好的印象，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马车停在马克思家门前。门里走出一位长者，很像是一位尊贵的主教。我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去，说明我是国际西班牙联合会的代表。长者拥抱了我，并吻了我的前额，用西班牙语把我引入室内。他就是卡尔·马克思。……我们边喝茶边广泛地交谈，谈到了革命思想、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等，马克思对于西班牙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满意。”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第一国际在伦敦秘

密地举行了代表会议，共有 32 名代表出席，其中有巴黎公社的杰出领导人奥古斯特·赛拉叶和爱德华·瓦扬。由于反对派的迫害，一些国家的工人代表无法前来与会，根据会前的规定，他们由本国的通讯书记代表。例如，马克思代表德国，恩格斯代表意大利出席了会议。

在开幕式的发言中，马克思指出，本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着手进行符合形势需要的新的组织工作”，所以会议应重点讨论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在这一原则性问题上，会议代表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爱德华·瓦扬认为，为了无产阶级事业的胜利，工人应该在政治基础上团结起来。这一主张遭到了无政府主义者们的猛烈围攻，他们主张建立一个脱离政治的工会国际联合会取代国际。马克思认为瓦扬的提法虽有些模糊不清，但基本思路对头。于是他立即站出来为瓦扬辩护，指出：无产阶级应该进行政治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则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而工会则不能起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作用。同时，他还批评了英国工联的某些弊端：代表了工人贵族的利益，置低薪工人的利益于不顾，等等。

恩格斯也参加了辩论，并发表了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演说，批判了巴枯宁宣扬的放弃有组织

的政治工作的谬论。他指出：“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这一点已经最明显不过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不干预政治！所有鼓吹放弃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家，甚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也就必须采取这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采取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

在会议期间，一些人向总委员会提出要求：立即发动一次革命或起义，给资本主义世界以致命打击。他们的言词之尖锐，情绪之激烈，在国际的历次会议上都是罕见的。但不论这些人的态度多么恶劣，观点多么荒谬，马克思都耐心地倾听，并冷静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国际领导层中出现这种情况是值得深思的，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人对问题的认识非常肤浅，理论上很幼稚，因此在行动上莽撞盲目；而另一类人则纯粹出于强烈的虚荣心和权力欲，他们（主要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为了夺取国际的领导权而不惜拿工人阶级的

事业开玩笑,这是不能容忍的。

马克思、恩格斯据理力争,与巴枯宁主义者进行了面对面的激烈辩论。通过几个星期的讨论,马克思使大部分会议代表认识到:巴枯宁的过激言行所掩盖的是篡夺国际领导权的肮脏野心,而他的理论的要害之处则在于反对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斗争,阻碍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

通过马克思等人的坚决斗争,会议针对巴枯宁主义者的破坏活动做出了一系列决议,例如,关于统一国际地方组织名称的决议;关于建立国际农村支部、妇女支部的决议等。另外,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原则性的决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严正指出:“工人阶级这样组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在伦敦代表会议上,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重大胜利,狠狠打击了巴枯宁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使他们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陷于失败。恩格斯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当时这些先生们曾希望获得多数并且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当时无论怎样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他们都觉得不够。”马克思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中发挥了相当突出的作用,许多重要的决议是在他的参与和帮助下起草完成的,其中一些就出

自于他的手笔,而他本人在这次会议中的发言竟达到 97 次之多。

会议结束之后两天,在伦敦隆重举行了纪念第一国际成立 7 周年大会,马克思在会上做了长篇报告,对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和伦敦代表会议的重大意义做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并再次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国际的任务就是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

巴枯宁本人没敢出席伦敦代表会议,但他不甘心失败,在暗中加紧进行破坏国际的罪恶活动,向总委员会发动猖狂进攻。1871 年 11 月,他纠集了汝拉联合会的一伙人在瑞士桑维耳耶召开了所谓的“代表大会”,抛出了一个《桑维耳耶通告》,对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本人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诽谤。他们还以伦敦会议不是代表大会不能决定重大问题为由,要求立即召开国际的代表大会。

马克思认为这是巴枯宁公开闹分裂的一个信号,必须立即予以反击。1872 年初,总委员会发布了《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通告,严厉批驳了巴枯宁

的种种谬论狂言,彻底揭露了巴枯宁集团的分裂阴谋和罪恶目的。为了彻底粉碎巴枯宁阴谋集团,总委员会决定于同年9月在海牙召开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马克思对海牙大会非常重视,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将关系到国际的存亡”。但由于各国政府镇压工人运动和巴枯宁分子进行破坏活动,国际形势变得异常复杂严峻,为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开好这次大会,马克思做了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把会址选在海牙就是马克思的建议,他认为荷兰政府尚未公开镇压工人,巴枯宁主义者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社会基础,因此这是最理想的开会地点。

海牙大会的一个重要议程是修改共同章程,马克思亲自参加了这项工作。马克思还支持总委员会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调查巴枯宁集团的罪恶活动,以便为国际清除这个阴谋集团提供事实依据。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本人还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几位最亲密的朋友:他以后不再进入总委员会了,原因是他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而且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也严重影响了他的研究计划。

9月1日,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到达了海牙,这是他们参加的唯一一次国际的代表大会,可见他们对于这次会议是何等的重视。与他们同期赴会的还

有一大批坚强的无产阶级领袖和科学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尼古拉·吴亭、弗·阿·左尔格、约·菲·贝克尔、沙尔·龙格、爱德华·瓦扬、奥古斯特·赛拉叶、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列奥·弗兰克尔和保尔·拉法格。巴枯宁曾经叫嚣要在国际的代表大会上与马克思进行一场全面较量，但事到临头，他却却没有勇气在大会上公开露面。

这一大批工人运动领袖的出现使各国反对政府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慌，法国、德国等国政府派来了暗探和秘密警察，荷兰的反对势力则鼓动当地的有产者反对大会的召开。但是，荷兰的工人阶级极其热情地接待了这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各国的无产阶级也对这次大会和马克思本人给予了坚决的支持，纽约德国人第一支部、莱比锡支部和毛里西奥港意大利工人协会都委托马克思作为他们的代表与会。

海牙大会刚刚开幕就出现了尖锐的矛盾斗争。在审查与会代表资格时，巴枯宁主义者首先发难，对拉法格等人的代表资格提出了质疑。马克思为拉法格进行了成功的辩护，并且严厉地指出：国际内部存在一个秘密的巴枯宁主义的国际组织，这是与国际的原则水火不相容的。英国的改良主义音对巴里的代表资格也提出了异议，认为他不是英国工人公认

的领袖。马克思在辩护词中告诉人们：那些所谓的英国工人领袖中的某些人已经被当局收买了。马克思的这番话直接击中了改良主义者们的要害，把他们驳斥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在转入正式讨论后，大会中的斗争更加激烈了。

在讨论组织问题时，马克思指出：为了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建立起坚强团结的组织。他同时还指出：“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用暴力。”多数代表都赞同马克思的立场，反对巴枯宁主义者要工人放弃政治活动的错误观点，他们一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是，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下，这个原则才能够实现。

在讨论总委员会的权力问题时，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巴枯宁主义者力图使总委员会放弃一切权力，变成一种“通讯统计”的机构，这一谬论遭到了多数与会者的坚决反对。马克思深刻地剖析了巴枯宁主义者的错误观点，指出巴枯宁分子是在以反权威为名，行瓦解国际之实。他认为，在严酷的阶级

斗争的现实中,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是极其重要的。马克思的战友赫普纳在批判巴枯宁主义者的这些谬论时指出:他们的目的是“想实现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即把有战斗力的国际变成穿着睡衣和拖鞋的小市民的政党。”

严格地说,马克思的演讲水平并不是最出色的。但是他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真正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政治要求,所以,他的讲话论证充分,逻辑缜密,严谨详实,对全体与会者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在大会的过程中,马克思做了大量的工作和艰苦的努力,这些都是这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的重要保障。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恩格斯写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对巴枯宁集团的产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写道:“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秘密阴谋,其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本身。”恩格斯用大量的调查材料证明,巴枯宁主义者在许多国家的国际支部中都在进行阴谋活动,给国际工人运动造成了巨大危害。

据此,总委员会得出结论:这一阴谋集团的存在是同国际的原则相抵触的,它的活动纲领更是严重

违背了国际的纲领，建议将巴枯宁及其帮凶们开除出国际。大会最终做出了这一重要的决定。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次大会是对无产阶级叛徒进行的庄严审判。它表明在反对巴枯宁阴谋活动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海牙代表大会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首先，它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必须在政治领域内同旧势力进行斗争，而暴力则是重要的斗争手段。其次，这次大会使国际总委员会获得了新的充分的权力，最为重要的是这次大会决定把巴枯宁阴谋集团开除出国际，从而维护了国际内部的团结，并进一步明确了国际的政治路线。

另外，海牙大会还做出一项重要决定：把国际总委员会的驻地从伦敦迁至纽约。

这一决定是根据恩格斯（他也代表了马克思的意见）的建议做出的。这件事当时在代表们中间引起了巨大波动，许多人感到十分惊讶，一时难以接受。因为他们十分清楚，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等工人领袖将离开总委员会的工作岗位了。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提出的理由是：巴枯宁集团和其他机会主义者们猖獗的破坏活动使总委员会在伦敦的工作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特别是在近期内难以开展工作，国际反动势力的进攻也使国际在法国等国家的活动几乎

停顿,而且,总委员会设立伦敦已有 8 年之久,换一换环境能够避免出现僵化的现象,等等。而纽约则是设立国际的最适当的地点,因为在那里“我们的文件没有丢失的危险;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新的组织;在那里,我们的党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具有真正的国际性质”。

最后,马克思的巨大威望和说服力起了重要作用,大部分代表怀着沉重的心情接受了这个建议。

海牙大会结束后,马克思夫妇同女儿劳拉以及恩格斯等人一同来到了阿姆斯特丹,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工人大会。马克思应邀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这是他多年以来的一次公开露面。在演说中,他时而使用法语,时而使用荷兰语,用史诗一般雄壮深沉的语言对工人运动的历史和未来进行了全面评述和展望。其中许多语言十分诚恳深沉,既像叮咛又像嘱托,使人深省并倍感亲切。他讲道:

“18 世纪,世界上的君王和权贵往往在海牙集会,商讨与自己王朝的利益有关的事情。

在这个地方,我们不顾一切恫吓,决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我们要在最反动的居民当中证实我们伟大的协会的生命力,发展和未来的希望……

海牙代表大会……有必要向工人阶级宣布,工人阶级在政治领域内必须和在社会领域内一样,同

正在崩溃的旧社会进行斗争；而我们可以庆幸的是伦敦代表会议的这项决议今后便包括在我们的章程中了。

公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革命应该是团结的。”

海牙大会之后，巴枯宁主义者仍在进行垂死的挣扎。他们召开了“反权威主义”大会，甚至成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国际，公开与国际工人协会进行对抗，遭到了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治组织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在各国国际会员的强烈要求下，国际总委员会于1873年1月通过了一项决议，将拒不承认代表大会决议和参加“反权威主义”大会的团体和个人开除出第一国际。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者就同那些敌视国际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在组织上划清了界限，并保证了第一国际在纲领原则和组织原则上的纯洁性。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先后撰写了《论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等著作，全面深刻地批判了巴枯宁集团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分裂阴谋，从思想上进一步清除了巴枯宁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恶劣影响。

总委员会迁到纽约之后,第一国际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活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所发生的变化已经提出了改变工人运动组织形式的要求,对此,马克思已经有所觉察。在1873年筹备日内瓦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国际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各国的无产阶级,根据国际的纲领和本国的国情,建立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国际这种旧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而且,由于各国政府的迫害,它作为合法的群众性组织在许多国家已经不可能进行活动了。

于是,马克思于1873年9月写信给现任国际总书记左尔格,指出:“从欧洲的形势看来,暂时让国际这一形式上的组织退到后台去,是绝对有利的,……事变和无可避免的发展以及情况的错综复杂将会自然而然地促使国际在更完善的形式下复活起来。”

根据马克思的这一建议,第一国际于1876年7月在费城召开了最后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解散总委员会和结束第一国际的宣言。费城会议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了庄严的呼吁:“鉴于目前欧洲的政治局势,我们解散了国际组织;但我们看到,这个组织的原则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进步工人所赞成并维护的……以后具备了更有利的条件时,全世界的工人将

在一个共同的旗帜下重聚起来。那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声将喊得更为嘹亮。”

这样，马克思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战斗岁月结束了。

在这 9 年之中，马克思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和学术研究工作，把全部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之中去，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革命成果，使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峰。恩格斯后来在回顾这一段斗争经历时写道：马克思“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自从 1849 年离开欧洲大陆后，马克思一家旅居伦敦已有 20 多个年头了。这期间，国际风云几经变幻，发生了许许多多惊天动地、永载史册的大事件，同时，马克思的家庭也有了不小的变化，但无论是政治风暴的猛烈冲击，还是亲人故去带来的巨大悲痛，都没有丝毫减弱这家人深厚的骨肉亲情和追求崇高理想境界的勇气。相反，马克思的家庭里始终洋溢着一种充满生命活力和青春气息的良好氛围。

这是寄居在资本主义大都市之中的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而又平凡的家庭，既充满了蓬勃向上的革命朝气，又始终保持着亲切温馨、高雅活泼、充满天伦之乐的生活气息。

三个女儿都非常眷恋她们的父母,从他们身上,女儿们可以得到绵绵不尽的爱抚和呵护,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严格认真的教育。而对于马克思夫妇来说,三个孩子简直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和情感的寄托,她们的欢声笑语能驱散生活带来的巨大压力和忧伤,她们委婉动人的歌声和朗朗的读书声则能使他们心旷神怡,感受到无限的欢乐和希望。

在燕妮的眼中,自己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世界上最漂亮、最惹人喜爱的,简直就是天使。她曾经这样得意地描绘她的宝贝女儿们:“小燕妮面庞黝黑,头发黑油油的,眼睛又黑又亮,泛着红晕的脸上透着几分稚气,一双深邃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目光,显得妩媚动人。劳拉则处处显得更为明快、开朗和活泼。实在地说,她比姐姐长得更漂亮。她五官端正,那双淡绿色的、机灵的、有长长睫毛的眼睛闪烁着快乐的火花。……最小的三女儿外貌可爱、风度优雅,有几分顽皮淘气,是我们全家的一线光明。”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巨匠和令各国反动派胆战心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在孩子们面前,他永远显得那样慈祥和善,平易近人。这是因为在他心目中,孩子们始终占据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热爱孩子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形成的一种禀性。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我喜欢他们小的时候。”只要能听到孩

孩子们嬉戏喧闹的声音,他就会感到由衷的快乐,人也仿佛年轻精神了许多。而一旦与孩子分别,哪怕只是短时间的离别,他也会感到若有所失,有时甚至寂寞难耐,忧心忡忡。翻阅一下马克思从外地写给孩子们的信件,人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位慈父对女儿的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爱和思念。

在给小燕妮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深情地写道:“我可爱的孩子!我昨夜梦见了你。我梦见你穿着自己那套运动服,巧妙地表演了达文波特戏法,以后,作了几次极其惊人的翻腾,几乎飞到空中去了。我的老朋友的成功使我充满了骄傲的感情,使我的自豪感得到了满足。我也清楚地回想起很久以前你在旷野上所表演的不太轻盈的舞蹈。”

在另一封信中,马克思不无忧伤地告诉劳拉:“我亲爱的白鸚鵡!遗憾的是,我不能在家里为我可爱的、有着一双明亮的小鸟眼睛的女儿庆贺生日,但是,老尼克的思想永远和你在一起。你被锁在我的心窝里。”

而在给小女儿爱琳娜的信里,马克思则表现出了几分幽默和风趣,他写道:“我心爱的士∞干老师:无论蒙您扮演什么角色——无限小的或无限大的,我对您的无限量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马克思夫妇虽然非常喜爱孩子,但对她们并不

过分地溺爱。他们深深地懂得,要想把女儿们培养成能够在社会上自立的真正有用的人,就必须从小严格地要求她们,同时,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教育她们。正是在这种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女儿们渐渐地长大了。使马克思夫妇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的女儿不仅外貌美丽,而且心地也十分善良美好。她们从小就受到革命环境的熏陶和良好的教育,品学兼优,很早就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远大理想。到了60年代中期,两个稍大一点的女儿已经能够帮助父母做一些事情了。

马克思的家庭生活一向是十分清贫的。为了帮助父母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女儿们开始尝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小燕妮在音乐、绘画方面有很高的天赋,中学毕业后,她外出给人当家庭教师,以增添家里的收入,晚上回家后还要帮助父亲做各种工作。二女儿劳拉生性活泼,多才多艺,干起家务事来十分麻利,是持家理财的能手,但她干得最为得心应手的事情是为全家人准备美味可口的饭菜,因此在家中获得了“厨娘”的美誉。

女儿们不仅尽力帮助父母维持家庭生活,而且还是马克思从事革命事业的非常得力的助手。

小燕妮有着同父亲一样的黑眼睛、黑头发和火热的性格,但由于从母亲那里继承来了几分温柔,使

她要比父亲更为柔和一些。可能是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小燕妮从小就喜欢政治,关心国际工人运动,并始终把自己同无产阶级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中学毕业以后,她白天在外教书,晚上在家里协助父亲做各种工作,例如,广泛浏览收集各种报刊和文献上的资料,并做了大量摘录、整理和翻译工作,这些材料对于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等著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她还经常帮助父亲抄写稿件,其中包括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和《资本论》的部分手稿。

后来,小燕妮开始尝试写作,她曾经以“燕·威廉斯”的笔名在《马赛曲报》上发表了近10篇关于爱尔兰问题文章,大胆地为爱尔兰人民反抗英国殖民压迫的斗争辩护,揭露英国当局的种种暴行,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马克思对这些文章给以高度的评价,恩格斯则兴奋地赞扬道:“小燕妮在这方面的成就引起了这里的一片欢呼声。”公社革命失败后,她积极投入了救助公社流亡者的运动。后来,她与一位公社流亡者产生了爱情。

劳拉的性格要比姐姐更为文雅,长着一头浅色的金发,皮肤白皙鲜亮,显得娴静可爱。同姐姐燕妮一样,劳拉也尽力帮助父亲做一些事情。起先,她主要负责为父亲抄写稿件,后来又帮助父亲收集整理资料,收发信件,还经常陪伴父亲到图书馆去查阅书

籍。马克思认为劳拉的工作很出色，夸她是一个“可爱的私人秘书”，可惜的是从未向她付过“年金”。当劳拉订婚时，马克思实在舍不得女儿嫁走，他十分诙谐地说：“老实说，我倒挺喜欢这个小伙子，但同时我也有一点嫉妒他，因为他想夺走我的前前任的‘私人秘书’”。

望着自己可爱的女儿，马克思夫妇在为她们长大成人而感到高兴的同时，内心也产生出几分忧郁和怅惘：在这个充满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她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她们能生活得幸福吗？

此时马克思夫妇已经预感到：长大了的女儿快要出嫁了。

令马克思夫妇颇感意外的是最先离他们而去的是二女儿劳拉，她比姐姐早结婚三年。1868年4月2日，劳拉嫁给了法国人拉法格。

保尔·拉法格是一位法国社会主义者，曾参加过反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斗争，因此被巴黎大学开除。拉法格于1866年初赴英国继续学医，当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不久又出任西班牙书记。

在这期间，拉法格与马克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经常到马克思家中拜访，聆听教诲。马克思很喜欢这位身材颀长，长着一头黑发的热血青年，燕妮则给予

他母亲一般的关照。经过一段时间的频繁交往,拉法格与劳拉悄悄地相爱了。但直到有一次马克思碰到他们正在幽会,才恍然大悟:他的这位得意弟子已经把感情“从老头转向了女儿”。1866年8月,他们订了婚。燕妮后来在谈论这件事时写道:“……大约八个月前,奥尔西尼的兄弟和两个年轻的法国人来参加国际协会。……他们中间比较年轻的一位是保尔·拉法格,医科大学生,24岁,他经常来。我太天真了,以为他来是为了在卡尔那里——他很快就接受了卡尔的观点——在政治、哲学等方面继续深造,他突然向劳拉求婚,我才像触电一样猛省。”

马克思夫妇称赞拉法格是一个心地善良、精力充沛的革命者,但当他们看到拉法格对劳拉表现出的近乎狂热的痴情时,又感到很担心。于是马克思写了一封信,对这位年轻人提出忠告,他写道:“在我看来,真正的爱情是恋人对他的偶像采取含蓄、廉恭甚至羞涩的态度,而绝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的亲昵。”马克思希望拉法格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能成熟起来,直到1868年拉法格得到了医师执照后,马克思才同意他与劳拉结婚。

婚后,拉法格携劳拉像一双比翼齐飞的鸟儿一样迁居到了巴黎,而马克思经过了巨大的努力才承受住了这种骨肉分离对心灵和情感的沉重打击。拉

法格夫妇在巴黎一边谋生，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和共产主义宣传。他们把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介绍给法国的革命领袖们，还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了法文。恩格斯对他们的译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这本小册子是我们引为骄傲并能给读者提供原著概念的第一个法文本。越是接近结尾部分，实践将使你的工作越加完善，你就越来越不是翻译，而是用另一种语言再现了。……这将给法国的运动带来很大的好处。”拉法格夫妇还积极参加了法国的工人运动，并及时把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活动情况汇报给马克思。

公社革命期间，拉法格和劳拉正在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他们设法与公社领导人取得了联系，在波尔多组织援助公社的活动。公社失败后，他们流亡到了西班牙，继续紧张地从事革命斗争，积极参加国际马德里支部和《解放报》的工作。拉法格和劳拉还一起参加了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与巴枯宁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此后，他们在伦敦定居下来，开了一家小刻版石印厂谋生，同时协助马克思从事革命工作。劳拉在自己的《自白》中说，她的座右铭是“真理高于一切，它必然胜利”。这是她毕生的遵奉的信条。

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是在 1872 年 10 月结婚的，

她的丈夫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公社流亡者”，名叫沙尔·龙格。龙格比燕妮大5岁，此时已经有了一段非凡的革命经历，他参加过巴黎公社革命，是公社委员会委员和公社机关报编辑，他还是第一国际会员，曾担任过比利时通讯书记，与马克思共过事。

小燕妮和龙格婚后的生活十分艰苦坎坷，他们首先要为谋生而操劳奔波。小燕妮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从圣诞节开始，我就投身于那给人以教益的战斗，即为生存而斗争。如果一一列举我曾经多少次从伦敦的北区跑到南区，从东区跑到西区，找教法文和德文的工作，找教唱歌和演说的工作，而且到处都不成功，那样叙述起来是会使您厌烦的。”由于一时找不到工作，他们就帮助马克思审校《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直到1874年，龙格夫妇才找到了固定的工作，龙格在皇家学院当法文教师，小燕妮则在一所学校里教德文，还兼任家庭教师。

虽然为生活所累，并且体弱多病，小燕妮始终是父亲开创的事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参加者。她积极参加国际工人运动，后来当龙格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妥协和动摇时，她及时地给予了忠告和帮助。小燕妮的品格和一生的所作所为完全印证了她最喜欢的那句座右铭：“披荆斩棘，攀登高峰！”

两个姐姐出嫁后，马克思夫妇身边只剩下一个

女儿爱琳娜了,那时她只有 17 岁。在父母的影响下,这个高挑身材、满头黑发的活泼俊俏的姑娘,已经成了一位性格倔强、思想成熟的坚强女性,勇敢地承担起了姐姐们留下的工作,充当了父亲的工作助手。由于她天资聪慧,知识广博,做事喜欢动脑筋,因此,她总是能把父亲交待的工作干得又快又好。与此同时,她还开始自己谋生——在一所学校里当教师,讲授的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

还在 9 岁时,爱琳娜就在自白中写下了自己最喜爱的一句格言:“勇往直前!”这句话成了爱琳娜的生活态度,她一生始终都在奋斗,努力地学习知识,勇敢地与敌人斗争。在紧张繁重的工作之余,年轻的爱琳娜积极参加了英国的工人运动,并发表了许多政论性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错误观点。这些文章立场鲜明,文笔生动犀利,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反响。燕妮高兴地称赞道:“她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革命活动家了。”

在女儿们出嫁几年之后,马克思家的第三代人开始陆续来到人世,添丁进口又使得这个家庭变得更加热闹起来。

1876 年 5 月,小燕妮的长子让·龙格出生了,他很快就成了外祖父母的掌上明珠,他们亲切地叫他琼尼。燕妮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这孩子起初

又弱又小，怪可怜的。现在他已长出了唯一的一颗牙，被喂养成成了一个又胖又壮，十分好看的小家伙，他是全家人的宠儿，……每个人都想争先抱到他。”琼尼曾长期住在外祖父家中，受到了马克思夫妇的精心养育照料。

马克思十分宠爱这个小外孙，他成了这个孩子玩耍的最好伙伴。琼尼最喜欢与外祖父玩“驾马车”的游戏：他把马克思当成一辆马车，双腿骑在马克思的肩上，充当勇敢的驾车人，然后八面威风地大声口么喝着，挥舞鞭子，驱赶“马车”前进。有时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也被叫来充当拉车的马，他们在琼尼的驱使下在屋内或院子里跑来跑去，直到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为止。

在琼尼之后，小燕妮又生了三个男孩（哈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和一个女孩（燕妮），马克思夫妇给予了他们同样的温暖和关怀。奥古斯特·倍倍尔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生动地记述了马克思晚年含饴弄孙时的动人情景，他写道：“在这里，我非常惊喜地见到了马克思，这个当时被人诽谤为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的人，多么亲热温和地同他的两个外孙玩耍，而孩子们又是怀着何等的爱依恋他们的外祖父。”

第三十一章

伦敦老人

马克思由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

——恩格斯

在世界近代史上，19世纪70年代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强有力推动下，各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都出现了极其迅猛的发展。

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此时呈现出了一种极不平衡的局面：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商业已经趋于饱和，举步维艰，而美、德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则出现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势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逐步向垄断过渡。

在国际政治方面，这一时期的情况也与前一阶段截然不同。大规模的革命高潮时期已经过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社会的发展具有“相对和平”的特点。因此，这一时期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已争得的民主权利），团结积聚力量，在各国建立自己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未来的决战做好准备。

在 70 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

自从摆脱了领导第一国际的繁重的工作之后，马克思有了更多的属于个人的时间，但他却显得更加紧张繁忙了。因为他要抓紧一切时间赶写《资本论》的第二、三卷，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和全部热情

都投入到了这一伟大的工作之中,每天都要伏案写作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对于他来说,完成这件工作已经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大愿望,他决心要用全部精力把它写好,留传给后人,并能经受得住时代和历史的考验。

此时的马克思已年近六旬,他的头发已经花白,背也有些躬了,精力和体力都大大不如从前。但是,不论严冬酷暑,白天黑夜,他仍然坚持不懈地伏案研读,笔耕不辍,并且常常是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工作之余,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休息和锻炼方式是散步:在室内来回踱步,从房内的一角走到另一角;或者到户外的草坪、林荫道上慢慢地行走。但即使在这时他也从未真正停止过工作,不是认真地考虑各种问题,就是与恩格斯进行研究讨论,而这种讨论有时竟能演变成为一场紧张激烈的学术辩论。他们都乐此不疲。

但是,长年艰苦的脑力劳动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已经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使他病魔缠身。1873年初,紧张的工作使他旧病复发,整夜整夜地失眠,头剧烈地疼痛,甚至出现了中风的症状。他的好友龚佩尔大夫对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病情才逐渐有所好转。马克思觉得体力得到了恢复,于是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结果,病痛又一次把他击倒了,肝区疼痛难忍,身上还起了许多痍。这一次,家人、医

生和朋友们严格禁止他继续工作，并强制性地要求他到外地去疗养一段时间。

在随后的几年中，为了恢复体力，以便早日完成艰巨的理论研究工作，马克思曾经多次到英国和欧洲等地去疗养。1873年秋天和1874年春天，他先后到哈罗格特和兰兹格特海滨进行疗养，但是这两次旅行都未能取得预期的疗效，反而使他的肝病一度加重了。后来根据朋友的推荐，在小女儿爱琳娜的陪伴下，马克思于1874年8月到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进行完全遵照医嘱的休养治疗。

为了防止奥地利当局制造麻烦，马克思向英国政府递交了加入英国国籍的申请书。但直到马克思动身之后才收到了当局的回函——他的申请被断然拒绝了，其理由迂腐得令人捧腹：“此人对自己的君主不忠。”

卡尔斯巴德是欧洲最富盛名的一个疗养地，欧洲上流社会的人们大都喜欢到这里来休闲、享乐或者进行生意场上的交易，而马克思父女到这里来则纯粹是为了治病（爱琳娜也刚刚生完一场大病）。他们住进了日耳曼尼亚旅馆（后曾更名为“马克思疗养院”），为了减少麻烦，他在旅馆登记册上留下的名字是“食利者查理·马克思”。

日耳曼尼亚旅馆的规模不大，但却装饰得舒适

雅致,再加上环境十分安静清洁,极适宜于病人休息疗养。它周围是一座不大的花园,长满了修剪得整齐精致的各种花卉和草木,色彩缤纷,馥郁芳香。从园中石阶拾级而上,便是一片起伏不定,岩石密布的丘陵地带,到处是茂密葱翠的乔木林和松柏,散发出一种大森林中特有的复离子的浓郁气息,沁人心脾,爽人耳目。

马克思经常与爱琳娜在小花园和山丘上散步或者闲坐,有兴致时还给女儿讲一些生动有趣的事情。这一段时间里,他最喜欢讲的是波希米亚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和历史,令小杜西听得如醉如迷。

“波希米亚现在已经被哈布斯堡王朝掠夺了,当地人民时刻都期望获得独立,盼望着他们的民族敌人哈布斯堡王朝崩溃。”

马克思平时不愿意与那些养尊处优、庸俗市侩的上层人物们交往,反之,他十分喜欢与那些科学家和艺术家们攀谈,而且谈得非常深入投机,往往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但在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是与女儿一起度过的。他们严格按照医生的嘱咐行事,每天早晨坚持洗温泉浴,只要体力许可,还进行各种户外活动,到山上或森林中散步赏景和听音乐,这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有时,他们还到附近地区漫无目标地闲逛。

当地的矿泉水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对马克思的肝病有明显的疗效,这使得马克思父女都感到十分高兴。但卡尔斯巴德也有令马克思感到不如意的事情:一是医生要求他只能喝矿泉水,不能饮酒;二是疗养费用过于昂贵了。对此,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抱怨道:“目前我只能拿白水当饮料;杜西倒每天可以喝一杯比尔森啤酒,当她喝酒时,我以忌妒的眼光看着她。我的医生是库格曼推荐的,他是奥地利人……他起先看到我留在这里,有点不放心。我遵照他的忠告,用伦敦的‘食利者’查理·马克思的名义来登记。这个‘食利者’带来的后果是,我必须替自己,还要替爱琳娜向可敬的市财库交双份疗养税。然而这样就没有人怀疑我是名声很坏的卡尔·马克思了。”

后来,当地的资产阶级报纸故意披露了马克思来此疗养的消息,引起了当局的关注。于是,马克思父女不得不于9月21日离开了卡尔斯巴德。在返回英国的途中,他们顺便做了一次愉快的旅行。

马克思携女儿经过了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并在这里休息了几天。马克思本来打算在莱比锡见一下奥古斯特·倍倍尔,但未能如愿,这位坚强的工人运动领袖当时正被关押在官方的监狱之中,其罪名是“渎君”。令马克思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莱比锡见到了

自己当年亲密的战友威廉·李卜克内西，并听取了他关于德国工人运动情况的报告。

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大派别——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正在讨论有关两党合并的问题。马克思对于这两大工人组织的合并在原则上是赞同的，因为这毕竟有利于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他反对仓促的无原则的合并，他认为对拉萨尔机会主义的任何让步都迟早会使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大受其害。他主张：只有在一致的科学观点基础上实现合并才有利于无产阶级。

马克思利用在莱比锡逗留的几天游览了这里的市容和名胜古迹，会见了当地工人组织的重要领导人，另外，他还见到了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这个小家伙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为卡尔·李卜克内西，此时刚满了周岁，但已经是一个活泼健壮的小男孩了。马克思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他，两个人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游戏伙伴。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眼下这个步履还有点蹒跚的小卡尔，成年后竟成了德国无产阶级公认的革命领袖——一个敢于与强大的黑暗旧势力奋勇抗争的真正男子汉。

由于卡尔斯巴德的矿泉水对马克思的病情有十分明显的疗效，他后来于1875年和1876年又连续到

那里去疗养了两次。1877年夏天,他带着燕妮和爱琳娜来到了诺伊恩阿尔浴场疗养。这里有清澈的泉水、金色的沙滩和莽莽的黑森林,景色优雅秀美,气候也很怡人。然而,这里泉水的疗效却不尽如人意,于是马克思又想起了卡尔斯巴德。他在给友人的信中风趣地写道:卡尔斯巴德矿泉水是为他病情危急时备用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必须要耍外交手腕”。

但是,马克思未能再次品尝到卡尔斯巴德矿泉水,因为德国和奥地利反动当局后来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极其残酷的迫害,从而阻断了他去卡尔斯巴德旅行的通道。

1875年初马克思又搬家了。新居离原来的住址不远——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41号。这是一套单元式住宅,面积虽不大,却很舒适实用。一层有一个过道和两个起居室,三层是卧室,马克思的工作间设在二层,既宽敞明亮又十分安静,令他感到十分满意。厨房和仓库在地下层中,平时吃饭也在那里。

在晚年,马克思和燕妮基本上摆脱了贫困潦倒了的生活。于是,他们原本就十分突出的好客精神得以发扬光大,他们的家变成了一座向世界开放的住宅,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领袖们时常来这里聚会,一些普通的工人群众也常来拜访请教。

许多来访者原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威严冷酷的鼓动者，一个对某种学说冷漠偏执的狂信者，或者是一位狂放不羁的空想家。但通过交往他们都发现，马克思也是一个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人。他不仅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而且具有极其渊博深厚的知识，对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甚至体育、生活等方面都具有广泛浓厚的兴趣，能与来访者就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妙趣横生的对话，并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魅力和道德修养。

在马克思家里，来访者们都体验到了一种浓浓的家庭气息和人情味。他们不仅能受到主人热情的接待，从诚恳深刻的交谈中得到巨大的收益，而且有时还能参加马克思的家庭娱乐活动。在周末或星期日，马克思常常同朋友们一起外出游园、散步或者去看戏，有时还邀请朋友们与他共进午餐，偶尔也举行范围较大的宴会。宴会上的气氛总是热烈而活跃的，主宾双方无拘无束，谈笑风生，谈到兴奋之时便载歌载舞，不亦乐乎。每逢这时，马克思也仿佛年轻了许多，经常情不自禁地加入到跳舞者的行列中来，但他最喜欢的舞伴似乎永远是燕妮和恩格斯的夫人莉希。

马克思与夫人燕妮极其热情地欢迎八方来客，他们体面周到的款待给每一个人都留下难以磨灭的

印象。他们的老战友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后来怀着幸福的心情描述了当时的感人情景，他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马克思的家对每一个可信赖的同志开放。我和其他许多人与他家属相处时，其愉快情形令人难以忘怀。一家中最得人心者是出类拔萃的马克思夫人。她是一位高尚的，十分美丽的女性，仪态优雅，心地善良，亲切，有说有笑，既不傲慢，也没有局促不安。在她的周围，人们就像在家里自己母亲或姐妹跟前那样随便。她满腔热情地对待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斗争所取得的成就，哪怕是极小的成绩，也使她感到非常满意快乐。”

马克思一生都喜欢孩子，他年轻的时候就认为：孩子并不是一种负担，而是真正宝贵的财富，是最幸福的遗产。马克思之所以喜欢孩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把孩子们看作“人类的希望”。在这方面，他有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至理名言：“孩子们必须教育他们的父母。”因此，他把每一个女儿都视为掌上明珠，表现出了真挚深厚的父爱。在自己的“自白”中“你喜欢的名字”一栏下面，他郑重地写下了女儿们的名字：“劳拉、燕妮”。

马克思的女儿们是在虽十分清贫却充满了父爱的家庭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从父亲身上，她们获得了人世间最大的欢乐，同时也懂得了生活和做人的道

理,认识到了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掌握了克服困难的的能力和勇气,而且从小就强烈地同情各国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解放斗争。小燕妮心目中的英雄是古罗马保民官格拉古,劳拉崇拜的偶像是英国革命诗人雪莱,爱琳娜则喜爱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逐渐把浪漫的情怀变成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自觉意识。后来的事实证明,她们都不愧为是马克思的孩子。

随着女儿们长大成人,结婚生子,马克思又把这种爱给予了家中的第三代人,他对外孙们表现出的关怀和爱抚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感动不已。当得知小燕妮的第一个孩子夭亡时,他简直痛苦极了,坐卧不宁,什么事情也做不下去,他写道:“我们的房子像冰窟……每一步他的影子都跟着我,当我想念他时,我的心就往外流血,难道说能忘记这个调皮的好孩子吗?”

后来,小燕妮的其他几个孩子平安地降临人世了,马克思激动得不能自己。只要孩子们住在他的家里,他总是要挤出许多时间陪他们嬉戏玩耍,或者指导他们读书写字。马克思还给外孙们起了一些很有趣的绰号,例如,他管埃德加尔叫“狼”,因为这孩子有一次把生腰子当巧克力吃掉了。

当然,这些孩子还不能完全取代女儿们儿时可

爱的形象,但他已在自己的心目中把他们两代人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当孩子不在身旁时,他常常会感到一种可怕难耐的孤寂和空虚,觉得家里安静得几乎没有了生气,不禁为孙儿们的饮食起居和健康而操心劳神。他给女儿的信中谈论的主要是外孙们的身体情况,他曾经对小燕妮提出一个要求:“你应当每天给我写一封信,告诉我他(指小琼尼)的身体状况,并告诉我一切真情。”

有时候,马克思想外孙简直象着了魔,脑子里竟然出现了种种幻觉。他曾写道:“我多么希望在美好的一天,那个神话中的飞毯能把小琼尼送到我的身边。我亲爱的小外孙肯定会喜欢摩尔人、阿拉伯人、柏白人、土耳其和黑人……一句话,所有巴比伦市内的人和身穿东方服装的人(大部分都是优秀的人民)。”

但是,马克思对待外孙们并不仅仅局限于生活上的关心照料,正如他在给女儿们的信中所说的,他要“实实在在地担起做外祖父的责任”,关心他们的教育工作。他让孩子们从小就接触一些进步书籍和世界文学名著,并注意在生活中培养他们的品行情操和学识,帮助他们树立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的远大的人生理想,希望他们手持生活的接力棒,向着美好光明的未来迅跑。在孙辈们的心目中,外祖父的形象

永远是高大亲切的。

谈到马克思的家庭，人们不应该忘记一个重要的名字——海伦·德穆特（即琳蕻），如果在描述马克思的家庭生活的章节里不提到她，这一章就一定是不完美的。

这位来自德国的农家女儿虽然从未与马克思订立过契约，但她那颗善良忠厚的心早已与同样善良的马克思一家人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如今岁月蹉跎，青春已逝，琳蕻与马克思一家同甘共苦已有 30 多个年头，她已经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个永久性的成员。

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说过，琳蕻“在某种程度上是全家人的轴心，一切都围绕着她转动”。她几乎什么事情都做：料理家务，采购食品，烧饭做菜，裁剪缝洗衣服。在马克思家最困难的时期，她甚至主动帮助马克思夫妇外出借贷、向商店赊购和应付那些难缠的讨债人。从这层意义上讲，她是这个家庭中的主妇兼管家，而李卜克内西则称她为马克思家的“护家神”。

但是，琳蕻还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是她把马克思的女儿们从小一个个带大的，不仅照顾她们的饮食起居，接送她的上下学，而且还以自己的方式管教她们。虽然她的管束有时很严厉，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她们之间的关系，孩子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悄悄地

跟她说。

另外,根据李卜克内西的说法,琳蘅还是马克思家中的“执政者”,家里的许多事情是由她具体操作的,甚至连马克思本人也要服从这种“专政”。在她眼中,马克思并不是一个伟人,而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有时还是一个有点任性的男孩,为了照料好他的生活,她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由于她对马克思的脾气和弱点都了如指掌,因此,当马克思因心境不好而发怒以致别人无法靠近时,只有琳蘅有办法说服他,有时甚至把他“教训”一顿,“于是狮子就变得象羊一样驯服”。(威廉·李卜克内西语)

琳蘅的文化水平有限,她主要是根据自己善良纯朴的感情和直觉来看待事物的。因此,她对马克思一家的爱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她认为他们都是好人,所以凡是他们做的就一定是对的,谁反对马克思谁就是在跟她作对。琳蘅一生未婚,她跟随马克思一家东奔西走,爱尽磨难。为了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她付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而从未有过一句怨言。

对于琳蘅为家庭做出的贡献,马克思夫妇和女儿们是十分感激的,他们都十分尊重这位把青春和生命都奉献给了自己的平凡女性。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的家庭生活逐渐好转,娱乐活动增多了,例如,外出旅游和看戏等等,每次活动全家人都要请琳

蘅一同参加。马克思的女儿们都视她为“第二母亲”，亲昵地称呼她为“尼姆”或“尼咪”，即在出嫁之后，她们每次来信都要问候自己的“尼姆老爹”。

琳蘅一生的命运是与马克思一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多年来，这位忠实的女佣分享了马克思一家人所有的忧患和欢乐。琳蘅于1890年去世，人们把她与马克思，燕妮安葬在了一起。

马克思一生交过许许多多朋友，而在晚年，他的朋友变得更多更广泛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社会各界人士中都有他真挚的友人。但是在这些众多的交往当中，仍然要属他与恩格斯的交往最为频繁密切，也最轻松快活。他们虽然已经相处了几十年，但却未产生过丝毫的厌倦感，相反，他们的友谊仍然在不断地加深和更新，这是由于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共同的信念和事业的基础上的，是在相互合作和不断奋斗的艰难经历中形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研究方面的默契配合由来已久，长期以来，他们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分工：恩格斯主要研究军事学、语言学和自然科学，而马克思则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许多重要的著作都是他们共同劳动的结晶。在马克思晚年，为了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完成他的经济学巨著，恩格斯愈来愈多地承担了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通讯

工作。但有一点从未发生过变化：不论由谁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定政策和策略，他们事先总要互通信息，周密磋商，以便在原则上达成共识。

在退出国际总委员会以后，马克思已经年近 60 岁了。按理说这个年龄并不算太大，但由于积劳成疾，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的生理年龄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暮年。为了能够在有生之年完成《资本论》的第二、三卷，他不仅没有减少工作量，反而更紧张地投入了写作工作。

在着手修改、充实《资本论》第二、三卷之前，马克思曾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对第一卷作了修订，其中包括法文版的出版工作。为了使法文版的译文流畅自然，具有法文特色，他和女婿龙格夫妇忙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修改译文的同时，还对原著作了修订，补充了许多新的材料和统计数据。

法文版最终是以分册出版的，目的是为了能使更多的工人买得起。1872 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再版了，印了 3000 册。这件事说明人们对这本书的兴趣大增，这使马克思夫妇感到他们的工作收到了成效。

为了修改好《资本论》的第二、三卷，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又投入了极其艰巨的理论研究工作。这一次，他研究的领域更为广泛了，其中主要涉

及到财政、金融、农业、生物、地质、数学、历史、化学、气象学等许多方面。另外，他还收集了大量西方各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其中仅恩格斯给他提供的材料就有几堆，体积达到数立方米，他都一一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

朋友和广大读者们都急切盼望马克思能早日完成《资本论》二、三卷的修改工作，但这件事却一天天地拖了下来，一直到他去世。究其原因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国际工人运动中有一些重大问题需要由马克思本人研究解决，这些事情仍然牵扯了他的许多精力；其次，马克思的身体此时期正在迅速恶化，使他不能正常地进行研究和写作工作。另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马克思本人认为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他此时正在认真地考察世界经济正发生的重大变化及其规律，以便得出更具科学性的结论。

1879年，马克思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解释，他写道：“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完全撇开其他各种正在变化着的情况不谈，这是很容易用下列事实来解释的：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之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了

这样严重的，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

在潜心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同时，马克思仍在密切地注视着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他和恩格斯不断就出现的实际问题深入地研究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流派进行坚决的斗争，教育和提高各国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873年底，马克思在意大利的《共和国年鉴》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冷淡主义》的文章，对严重危害工人运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在这篇论战性的文章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工人阶级不要参加政治斗争和民主运动，不要成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准备对旧制度进行全面的“社会清算”，其结果只能使工人阶级无所作为，从而保护了资本主义制度。他非常形象地写道：“在等待这个美好的社会清算时，工人阶级应该象一群饱食的绵羊那样，尊重法律，毫无怨言地充当炮灰。”马克思在文章中还着重强调了无产阶级国家的重要作用，指出无产阶级国家是对社会实行社

会主义改造的必要工具。

在退出总委员会之后，马克思实际上仍然是国际工人运动思想上的领导者和顾问。虽然此后他从未在国际工人组织中担任过任何正式职务，但由于他在科学理论方面的巨大贡献和为国际工人运动建立的丰功伟业，他始终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起着无法替代的领导作用。而且，随着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不断提高，对革命理论的重要性认识得愈加深刻，他们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也更加崇敬了。

对于这种情况，恩格斯做了认真详尽的研究分析，并就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关系和作用问题作了辩证的阐释。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由于自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对于运动极端重要的特殊作用，就建立在这种基础上……”

马克思非常重视对工人运动的理论指导工作，总是努力帮助工人运动的领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

思想。为了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阐述的重要思想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并接受，他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再版和翻译这些著作。

考虑到普通工人群众在阅读理解《资本论》时会遇到困难，当时一部分工人运动活动家组织出版了一些通俗解释这些著作的读物。对于这种做法，马克思在原则上表示赞同，并给与支持和协助。但他对于从事这项工作的作者和译者们提出了相当严格的要求，对于那些粗制滥造的版本和不负责任的解释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会对国际工人运动产生不良的影响。例如，他对德国人约翰·英斯特出版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就很不满意，并亲自纠正了其中的一些严重错误。

在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一再要求各国的工人阶级发扬第一国际的光荣传统，坚决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1875年1月23日，伦敦举行了纪念波兰民族起义12周年国际大会。马克思此时正为肝病所困扰，但他认为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因此抱病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精彩的讲说。

在演说中，马克思首先高度赞扬了波兰人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英勇表现和他们给予巴黎公社革命的巨大支持，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然后，他深

刻阐释了波兰民族解放事业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波兰的解放将沉重地打击俄国、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的专制统治,并将推动整个欧洲的社会革命,因此,各国工人阶级应该全力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

马克思很重视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希望他们能够从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巨大的精神动力,从而不断地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从这一目的出发,他十分重视对巴黎公社历史的研究工作。

当马克思得知法国人、公社革命的参加者普·奥·利沙加勒正在撰写《1871年公社史》一书时,立即给予他大力支持和赞助。1876年,这本书在比利时出版了,马克思立即与德国出版商威·白拉克联系,希望由他在德国出版该书的德文版。他在给白拉克的信中写道:“这将是第一部真实可信的公社史。利沙加勒不仅利用了所有已经出版的资料,而且掌握了所有其他人不易得到的材料,且不说他所描述的事件大部分是他亲眼看到的。”当德国方面的出版事宜落实之后,马克思又帮助寻找译者,后来又亲自校对了对德文版的译文。

在晚年,马克思因身体等原因已不能经常外出旅行了,但他仍通过各种方式同世界各国的革命者们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在伦敦的家中经常坐

满了来自世界各个地区的拜访者和求教者，马克思总是尽量抽出时间与他们进行亲切详细的交谈。除此之外，马克思与外界进行联系的最主要的手段还是通信。

这一时期，马克思的通信联系范围仍然十分广泛，与他通信的人中有许许多多普通工人群众和革命者，但是与他经常有通信往来的仍然是各国的工人领袖和社会主义活动家，例如，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韦努伊埃、米维尔，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希尔施、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盖布、狄慈根，瑞士的国际活动家老贝克尔和培列，丹麦的皮奥等等，此外还有已经移居美国的左尔格、克林格库、波尔特、库诺、麦克唐纳等人。通过一封封来往的书信，马克思把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同时，也从各个国家和地区收集到了大量情报和革命运动的信息。

马克思同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相比较而言，要数他同德国工人运动的联系最为密切。这首先是由于德国是他的祖国，虽然他已不可能回去定居了，但那里发生的每一件大事仍在时刻牵动着他的心。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1871年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已经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

马克思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德国统一后的发展状况：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繁荣，铁路网迅速覆盖了全国，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萨克森、柏林、莱茵和鲁尔等地区形成了一个大大工业中心，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也在迅速壮大，工人运动正在阔步前进。这些事实证明了马克思早先做出的一个论断：德国的统一不仅对资产阶级有好处，而且对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斗争也是大有裨益的。

但马克思同时也看到，统一后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变得更为雄厚了，他们利用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而此时的德国工人阶级则仍然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之间仍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极大地削弱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反动政府的迫害下，工人阶级的力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许多革命领导人被捕入狱。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认为实现德国工人阶级的统一是此时德国革命领袖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只有实现了统一，工人阶级才能把一切革命民主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有效地抵抗反对政府的镇压，捍卫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

马克思的这一主张为德国工人阶级接受了。不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首领施韦泽因公开反对公社

革命被开除出党。阻碍德国两派工人联合的主要障碍被搬除了,于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于1874年向爱森纳赫派提出了合并的要求。

马克思赞同实现德国工人阶级的统一,但他反对无原则的合并,他在给社会民主工党的信中严肃地指出:合并的前提应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完全放弃拉萨尔的错误观点,两派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通过一系列谈判和协商,1875年3月7日,德国两派工人合并的纲领草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马克思看到这个纲领草案后大吃一惊,他发现其中竟然包含了一些庸俗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词句和内容,特别是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爱森纳赫派的领袖们向拉萨尔派作出了让步,而这种无原则的妥协只能为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泛滥铺平道路。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非常愤怒。

“这简直是一个耻辱!”马克思生气地说道,“我们早就向他们敲过警钟了,我们还有《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资本论》。为什么他们会犯这种愚蠢的错误呢?”

“这种合并是用高昂的代价换取的。”恩格斯尖锐地指出了李卜克内西等人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们已经再三向他们强调了这一点,不能用丧失原则来

寻求联合,但竟然毫无用处!”

“这个纲领是极其糟糕的!”马克思一边说着,一边急促地踱着步子。“它只能使党走向坠落,几乎每个字都应该给以批判。”

恩格斯完全赞同马克思的意见,他说:“我们应该再一次明确地告诉德国人,不!要告诉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能走别的道路!”

为了坚持原则,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路线,教育广大的工人群众,马克思立即抱病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后来被称为《哥达纲领批判》),并以通告信的方式把它寄给了白拉克、李卜克内西等德国党的领袖,希望他们能设法避免由于妥协而造成的恶劣后果。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合并纲领草案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批判,揭露并剖析了其中所包含的一些拉萨尔主义的错误内容并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例如,纲领草案认为:拉萨尔所说的“铁的工资规律”仍存在,如果这样的话,无产阶级为反对资本家而进行的自卫和罢工斗争就毫无意义了;纲领草案认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其它阶级“只是反对的一帮”,这样一来,工人阶级就会在斗争中失去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农民;纲领草案还无视无产阶级

的国际主义责任，表现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纲领草案提出要建立所谓“自由国家”，对建立无产阶级国家却只字未提；纲领草案还接受了拉萨尔主义的主张：“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社会合作社”，这就等于说社会主义不必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只要依靠德意志帝国的帮助就能实现，等等。

马克思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向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敲响警钟，告诉他们应该从公社革命中汲取经验教训，制订自己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以便更有力地同容克——资产阶级的德意志帝国进行阶级斗争，采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告诫德国党的领导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哥达纲领批判》的意义已经大大超过了马克思当时对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他所研究论述的是人类通向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必由之路，体现出了他对社会发展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和理解力。这本小册子后来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和共产党人的必读书。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们并没有完全

接受马克思的忠告。1875年5月下旬,他们与拉萨尔派分子在哥达举行了合并大会,原来的那个合并纲领只稍加修改便被通过了(后来被称为《哥达纲领》)。鉴于当时的斗争形势非常复杂,马克思没有公开批判它,他希望看到合并后的社会民主党能够在实际斗争中改正自己的错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令马克思感到欣慰的是社会民主党成立后组织发展相当迅速,在1877年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中,该党获得了近50万选票,12名党员当选为议员。但另一方面,由于党的纲领中存在拉萨尔主义的错误,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也在发展泛滥,其中杜林的活动给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面对这一现实,李卜克内西等人认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当杜林对马克思主义发动更为猛烈的进攻时,他请求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杜林的谬论。

此时,马克思正在修改《资本论》第二、三卷。为了不影响马克思的写作工作,恩格斯主动承担了批判杜林的战斗任务。从1876年5月起,他用了整整两年时间对杜林及其思想体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把他的反动观点批驳得体无完肤。在写作过程中,恩格斯得到了马克思的大力帮助,马克思时常抽出时间认真阅读分析杜林的著作,帮助恩格斯修改书稿,有时还亲自参加撰写工作。

从 1877 年 1 月至 1878 年 7 月,恩格斯的文章连续在《前进报》上刊载。后来,这些文章被汇编成书,题名为《反杜林论》,其中第二编第十章出自马克思的手笔。这是这两位伟人合著的最后一部著作。

第三十二章

巨星陨落

马克思是科学大师，也是工人阶级的卫士，他的功绩是不需要树碑立传的。证实他的业绩的不是青铜白石，而是来自全世界各个角落、响应他的不朽的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浩浩荡荡无产者的大军。

——左尔格

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的健康状况开始迅速恶化。就在几年之前,他给人留下的印象还是那样精力饱满、豪放有力。而如今,这种情形已经成了昨日的辉煌,各种各样的病痛几乎每天都在残酷地折磨着他,吞食着他羸弱的躯体。医生把他的病归咎于操劳过度缺乏生活规律和饮食不当,要求他改善饮食结构,充分休息,进行适当的锻炼和旅行,并把他的工作时间限制为每天4小时,早晚各一次。

在进入晚年后,马克思愈来愈多地目睹了同时代的老朋友和熟人相继离世,这位一向藐视命运的时代巨人也时常产生出一种人生苦短的悲凉感觉。

早在1864年拉萨尔去世时,马克思就向恩格斯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我们这一伙人变得越来越少了,又没有新人增加进来。”他有时也参加一些葬礼,向那些辞世的老战友们告别。每次葬礼后他的心情都格外沉重,长时间沉默不语。他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时光已经不多了,而自己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没有做完。因此,马克思没有完全遵守医生的嘱咐。

在晚年,除了卧病在床或者外出旅行疗养外,马克思仍然坚持每天早上八九点起床,洗涮完毕喝过咖啡后就开始工作。先是浏览近期的各种报纸杂志,然后按即定计划阅读书籍,研究分析文献资料,挥笔写作……累了就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除了吃午

饭外，一直不停地忙碌到深夜。他仍然保持着年轻时那种对科学和求知的热情，工作起来如醉如痴，完全沉浸在一种高尚优雅的精神境界之中。他一向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工作，一个人如果不能工作了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

马克思晚年的主要工作是修改充实《资本论》第二、三卷，因此经济学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

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他收集阅读了大量有关的书籍资料。例如，对于当时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学家格雷茨、毛勒尔、许尔曼、哲学家莱布尼茨、笛卡尔、经济学家考夫曼等人的著作和西方各国新近出版的有关书籍，他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写下了许多读书笔记，并摘抄整理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除此之外，马克思的研究还涉及到了更为广泛多样的领域，他似乎对于世上的各门学科及其分支都怀有极大的兴趣。

例如，马克思很喜欢数学，他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学的作用将会愈来愈大。他甚至有这样一种想法：只有能运用数学解决其专门问题，一个学科才能有长足的发展。因此马克思时常抽出时间从事数学研究，有时还把研究数学作为休息时的一种消遣。

马克思对自然科学也很重视，他认为要想真正了解自然界就一定要懂得数学和自然科学。因此，他

一方面支持恩格斯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同时，他本人也亲自对各门自然科学的应用进行了研究，并对技术发展史、甚至电子学和化学也进行过探讨。另外，马克思对于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也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马克思一生非常喜欢文学艺术，年轻时还曾亲身在文学和诗歌的海洋中纵情遨游过。虽然由于长期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理论研究，未能在这方面有更大的建树，但他对文学艺术的巨大热情却始终未减，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对文学艺术的热爱更加热烈执著了。凡是到过他的书房的人都会看到，他的书桌上总是放着许多文学作品。他告诉人们，对于他来说，阅读这些作品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和最好的休息方式。

马克思非常喜欢阅读世界文学巨匠们写作的小说，他把它们当作精美的精神食粮来加以享受。例如，他把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看作是一部反映衰落的骑士制度的史诗；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看作是对整整一个时代的生动描述，曾想在完成《资本论》后写一篇研究巴尔扎克的论文。马克思非常推崇俄国文学家们的作品，认为莱蒙托夫对大自然的描写是无与伦比的，普希金是“俄国文学的创始人、俄罗斯诗人之父、诗歌的太阳”。可能是长期旅居英

国的缘故,马克思对于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萨克雷和白特朗等人情有独钟,称赞他们是“杰出的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向世人揭示了“政治和社会真理”。

这一时期,马克思还经常去剧院看戏或欣赏音乐。他很喜欢听古典音乐,也喜欢听托马斯·穆尔等人创作的优美动人的抒情歌曲。在戏剧方面,他最喜欢看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且具有很高的鉴赏力。夫人燕妮更是一位戏剧迷兼评论家,1877年,她曾经在《法兰克福报和商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戏剧评论文章,其中许多观点反映了马克思的意见。

由于马克思涉猎的知识领域相当广泛,所以他学识渊博,知识面十分宽阔,头脑极其敏锐深邃,富有理性和激情,这些对于他从事理论研究和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大有裨益的。

1880年秋天,一位美国记者与马克思进行了一次交谈,事后他十分感慨地谈了自己的亲身感受,他写道:“他的谈话使我想起苏格拉底的对话。他的谈吐是那样不拘形式,明确利落,新颖独特,机智尖锐,真诚实在;还带有一些讽刺,有时幽默而令人愉快。他谈到欧洲各国的政治力量 and 人民运动,谈到俄国的人心思变,德国的思想变革,法国的运动,英国的停滞。他用充满希望的声调讲到俄国,用哲学的口吻论述德国,谈到法国时热情奔放,谈到英国时阴郁低

沉,至于谈到自由派在英国议会中为之耗费许多时间的那些‘微小的改革’他则十分蔑视。”

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千千万万共产党人的努力奋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得以广泛流传,它已经战胜了各种机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派,为愈来愈多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接受。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欧美各国),马克思都有大量的朋友和他的思想的坚定拥护者,他们在理论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按照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行动,并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不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动乱的岁月,这些革命志士们都经常给马克思写信,就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向他请教。而马克思不管工作负担多么重,身体状况多么恶劣,总是能够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给予他们热情的指导和帮助,各国的工人领袖们都把能得到马克思的亲切教诲视为一件十分荣幸的大事。尽管马克思从不喜欢沽名钓誉,更反对搞个人崇拜,但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在举办重大活动时,总是把马克思的肖像与他们国家民族英雄的肖像高高地悬挂在一起。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这一情况在

70年代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继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丹麦(1871年)、奥地利(1874年)、美国(1876年)、波希米亚(1878年)、西班牙(1879年)、法国和匈牙利(1880年)、英国(1881年)、波兰和意大利(1882年)等都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马克思恩格斯从70年代初起就致力于为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党而斗争,这一大批社会主义政党的涌现就是这一斗争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些政党都以科学共产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并且都在各自国家的革命斗争中起了极其重要的领导作用。

对此,马克思感到十分欣慰,他始终以热切和期盼的目光关注着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历史命运,不仅对欧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而且对于那些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状况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也是如此。1879年至1881年,他搜集了大量资料,编写了一部《印度历史编年大事记》,概括了印度几个世纪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史和印度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

但是,如同大自然中有晴空、阳光和彩云,也有狂风骤雨、雷暴阴霾那样,人世间也常有各种各样难以避免的灾祸。正当马克思、恩格斯愉快地品尝着甘甜的胜利果实,构建着未来宏伟美好的理想蓝图时,

巨大的不幸开始在他们两家人身上降临了。

1876年，恩格斯的妻子莉希病倒了。

开始，她患的是哮喘和坐骨神经痛，恩格斯曾多次带她外出治病疗养，一度控制住了病情。但到了1877年，莉希的病情开始加重了，为了减轻她的痛苦，恩格斯主动承担起了一部分家务。他在一封信中告诉友人：“只要我们家里稍微安排好了，我就首先带妻子到海边住两星期，使她增进食欲，而我也不致精疲力尽。如果您看见昨天晚上我是如何铺床的，今天早上是怎样在厨房生火的，您一定会发笑。”

到1878年夏天，莉希的病情迅速恶化，医生的救护只能使她的生命延长一些时日。

莉希在恩格斯身边已经度过了15个春秋，她内心感到非常幸福和满足，在行将辞世之际，她心中唯一的缺憾是没有与丈夫履行过正式的结婚手续，临终前她向恩格斯提出了这一要求。恩格斯一向认为去教堂举行结婚仪式是多余的，但这一次他爽快地答应了妻子的请求。

1878年9月11日，恩格斯携莉希去教堂举行了结婚仪式。几个小时以后，莉希含着幸福的微笑长眠在恩格斯的怀中。

莉希的去世对恩格斯的打击是异常沉重的，一连几个星期他都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一个人

隐居到一个偏僻的小地方,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哀痛。恩格斯深切地怀念这位给他带来了幸福和快乐的善良女性,敬佩她的革命精神和美好品格,多年后他在回忆莉希时写道:“我的妻子也是一个地地道道血统的爱尔兰无产者,她对本阶级的天赋的热爱,对我是无比珍贵的,在关键时刻,这种感情给我的支持,比起‘有教养的’、‘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小姐的细腻和小聪明可能给予的总要多些。”

不久,厄运又降临到了马克思一家人的身上。

从1876年起,马克思夫人燕妮患上了重病。到1877年,她的病情日益加重,于是,马克思和爱琳娜在夏天陪她一起外出医治疗养,使病情有所缓和。但时隔不久,燕妮的病开始迅速恶化,1880年,医生确诊她患的是肝癌。

剧烈的病痛给燕妮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使一向处乱不惊的马克思感到非常慌张,心绪不宁。但燕妮本人却表现得异常勇敢沉着。她强忍住病痛与亲人朋友们谈笑自若,只要身体许可还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和娱乐。1880年,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访问了马克思家。事后,他的一位随员在记述中写道:“当我们去拜访时,马克思夫人已经得了重病。但我们在他家吃午饭的那天,她为在午餐时向我们表示敬意仍然离开了病榻。她以友好的语言祝愿

倍倍尔和我身体健康,并提到了我们的活动,对倍倍尔的功绩给以恰如其分的赞扬,……她的举止表明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其言谈温柔而不过分。”

在坚持工作的同时,燕妮还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顽强地与疾病抗争。她告诉医生:“我不放弃任何希望,我还想多活几天,亲爱的好医生。奇怪的是人越日暮西山,他越留恋尘世。”

燕妮患病马克思使的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工作能力,而且还摧垮了他的健康。1880年秋天,他大病了一场。当时马克思家里的情形简直窘迫极了,爱琳娜在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那真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在前面大房间里躺着我们的母亲,后面的房间里睡着摩尔。那么相依为命、相亲相爱的两个人,此时竟不能同住在一间屋子里。”

然而,病中的马克思仍时刻牵挂着自己的妻子和未竟的事业,他以巨大的毅力又一次战胜了病魔。一天早晨,他艰难地从病榻上爬了起来,步履蹒跚地走进了燕妮的房间。爱琳娜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早上的情景:“他们在一起又都成了年轻人,好似一对正在开始共同生活的热恋的青年男女,而不像一个病魔缠身的老翁和弥留的老妇,不像是那将永别的

人。”

1881年夏季,被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燕妮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到法国去看望长女小燕妮和她的孩子(此时他们已迁居法国)。医生知道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旅行,但鉴于燕妮的病已经毫无希望了,因此破例答应了她的请求,满足了她的这一愿望。

7月末,燕妮在马克思和琳蘅的陪同下来到巴黎附近女儿家中小住了半个多月,完成了她人生的最后一次旅行。在这段时间里,燕妮的精神状态似乎特别好,她与女儿和小外孙朝夕相守,形影不离,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而又难忘的日子。直到家人和医生再三敦促,才依依不舍地返回了伦敦。

1881年12月2日,死神终于降临了。

弥留之际,燕妮紧紧握住马克思的手,含着微笑疲倦地对丈夫说了最后一句话:“卡尔,我不行了!”

燕妮的死使马克思感到无限悲伤,痛不欲生。从青少年时代起,他们就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一起承担着生活和事业的重担,共享人生的乐趣和痛苦,风风雨雨40多年,始终亲密得像一个人一样。如今燕妮在他的跟前去世了,马克思受到了一次最沉重的打击,他的精神变得有些恍惚,不禁回想起了40多年前燕妮对他说过的那句话:“你的爱情的终结和我

的生存的末日同时来临。并且在死亡之后,就再不可能复活,——因为只有 在爱情中相信生命继续存在。”

闻讯赶来的恩格斯看到马克思那种难以言状的表情,感叹地说道:“摩尔也死了。”

遵照死者的生前嘱咐,丧事从简,没有通知亲戚朋友前来吊唁。12月15日,在海格特公墓为燕妮举行了简朴的葬礼。由于医生的极力劝阻,病重中的马克思未能参加。

恩格斯在墓前致了悼词,他说道:

“这位具有极其敏锐的批判智能、巨大的政治上的机警、充沛的精力和热烈的性格、忠于自己的战友的女性,在差不多40年中为运动所做的事情,是社会公众看不到的,现代报刊的年鉴里也没有记载下来。这一切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感受得到。但是我深信:那些巴黎公社流亡者的妻子们还会时常回忆起他,而我们将时常为再也听不到她那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丝毫不损尊严的意见)感到若有所失。……如果有一位女性把别人的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燕妮的去世使马克思生命的航船几乎停止了行驶,正如爱琳娜写道:“摩尔的生命同母亲的生命一同逝去了。”事实也正是这样,燕妮死后,马克思仅继

续活了 15 个月。

料理完燕妮的丧事后，马克思接受了医生的嘱咐，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疗养。

1881 年底，马克思在爱琳娜的陪同下在英国南部海岸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又只身来到北非的阿尔及尔休养了两个多月。不巧，他在这里遇到了坏天气，从沙漠吹来的风暴和低温使他的病情恶化了。于是，马克思渡海来到法国南部的海滨城市马赛、尼斯等地休养了一个多月，6 月初来到了此时居住在巴黎附近阿尔让台的大女儿燕妮·龙格的家，用硫矿泉水进行治疗。8 月中旬，他到瑞士作了一次旅行，其间还去伦敦看望了恩格斯。回到法国不久他又病倒了，但更令他沮丧的是大女儿燕妮也得了重病，卧床不起。

马克思于 10 月份回到英国，他感到体力有所恢复，于是又开始了科学研究工作，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三版，并继续进行数学研究。

但时隔不久，马克思又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1883 年 1 月，他的大女儿燕妮因病突然去世了。

当爱琳娜带着这个噩耗赶来见马克思时，心情是极端矛盾沉重的，她后来写道：“我一生经历过不少伤心事，但是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却从未有过。我感到自己此去等于把死刑判决书带给我父亲。在漫

长的旅途中,我焦虑地绞尽了脑汁,不知该采取什么方式来把这件事告诉他。但是不等我开口,他已经从我的面部表情看出来。摩尔立刻就说:“我们的燕妮死了!”接着还命令我马上到巴黎去照看那些孩子。”

这次打击对于马克思来说是致命的,他被彻底摧毁了。

不久马克思病倒了。先是支气管炎发作,接着又患上了喉头炎,肺部也出现了脓肿,只能吃流质食物。爱琳娜、琳蕙和恩格斯等人竭尽全力安慰照料他,企图挽救他的生命,但都无济于事。

3月14日中午,伦敦上空阴霾密布,浓浓的迷雾把马克思的住宅团团围绕起来,北风在窗外呜咽徘徊。此时,马克思静静地坐在家中的安乐椅上,似乎正在凝神屏息地思考着什么重大的问题。在屋子的另一角,琳蕙正在缝纫东西。

电铃突然响了,琳蕙赶紧走下楼打开房门。

恩格斯轻轻走进来,低声问道:“尼姆,卡尔怎么样了?”

“他正在安乐椅上休息呢。”

两人说着话很快地上了楼,以免让重病在身的马克思独自一人留在房间里太久。

当恩格斯走进房间时发现:马克思“躺在那里睡

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脉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两分钟之内,就安祥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

噩耗迅速传遍了全世界,在各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中间掀起了悲痛的波澜。人们怀着对革命导师和领袖的爱戴之情,纷纷向伦敦发来唁函,对马克思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为全世界劳动者遭受的巨大损失而痛惜不已。但他们都坚定地表示:马克思将永垂不朽,他的辉煌业绩和伟大思想将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去完成宏伟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就连一些资产阶级的报刊也纷纷撰文,对马克思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报纸《新维也纳报》发表评论,认为应该把马克思列为“当代最重要和最杰出的人物”。而俄国的民主派刊物《司法通讯》则称:“卡尔·马克思是一个杰出人物和罕见的学者。”

3月17日,马克思被安葬在伦敦郊区的海格特公墓,与爱妻燕妮合葬在一起。他们安息的墓上只有一块仅仅刻着他们生卒年的简朴的墓碑。

海格特公墓是一个雄伟肃穆的处所,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庄重优雅的文化特色。整个墓地布局美丽雅致,场地宽阔,园林幽深,景物典雅怡人。

与马克思同在这里安息的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杰出人物,例如:马克思一生十分推崇的小说家

狄更斯就安葬在这里；离马克思墓不远处还有著名文学家乔治·埃利奥特的墓；而距马克思最近的一处墓穴的主人则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曾经批判过的实证主义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

马克思的葬礼很简单，只有他的孩子们、琳蕙和几个朋友伴送他来到墓地，正如梅林所说：“他的家人非常明理地免除了‘一切仪式’，因为那会显得和马克思的一生极不协调。”

有人说应为马克思立一块纪念碑，但他的亲密朋友和孩子们不同意。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崇高理想和光辉业绩是任何人工的纪念物所无法表现的，左尔格的话最准确地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他的功绩是不需要树碑立传的。证实他的业绩的不是青铜白石，而是来自全世界各个角落、响应他的不朽的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浩浩荡荡的无产者大军。”

在马克思的墓前，他的女婿龙格宣读了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挽词和唁电。恩格斯怀着无比沉痛和崇敬的心情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他说道：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

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附录

马克思年表

- 1818年5月5日 马克思诞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一个犹太律师家庭。
- 1830年10月 马克思进入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
- 1835年9月24日 马克思获高中毕业证书。
- 10月 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
- 1836年夏季 马克思与童年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秘密订婚。
- 10月 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
- 1841年4月 马克思获博士学位证书。

-
- 7月
1842年
马克思迁居波恩。
马克思前往科伦,于10月中旬出任《莱因报》主编。发表关于摩塞尔河畔葡萄种植者贫困状况的文章。
- 1843年1月
3月
6月19日
10月
12月
马克思发表一系列批判普鲁士新闻检查制度的文章。
马克思退出《莱因报》编辑部。
马克思与燕妮结婚。
马克思迁居巴黎。
马克思为《德法年鉴》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
- 1844年2月
5月1日
9月初
1845年2月1日
2月底
9月26日
马克思出任《德法年鉴》主编,与恩格斯建立通讯联系。
女儿小燕妮诞生。
恩格斯到巴黎拜访马克思,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友谊和合作。
马克思被驱逐出巴黎,迁往布鲁塞尔。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出版。
次女劳拉出生。

-
- 1846 年年初 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 5 月 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完稿。
- 1847 年 1 月 儿子埃德加尔出生。马克思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
- 6 月初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
- 7 月初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出版。
- 8 月 5 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和区部成立,马克思当选支部主席和区部委员。
- 8 月底 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组织德意志工人协会。
- 1848 年 1 月 马克思撰写《共产党宣言》
- 3 月 4 日 警察逮捕了马克思夫妇,后被驱逐出境,于 3 月 5 日到达巴黎。
- 3 月 10 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马克思当选为主席。
- 3 月 20 日 1000 册《共产党宣言》从伦敦送

- 到巴黎。
- 3月21—29日 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 4月11日 马克思、恩格斯到达科伦，筹办《新莱茵报》。
- 5月31日 《新莱茵报》创刊，马克思出任主编。
- 1849年2月 科伦陪审法庭审讯马克思本人。
- 5月16日 普鲁士政府下令驱逐马克思。
- 5月18日 《新莱茵报》出版红色终刊号。
- 5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前往南德地区。
- 6月初 马克思抵达巴黎。
- 8月16日 马克思被驱逐出巴黎，8月24日离境。
- 8月26日 马克思抵达伦敦。
- 8月底至9月初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重新在伦敦建立。
- 11月5日 次子吉多出生。
- 1850年3月6日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创刊，马克思任主编。
- 5月中旬 结识威廉·李卜克内西。

-
- 11 月 15 日 恩格斯到曼彻斯特经商。
- 11 月 19 日 吉多去世。
- 1851 年 3 月 28 日 女儿弗兰契斯卡出生。
- 1852 年 4 月 14 日 女儿弗兰契斯卡病逝。
- 5 月 20 日 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纽约出版。
- 10 月 4 日 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开始。
- 1853 年 1 月 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出版。
- 1855 年 1 月 16 日 女儿爱琳娜出生。
- 4 月 6 日 儿子埃德加尔逝世。
- 1859 年 6 月 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柏林出版,发行 1000 册。
- 1864 年 9 月 28 日 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举行成立大会,马克思被选入协会的临时委员会。
- 11 月 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在伦敦发表。
- 1865 年 12 月 马克思写完三卷本的《资本论》草稿。
- 1867 年 9 月 2 日 《资本论》第一卷问世。

-
- 1868年4月2日 女儿劳拉与保尔·拉法格结婚。
- 1870年9月18日 恩格斯结束经商生涯定居伦敦。
- 1871年5月30日 马克思写的关于巴黎公社的宣言《法兰西内战》被国际总委员会通过。
- 1872年10月10日 女儿燕妮同沙尔·龙格结婚。
- 1873年5月 《资本论》第一卷再版。
- 1875年5月 马克思把《哥达纲领批判》寄给白拉克。
- 1876年7月 国际工人协会解散。
- 1877年年初—8月 马克思写《反杜林论》的有关章节。
- 3月 着手修改《资本论》第二卷。
- 1880年6月 马克思病情加重,医生禁止他长时间工作。
- 1881年12月2日 马克思夫人燕妮病逝。
- 1883年1月11日 长女燕妮在巴黎病逝。
- 3月14日 马克思在他的伦敦住宅中去世。

3月17日

马克思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恩格斯致悼词。